话说中国千古之谜系列

黄山书社

中华民国之谜

王晓华 张庆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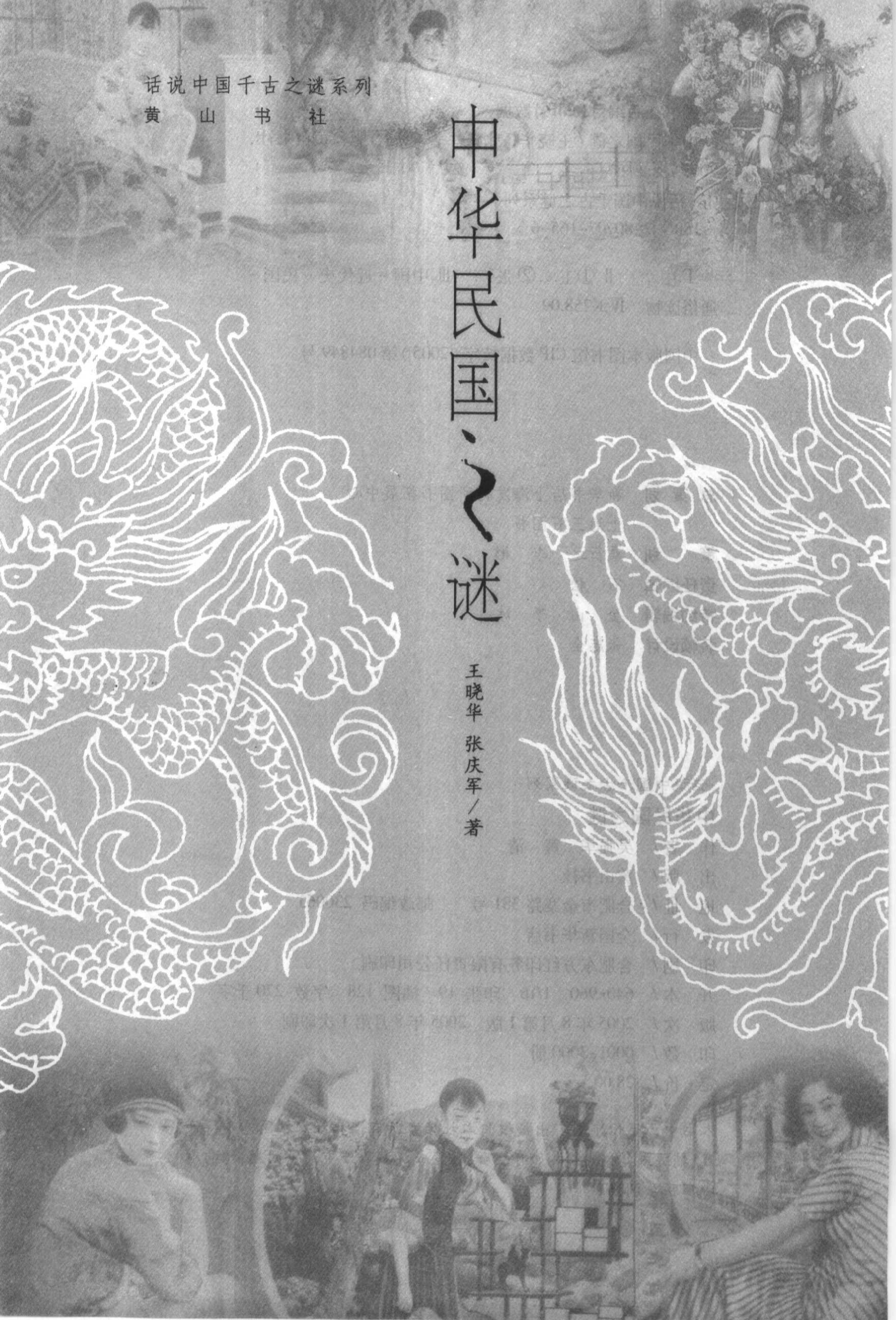


话说中国千古之谜系列

黄　山　书　社

中华民国之谜

王晓华　张庆军／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民国之谜/王晓华，张庆军著. —合肥：黄山书社，2005.7

（话说中国千古之谜系列）

ISBN 7-80707-165-6

Ⅰ.中… Ⅱ.①王…②张… Ⅲ.中国-近代史-民国-通俗读物 Ⅳ.K258.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84849号

总 策 划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图书拓展中心
上海三石图书

策　　划 桑行之　李　彬

责任编辑 石　松

特约编辑 金　山　李　冰

装帧设计 张志全

·话说中国千古之谜系列·

中华民国之谜

作　者/ 吴强华　黄　清

出　版/ 黄山书社

地　址/ 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 230063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东方红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　本/ 640×960　1/16　印张 19　插图 128　字数 270千字

版　次/ 2005年8月第1版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册

定　价/ 2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门无人不参与、无人不受影响的学问的话，那就是历史。

每个人，无论他（或她）是否愿意，实际上都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他（或她）的一切活动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尽管不一定被以文字记录下来，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复原的信息。即使是完全没有历史意识的人，也避免不了历史的影响，一般来说，他（或她）在一生中总要追溯家族或个人的往事，也不能不受到这些往事的影响。一个人的经历再丰富，所处的时代再重大，与人类悠久的历史及其壮阔的波澜相比就显得极其渺小，微不足道。正因为如此，历史能给人理念、知识、智慧、乐趣和享受，是其他学问所无法替代的。另一方面，要了解一个个人、群体、社会、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也必须从其历史入手。不了解其历史，就无法理解其现状，也难以产生真实的感情，维持必要的信念。所以梁启超曾有这样的说法："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但到目前为止，时间还是不受人类控制的客观存在。除了少量遗迹遗物外，人们无法直接观察过去存在过的事和人。尽管历史是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事实，但想了解历史，只能通过能够显示或反映这些存在的信息（主要还是文字）的记载。随着资讯的发达，文字以外的信息，如照片、图像、音像、实物等今后也会占越来越大的比重。但无论如何，历史都不可能是以往直接、简单的复原，只能是后人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所谓"意识"和"选择"，不仅是指历史的叙述者，而且也应该考虑历史的接受者。同样的史实，不同的叙述者完全可能选择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侧重点，运用不同的叙事方法，寄托不同的感情，同时也应该考虑针对不同的对象。

历史学者应该明白，绝大多数历史爱好者了解和学习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是为了获得信念、知识、智慧和乐趣，所以必须根据他们的需要，提供他们便于接受、乐意接受的读物，而不能一味强调学术性和专业性。近年来，戏说历史充斥于影视，固然使历史学家不无忧虑，但另一方面也正说

明民众对历史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如果我们“正说”历史时也能写得生动可读，引人入胜，何愁缺乏读者？也就不必担心真正的历史不为人所知了。

这套《话说中国千古之谜系列》共九册，达数百万字，分别是《大唐王朝之谜》、《大宋王朝之谜》、《大明王朝之谜》、《大清王朝之谜》、《中华民国之谜》、《中国宫廷之谜》、《中华国宝之谜》、《中国王陵之谜》和《中国帝后之谜》。作者都是上海高校的历史教师或专业研究人员，我与他们虽然素不相识，但了解了这套书的概况后，感到他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尽了一位历史教师的职责——不但要在课堂上教历史，还应该向全社会普及历史。

或许有人以为，近年来图鉴、故事体的历史普及读物已经出版过不少，如上海就有辞书出版社的《中华文明传真》、人民出版社的《中华文明通史图鉴》，最近出版的《话说中国》更是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些高质量的读物大多简明扼要、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备受读者欢迎。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根据不同读者的需要加以选择；在确保学术水准的同时，尽可能采用生动活泼的叙述方式；在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上，注重知识性和趣味性——是这些读物的共同特点。只要做到了这些，这类书应该多多益善。而对我们这个拥有上亿读者的国家来说，对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已经出版的这些书是远远不够的，何况不同的作者和不同的读者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我相信，这套书也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至于书名所说的“谜”，只是一种叙述的方法，作者提供的还是“谜底”——历史真相。其实有的谜早已不成其谜，已有公认的答案；有的却不止一个谜底，还有的至今尚无谜底，或许永远不会有谜底。这不是作者偷懒，或故意留一手，历史就是这样——是千古遗憾，也是永恒的魅力。读者有兴趣，不妨自己也去找找谜底！但历史本来就是个大迷宫，小心别走进死胡同。

葛剑雄

2005 年 7 月

前言

只言民国事，不说民国史。自2005年4月下旬开始，海峡对面的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和平之旅”以来，不旋踵，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搭桥之旅”和新党主席郁慕明的“民族之旅”纷至沓来。他们的大陆之行，必访问古城南京，来南京一定要登上392级台阶，拜谒中山陵。以此为契机，将两岸关系推到一个新阶段。于是，素有“火炉”之称的“民国首都”南京的浪漫夏天，充满着沧桑感的总统府、洋溢着无限魅力的中山陵，那里的旅游可用“炽热”、“大火”来形容，平均每天有几万人，中山陵最多的一天有十几万人。许多游客，特别是年轻人，抚今追昔，追根寻源，游民国旧地，不约而同开始对中华民国那段并不太遥远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上今年正值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对无数为国流血捐躯的抗日先烈们的缅怀和纪念，无疑也带动了一般老百姓了解民国历史的兴趣。当今时代，旧貌换新颜，让历史专业的本科生去研读李新、杨天石和张宪文等民国史研究大家的大部头，可能都勉为其难，何况一般读者，对陶菊隐等名家的《北洋军阀史话》等巨著，无论从理论到语言，或许都时过境迁，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已经不太适合。与时俱进，不但是一句时髦的口头禅，而且是时代的需求。因此，编撰一本浅显易懂且能令读者产生兴趣的《中华民国之谜》，也应该算是应运而生吧。我们实在不敢忝为什么专家、学者，也没有哪个领导会让我们用公费参加什么学术讨论会，就像公费旅游一样。我等只是在弥漫着古旧霉潮气味的存放民国案卷的档案馆里“熏陶”了一二十年的普通工作人员，说实话，自知水平有限，斗不起胆量去写什么藏之深山、传之后世的几百万字的民国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政府史，只能写几本通俗的小册子让读者阅读。我赞赏毛泽东的一句语录：“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里解放出来。”我们的目的也是想把民国史从研究者的书斋里“解放”出来，变成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故事。利用公布的史料和一些当事人的揭秘性的回忆，还有选取了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将民国史上一些重要的或带有新闻聚焦性的故事用通俗的笔法写出来，就像日暮深山里的缕缕炊烟，给人一种精神上的补充就行了。且打住，有读者可能会问：

你们是在戏说吗？不对！我们是天天看着民国档案过日子的，虽然档案的东西也不一定都是真实的，但只要有出处，也能算是一家之言吧。

俗话说，萝卜快了不洗泥。没办法，快节奏的时代，就要有快餐文化，就要有“快枪手”，我们也想在一个早晨就打倒“蒋介石”，但是同志哥，岁数大了，力不从心，想快也快不起来。只能利用看电视、玩游戏的时间，让空调赶着电表的速度，玩命地敲电脑键盘。如果没有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完颜绍元先生推荐我们写此书；如果没有责任编辑不厌其烦地“催命”，这本书可能就得拖到和秋菊一起面市了。不过，假如真到那时，对出版社来说，就晚了八秋了。

王晓华

乙酉年头伏于石头城

目　　录

政治事件

五色青天　中华民国国旗之谜 …… 001
帝王之梦　中华民国国玺之谜 …… 004
波诡云谲　“中山舰事件”之谜 …… 008
一箭双雕　新生活运动之谜 …… 014
子承父业　三青团被国民党吞并之谜 …… 018
法治与人治　胡汉民反蒋之谜 …… 020
谁是犹大　邓演达被捕之谜 …… 024
李代桃僵　王亚樵暗杀宋子文之谜 …… 029
密谋反蒋　刘湘被“吓死”之谜 …… 032
冲突罗网　蔡锷将军离京之谜 …… 035
冒名顶替　昆明血案之谜 …… 037

外交风云

以夷制夷　《二十一条》被泄露之谜 …… 041
光荣归谁　火烧赵家楼之谜 …… 044
千秋功罪　外蒙古撤销自治之谜 …… 047
权益之争　日奉铁路交涉之谜 …… 051
雾里看花　《田中奏折》真伪之谜 …… 055
双重面具　高宗武真实身份之谜 …… 058
胳膊肘往外　史迪威被“炒鱿鱼”之谜 …… 062
伸张正义　沈崇事件曝光之谜 …… 065
等待变化　司徒雷登滞留南京之谜 …… 068

司法案件

钱能通神　东陵盗宝案审理之谜 …… 072
手眼通天　施剑翘被特赦之谜 …… 076
不了了之　徐道邻状告冯玉祥之谜 …… 080
杀人灭口　汉奸缪斌被枪毙之谜 …… 084
黑吃黑　周佛海被赦之谜 …… 087

情迷法乱　昆明胡致中案之谜 …… 092
反共有功　冈村宁次被释放之谜 …… 095
代人受过　赵秉钧暗杀宋教仁之谜 …… 099
此恨绵绵　廖仲恺被刺之谜 …… 103
血泪黄花　黄慧如情奔之谜 …… 105
沪上奇案　张伯驹被绑架之谜 …… 111
月黑风高　永和金号案之谜 …… 112
怀璧其罪　蒋范卿投匪之谜 …… 115

经济疑云

扰乱金融　直奉战争中的假币之谜 …… 118
谁在操盘　江浙财阀之谜 …… 121
强取豪夺　中国银行被吞并之谜 …… 126
以权谋私　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之谜 …… 128
上下其手　黄金风潮之谜 …… 133
内部作案　币制改革泄露之谜 …… 137
“窝里斗”　蒋经国“打老虎”失败之谜 …… 142
走私与缉私　蒋桂鸦片争夺之谜 …… 146
以毒攻毒　中日假币大战之谜 …… 150

军事斗争

并非“原创”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口号出处之谜 …… 153
权宜之计　马占山“落水”之谜 …… 156
旁观者清　西安事变被预测之谜 …… 162
欲加之罪　卢沟桥事变第一声枪响之谜 …… 166
以水代兵　黄河决堤策划者之谜 …… 170
不择手段　冈村宁次偷地图之谜 …… 173
“不带刀的将军”　冈村宁次军刀下落之谜 …… 177
刀下留人　孙元良逃生之谜 …… 180
顾问之死　鲍尔粹死之谜 …… 183
害蒋？救蒋？　何应钦主张讨伐西安之谜 …… 184
代人背过　杜聿明解决龙云之谜 …… 187
曹营汉心　卫立煌东北战场用兵之谜 …… 191

醉翁之意　蒋介石急欲出兵朝鲜之谜 …… 194
替罪羔羊　长沙大火案之谜 …… 196

名人与文化

妻妾成群　蒋介石婚姻之谜 …… 199
水落石出　蒋纬国身世之谜 …… 204
扑朔迷离　蒋介石“胞兄”之谜 …… 209
魂归故土　蒋介石墓址之谜 …… 213
旧情难忘　王赓“丢”地图之谜 …… 215
“人言可畏”　阮玲玉遗书之谜 …… 219
红颜烈女　方君瑛自杀之谜 …… 223
多出个爹　马占山弃亲案之谜 …… 225
相煎何急　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之谜 …… 229
口舌之争　鲁迅与“四条汉子”产生矛盾之谜 …… 232
误会与隔阂　吴宓与钱钟书师生失和之谜 …… 235
踏破铁鞋　“北京人”头盖骨失踪之谜 …… 238
谁为祸首　邵飘萍被枪杀之谜 …… 241

特工汉奸

怪西人案　牛兰事件之谜 …… 245
案中有案　河内刺汪案之谜 …… 247
歪打正着　中国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之谜 …… 253
“妖艳的白蛇”　郑萍如间谍案之谜 …… 257
将星陨落　叶挺飞机失事之谜 …… 261
恶有恶报　戴笠座机失事之谜 …… 263
惟我独尊　保密局谋刺李宗仁之谜 …… 266
出卖情报　黄浚间谍案之谜 …… 270
巧设陷阱　汪精卫叛逃之谜 …… 272
文人掌兵　汪伪军权掌控之谜 …… 275
乞求活命　褚民谊“献”孙中山肝脏之谜 …… 280
买凶锄奸　李士群被毒杀之谜 …… 284
世人皆欲杀　汪精卫死亡之谜 …… 287
失节落水　周作人当汉奸之谜 …… 290

政治事件

五色青天　　中华民国国旗之谜

清朝没有国旗，只有象征皇权统治的黄龙旗，而且是三角形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外交往日益增多，1889年5月，有个叫张荫桓的大臣，要出使国外，请朝廷定长方形黄色龙旗为国旗，这样龙旗成为清朝的国旗。中华民国成立时，临时参议院决议用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到后来为什么又换成青天白日旗呢？这里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895年，兴中会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会员陆皓东设计了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之旗，旗底为蓝色，以示青天，旗中置一白日，有白光芒十二道。因广州起义失败，陆皓东死于是役，该旗未能使用。1900年孙中山在惠州三洲田起义时，第一次打出青天白日旗为标帜。其后，兴中会骨干尤列在南洋创立中和堂，各会所均悬青天白日旗。当时旗上所列叉光多寡不一。后经孙中山解释：叉光代表干支之数，应排做十二，以代十二个时辰，从此成为定制。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在青天白日旗上加红地，改成红、蓝、白三色，以符合世界上自由、平等、博爱之真意，想以此旗作为革命军国旗图样式。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的形式不美观，以太阳为标志，是效法日本国旗。于是设计了井字旗，表示平均地权之意，但被孙中山否定。

1907年的潮州、黄岗、七女湖、钦州防城、广西镇南关等起义，以及1908年钦州马笃山、云南河口起义，和1901年、1911年4月广州诸役中，革命党均打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反清的象征。

1911年5月，湖北革命团体共进会领导人刘公、孙武等联合文学社，积极筹备反清起义，绘制了十八星旗，以备起义使用。红地和黑九星象征“铁血”，说明革命必须使用武力，以热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黑九角星内，外角上共有十八颗金黄色的圆星，代表关内十八个行省；黄色代表黄帝子孙，意味着这是一次民族大团结的革命。同时秘密制作了星旗。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共进会机关内装制炸弹，不慎

爆炸。俄国巡捕赶来搜查，将革命党人的有关文件、书信和起义者名单等统统抄去。当天晚上，武昌小朝街总部被军警搜查，革命党人彭楚藩被捕，革命军总司令蒋翊武出逃。消息传来，为了不坐以待毙，新军工程营的革命党人在10日凌晨，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他们在裁缝店找到两面十八星旗，将其悬挂在阅马厂湖北军政府门前。很快，十八星旗便成为辛亥革命的象征。武昌起义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当时各省所用旗帜共有四种：

（一）湖北军政府、湖南军政府（焦达峰）为共进会的十八星旗，即武汉旗。

（二）上海、江苏为五色旗。11月3日，同盟会会员陈其美和光复会会员李燮和率领商团、学生、敢死队和部分军警在上海举事，进攻江南制造局。4日，上海光复，李燮和被推为临时总司令。有人挂出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以示庆祝。12月2日，南京被江浙联军克复。上海一部分人建议，用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作为光复旗，并通函全国。不久，上海、南京等长江下游地区皆悬挂五色旗，作为新政权的象征。

（三）广东军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三色旗。11月9日，广东宣告独立。同盟会领导人之一胡汉民就任广东都督，在全城悬挂起孙中山制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四）陈炯明在惠州举兵时，使用了井字旗。当时，除了北方少数省还悬挂大龙旗外，武汉旗十八星旗、上海、南京五色旗和广东青天白日旗成为革命旗帜的主流。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自沪抵宁，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决议，以五色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取红、黄、蓝、白、黑五色，代表汉、满、蒙、藏、回五族共和之意，请孙大总统颁行全国。1月12日，孙中山复函临时参议院，认为用五色旗作为国旗有三点不妥：（一）清国旧例，以五色旗作为海军一、二品大官之旗。今废清国国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体。（二）五色旗的用意为五大民族，但用颜色代替，取意不准确，譬如用黄色代表满族。（三）既然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因此，孙中山认为，从旗帜的历史、旗帜的取意和旗帜的美观而论，用青天白日旗为宜。更何况其时独立各省所用之旗有十八星旗、五色旗和青天白日旗三种，用其一必废其二，所以不能遽付颁行。待清廷覆亡，民选国会成立后，再将国旗问题交国民公决。

在此期间，外交上发生了两件大事，皆与五色旗有关。一是荷属八达维亚爪哇岛泗水埠（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华侨，得知清帝逊位，共和国

成立的消息后，欢喜异常，升起五色旗并燃放鞭炮进行庆祝，遭到殖民当局的无理镇压，当场被荷警开枪打死三人，打伤十多人，拘捕数十人。不久，华侨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请求保护。

孙中山就荷属爪哇殖民当局迫害华侨事件，召集南京临时政府内阁开会，议决照会荷兰政府，提出：（一）限三日内释放被捕者；（二）赔偿财产损失；（三）被害者之赔偿；（四）恢复人权，与欧侨、日侨一律看待，并限一星期内答复。否则将禁止通商，不准民国悬有荷兰国旗。荷兰政府外交部复照中国驻荷兰临时外交代表刘镜人，就爪哇殖民当局侮辱五色国旗，暴虐华侨事件强行诡辩，竟胡说中国“不应将改建国体事通告华侨”。

另是驻日本公使汪大燮向日本政府通报中华民国成立，以五色旗为国旗后，2月24日，在日本神户、大阪等地，当地华侨在中华会馆召开中华民国共和祝贺会，当晚，举着五色旗，提灯游行庆祝时，也发生日警毁旗拘捕华侨和留学生事件。

这些外交事件表明：五色旗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国际上已成为既定事实，有了一定的影响。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5日，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5月6日，临时参议院讨论国旗统一案。以蔡元培为代表的革命党议员们，坚持用青天白日旗作为国旗。湖北省的议员则认为，十八星旗与辛亥革命有密切关系，应以此为国旗，以示不忘武昌革命。但有人反对说：十八星旗代表独立的十八行省，不包括内外蒙古、东三省、新疆、青海、西藏。现在约法规定：民国分26个区域，是不是要改十八星为二十六星？可见，用十八星旗是不合适的。最后江苏都督程德全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代表汉、满、蒙、藏、回五族，作为中华民国国旗，以十八星旗作为陆军旗，以同盟会青天白日旗作为海军旗。此方案由北京政府正式公布。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流亡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在颁发的党证及委任状上，均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党旗，交加于上。1916年，在“护国运动”期间，起义于山东潍县和广东各地的中华革命军，都打出青天白日旗作为标志。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宣布废止五色旗及十八星旗，规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和军旗。为了推翻北京政府，孙中山在桂林建立北伐大本营。1922年1月1日，在大本营所在地举行隆重的升

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之典礼。1923 年，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大元帅府，孙中山就职之日，正式举行阅兵授旗礼，青天白日旗重新飘扬在广州上空。1924 年 10 月，孙中山北上途经香港时，军舰上悬挂着青天白日旗，港英当局遣人上舰交涉说："如改悬五色旗，当以礼接待。"孙中山不予理睬。1925 年 7 月 1 日，国民党在广州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军事委员会"告诸将士文"中，号召"吾同志和军人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一致团结"，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1927 年 4 月 18 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1928 年北伐成功后，东北易帜。"青天白日"旗统一南北。

1937 年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12 月 14 日，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成立了以王克敏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开恢复五色旗为"国旗"。1938 年 3 月 27 日，在南京国民政府所在地，汉奸梁鸿志也升起了五色旗，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 年 12 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逃离战时陪都重庆，公开投敌。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他合并了南北两个汉奸伪政权，着手组织汪伪中央政府。他打起"继承中华民国法统"的旗号，规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但汪精卫提出的国旗方案，却不被日本主子认可。最后，汪精卫同意，在青天白日旗旁边再加上一个黄布条，上写"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战败，当时南京及全国的国统区又在蒋介石的青天白日旗统治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经过三年浴血奋战，于 1949 年 4 月 23 日终于解放了南京，第三十五军冲进总统府，降下了象征蒋介石统治的青天白日旗，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在同年 9 月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讨论了新中国的国旗和国徽。最后，一致通过以五星红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至此，五星红旗取代了青天白日旗，正式成为中国国旗。

帝王之梦　　中华民国国玺之谜

国玺是封建王朝的帝王在国家大典、重大政事及交换国书时使用的印章，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中华民国是结束两千多年帝制后诞生的国家，有没有国玺？如果有国玺，那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1927 年 4 月 17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在南京召开。

参加者有蒋介石、柏文蔚、吴敬恒、张人杰、甘乃光、陈果夫、胡汉民、李煜瀛、蔡元培等，会议议决于4月18日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将原来广州国民政府的“国民政府之印”，改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

4月18日上午9时，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柏文蔚、吴敬恒、张人杰、甘乃光、陈果夫、胡汉民、李煜瀛、蔡元培等在南京丁家桥前江苏省议会举行国民政府定都典礼。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仓促，其时没有国玺，只镌刻了一方“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由监察委员蔡元培代表国民党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受印。

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登上中国最高权力宝座的蒋介石，却存有帝王专制之野心，急需要一颗新的国玺来替换“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在他的授意下，11月2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议决：“制玉质国玺，文曰‘中华民国之玺’。”后来又规定了国玺的尺寸、形状。由于一时缺乏荆山之玉，只好留待日后。

北伐胜利后，为防止诸侯坐大，蒋介石要控制、缩小各集团军的力量，1929年3月，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矛盾激化，蒋桂战争一触即发。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的李济深以鲁仲连自任，出面调停蒋桂之间的矛盾，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他向蒋介石荐言，不要派遣中央军进入湖南，防止战争爆发。蒋介石装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模样，表示：“请任潮兄(李济深字)转告李宗仁、白崇禧，蒋某决不向湖南派兵。”李济深满心欢喜，电告李、白停止军事行动，说蒋介石已经同意“和平解决湘事”。

熟料，中央军突然开进了湖南。李宗仁、白崇禧感到被李济深欺骗了，进行电责。李济深对蒋介石的出尔反尔行为也十分气愤，为了表示自己是与广西保持一致的，他电告李、白：“如蒋军继续入湘追击，可予迎头痛击。”

此电还未发出，便被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所截获。李济深成了阶下囚，被蒋介石囚禁于南京郊区的汤山，罪状为“主使部队抗命称兵，分头发难，谋叛党国”。国民党中央也做出了永远开除李济深党籍，褫夺一切职务的决定。春夜独思，李济深发出“丢了将军印，问渠何所之”的感叹。

顺带说一下，根据国民政府印信条例规定：最高级别的将军印，即蒋介石，为特级上将，将军印为8.8×8.8厘米；上将印为7.5×7.5厘米；中将印为6.7×6.7厘米；少将印为6.5×6.5厘米。李济深做过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如果他有“将军印”，丢掉的应该是7.5×7.5厘米规格的一种。

蒋桂战争爆发后，李宗仁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第四集团军很快瓦解。此时，粤系将领、李济深部下陈济棠正滞留沪上，李济深被囚禁后，陈济棠公开支持蒋介石，蒋介石遂委陈济棠为广东特派员，将两广大权交给陈，令其“随即返粤，不必入京”。

陈济棠受宠若惊，回到广东发表通电，就任中央编遣特派员职务，他命令桂军立即离粤，并计划三个月内将两广军队整顿完毕。

陈济棠此举加剧了粤桂间的矛盾，不久，李宗仁发兵沿西江而下，进攻广东。陈济棠投靠蒋介石，接任第八路总指挥，调遣蒋光鼐、蔡廷锴部迎击桂军，大获全胜，桂系残部由李明瑞收编。



被称作“南天王”的陈济棠

陈济棠在广东立住脚后，又以李明瑞“赤化广西”为借口，就势夺取了广西的地盘。陈济棠从一位粤军师长一跃而成为“南天王”，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但不知道怎样回报蒋介石，于是他专门咨询了古应芬。

古应芬字勷勤，广东番禺人，同盟会元老，曾任孙中山广州大本营秘书长、大本营财政部长、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等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古应芬任财政部长，后任文官长。古应芬告诉陈济棠：蒋介石亟须一颗国玺，但没有合适的印材。

陈济棠立即派人去缅甸，踏破铁鞋，终于寻到一块上好的青翠玉石，以9 500元大洋的高价将其购回，并托古应芬带到南京，献给蒋介石。

蒋介石请玉石专家鉴定，果然是块稀世珍宝，决定以此制成国玺，遂将这块缅甸玉石交给印铸局局长周仲良，让其负责刻玺工程。

周仲良专门组织了一套人马，自己亲自督制。技正施震华（别号子肩）担任设计绘图，唐源邺（别号醉石）、刘云逵（别号心僧）任监工助理，技正王褆负责监工并篆文，玉匠陈世科、陈燮之父子担任篆刻工作。

这里要专门介绍一下王褆其人。王褆（1878～1960）初名寿祺，字季维、福盦、屈瓠，别署罗刹江民，晚年自号持默老人。民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西泠印社的创办者之一。凡钟鼎、籀书、隶书、楷书无所不精，尤通晓治印。他喜欢收集印章，自嘆为“印佣”。民国初年曾在北京政府印铸局任技正，袁世凯的“中华民国之玺”六个篆字就出自他的手笔。

此次王褆使出浑身本领，书写了“中华民国之玺”几个字，与北京政府的玉玺篆字风格有异，更见功力。

刻玺工程从1929年7月1日开始，到10月9日国庆前一日琢刻完竣，成为向双十节献的一份大礼。

南京国民政府的这枚国玺，比北京民国政府的国玺略有扩大，为13厘米，更显厚实庄重。印铸局局长周仲良特意为此事题识如下：

国民政府于上年十一月二日第五次国务会议决议，制中华民国之玺一方。续于第八次国务会议核定玺文及尺度。惟以相当玉材难得，久未能制。今年夏，适陈济棠同志捐送缅甸翠玉为制玺用，托古文官长赍京。经第三十一次国务会议议决，复经第三十二次国务会议核定玺钮图式，遂于七月一日开始琢制，国庆前一日告成。重九十二两七钱，台高九公分，二面方十三公分。二玺钮为四环柱，分列虞书十二章，取中华民族文明达于四表意。钮顶中端为党徽，示党高于一切之意……

中华民国十八年国庆日周仲良谨识

1929年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国民政府明令，于国庆日启用国玺。

后来，考试院院长看了周仲良的题识，认为该文中有不确之处，特地予以更正。文曰：

监制国玺者为印铸局局长周君仲良，其所记经过及度量数字均正确无误。惟诠释钮顶文之青天白日谓之党徽，又云意在党权高于一切，实为随俗之误会。我国父定青天白日为国徽，其意义之广大深远已自明显。三民主义即青天白日之用，天心人意皆以青天白日为大中至正之体，而诚正修齐治平之工夫，亦无不以青天白日为楷模。余追随国父者有年，国府议定玺案余亦在席，因略志之以告后贤。



蒋介石、白崇禧(右)、何应钦

1936年，两广事变发生，陈济棠与蒋介石翻脸，起兵反蒋。他否认自己献玉的媚蒋

之举，辩解说献玉是“表示余拥护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如玉之纯粹坚决，爱国爱党意志如玉之坚贞之意”。（《陈济棠自传稿》）

1949年4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率领和谈代表飞抵北平，与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4日，朱蕴山、刘仲容从北平飞回南京，带来了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一个重要口信：只要李宗仁把总统大印和国玺带在身边，无论在哪里都可以签订和平协议，并凭此可做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宗仁听后默不作声。

4月23日，李宗仁带着中华民国之玺和总统大印逃离南京，辗转去了广州。不久，李宗仁去美国养疴，蒋介石趁乱恢复总统制，那颗“中华民国之玺”，最终被蒋介石带到了台湾。

波诡云谲　“中山舰事件”之谜

1926年3月18日，时任国民革命军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接到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的命令：奉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指令，速派中山舰到黄埔候用。3月19日，中山舰开赴黄埔之后，蒋介石却断然否认调派之事，并以中山舰擅入黄埔，是共产党阴谋暴动为由，先后抓捕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和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及中山舰上的共产党员，罪名是“中山舰异动”，李之龙“矫令派舰”。3月20日凌晨，宣布广州市戒严，抓捕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围攻省港罢工委员会。随后又强迫在第一军中工作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该军。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山舰事件”是著名的“司芬克斯”之谜，至今尚未彻底解开谜底。汪精卫的心腹陈公博在其所著《苦笑录》中说：

有名的三月二十日之变，也和西安事变一样，同是一个难解之谜。不过三月二十日之变，其难解是原因；而西安事变，其难解是在结果。我听说蒋先生曾在他的日记中略述三月二十日之变的来由，不过截至我写这篇记载为止，蒋先生还没有将他的日记公布，他的记载只是一种非卖品，专用以为对于他的部属宣传，我始终没有读过。只是有一次汪夫人陈璧君对我说过，她一日无意中在汤山俱乐部与我见过一次，我问她怎样说法，她笑了一下说：“还不是说那次因为汪先生要杀他吗？”



在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如今已没有往日的辉煌和热闹

蒋介石的心腹王柏龄也在其所著《黄埔创始之回忆》中宣称，“当中详细惟鄙人与蒋先生二人知之”，可是他又说：“未待蒋先生许可，我固不敢披露。”

两位当事人的心腹，一是不知真情，一是知而不言，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将答案推到蒋介石的日记中，这也符合蒋介石自己的说法：“若要三月二十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那时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然而，蒋介石的日记迄今尚未公布。所幸的是，毛思诚曾读过这部分资料，并将它分类摘抄，一部分经修改后作为《蒋公介石年谱初稿》的写作资料，其中曾涉及此事。

其实，蒋介石对此事也是多猜测而少证据，请看他在事发后不久的解释：

> 当三月二十日前两天，即三月十八那一天夜晚，无缘无故开两艘兵舰到黄埔来。一艘是中山舰，一艘是宝璧舰，这两舰是在广州最大的舰。当时我并不晓得他是已经开到黄埔来了。到了第二天，即十九日，有一同志——他的名字不能宣布——问我，起初见面时就问我：“今天你黄埔去不去？”我说：“今天我要回去的。”后来离别了他之后，到了九点至十点钟模样，那同志又打电话来问我：“黄埔什么时候去？”如此一连打了三次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去，当他打第二次的电话，我还不觉得什么，直到第三次来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有些稀奇，为什么那同志今天总是急急地来问我去不去呢？如果没有缘故，他从来没有这样子来问的。我后来答复他说：“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他晓得我是不去黄埔了。后来不到一

点钟的时候，李之龙就打电话来问我，说他要调中山舰回省城，预备给参观团参观。我问他中山舰什么时候开去的，他答昨晚上开去的。我说我没有叫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因为十九日十点钟，晓得我不回黄埔，所以当日下午就叫中山舰回省城，开到省城的时候，已是天黑了。因为李之龙上午的电话，我很奇怪，为什么既没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又要来问我？因为从来开船并没有来问过我的。后来问他："哪个叫你开去的？"他说是校长的命令，又说是教育长的命令。我要他拿命令来看，他又说没有，是打电话来的。这事情模糊极了。等到中山舰回省城之后，应该没有事情就要熄火，但他升火升了一夜晚，形同戒严。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回黄埔在省里，他就开回来省城，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所以我一面派兵到中山舰去震慑，一面要李之龙来讯问，因为他是代理海军局长，不能不负责任。这就是当时的情形。其余的话，现在还不能发表。总之，现在这事情还没有十分明白，我亦不愿意十分追究。

蒋介石在此谈话中提到的某位不断给他打电话的"同志"，就是汪精卫，是他的政敌。他的怀疑出发点即在于中山舰突然无缘无故的频繁调动，他担心这其中将有不利于他的行动。由此可见，他后来做出的反应全部是建立在臆测的基础上的。

让我们再听听海军局长李之龙的申辩。他在后来所著的"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一文中回忆说，此事他完全不知情，一切都是按规定做的：

三月十八日晚上，有三人来文德楼之龙寓所，一人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饬派能战斗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校长调遣。时适之龙外出，此三人即交下作战科邹科长一函留呈之龙。及之龙是晚回家启视，该函略云："军校办事处欧阳钟秘书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派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职（邹科长自称）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决定一艘"云云。之龙阅毕，即往对门自由舰长谢崇坚家商量派该舰前往。据自由舰长云，该舰新从海南返省，机件略有损坏，现正在修理，即时不能开行。之龙遂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听候差遣。未几，宝璧黄舰长持邹科长函来请之龙下一命令。之龙遂用笺纸写了两张命令，一交宝璧舰长，一请代交中山舰章舰长。该两命令略云："着该舰长即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等语。此乃军校驻省办事处来

要舰与之龙派舰的经过情形也。

李之龙这番辩解，还有实物佐证：作战科邹科长的那封信函虽然后来被毁，但却留下了一个信封。原来是李之龙阅信后并未装上，这一小小的粗心，成了洗刷自己的铁证。

除此之外，海军局内还存有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索舰公函，且编号存案。这一纸公函也证明了李之龙的无辜：

军校驻省办事处要舰公函

敬启者，顷接

教育长电话，转奉

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祷。

此致

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启

三月十八日

由此看来，李之龙调舰至黄埔是奉命而为，无罪可究。

但是蒋介石却断然否认下过此类命令。

蒋介石说的也是事实。

这其中的隐情却是极简单的偶然。事件发生后，黄埔军校内部也进行了详细调查，根据军校驻省办事处交通股股员王学臣的报告，此乃他耳误的结果：

三月十八日午后六时三十分，接驻校交通股黎股员时雍电话云：因本晚由上海开来安定商轮已被一股土匪抢劫，现泊黄埔鱼珠上游，奉孔主任谕，派卫兵十六名，巡舰一只，前往商轮附近保护，以免再被土匪抢劫。职因此时接电话听不明了，但有饬赵科长限本夜调巡洋舰一二艘以备巡查之用。

问题的关键就出在此处，黎时雍根据指示，请驻省办事处派出巡舰（即巡逻艇），但由于王学臣未听确切，改成派巡洋舰一至两艘。“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他这一字之增，让这一段历史顿时动荡变色。

再说王学臣接到电话，立即报告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即亲赴海军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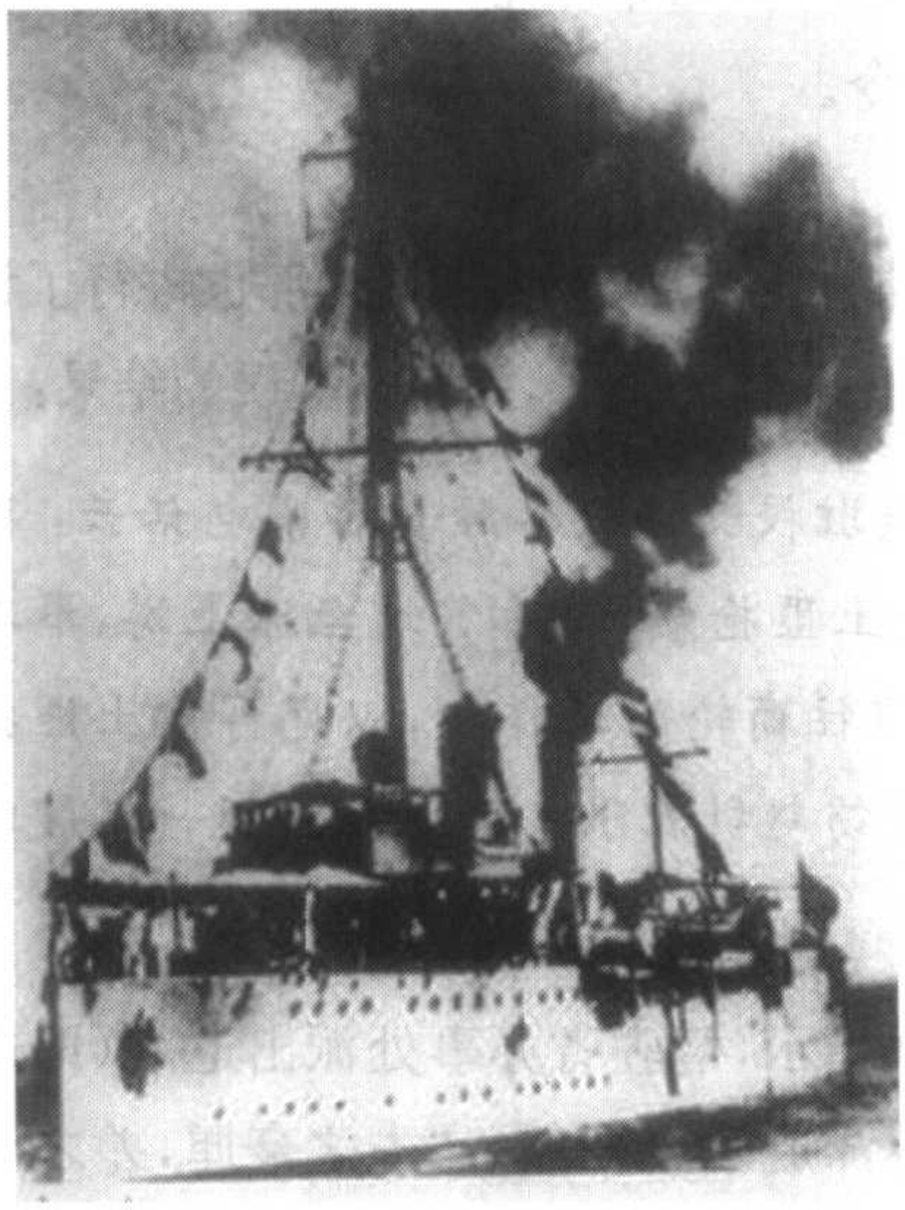
交涉。当时李之龙正外出，作战科长邹毅当面答应了他的请求。至于是否将调舰命令升格为蒋介石令，却没有确切记载。但第二天邹毅要他补办调舰公函时，他毫不犹豫地补办了。因此可否猜想，在交涉调舰时，欧阳钟是抬出蒋介石招牌来的。

至于为何将中山舰从黄埔调回，李之龙也有详细解释：

> 十九日……邹科长又对之龙说：顾问询中山舰在省否，因苏俄参观团要参观军舰。之龙遂一面饬给养科给发新军衣，一面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因是日参观团参观舰队，可否调中山舰返省。当承蒋介石允许，故电该舰返省，预备参观。及是晚六时许，中山舰长章臣桐来寓报告之龙云：昨晚未得你的命令时，在海军俱乐部中遇邹科长，他曾对我（章臣桐）说过了。我（章臣桐）当时答云，如无舰可派，则中舰可以去。及接你（称之龙）的命令，即行准备。次早六时许，开赴黄埔。抵埠时曾报告邓教育长，并请示任务。邓答云不知，恐为日本商船某事，可稍待后。后得你的电报及学校通知，始返省云云。此乃十九日调舰回省之手续与章臣桐之报告也。

中山舰是当时广州政府最先进的巡洋舰，苏联顾问要参观舰队，李之龙当然要将它调回装点门面，这也是符合情理的。

至于引起蒋介石疑窦的那个电话，李之龙也有合理的解释："派舰时，因邹科长信中谓省办事处来员云，系接邓教育长（演达）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云云。之龙忖思此语，料蒋校长必在黄埔无疑，故不能径向蒋请示也。次日邹科长告之龙谓：办事处说，蒋已返省，故之龙向蒋请示，可否调中山舰回省预备参观。"



中山舰

由此可见，中山舰的调动虽然异常，却是事出有因。但为什么却造成蒋介石的惊慌失措，甚至不惜大打出手，发动这场骇人听闻的事变。自称了解秘密的王柏龄将这笔反共的功劳算在了右派组织孙文学会的头上："中山舰云者，烟幕也，非真历史也，而其收功之总枢，我敢说，是孙文主义学

会。”似乎这一事件是孙文学会策划密谋的。

王柏龄的话让人不能尽信，因为在他的回忆中曾提及，三月十九日早晨，蒋介石曾召见他专门讨论过此事，而他当时的反应却是：“真是一个大炸雷，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既然他在此之前毫无了解，那么作为孙文学会的幕后支持者，学会如有这样大的举动，怎会瞒过他？因此，孙文学会参与此事一说不能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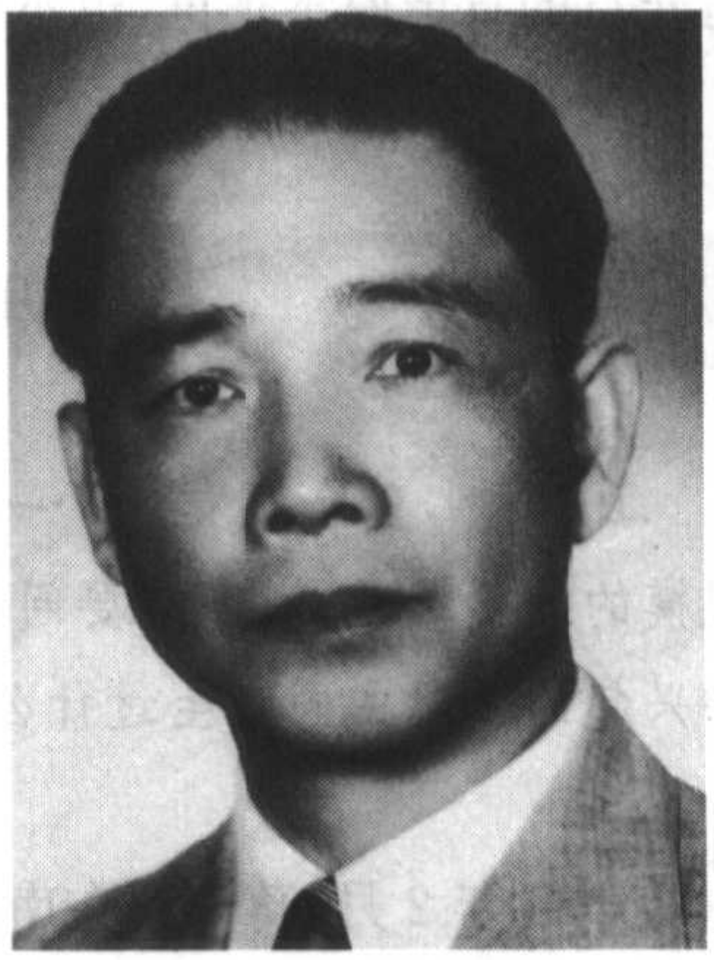
此外，还有另一种传说，这是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分子导演的一出“杰作”。

西山会议派的骨干人物邹鲁曾得意洋洋地告诉别人，当时，他们阴谋分裂广州政府，让蒋介石和共产党分家，玩弄了一个小小的把戏。

邹鲁与当时任国民常中央执委的伍朝枢商量，一个在外面想办法，一个在里面想办法，设计一个圈套让蒋介石钻进去。

伍朝枢是个极右分子，也很有手腕，他定下了一个离间计。头天晚上，他刚宴请苏联领事吃饭，第二天又将蒋介石左右人拉来做客，席间有意无意道，他昨晚请苏联领事吃饭，听说蒋先生最近要去苏联，他问他们，可否知道具体行期。

蒋介石得知这一情报后，随即警惕起来，他连续三次向汪精卫试探，说自己感到极度疲乏，想去苏联作短暂休息，一可以和俄国当局接触，再可以多学些军事知识。在第二次试探时，得到了汪精卫的同意。蒋介石还进一步提出要求，希望曾仲鸣和陈璧君陪他出国。而陈璧君是个好事之徒，天天催蒋介石动身。碰巧俄国有一条船来，并且请蒋介石参观，听说当日蒋介石要拉汪精卫同去，而汪因已参观过，没有答应，于是蒋便以为这条船是预备在他参观时扣留他直送莫斯科的。因此决定反共反汪，这就是三月二十日事变的真相。



汪精卫

这件事说得有枝有叶，不像是空穴来风，还有其他材料可以佐证。

当时任广州《民国日报》总编辑的陈孚木，后来在《国民党三大密案》一文中也提到了与邹鲁所述相同的情节，即伍朝枢造谣说，季山嘉与汪精卫已取得一致，欲将蒋介石劫持到苏联，并通过邹鲁再传给蒋介石的亲信朋友，如陈果夫、张静江、戴季陶等人耳里，从而挑起蒋介石的疑惧心理。于是，王柏龄便与欧阳格等人商量，决定诱使中山舰异动，从而造成事件的发生。

以上所述，固然曲折引人入胜，但如果说“中山舰事件”是西山会议派一手策划的，未免证据不足，漏洞百出。邹鲁、陈孚木都是事后追忆和研究，尽可以按历史的事实来演绎、附会。我们可以设想，纵使伍朝枢谣言起了作用，如果十八日晨虎门附近没有发生劫船案，又何需调动船舰？如果不是王学臣接电话有误，又何来出动中山舰？如果不是汪精卫十九日上午连打三个电话，引起蒋介石疑心，蒋又何至于立时翻脸？因为他发动中山舰事变也是踌躇再三，他的实力在当时还是有限的。如果不是苏联顾问来参观，李之龙又何需将中山舰急急调回？这里面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失误，这一阴谋均要告吹，而这每一关键之处，都不是西山会议派及其他右派分子所能左右的。

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所谓“中山舰事件”完全是由蒋介石的疑心、鲁莽、判断失误造成的，他确实是认为有可能发生对他不利的情况，因此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很有可能事发后不久，他就察觉出自己的判断失误，但这一失误却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然而为难的是如何向世人有个明白的交代，因此只能欲语又止，将答案推到永远的将来。所以有人甚至猜测，即使将来蒋介石的日记原本现世，也不可能有什么准确打开此谜的钥匙。

一箭双雕　　新生活运动之谜

1934 年，蒋介石发动了一场新生活运动。我们在回眸这段民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时，不禁要问：新生活运动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它是怎样兴起的？对中国产生过什么影响？对以后的社会发展有什么作用和意义？

1934 年 2 月，蒋介石在南昌大张旗鼓发起新生活运动。移风易俗、清扫卫生、整顿市容等。自从 1927 年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来，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就是他的心腹大患，肢体之患主要是对中国鹰瞵虎视的日本，而肘腋之患即“福建政府”，蒋介石应付这些大敌尚且招架不住，怎么有心突然间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新生活运动呢？

1934 年 2 月，北风凛冽，来自西伯利亚的一股强大的寒流肆虐南下，掠过太行山、黄河、大别山，席卷长江、鄱阳湖，横扫赣北大地。

在“星分翼轸，地接衡庐”的南昌这座历史名城之中，蒋介石亲临坐镇，部署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的关键一仗——广昌之战。此番他是志在必得，调兵

遣将，运筹帷幄，南昌城和江西大地腾起一股股战云和杀气。

为了将中央红军赶尽杀绝，蒋介石驻节南昌，谋士、良将云集帐下，他亲自部署了新的战斗序列，以赣闽红军为主要进攻对象，分设北、西、南三路军，总兵力约八十多万，蒋介石亲自坐镇指挥。就在这场红与黑、生与死大搏杀的关键时刻，蒋介石突然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这似乎是正剧幕间的插科打诨，也恰似作文中的闲来之笔。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新生活运动从1934年2月开始，一直持续了十几年，余波延续到抗战胜利以后，而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农林、卫生、美术、风俗、民生建设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生活习惯、精神面貌无不潜移默化，影响甚深。

蒋介石提出“新生活运动”的概念，御用文人经过一番精心爬梳整理，提炼出有关新生活运动的理论要点，即三个目标：生活军事化、生活生产化、生活艺术化；四点基础：礼、义、廉、耻。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新生活运动的核心是三个目标和四点基础，其实质就是传统的道德思想——礼义廉耻。新生活运动大致分几方面内容。宣传强调要“先从南昌起，开始一种新生活运动”，要求造成一种新风气，带动全国，“使全体国民的生活都普遍的革新”。新生活运动的原则是“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从国民的“衣食住行”开始，要求人们安分守己，循规蹈矩。

新生活运动共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全省组织了两个研究机构来领导新生活运动。即“新运”工作研究会，挑选了一干人等为“新运”工作研究委员，集思广益，指定如何推行下一步工作。此外，还组织礼俗改良讨论会，讨论如何废除旧礼节，改良新礼节。

第二，召开“新运”工作研究委员会会议，择定“三化”（即生活军事化、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方案内主要事项八种，为该会第一期中心工作。

第三，整理、打扫公共场所，包括娱乐场所、旅店清洁卫生，检查饭店、茶馆、酒楼及澡堂等卫生，不及格者挂牌警告，限期整改，否则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举办商店店员新生活讲习班，专门讲授礼貌和清洁卫生两方面的课程。

第五，提倡国货，提倡土布，“新运”江西分会会同省党部、民俗改善委员会等机关，筹办土布运动，提倡节俭，以堵塞漏洞。

第六，改良儿童生活，会同江西省教育厅召开第五届儿童节庆祝大会，举

办儿童新生活比赛大会。

第七，举办南昌市各行业厉行新生活竞赛会，先从窗口行业旅栈业开始。

第八，改善南昌市区的公共设施。有鉴于南昌行营房屋坍塌的例子，“新运”会特别提出“该省建筑，因业主省钱，包工做定砖瓦材料，多不坚固，偶稍烈风雨，时有坍塌之虞，于人民生活财产，颇多危险”。要求有关方面检查工程质量。改良市区公共厕所。

第九，举办南昌市民健康比赛。组织健康比赛委员会，内设总务、布置、评判、测验、救护、征集等六组，规定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市民，包括学生、公务员等报名参加比赛。由卫生处定出比赛标准，予以测验，优胜者获奖。

第十，提倡拳术，拟订南昌市民训练国术办法。

第十一，举办各种展览会，包括国货、中药等。

不许抽烟，成为“新运”时期的南昌街头一景。童子军站在街上，凡是叼烟卷走来的人，摘掉他们嘴里的香烟并搜光他们口袋里的香烟，揉成一团，扔到阴沟里。然后敬个礼，再去等下一个“倒霉”的人。没多久，在南昌街头就没有抽烟的烟民，很多人和宋美龄一样，躲着抽，偷着抽。童子军稽查抽烟的效果是明显的。南昌市1934年卷烟的销售额锐减，为全国做了榜样。

不准穿奇装异服。夏天是浪漫的季节，是时尚妇女展现窈窕身体曲线和风采的季节。欧式连衣裙、模特装、各种薄露透的服装不时飘过南昌街头。童子军发现后，用毛笔在这些奇装异服上写下标语和口号，搞得街上连穿旗袍的人都少了。



蒋介石

还有一些过度热心的军官们，派出恶狠狠的值勤队，碰到在街上吐痰的人，拖翻在地，猛揍一顿。很快，各种各样的新生活运动训练班、组织纷纷戴起各自的证章、袖标，打出各自的旗帜，像蝗虫一样蜂拥而至，什么都管，什么都干涉。还有那些趿着鞋走路的人、吸香烟的孩子、要饭的乞丐、花里胡哨的女人、操皮肉生意的妓女、得花柳病的嫖客、赌博的、喝酒的、打架骂人的、随地吐痰的，以及在饭馆吃饭喝红酒或白酒的人、一顿饭点菜超过四菜一汤的人或给小费的人，都被警察、宪兵拖到街上挨上几棍子。从那以后，白兰地

和红酒都装在茶壶里供应，以骗过那些四处站着监视的童子军、“新运”服务队和执法队。

南昌的污泥浊水一扫而光，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大兴土木、大改地名，天天都有新人新事。人们见面必称“你好！”见党旗、国旗必弯腰鞠躬，开口“新生活”，闭口“做新民”，真是让国人和洋人大开眼界，都被新生活所感染、陶醉、忘情……

有了南昌这个样板，新生活运动很快推广到其他地区。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规模运动如暴风骤雨般铺天盖地而至。

首都南京市和上海、杭州等城市看上去都有很大的变化，街面上比以往干净多了，再配上五颜六色、琳琅满目的标语，的确1934年是中国进入新生活的一年。在移风易俗方面，新生活运动总会有关于婚俗、丧俗、寿礼、宴会、送礼等五大改革。1936年1月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由南昌迁往南京办公。主任干事熊式辉因是江西省政府主席，不能离赣，因此改由钱大钧担任主任干事。同时扩大总会组织，改为调查、设计、推进三个组，并增设总务组，又在总会之下另设妇女指导委员会，请宋美龄任指导长。通告各省市成立“新运”会，计有福建、河南、广东、浙江、山东、安徽、江苏、山西、绥远、陕西、湖北、湖南、青海、甘肃、四川、贵州、云南、宁夏、河北、江西等二十个省，以及首都南京、上海、汉口、北平等四直辖市，其他尚有铁路“新运”会十四个，华侨“新运”会十九个，各省“新运”会并辖有各县“新运”会之组织，全国计有一千三百五十五个县会。妇女“新运”方面，有江西、陕西、湖南、江苏、山西、青海、广东八省妇女工作委员会，其他尚有首都、上海县、浙江溪口等妇女会。

其实，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以精神总动员的方法，唤起国人现代觉悟与意识，所以新生活运动在提高人民的觉悟方面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当时，日本一再压迫中国政府取缔抗日活动，蒋介石自然不愿意泄露新生活运动的抗日的底牌。就像整顿军备一样，国民政府从德国购买大批的先进军火，目的是对付日本侵略，可嘴上喊的是为“剿共”作准备。其实明眼人都可以看出，剿共何需如此先进的坦克、大炮？

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有三个不可轻予看过的大事，整理财政、整理军备和新生活运动。”他将中国发生的三件大事列为抗日战争的必要准备。由此反证出新生活运动对抗日起到一定的作用，只是当时蒋介石“安内”的任务尚未完成，因此不便把新生活运动的“攘外”涵义挑明罢了。

子承父业　三青团被国民党吞并之谜

1947年6月30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联席会议上突然宣布关于“党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统一组织的意见，顿时引起轰动，它实际上宣布了成立已达九年，人数超过百万人而且十分活跃的三青团突然间猝死，从此不复存在。

这件事引起很多人的不解，就在一年前，三青团的“二全”大会还在庐山召开，一片兴旺景象，甚至积极筹备党、团分家，自立门户，成为独立政党。然而时隔一年，却遭到了国民党的吞并，这是为什么？

由于此事发生在国民党和三青团高层，所以有关内情一直没有揭秘，国民党败走台湾后，留下了一些档案材料，遂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注意。1991年《民国春秋》所载《三青团为何被国民党吞并》，为我们揭开这一秘密提供了信息：

三青团成立于1938年，它与一般的政治组织团体是不同的，备受蒋介石的重视。本来在它成立的酝酿过程中，有人提议它没有必要独立组团，只需在党内成立一个青年部就行了，类似俱乐部性质，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反对，他对三青团的推崇让人吃惊，称它是国民党的“新血液”。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三青团发展得很快，到了1946年，已经达到一百三十万人以上，它的主要领导成员也大都由蒋介石的心腹嫡系组成。团的重要干部除了CC系和黄埔系，蒋经国系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而且有后来居上之势，似乎想把三青团变成培养蒋太子的政治势力和声望的基地。



陈立夫

在组织性质上，三青团也具有浓厚的私人政治集团色彩。三青团奉蒋介石为最高领袖，根据团章规定，三青团设团长一名，由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担任，团员必须服从团长命令。

三青团在社会政治活动中也是蒋介石的有力帮手，它同共产党积极争取青年，大搞特务活动。

正因为以上种种原因，蒋介石对三青团青睐有加，他甚至私下里盘算过以三青团取代国民党的地位，进行一次大的政治改革。

所以，三青团从一成立起就气势咄咄，虽然三青团的干部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但他们的内部矛盾却十分激烈，CC 系的优势和工作重点主要在国民党内，当时即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而三青团的大权却在黄埔系手里。因此，CC 分子就有意识地要降低三青团的地位，把党团关系说成是三青团从属于国民党，这让三青团的绝大部分成员和黄埔系分子感到不满。因此，当时三青团的组织处长、黄埔系的骨干分子康泽就尖锐地攻击 CC，强调三青团的重要性和独立性，将蒋介石的话引申发挥，认为三青团是国民党的未来希望，承担着组织全国青年的重任。在这种思想鼓励下，全国各地的三青团组织也积极地与当地国民党基层组织争权势、争地位，摩擦事件时有发生，让蒋介石也深感苦恼。

到了 1944 年，蒋经国取代康泽的地位，上述矛盾更尖锐了。由于蒋经国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三青团的气势更旺，甚至有了独立组党之议，即三青团组成新党，与国民党轮流执政，蒋介石兼跨两党领袖，蒋经国亲自领导。这种议论终于在三青团“二全”大会上被公开提了出来。这一提议对 CC 分子极为不利，如果通过，那么他们掌握的党权就要从此失去。因此陈立夫专程赶到庐山，向蒋介石进谏。CC 系反对三青团另组新党的理由简单而实际：既然蒋介石一身兼两党领袖，当两党相互指责攻击时，他将何以自处？CC 的意见终于说服了蒋介石，同意取消三青团组党的提议。

三青团不仅与 CC 系有矛盾，蒋经国系与黄埔系也积怨甚深。自从蒋经国取代康泽的青干校教育长这一拥有实权的职位后，康泽就以消极的态度进行抵制。实际上，蒋经国除了他从江西带来的那班人马外，对三青团基层干部组织的使用和控制根本谈不上得心应手，而且自庐山会议独立组党计划失败后，更是心灰意冷而怠于问事，团的工作也就愈益散涣、松懈。

最让蒋介石恼火的是，三青团积极参加了当时的各种政治竞选工作，由于蒋经国将精力转向其他方面而无暇过问三青团，三青团的一部分干部开始和其他政客相互结纳，操纵团员参加竞选。另一方面特别与 CC 过不去，比如在国民党“六全”大会期间，在选举中央委员问题上，CC 为了帮助蒋介石控制选举工作，自称他们一向服从领袖，自愿将选举权奉献给蒋介石。而三青团则不知轻重，特别针对这一情况联名上书表示反对，以为选举权不能私相授受。这当然要让蒋介石不快了，CC 也乘机攻击，痛陈党团对立之害，强调日后势必有其他党派进行竞争，而国民党再分散力量，后果堪忧。

以上种种，终于促使蒋介石下了合并三青团的最后决心。然而里面还有一个奥妙，根据党团合并的有关规定，三青团的中央委员也全部被承认为国

民党中央委员，蒋经国因此顺理成章地进入国民党中央机构，从而完成了子承父业的重大步骤。

法治与人治　　胡汉民反蒋之谜

胡汉民发迹时，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还微不足道。正是因为胡汉民的支持，蒋介石在1927年4月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但很快胡汉民就与蒋介石在政治上分道扬镳，走上了一条坚决反蒋的道路。这里有着曲折复杂的内幕，其经过情形究竟是怎样的呢？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与领袖，与汪精卫、廖仲恺同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助手。1924年11月，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委任胡汉民为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省长。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7月广东大元帅府改组为广东国民政府。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国府常委兼外交部长，廖仲恺为国府常委兼财政部长。是年8月，廖仲恺被刺杀，牵涉到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这给蒋介石的崛起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蒋介石利用“刺廖案”与汪精卫联手，打击胡汉民，以“保护”为名将其遣送国外。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又利用“中山舰事件”打击了汪精卫，自己很快掌握了军权，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927年2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决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会上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4月，汪精卫回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武汉国民政府主席。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此时，胡汉民刚从欧洲归来，在他的支持下，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胡汉民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同年8月，蒋介石下野，不久，胡汉民为表示与蒋介石共进退，也辞去本兼各职，与孙科、伍朝枢同赴欧洲考察。1828年1月，蒋介石东山再起，重新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指挥各集团军进行“二次北伐”，6月占领北京，易名为北平。



胡汉民

此时，胡汉民也从欧洲归来，欲从香港去上海，再转道南京助蒋一臂之力。不少在香港的国民党元老许崇智、居正、谢持等来劝阻，希望他不要忘了以往的教训，不要去南京帮助蒋介石。胡汉民却认为："中国需要统一，统一需要建设，需要一个健全的中枢。我到南京，并不表示帮助蒋个人，是想帮助中华民国完成中国革命的使命，你们应该把对人的观点改成对事的观点。退一步说，假如我到南京是帮助蒋介石个人，则我希望这所谓的个人是凯末尔，不是袁世凯。如果这个所谓的个人是袁世凯，我必首先反对他，任何牺牲在所不辞。"

1928年9月，胡汉民抵南京后，按他的设想是自己主党政，蒋氏主军政。在胡氏看来，按照孙中山"以党治国"的理论和"政权与治权"分离的设计，在"训政时期"党是替代人民行使政权的，行使政权的核心是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只有把这四权行使好了，才能保证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作为党与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中央政治会议（类似于西方议会，但非选举产生），具有创制与立法的最高权力；作为治权系统的立法院，主要是对中央政治会议的立法纲要进行具体化、条文化，做出实施细则等方面的规定。胡氏要利用"以党治国"的理论，通过中央政治会议和立法院，实现其建立民主中国的理想。胡汉民到南京后，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立法院院长之职。

很快，胡汉民耿介的性格与民主的思想就和蒋介石独断专制的作风发生了矛盾。蒋介石为了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兵权，先在政府里给冯玉祥系安排了几个部长的位置，打败桂系后，又把给冯玉祥系的位置给了阎锡山的晋系，后来为拉拢张学良反对冯玉祥、阎锡山，又将这几个部长的位置给了奉系。对此，胡汉民表示反对，他说："一个政府立足，不应该用拉拢凑合的卑鄙手段……蒋介石过去把这种手段施于冯、阎，我已经反对，现在又施于张学良，我当然也反对！我以为合作并不在分配官职；国家的名器，也不应该这样滥给人。"

蒋介石气得大发脾气："我要辞职，让姓胡的去干吧！"吴稚晖慌忙来劝胡汉民："这样下去，介石要辞职了。"胡汉民傲然说："介石要辞职，何必告诉我？我只问道理对不对，政府像不像政府，其余的我都不管。他们这样闹，全没体统！你应该将我讲的话去转告介石才对！"

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日本公使重光葵签订"中日关税协定"，立法院立即提出质问；张学良与苏联进行中东路交涉，立法院也提出质问。胡汉民的做法令蒋介石大光其火，说："事情紧急，胡先生这样做，是不是想推翻政府？"

胡汉民一步不让地回答:“提出质问是立法院职责所在。在职责范围内,我不能不问。不能因为我提出质问,就说我想推翻政府。王正廷与张学良擅自签订法律案,不经立法许可,是违法的!”

当时蒋介石打败各派地方实力派后,其独裁专制日甚一日,准备通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一部确立总统制的训政约法,以实现其当总统的野心。胡汉民认为,蒋氏要制定约法当总统,这就意味着他的党制理想不能实现,意味着他欲借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掌管“党务审查”,把党权控制在自己手里,欲借中央政治会议把南京政府变成“党治政府”的计划全部落空,他所主张的党国政府要变成蒋记独裁政府。因此,胡汉民极力反对制定约法,更反对国民会议选举总统。

在国民党南京中央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胡汉民发表文章指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已决议将总理所著的遗教,定为效力等于约法的根本大法,现在又谈约法,岂非将总理遗教撇开而另寻别径?”这就使胡、蒋的矛盾继续扩大。同时,蒋介石又通过戴季陶等人控制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企图像包办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样来操纵国民会议。胡汉民决定不再继续妥协沉默,决心与蒋介石较量一番。

1930 年 11 月 12 日,四中全会开幕。胡汉民主张全会的任务是“严正地检查过去,策动将来”而蒋介石则强调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召开国民会议与制定约法,双方相持不下,最后胡汉民退让,同意召开国民会议,但不同意国民会议选举总统和制定约法。他在谈话中指出:蒋介石所述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是违背先总理精神的,孙中山从未谈过国民会议应当制定约法。国民党中有不少人不愿选蒋介石当总统,自然也反对制定约法。

1931 年 2 月 28 日晚 8 时 45 分,胡汉民赴蒋介石晚宴,当他到达三元巷总司令部门口时,即被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扣留。吴思豫交给他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胡汉民打开一看,里面罗织了胡的所谓几大罪状:(1) 勾结许崇智;(2) 运动军队;(3) 反对约法;(4) 破坏行政。

吴思豫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想请胡先生辞去立法院院长……

深夜 12 点,蒋介石终于盛气凌人地来了,劈头就是:“胡先生,你为什么反对我的约法呢?”

胡汉民反问:“你的约法吗?你有你的约法吗?你的约法给我反对了吗?开国民会议是一回事,约法又是一回事。我在立法院纪念周上公开演讲,遵照总理遗教,召开国民会议,这有错误吗?……我说总理主张召开国民会议,

但没有说国民会议当编订约法……国民会议不讨论约法，是中央党部的决议。即使是我首倡，但你也附和了，已经成为党的决议，便不是我个人主张。再退一步说，你四天前不还是赞同不要约法吗？何以今日你又变卦了？到底是今是而昨非，抑或是昨是而今非？人的历史，自己创造，自己毁坏。自己不毁坏，没人可以代替毁坏。自己毁坏了，没人可以代替你补好。这是我创造的格言。这句话可以用之于你，也可以用之于我……我早就想辞职了，从今天起，我什么都可以不问。”

蒋介石狡猾地回答：“胡先生能辞职，很好，但不能不问事。我除总理以外，最为尊敬的便是胡先生。今后遇事，我还要向胡先生请教。今晚胡先生火气太盛，我又不会说话，讲什么事，向来辩不过胡先生。不过我蒋中正断不肯冤枉胡先生，如果冤枉胡先生，我蒋中正不姓蒋。”

第二天，胡汉民被迫写了辞职书，被吴思豫派人送往南京东郊的汤山温泉“疗养”去了。

两广方面的军人听说蒋介石软禁了胡汉民，义愤填膺，摩拳擦掌，主张出兵北伐打南京。汪精卫等人伙同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要求蒋介石“即行引退”，“释放胡汉民”。5月27日，汪精卫等乘势打起“救党护国，打倒独裁”的旗号，堂而皇之地召集了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推汪精卫做广州国民政府主席。

正当宁粤间加紧备战、剑拔弩张之际，平地一声霹雳，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南北两政府皆谋求谈判。广州方面坚持：蒋介石必须释放胡汉民，然后再举行和谈。在粤方压力下，10月14日，蒋介石终于释放胡汉民。

从此，胡汉民便痛下决心，立志倒蒋。他在致同志的密札中称蒋介石为“蒋门神”，又简称“门”，信中说：“门与门系为中国致命一大毒疮，能请西医割去，是一治法，否则用中医拔毒（什么内托外消），打消方剂，抑或见效，除却二者便无是处也。”

他在致广东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萧佛成等人的信中明确指出：“迫蒋辞职，并促制度上限制个人权力，打破独裁。”

10月27日，宁粤双方召开了“上海和会”。粤方谈判代表汪精卫、孙科等人坚持南北统一的条件是：军人不能担任政府主席，不得为五院院长，废除陆海空军总司令职位等，都是针对蒋介石的独裁专门提出来的。

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

总司令等本兼各职。略谓:“胡汉民等同志微日通电,且有中正必须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欲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胡汉民迫蒋辞职的计划获得初步胜利。

1933 年,日军进攻山海关,华北危在旦夕。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此时胡汉民已在国外。他在致函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的信中说:“某(指蒋)为不抵抗主义者。华北为某所有,则抗战之希望已成灭绝。在此时,对内对外,非设法打破某在华北之阴谋必无以策善后。”信中还提出四项方法:

(1) 选派军队北上,参加华北抗战,“一以示西南抗日之诚,一以作华北将领之气,亦以戢某对日妥协之谋”;(2) 成立华北军事组织。西南方面予以人才、经费之接济;(3) 华北军事组织尤须“以抗日救国为名”,笼罩鹿钟麟、韩复榘、阎锡山、冯玉祥及东北军旧部。西南方面选派人员参加;(4) 在北方成立西南统一办事机构,委派有资望、能力同志前往主持。

最后,胡汉民说:当此危急存亡之秋,“万不能持徘徊观望之态度”,“惟有投袂奋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胡汉民还制定了筹组西南联军,以蔡廷锴任指挥,出师武汉的反蒋计划,并决定在时机成熟时回国主持,宣布反蒋。在胡汉民这面反蒋大旗号召下,西南各省对南京政府持半独立态度。

在全国抗日呼声日甚一日的情况下,蒋介石意识到如再坚持对日妥协方针,便会遭到各派和全国人民的唾弃。1935 年,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李烈钧、冯玉祥等人提出的抗日救亡大计提案。在同年 12 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胡汉民当选中执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亦派戴季陶等人飞赴广州,会晤陈济棠、李宗仁等,商谈合作之事,敦请胡汉民回国。

1936 年 5 月 12 日,回到广州的胡汉民与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下围棋,突发脑溢血,延至下午 7 时 40 分,在广州逝世。享年 57 岁。

胡汉民之死并没有给蒋、胡恩怨画上一个终止符,蒋介石借机对西南用兵,终于导致两广“六一运动”的爆发,这算是蒋、胡恩怨之余波吧。

谁是犹大　　邓演达被捕之谜

1931 年 8 月 7 日,国民党著名左派、第三党领袖邓演达先生在上海遭到

国民党当局逮捕，不久即被枪杀。长期以来，人们对邓演达被捕一事不能释怀，纷纷猜测谁是告密的犹大，然而却因为缺少有力证据，不能做出最后的肯定。

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教育长的邓演达，是一位让蒋介石忌讳的人物，这是因为邓演达在黄埔军人中威望极高。著名记者恽逸群这样评论说：邓演达“在黄埔军校学生心目中的地位，虽不一定说高于蒋介石，至少是足以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不在蒋介石之下。”

但是邓演达却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两人遂分道扬镳，邓演达组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企图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找一条出路，形成第三种势力，故人们也习惯地称之为第三党。

邓演达的行为让蒋介石感到了威胁，因为邓演达对军界很熟，尤其在黄埔军人中威望很高。恰如恽逸群所说的那样：“黄埔出身的学生，是‘蒋家天下’的奠基石，如果这一基石发生动摇，‘蒋家天下’就随时有倒塌的可能。民国十七年（1928）以后，蒋介石与其他国民党领袖相斗争，其惟一优势就是黄埔军人在他掌握之中，为其他国民党领袖所不及。能和蒋介石争夺黄埔军人领导权的只有一个邓择生（邓演达），因此邓择生是蒋介石的劲敌。”

邓演达利用自己的影响，组织起“黄埔革命同学会”，联络反蒋力量，进行军事策化。同学会的发展十分迅速，一度曾达到五千人以上，像后来的黄埔名将杜聿明、宋希濂、周至柔甚至包括陈诚，都与这一组织有所联系。

邓演达的活动让蒋介石十分惊慌，于是通知上海租界及上海警备司令部，出重金悬赏，侦察缉捕邓演达。1931年8月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元坊20号被捕，11月29日惨遭枪杀。

邓演达之死在社会及黄埔军人中引起极大震动。人们在痛惜之余，也痛恨那个出卖邓演达的叛徒，一时间议论纷纷，都在猜测谁是告密者。时至几十年后，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邓演达在黄埔军人中的威望极高

在诸多怀疑人中，陈诚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陈诚，蒋介石之宠将，名列“黄埔八大金刚”，与胡宗南、汤恩伯并称军中三鼎甲。其辖下第十八军、第十一师是国民党之精锐，并以此构成了势力强大的“土木系”，是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

然而陈诚的起点却很低，在黄埔时只是个普通的上尉官佐，论资历远远不能和何应钦、张治中、顾祝同等相比，然而却在几年内迅速窜红，尤其在邓演达遇害之后，更是一跃成为蒋介石手下第一号红人。

所以有人怀疑，邓演达被害与陈诚有关。曾为陈诚集团将领的杨伯涛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七辑《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一文中这样写道：

有一件疑案一直没有得到澄清，这就是关于陈诚出卖邓演达先生的传说。现在我把所了解的情况写在下面，以供有关方面研究。

陈诚于1924年在广东粤军第一师当连长时，直属营长是严重，直属团长是邓演达先生。他由于得到邓、严的提拔而投入黄埔军校，从此一帆风顺，青云直上。陈对邓、严二人不仅怀有知遇之恩，而且奉之为师，极为钦敬。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邓先生在武汉与共产党合作，严则挂冠而去。后来邓先生建立第三党，与蒋介石作斗争。蒋认为邓是心腹之患的政敌，阴谋杀害。邓先生匿居上海租界，蒋遍索不得，这时陈诚一面积极拥蒋，一面却暗地和邓先生保持联系，因而对第三党的活动略有所知。邓先生被捕去以后，当时即有人说是陈为了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向蒋告密，邓先生致遭被捕。但是另一方面，据说陈诚在蒋杀害邓先生之前，曾向蒋力保，恳蒋暂不动手，留待邓先生转变。蒋于第二次下野之前，终下毒手，将邓先生杀害。



1919年，邓演达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留影

然而杨伯涛这一说没有任何事实佐证，道听途说而已，他甚至连邓演达被捕的日期尚未弄清，因此遭到了原陈诚系一些将领的反驳。邱行湘曾撰文《关于邓演达之死的问题》，一口气提出七大疑问，以证明此事与陈诚无涉。其主要观点是，根据他的所见所闻，陈诚为“第三党”人无异，其部下也有许多将领是第三党人，如

果是他出卖了邓演达，许多将领必然不会再为之卖命，而且邓演达最好的朋友严重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重新出山与陈诚合作。邱行湘还听说，鼓动蒋介石向邓演达下毒手的人是胡宗南和何应钦。

黄维也认为，以陈诚对邓演达的感情和崇拜，决不致卖友求荣。他在纪念邓演达的文章《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中写道：

> 邓先生的革命言行，向为严重、陈诚及黄埔同学所尊敬。严重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二十一师师长，北伐攻占苏州，驻军沪宁东段时，国民党宁汉分裂。邓在武汉电严重，询其对时局的意见，严电复，力主北伐到底，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当蒋召见严时，询及对邓的态度，严据实以告，严为履行邓先生和自己的主张，借病请假，保荐该师副师长兼团长陈诚升代师长，并密嘱陈诚俟机将部队拉到武汉方面去。后因武汉政府也发生了变化，原计划未能实现。1930 年春，陈诚赴沪谒邓时，仍表示支持其主张。陈对邓很尊重，愿从十八军十一师的公积金内，为邓提供生活费用，并请邓派人到十八军工作……抗日军兴，黄琪翔、严重、朱代杰……等第三党人，东山再起，复投陈诚麾下，贯彻邓先生‘打倒帝国主义’的一贯主张，都为陈诚所重用。

宋瑞珂也发表文章《邓演达的被害与陈诚的发迹有关联吗》，文章指出，陈诚自入黄埔就一直为蒋介石欣赏，且立功累累，到北伐时已凭战功升任师长，特别是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的东山再起，更是获得蒋介石之宠信，从此飞黄腾达。可以说：“陈诚的发迹和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是在 1930 年以前就开始的，而并非在 1931 年邓演达被害之后。”

为弄清事实真相，黄维等专门函询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请将真相告之。1982 年 9 月 3 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党史研究委员会给黄维发了函，才算解开谜底：

> 出卖邓演达先生的是叛徒陈敬斋，不是陈诚。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从邓先生被捕迄今，数十年都无疑议。所以在解放以后，我党即把捉拿叛徒陈敬斋归案作为当时一项重要事情来办的。陈敬斋是 1950 年春由江西省公安部门在景德镇捕获的，经解京审讯后，于 1951 年秋在此伏法。他出卖邓先生的经过，据中央公安部 1950 年 10 月 16 日致我党函称：“据供，由于反动势力压抑，对前途悲观，乃思卖党求荣之念，于 1931 年 7 月中旬，向蒋匪密告该党领袖邓演达先生之行踪，并与匪特暗中计



邓演达墓在今南京灵谷寺东面

谋，待机行动。同年8月17日，在上海英租界静安寺愚元坊20号邓演达出席地方干部训练班之际，陈犯听讲未及一半，伪装肚疼离席外出，向预伏之伪警备部侦缉队联络，遂将地址包围，当时被捕者计有邓演达先生等十余人。事后该犯即赴南京，向蒋匪领取奖金一万元。以上事实均供认不讳。”

至此，邓演达被捕一案真相似乎水清沙明。

然而，到了1988年，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邓演达年谱》，作者丘挺还是继续坚持以下观点：

国民党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师长陈诚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伪装拥护邓演达的样子，到上海看望邓演达，并拿出一笔钱给他做活动经费，还表示愿意从十八军十一师的公积金中为邓演达提供生活费用；又让邓演达派人到他的部队工作。邓演达一时不察，以为陈是自己的旧部，会有良心血性，可以争取过来为革命事业效力，便将自己的活动情况陆续告诉他。陈诚每从邓演达那里得到消息，都原原本本地向蒋介石报告，并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去应付邓演达；甚至邓演达给他的信，也原封不动地送给蒋介石拆阅后才敢看。这样一来，蒋介石对邓演达的活动便了如指掌，陈诚因此很快被提升为十八军军长。

丘挺还加了一个注解，说明坚持以上观点的理由：这是1940年6月叶挺在游峨眉山途中沉痛地对李洁之谈及的“从多方打听，获得可靠的消息。”（见广东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期）丘挺接着认为：“丘行湘、黄维、宋瑞珂等以邓、陈两人公交私谊甚密和向特务告密的是陈敬斋为由，反对此说，但所述理由并不能证明陈诚不会直接向蒋介石出卖邓演达。

1984年夏天，文强同笔者谈及黄维观点时，认为轻易否定此说是不妥的，而要肯定此说，需查看蒋介石的日记，这不是短期能办到的，现故从叶说。”

看来，邓演达被捕之谜还要继续争论下去。

李代桃僵　　王亚樵暗杀宋子文之谜

1931年7月23日，上海火车站发生了一起激烈的枪战，杀手是著名的暗杀大王王亚樵，刺杀对象是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枪林弹雨中，宋子文奇迹般地毫发无损，而他的秘书唐腴胪却死于非命。王亚樵与宋子文有何过节？为什么一定要致宋于死命呢？

王亚樵，字九光，1887年生于安徽合肥。其父王荫堂一身兼二职，经营一家棺材铺，专挣死人的钱。同时也开着一爿药铺，干着悬壶济世、救人性命的营生。王亚樵受家庭的影响，从小对杀恶人和救穷人有一种偏好，青年时代便养成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靠着五十把利斧起家，在刀光血影中名声越来越大，成为上世纪30年代著名的斧头帮老大和暗杀大王，是一位令蒋介石和戴笠心惊胆战的危险人物。

暗杀宋子文的原因还要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的矛盾说起。

1931年2月，蒋介石软禁了西南派领袖胡汉民。5月27日，反蒋派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非常会议，议决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推举汪精卫、唐绍仪、陈济棠、李宗仁、孙科等十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汪精卫、邓泽如、邹鲁、孙科、李文范等五人为常务委员，轮流担任国务会议主席。同时成立广东军事委员会，将粤桂两省军队分组为国民革命军第一、第四两集团军，陈兵湘境，叫嚷要发兵讨伐蒋介石。与此同时，胡汉民的亲家林焕庭带着二十万大洋到上海，找到上海滩斧头党的龙头老大王亚樵，将现金支票往王亚樵面前一拍，请其杀一个“仇家”。

王亚樵问：“不知先生的仇人是谁？”林焕庭用手指蘸着茶水写了一个“蒋”字，王亚樵微微一笑：“原来是‘草头王’，我正看他不顺眼呢。”

常言道：拿人钱财，给人消灾。王亚樵当即成立了行动小组。把暗杀“草头王”的任务交给华克之与郑抱真。

6月4日,“斧头党”在南京的联络处得到蒋介石赴庐山的情报。机不可失,华克之带着助手成诚等人乔装成游客,直奔庐山,他们秘密侦察了蒋介石的行踪和警卫情况。

王亚樵绞尽脑汁,想了一个密运武器之策。他买来十多只金华火腿,用刀划开,将中间挖空,把数只手枪拆散,用油纸将零件及子弹包好,分别放进火腿之中,再用针线将火腿缝好,涂上一层盐。然后,令其妹妹王亚瑛和其表弟媳刘小莲化装成阔太太的模样,两个枪手装扮成随从,从容地通过上海码头严密的检查,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当她们到达九江后,雇了两顶轿子,又大摇大摆地通过了沿途严密的盘查,到达牯岭,将火腿送到华克之等下榻的“庐山新旅社”。

6月14日上午,天朗气清,蒋介石坐滑竿出了美庐别墅,外出散心。他的卫队和外勤警卫人员都像猎犬一样,瞪大眼睛,四下搜寻。当他们行进到一片葱翠的竹林时,王亚樵的一名刺客正在附近,见这是一个极好的下手机会,来不及与同伴联络,便摘下草帽,取出藏在其中的左轮手枪。正在这时,蒋介石的卫队长蒋孝先眼明手快,大喊一声:“危险!”一把将蒋介石从滑竿上拉下。“啪——”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子弹贴着蒋介石的光头飞过。顿时,枪声大作,蒋介石的卫队纷纷开枪还击,将刺客打成了“马蜂窝”。枪声一响,华克之等知道事情败露,带着人立即撤离庐山。

庐山刺蒋行动失败后,王亚樵、华克之等准备再寻机会下手,但由于已经打草惊蛇,蒋介石出入更加戒备森严,无从下手。广东方面认为,倒蒋必先去宋!蒋介石要讨伐西南反蒋派,靠的是宋子文的财政支持,杀宋对蒋介石来说是乱其经济组织,等于釜底抽薪。如果得手,蒋介石必败无疑,可以不战而胜。于是,广东方面再次派人与王亚樵联络,将暗杀的目标定在宋子文身上。王亚樵暗中布置人手,调查宋子文的行踪并秘密买通了在财政部上班的一名职员,了解到每逢星期六,宋子文可能回上海的信息。

7月22日下午,王亚樵突然接到郑抱真从南京发来的加急电报:“康叔于今晚由南京乘夜车来沪,明晨准到,望迎勿误。”康叔不是别人,正是王亚樵给宋子文起的代号。

王亚樵兴奋不已,立即进行部署:行动组成员分成三路,组成三道狙击线,谅宋子文插翅难逃。王亚樵发给行动小组成员每人一把手枪、十粒子弹和一枚烟幕弹,王本人租下北站附近天目路一家旅馆三楼临街的一间客房为联络点,亲自观察和坐镇指挥。

7月23日晨，就在列车到达上海前的15分钟，站内突然来了一队警察，将月台上的闲杂人等统统清除干净。原来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也坐这趟车来上海，上海警察局接到通知，于是布置警戒。华克之、孙凤鸣等人无法在月台上动手，急忙向候车室埋伏的第二小组发出动手信号。

7时整，从南京方向开来的蓝钢快车隆隆驶进北站。当熙熙攘攘的大批旅客陆续涌出车站后，在列车尾部专门为宋子文准备的豪华车厢门打开了，两名卫士先跳下车来。随后出现在车门前的是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胪，他身穿白色亚麻西装，头戴白色硬壳太阳帽，左腋下夹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紧随他身后的是同样穿着白色西装，头戴白色硬壳太阳帽的宋子文，最后下来的又是四名背着盒子枪的卫士。

当宋子文一行穿过长长的月台，经过车站东大楼，向出站口走去时，预伏在大楼楼柱后面第二狙击组的刘刚等人突然跃出，四五把枪同时从两侧向他们开火。走在前面的唐腴胪猝不及防，当即中枪。只听见他“啊”的一声惨叫，便倒了下来，其左肋、右腹、右臂等多处受伤，白色的西装满是鲜血。唐腴胪是上海人，家庭富裕，他的父亲唐乃安原籍浙江金华，是个买办商人。唐腴胪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曾担任冯玉祥的秘书、上海英文大陆报主笔、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的秘书，1930年担任财政部长宋子文的机要秘书，深得宋子文的信任。1931年5月，唐腴胪与原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闿的女儿举行婚礼，爱巢安在上海。

枪响之后，宋子文第一个动作是把在灰暗的车站里十分显眼的白色硬壳太阳帽甩掉，然后拼命跑进人群，躲到一根柱子后面瑟瑟发抖。宋子文的卫兵也清醒过来，纷纷拔枪还击，子弹横飞，火星飞溅，整个车站大厅都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味。华克之的第一小组也赶来参战，枪声四起。混乱的旅客喊叫着、拥挤着，拼命向站外逃命，秩序大乱。枪战持续了大约有数分钟，警笛声由远而近，大队警察赶来增援。宋子文在卫士和警察的保护下，快步登上候车大厅的三楼，脱离险境。华克之等不敢恋战，扔出烟幕弹，在白烟的掩护下，全体行动队员迅速撤离现场。

唐腴胪当即被送进医院，动了手术。由于伤势太重，是日中午11时30分谢世，终年32岁。宋子文为其治丧，而宋母倪桂珍恰在这时病逝，《申报》头版头条并列着两条以宋子文名义刊登的讣告。在唐腴胪治丧人员名单中，有王赓和徐志摩两人的名字。

王亚樵误以为打死了宋子文，正在弹冠相庆之际，忽见报端刊出唐腴胪

殒命的消息，才知道误中副车，遂懊悔不已。王亚樵自嘲说："我们已经尽了力。古人云：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宋子文福大命大，没有办法。"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王亚樵再次谋划了刺杀蒋介石的行动。由华克之、孙凤鸣等登记了一个晨光通讯社，孙凤鸣假扮记者混入会场，趁全体代表照相之时，乘机下手刺杀蒋介石。由于蒋介石见会场混乱，临时决定不去照相，而汪精卫代替蒋介石挨了两枪，还是误中副车。盛怒之下的蒋介石令戴笠限期破案，戴笠手下通过王的小老婆，终于查到王亚樵在广西梧州的线索。1936年12月20日，军统特务将王亚樵刺杀，这才了却蒋介石、宋子文的一桩心头大恨。

密谋反蒋　刘湘被"吓死"之谜

军阀刘湘与蒋介石矛盾颇深。抗战前，蒋介石想借追剿红军为名，使中央军进入刘湘的独立王国——四川。但刘湘却横加阻拦，与蒋介石明争暗斗。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乘机调刘湘及川军出川抗战。1938年初，刘湘病死在汉口，而民间却一直有"枪毙韩复榘，吓死刘湘"的说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35年，蒋介石以协助川军追剿红军为名，派贺国光率参谋团进重庆。不久，参谋团的牌子便换成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的牌子，专管川、滇、黔、康西南各省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不久，蒋介石以帮助刘湘统一川康为借口，亲自入川主持，行营主任为顾祝同，行营秘书长为杨永泰，贺国光改任行营参谋长。其目的是想直接掌握川、康两省实权，蒋、刘矛盾因此公开化。

刘湘暗地联络广西、云南、广东的反蒋势力，密谋倒蒋。1936年，两广发动"六一事变"，陈济棠、李宗仁通电反蒋，刘湘密令川军向成都和重庆两地集结。蒋介石买通了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一枪不发就平定了广东。刘湘欲盖弥彰，急令邓汉祥去庐山见蒋介石，欲摸清蒋介石对四川的态度，以便决定应付之策。蒋介石说："刘甫澄（刘湘字）图谋不轨，在夜里调动军队，想附和陈济棠叛乱。我对他的一举一动十分清楚！"邓汉祥辩解道："刘湘调兵是为了剿匪。四川的土匪向来与袍哥有关系，互通声气，因此军队一定要在夜间调动才不致泄密。刘湘绝没有反对中央的意思啊！"但蒋介石对刘湘的疑忌却与

日俱增。

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消息传来，刘湘喜出望外，召集干部会议。潘文华、傅常等人主张立即调集军队，包围重庆行营和成都的中央军校。

邓汉祥反对说："如果张学良把蒋介石杀了，蒋的军校、行营又搬不走，那时动手也不迟；如果张学良把蒋介石放了，我们已经发动了，怎么下台？"此时，何应钦派其弟何辑五来成都，希望与刘湘合作，并说何应钦要派飞机去西安轰炸，逼张杀蒋。刘湘听了之后大喜，跃跃欲试。然而，就在他准备部署行动时，张学良在中共调解下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在成都、重庆的军统特务将刘湘的企图报告了蒋介石，蒋恨得咬牙切齿。

刘湘从此深惧蒋介石，知道自己是斗不过他的，于是秘密派一个叫张斯可的人代表他到桂林与李宗仁联系，寻求对付蒋介石的办法。此时，中共方面也有代表在桂林，于是，张斯可、李宗仁与共产党代表签订了反蒋抗日的《红、桂、川军事协定》，商定如果蒋介石不抗日继续打内战的话，便联合起来反蒋。刘湘和延安还互派代表，李一氓代表中共入川，王干青代表刘湘到延安。不久，中共又派罗世文到成都与刘湘谈判。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制定了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和战略大后方的抗日计划。他的心腹之患便是刘湘及五十万川军。8月7日，刘湘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刘湘在发言中慷慨激昂地表示，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和粮食若干万石以支持抗战。于是蒋介石便命令刘湘率川军出川抗战。

刘湘回川后，动员军队分水陆两部出川。11月12日，他赶到南京时，淞沪抗战已失利，日军正分三路向南京挺进，前锋已达江阴。蒋介石一见刘湘，说："来得好！现已划定苏南、浙北和皖南东部为第七战区，由你任司令长官，主要是要死守首都。"

刘湘明白：南京是守不住的，后果将是牺牲川军，而且要背上"失守首都"的罪名。于是推托说："委座，我刚刚过来，队伍究竟到啥子地方我还不晓得，等我马上去弄清楚再来接受任务。"刘湘辞别蒋介石出来，回到车上便大口大口地吐血，一下子昏死过去。

蒋介石一面派人将刘湘送进医院治疗，一面将刘湘兼的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一职，委其部下唐式遵接任。唐式遵当即向刘湘索要印信，气得刘湘病情加重。

南京陷落之前，刘湘被送进汉口的万国医院第一号病房，他暗中与反蒋各派进行联络。戴笠旋即开了刘湘隔壁的第三号病房，让与刘湘有过节的范绍增住进去，暗中监视与刘湘有接触的人员。

一天，范绍增发现一个瘦高个子来看刘湘，于是报告戴笠。戴嘱咐说："要严密监视此人的行动，最近刘湘与韩复榘往来密电频繁，可能与此有关。"

几天之后，范绍增旧部的一个团长潘寅久从前线回来，来找范绍增说："我去过刘湘的长官部参谋处看老朋友徐思平，一直进到办公室内，徐思平正在聚精会神地写命令，我站在他身后偷偷一看，见命令上写着要王缵绪带两个师出川，占领宜昌，随即与韩复榘取得联络。当徐发现我站在他身后时，急忙将命令盖住，搪塞说是写家信。"

当时，韩复榘既怕蒋介石借抗战为名消灭他的军队，又怕蒋介石借刀杀人，让日军消灭他的实力，于是擅自率所部舍弃津浦路，向鲁西南撤退，想经过中原，撤退到襄樊一带。

范绍增向行政院长孔祥熙报告刘湘与韩复榘秘密联络之事，孔祥熙认为事关重大，立即报告蒋介石。很快，蒋介石便离开汉口，北上开封。

1938 年 1 月 11 日，蒋介石在开封召开第一和第五战区师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以"擅弃国土"之罪名，将韩复榘逮捕，并于 12 日将韩押解汉口，交付军事法庭审判。1 月 19 日傍晚，参谋总长何应钦携带着由戴笠截获并破译的刘湘与韩复榘的来往密电，来到汉口万国医院。

何应钦板着脸告诉刘湘："韩复榘已被关押！"

刘湘一惊，假装糊涂地问："为啥子哟？"

"啪！"何应钦将夹有密电的文件夹掷于桌上，说："你看看这是什么吧！"

刘湘看后，惊骇万状，不知所措。何应钦与他谈了许久，起身离去。不久，刘湘便大口吐血，昏迷不醒。20 日，刘湘在汉口逝世。

据官方发布的公告，刘湘弥留之际，曾口述遗嘱，略谓："今后惟希我国军民在中央政府暨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下，继续抗战到底，尤望川中袍泽一本此志，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生还，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求达到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

22 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刘湘，追赠陆军一级上将，发给治丧费一万元，由何成浚领衔主祭，在武汉的党政军各界人士都前往祭奠，场面十分隆重。

23 日，高等军法会审判韩复榘；次日，韩被宣判死刑。24 日晚 7 时，韩在武昌被执行枪决。因此是刘湘先死，韩复榘后被枪毙。

冲突罗网　　蔡锷将军离京之谜

想当年，蔡锷将军首揭护国倒袁大旗，功在史册。但他如何潜离京师，多说是得到京城名妓小凤仙之助，遂演成一段佳话。然而符致兴先生却通过考证，认为另有隐情，写下《蔡锷离京并非小凤仙之助》一文，以正视听。

符先生的主要依据是美国作者艾伯特所著的《端纳与民国政坛秘闻》一书，端纳在华多年，先后当过袁世凯、张学良、蒋介石的顾问，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见证者。在他晚年，许多外国书商曾许以厚酬，请他写出在华经历，由于不想“得罪的人太多”，端纳一再放弃撰写回忆录的打算。直到身患绝症，才听从朋友的劝告，断断续续口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而关于蔡锷将军的回忆，虽然语焉不详，但毕竟为蔡锷离京出走之谜提供了关键性的线索。其主要经过如下：



蔡锷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

端纳大约在1912年前后与妻子离异，住在北京东城胡同一座宽大的宅院里，由于他善于交际，对中国革命抱有同情，他的居所也常成为失意政客和革命志士的聚会之处。1913年，蔡锷从云南进京后，始知袁世凯不是共事之人，进而发现袁氏热心帝制，遂秘密联络西南各方，准备护国讨袁。但袁世凯也是一代枭雄，对蔡锷防范甚严，平时派暗探跟踪监视，1915年10月，还借故抄了蔡锷在北京的寓所。为了释袁氏之疑，蔡锷故作消沉，一有机会便往京城名妓小凤仙所在的前门陕西巷云吉班放歌纵酒，也常到离家不远的端纳住处畅谈时事。至于他们何时结下深厚友谊，以使端纳不惜冒险掩护蔡锷离京，因为端纳没有细说，到现在已是一个谜了。

1915年12月1日上午，端纳邀同好友、时任北京美孚石油公司总经理的孙明甫前往演乐胡同蔡锷将军的寓所，显然事先有约，端纳把孙明甫一人留在客厅，单独与蔡锷在里屋长谈，讨论南方起兵反袁事宜。两位客人离开蔡

宅不久，就有袁世凯的侦探出现。不多一会儿，蔡锷还是像往常一样，乘坐四轮轿式马车大摇大摆向前门八大胡同驰去，那是京城妓院的聚集地。到了陕西巷，只见车水马龙，原来是云吉班掌班的生日，不少在这里赏秦楼明月的达官贵人纷纷前来助兴。蔡锷下了马车，来到小凤仙订好的房间，屋子里已经摆好了酒菜，两个人从容坐下，把酒言欢。与往常不一样的是，蔡锷把怀表掏了出来，放在圆桌上，显然心中有事。

其实此时蔡锷已定下脱离京城之计，但他明白，自从上个月送走家小，又赴天津会见老师梁启超之后，袁世凯对他更不放心了，不但袁的密探如影随形，对他盯得正紧，就是云吉班中也有袁的耳目，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酒过数巡，天色已晚，趁着院内众客余兴未尽，闹得乱哄哄之际，蔡锷佯装如厕溜出院外。袁的密探见蔡锷的呢帽大衣还在原处，料他不会走远，也就坐着不动，放心地跟客人凑趣胡闹。

出了云吉班，蔡锷不往崇文门火车站，而是折回城内，拐向西华门大街，闯进“筹安会”头目杨度的宅院。蔡锷一下子把他拉进里屋，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不愿再充当傀儡，决定引身他去，并劝杨度不要再为袁世凯帝制鼓噪，应该悬崖勒马，早日引退。斯言一出，吓得杨度目瞪口呆，他不知道蔡锷在将军府带头签名“赞成”帝制只不过是一种欲取先予的策略，一直以为蔡是推行帝制的同道，曾一再向袁世凯吹嘘和推荐，根本想不到这位朋友加同乡果然是别人早有怀疑的倒袁分子。面对这位前来进临别赠言又最后摊牌的将军，杨度无言以对，只是生怕隔墙有耳。恰巧这时男仆报告，大总统秘书夏寿田来访，杨度和蔡锷都大惊失色，因为夏是袁世凯的心腹，又是杨度的亲戚，可以随便出入杨家内外。幸好杨度夫人徐氏急中生智，把蔡锷拉进卧室，藏在大床的帐子后面。好容易等夏寿田告辞，杨度设法将蔡锷送回家中，却见门外仍有便衣逡巡，处境险恶。蔡锷打电话给端纳求救，端纳当即吩咐仆人，一起驾着马拉轿车来到蔡府，在夜色掩护下，他们让蔡锷藏在洗衣篓里，抬上马车，直奔崇文门火车站，因为这个车站专供外国人使用，所以不受中国当局检查。端纳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像一年多前帮助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离京出逃一样，亲自护送蔡锷登上火车直达天津，后又联系上一位船工，直到把蔡锷带上一艘日本轮船，端纳才打道回府。

此时在云吉班，密探们发现蔡锷一夜未归，连忙推醒仍在马车中苦候的车夫，睡眼惺忪的车夫连连摇头，不知主人何在。再冲到院内找小凤仙，也是一问三不知。这时他们才感到事情不妙，飞报公府，侦骑四出，却为时已晚。



蔡锷死后，葬在长沙岳麓山

端纳这事做得很巧妙，几乎无人知晓，直到蔡锷在云南举起反袁大旗，他的好朋友孙明甫还蒙在鼓里，以为蔡锷还在京城，所谓的云南义军只是有人在借用蔡锷的名义。于是端纳肯定地告诉他，蔡锷早就离京，而且就是他把蔡锷送出去的。

冒名顶替　　昆明血案之谜

昆明血案是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一件震惊全国的大案，进步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被暗杀，从而引发了一场大学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对此事进行调查，并举行军事法庭公开审理，最后判决凶手死刑，算是对全国的一个交代。

然而据知情者透露，所谓的法庭公开审理以及法场枪决死囚犯，竟是国民党最高当局精心设计的一场“冒名顶替”的司法骗局。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司法黑幕》揭露了其中的内幕。

1946 年 7 月 11 日，在云南昆明，李公朴偕夫人外出回家。他们从公共汽车下来走出不远，突遭美制无声手枪从背后射击，子弹从李公朴后腰射入，前腹穿出，因伤势过重，于次晨去世。四天之后，即 15 日晚间，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闻一多在出席了为李公朴被暗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后，在离西南联大宿舍十多米的地方，突然遭到一阵短枪的射击，头部、身上中了数弹，当即倒地。



闻一多先生

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是著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成员。由于蒋介石挑起内战，李、闻两先生凭着知识分子的满腔热情，为和平民主呼号，要求停止内战。因为李、闻两先生在青年学生中威信很高，在他们的努力呼吁下，1946 年的云南成了大后方的“民主之乡”，这当然为蒋介石所不容。

南京当局早就对云南方面发出“对中共与民盟分子同样可以密报、密捕、密决”的指示，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领会蒋介石“权宜行事”精神后，召集总部参谋长刘淑琬、警备总部第二处处长王子民等密谋，由王子民调集十余特务，进行两次暗杀。如闻一多被杀，就是由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派遣熊广福等凶手四人，乘坐军用吉普车，在西仓坡埋伏，用手枪暗杀的。

昆明李、闻血案消息传出，举国震怒，万民共愤，全国学潮汹汹，要求严惩凶犯，讨还血债。

蒋介石在庐山闻讯大惊，万没有料到事情会闹得如此之大，竟不能收场。于是，蒋介石亲自登场“缉凶”了。8 月 2 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昆明事件之调查与处理》，强调异常重视昆明事件，因为“国民政府的信誉，国民党的信誉，中国国家的信誉，乃至中国人民的信誉，都以此案为试金石”。8 月 10 日，蒋介石向全国发表讲话，要求“一、明是非、张正气；二、明礼仪、知廉耻；三、明责任、守法纪”。还先后令军统头目、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和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到昆明查办李、闻血案。

一同前往协助唐纵调查的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心中感到好笑，以他多年特务工作的经验，深知“按照蒋介石的规定：杀死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必须事先向蒋请示。像戴笠这样的人，要暗杀一个人，也一定要得到蒋介石的批准才敢动手。主要原因，是怕把蒋介石亲自派遣潜伏在各党派内的人杀错”。《中央日报》公布他们前往破案的消息，兴师动众，其实是装模作样，遮人耳目。

唐纵、程一鸣在昆明转了一圈，便知道了全案过程和细节，凶手主使是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唐纵便用保密局驻昆明的无线电台，拍电报给庐山的蒋介石，请示如何善后。

过了几天，蒋介石让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参谋长冷欣和中央宪兵司令部司令张镇，随带该司令部警务处处长周建心同来，设法了结此案。

顾祝同、冷欣、张镇、唐纵在云南省主席卢汉的别墅开会商量，想出了好办法：

对外只公布闻一多案被破获，不谈李公朴被杀案。如两案同时公布，对外刺激太大。

张镇自告奋勇，说闻案由宪兵司令部负全部责任，不要云南警备司令部负责。



1922年，闻一多在美国芝加哥美术馆前



李公朴先生

张镇建议由宪兵司令部编造一个骗人的故事，说两名宪兵身穿便衣参加李公朴的追悼会，听到闻一多辱骂国家元首和军人，义愤填膺，忍无可忍，后跟踪闻时，又听闻辱骂，乃拔枪将闻打死。这是宪兵出于义愤杀人，是为了维护国家元首威信，这样能得到社会同情，不至于牵涉到政治谋杀。

最后，由冷欣上庐山向蒋介石汇报处理方案，请示办法。经过蒋介石的同意，由宪兵司令部交出两名宪兵李文山和汤时亮，作为枪杀闻一多的杀手，举行公开军法审讯。公开审判时，这两人声称是“激于爱国义愤自动枪杀”，并慷慨陈词：“骂军人是走狗无耻，都该杀，把我们军人骂得不像人……我当

时气急了，就摸枪打死他，我想凡有血气的爱国青年，当时都可以这样做。”他们讲话有时流利，就像背书，有时却语无伦次。闻一多在致公堂讲话，痛斥特务暗杀李公朴，明明痛斥的是特务，根本未讲是军人，编造漏洞百出。这两人最后被判处死刑。顾祝同还发表了感想：“对凶犯汤时亮、李文山的触犯刑法，致受极刑，于执行律令之余不无感慨。”大有挥泪斩马谡的架势。

这两位“爱国青年”当然不会被枪毙，实际上被拉出去的是两个已判死刑尚未执行的抢劫犯，枪决前这两个替死鬼被人用酒灌醉，执行后掩埋，执行时刑场戒备森严，根本不让人走近。但人们还是隐约看到从有篷汽车上拉下两个犯人，不像法庭上慷慨陈词的两个青年。在行刑的当天晚上，接替霍揆彰任云南警备司令的何绍周（何应钦之侄）就告诉滇西警备司令、第二军军长王凌云：“这些被枪毙的凶手是假的，是特务用压迫手段和花了金钱弄来的。”何当时颇有感触地说，特务真厉害！冒名顶替的把戏是顾祝同带来的特务头子张振国一手包办的。

真正的凶犯却被送到大理第二警备司令部保护了起来。此事的执行人王凌云后来回忆说：他根据顾祝同的指令，将直接行凶的暗杀组成员王子民等十余人，送到第二军军部大理县后山的无为寺里，配以特务连一排，全副武装负责保护。顾祝同当面交代王凌云，不能把他们当犯人看待，也不能让他们跑掉一个；不准他们外出与人通信，也不准外面任何人去见他们。生活上优待，并嘱王用专用密码随时向陆军总部报告王子民等的情况。

8月25日，中央社把公审情况和“凶手”的口供发表，全国各报转载。但暗杀闻一多的全班凶手仍然一个没放，原因是担心骗局被揭穿。蒋介石、顾祝同当时还打算，如果万一原案泄露，在万不得已时，便可从王子民等人中提出一二人，以资应付。

外交风云

以夷制夷　　《二十一条》被泄露之谜

1915年的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秘密会见了袁世凯，面交了所谓的《二十一条》。当日置益陈述完《二十一条》的基本内容后，袁世凯十分吃惊，神情严峻地回答说："此条款请与外务部会商。"那么，这令袁世凯"十分吃惊"的《二十一条》究竟是什么内容？最早是由谁泄露出来的？又是通过什么渠道被被泄露的？许多史籍和文章对此语焉不详。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一些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战，无暇顾及远东地区的利益。日本利用这一形势，趁机加强在华的扩张，企图排斥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早在大战爆发前夕，日本参谋本部就已获得情报，得知袁世凯确有复辟帝制的野心。所以，这一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很注意加强与袁世凯身边一些人的联系，以了解袁世凯的想法，掌握袁世凯的动向。

8月1日，德俄宣战；3日，德法宣战；4日，德英宣战。7日夜，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德宣战。外务大臣加滕高明认为：驱逐德国在远东的势力，是符合实际的良策。8月15日，日本政府对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9月15日前，无条件地将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交付于日本，同时撤走德国在中国海面上的军舰，否则立即解除武装。

德国虽然无法采取强硬态度，然而还是拒绝了日本的要求。8月23日，日本宣布对德国宣战。之后，日军在山东半岛龙口登陆，德军在做了象征性抵抗后投降。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整个德国租借地，控制了胶济铁路。就在袁世凯紧锣密鼓地进行帝制活动之时，日本决定以此为契机，从中国索取更多的利益，以便达到全面控制中国的目的。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秘密会见了袁世凯，面交了所谓的《二十一条》。当日置益陈述完《二十一条》的基本内容后，袁世凯十分吃惊，神情严峻地回答说："此条款请与外务部会商。"日置益要求尽快结束谈判。

《二十一条》内容共分五号。第一号(四条),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并加以扩大;第二号(七条),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东部的各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延至九十九年;第三号(二条),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第四号(一条),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和割让予别国;第五号(七条),中国政府聘用日人为政治、经济、军事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和兵工厂,承认日本在武昌、九江、南昌及杭州、潮州间的铁路建筑权等。



袁世凯

显然,《二十一条》是一份赤裸裸地暴露日本政府狼子野心的大计划。由于担心消息外泄,引起其他列强国家的不满和干涉,日置益在临走时威胁说:“如秘密(指《二十一条》)泄露出去,日本当断然采取行动。”

但是,“二十一条”的内容很快就在美国报端上公布出来。日方大为恼火,质问袁世凯政府,而在袁政府方面,自然竭力否认和洗刷自己,还找出一个替罪羊来。于是在事发后不久,秘密警察就逮捕了袁世凯的首席秘书沈祖宪,咬定是他泄露了机密。

几十年后,桑盛廷先生曾采访过沈祖宪之子沈伯乐,并写成“沈祖宪案内情”一文。据沈伯乐称,其父当年遭捕的原因“是为了泄密二十一条的事”。因为沈作为袁世凯的秘书,《二十一条》曾由他保管过,所以难脱嫌疑。沈祖宪在关押期间,曾向法庭问过自己所犯何罪,回答云:泄露《二十一条》,私通孙中山。但是由于证据不足,沈祖宪最终无罪而释。

也有持另说者,认为泄密之事乃两位外国记者所为,即民国时期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莫里循和端纳。孟国祥先生在《米字旗下的中国朋友——端纳顾问秘闻》一书中很形象地描述了端纳得到《二十一条》的经过:1915 年 2 月 10 日那天,端纳去袁世凯顾问莫里循住处,在莫里循去书房时,发现莫里循有意识在一叠文件上轻按了一下,然后端纳支开佣人,乘机将那份文件抓进口袋。回到家后,发现那份文件正是《二十一条》的全译本。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给《泰晤士报》发去电稿,全文共计三百一十八个字,“已经把最完全、最真实的消息送回国”。但是,莫里循是如何搞到《二十一条》副本的?孟文

也作了分析，认为这可能是袁世凯在打“英美牌”，用英美来牵制日本。在1月18日晚上的紧急会议上，袁世凯认为“各条内容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开议”，于是决定“逐条谈判”的交涉方针。然而面对日方的咄咄逼人之势，他会考虑“以夷制夷”的手段的。有可能是他有意识向莫里循泄密的。让人感到疑惑的是：这样一个复杂的谈判条款，怎么会以三百一十八个字就能说清楚，何况是逐条谈判的呢？

前几年，国内出版了民国时期的资深外交家顾维钧的回忆录。据顾维钧回忆：袁世凯在日置益提出《二十一条》后，就立即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即让外交总长孙宝琦辞职，任命职业外交家陆徵祥为外交总长，与日本进行谈判。之后，袁世凯单独召见了陆徵祥，指示他尽量拖延时间。果然，日本方面要求天天谈，陆徵祥提出每周一次，最后达成妥协为每周会谈三次。为了获得国际对中国的支持，袁世凯决定不顾日本的威胁，将《二十一条》的内容泄露给美、英等大国。

在得到袁世凯和陆徵祥的授意后，外交部参事顾维钧在每次谈判后的当天下午或第二天清晨，就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向英、美汇报谈判情况。美国新闻界得到《二十一条》后，立即予以公布。消息传出后，迅速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更是深深地震惊了美国政府。

谜底终于揭开了，原来最早向全世界披露《二十一条》的是美国，而授意泄露《二十一条》内容的则是袁世凯本人，陆徵祥参与其事，顾维钧是具体执行者。问题是，袁世凯为什么要指示陆徵祥、顾维钧等人把《二十一条》的内容泄露给新闻界呢？

袁世凯之所以采取拖延的策略，还是沿袭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方针，本意是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借助英美的力量牵制日本，以便在复辟帝制的问题上少付出一些代价。

美国政府在得到《二十一条》的消息后，确也向日本施加过压力。首先，美国政府通过日本驻美国大使，将美国的立场通告日本政府；美国还向英国、法国和俄国提议，共同干涉中日交涉，却遭到三国的拒绝。尽管这样，袁世凯还是没有完全达到目的。1915年5月7日下午3时，日本公使日置益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照4月26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何等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对于此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5月9日午后6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

5月8日，英国公使朱尔典访晤陆徵祥，力劝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最终袁世凯以“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由，决定忍辱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

5月9日，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25日，《二十一条》由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字及交换。这样，不仅袁世凯为国人憎恶和唾骂，而且参与签订《二十一条》的陆徵祥也成为众矢之的。

孙中山在致北京学生的信函中一针见血地说：“袁世凯以僭帝位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道出了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实质。由此，我们对袁世凯也多了一层更深的认识，贼喊捉贼是他的惯用伎俩。

光荣归谁　　火烧赵家楼之谜

火烧赵家楼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因为这把火，掀起了五四运动的高潮，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然而，人们至今对火烧赵家楼的细节还不清楚，尤其是谁放火烧毁了赵家楼曹汝霖的宅邸，仍是众说纷纭。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的片断：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三所学校约五千多人，因巴黎和会及取消“二十一条”等问题举行游行示威，并冲击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住宅赵家楼。其实这是一个策划好的行动，据当事人之一的俞劲回忆：“五四运动的前两天，少年中国学会、爱国会、国民杂志社三个



1919年5月清华大学师生焚烧日货

团体的少数成员，大约二十余人（尽我的记忆所及，大都是湖南人和江西人，有匡日休、夏秀峰、易克嶷、熊梦飞等），在高工或北大理学院（现在想不起到底是哪一场所）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与会者异常愤慨，有主张暗杀卖国贼的，有主张实行暴动的。最后决定派人密查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行踪，并准备于5月4日那天采取行动，这是五四前夕秘密会议的大概。这一会议，可以说是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准备战。

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左右，各校学生约六七千人，在天安门前集会……大会后，队伍……出发，依照大会决议，应向总统府去请愿，但走在队伍前面的人（有些是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议的），却有目的地引导队伍浩浩荡荡向赵家楼曹汝霖公馆走去。”

以上记载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北京革命史话》基本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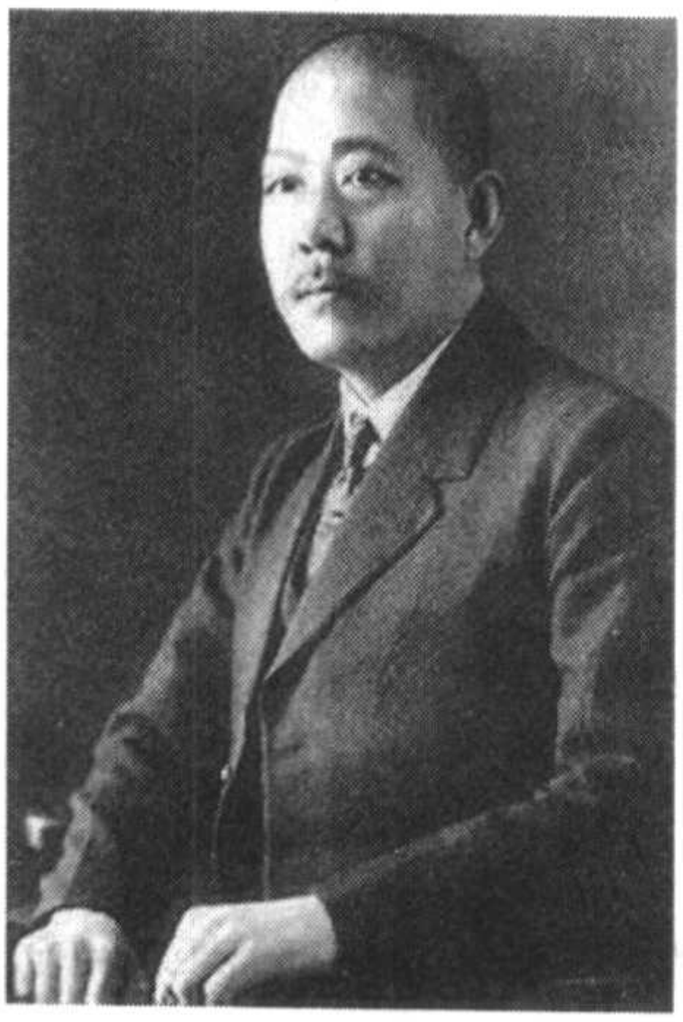
> 北京高师的学生们异常激动，决心用实际行动进行反抗。学生领袖匡互生遂与国立八校的湖南籍学生二三十人组成秘密小组，策划行动。5月3日晚，在校操场北角一间小屋里聚集了十几位工学会主要成员：匡互生、周予同、杨荃骏、俞劲、周为群等人，经过几番商讨，决定采用激烈的手段惩治卖国贼。主要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为目标，首先将他们打死，哪怕打倒一个也好。大家分头准备各自的任务：有的去调查曹、章、陆的住址和行踪；有的去准备放火用具；有的去设法搞到曹、章、陆三贼的照片，以便对证。有的准备旗帜和标语。匡互生誓言要作“流血大牺牲”。

队伍到了赵家楼后，因为公馆紧闭，学生拥挤在门口，俞劲回忆说：“这时突然有领队某君（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议人员之一，湖南人，高师数理部学生，曾习武术，臂力过人），奋不顾身，纵步跳上右边小窗户……便不顾一切跳下去，迅速而机警地把大门打开，于是大队学生蜂拥而入。”

这位“某君”指的就是匡互生，但也有其他说法，北高师的陈荩民和北大的许德珩都说是踩着匡互生的肩膀跳进窗内的。总而言之，匡互生是勇闯赵家楼的重要角色。

接下来就是举世闻名的“火烧赵家楼”了，但因为场面混乱，谁是点火者至今尚是疑问。但有一点，肯定是北高师的学生。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和夏晓虹主编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一书写道：

> 如此巨大的光荣，似乎没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前来争领。历来自居老大的北京大学，对此事也只能含糊其词；甚至还出现了北大中国文学院学生萧劳也都站出来作证，将“放火”的光荣拱手相让：“我行至曹家门外，看见着长衫



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

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壶，内装煤油，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点着，霎时浓烟冒起。我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见。大家认得他俩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

俞劲也在现场，是目击者，他说得很清楚，那位放火的人就是匡互生。他说：“大约到了天将黑的时候，忽然黑烟从后进房院升起，一会儿火势熊熊地蔓延开来，我们广大青年群众痛快淋漓地高呼口号而散……这场火究竟怎样起的？当时知道的人不多。放火的也就是那位跳窗户开大门的某君。当时队伍在大街游行的时候，我和某君同在队伍前面，他要我快跑去买盒火柴，我知道他不吸烟，干吗要火柴？但立刻体会他要买火柴的意图，便迅速地离开队伍买了一盒给他，这盒火柴果然得到了妙用。这就是……火烧赵家楼的情形。”

俞劲将光荣给了匡互生，“北京师范大学同学通讯辑刊”中也采此说，从进入曹宅后，“匡互生取出准备好的火柴，和周予同一起撕下床上的帐子。这时担任此次示威指挥的北大学生段锡朋看到，立即过来阻止说：‘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匡互生说：‘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定负不了责任。’说着，即将火柴点燃，熊熊怒火和着学生们的愤怒冲天而起”。

这一说法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但最近俞劲的外孙王立翔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在《记火烧赵家楼的点火者——俞劲》一文中认为，火烧赵家楼的点火者应该是自己的外祖父俞劲，他举出的证据十分有力，出自于北高师学生张石樵的自述，他也是现场的当事人，自称“亲眼看到北京高师一同学用煤油把房子点着了，我还添了一把火，赵家楼顿时火起……至今仍有不少人误把匡互生说成是烧国贼的放火者，这应该加以更正，真正放火者为俞劲（又名慎初）。我们不能为此而改写历史”。

说点火者非匡互生所为还有一条佐证，因为匡互生本人也有相关文章留世，他在 1925 年写下了《五四运动纪实》，只提学生放火是“以泄一时的忿怒”，而没说火是谁点的。

因此，“火烧赵家楼”的点火者至今未能确定是何人所为。

千秋功罪　外蒙古撤销自治之谜

1911年12月1日，外蒙古的王公大臣在库伦成立“大蒙古国”，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杭达多尔济亲王为外交大臣，年号为“共戴”。不久，乌里雅苏台亦成立临时政府，外蒙古独立。1920年元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库仑接过北京民国政府特使徐树铮的册封令与七狮金印，宣布外蒙撤销自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各省响应，纷纷独立。沙俄利用中国社会动荡之际，加紧策划分裂中国的活动。沙俄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在上沙皇的奏折中指出：“现在中华帝国解体，在各方面都是合意的。在中国各部分之间，即令他们彼此不是完全独立的关系，无疑会有竞争，足以将它们削弱。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情况，以便完成我国移民事业及巩固我们的边疆。我们在这些地方的自由行动，可能比现在大得多。”

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对俄驻华公使的训令中说：“将中国分为几个独立国家，从我们来看，最适合我们的广泛利益。”

在沙俄的策动下，外蒙古杭达多尔济亲王等与俄国驻库伦总领事密谋后，向清廷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后通牒，宣称“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独立共和国，公推博克多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不日登极。”

1911年12月1日，杭达多尔济亲王率哥萨克等骑兵包围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衙署，三多等办事大臣被哥萨克骑兵押解离境。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库伦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杭达多尔济亲王为外交大臣，年号为“共戴”。不久，乌里雅苏台亦成立临时政府，至此，外蒙古独立。

12月22日(阴历十一月初三)，清廷派车臣汗部落盟长札萨克多罗郡王多尔济帕拉穆、科布多办事大臣桂芳为查办大臣，前往库伦，调查蒙古独立事件。

1912年2月22日，清帝逊位，袁世凯上台，成为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袁政府也坚决不承认外蒙古独立。沙俄出面充当调停人，在中国和外蒙古之间进行调停。经过多轮谈判，1915年6月7日签订《中俄蒙恰克图协约》。主要条款为：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

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自治外蒙无权与各外国订立关于政治及土地关系的国际条约；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的名号由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中国政府可在库伦设办事大臣公署；中国驻库伦大员卫队数目不超过二百名，该大员之佐理专员分驻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恰克图各处，每处卫队不超过五十名；中国货物运入外蒙须纳内地货捐，洋货由外蒙运入内地，照中俄 1881 年“陆路通商条约”所定关税交纳。

1916 年 6 月 9 日，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告取消独立。袁世凯策令外蒙王公爵职及喇嘛各名号，“无论沿袭前清及得自外蒙者，均着一仍其旧”；并册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任命徐绍桢、荣勋为册封专使；同时申令免究所有内外蒙人参与独立事件之责任。7 月 8 日，在库伦举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册封典礼。

1917 年 11 月，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向全世界宣布：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等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皇在这些国家享有的特权。

日本早对外蒙怀有觊觎之心，急欲填补沙皇政府垮台后出现的真空局面，采取支持外蒙地区独立的政策。

1919 年 1 至 2 月，在日本第三师军官支持下，沙俄旧军官谢米诺夫在乌金斯克、大乌里煽动部分蒙古王公两次举行会议，决定在海拉尔组织临时政府，并派代表到巴黎和会上要求国际承认。谢米诺夫在日本支持下，在外蒙的非法活动愈演愈烈，都护使陈毅急向北京政府告急。

6 月 13 日，北京政府特派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国务会议议决出兵外蒙，以西北筹边使署为主管机关。改督办参战事务处为督办边防事务处，编定西北边防军，任命徐树铮为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根据外蒙许多王公惧怕日本，急欲撤销自治，重归中国的心理，提出了“西北筹边大纲”。

外蒙古撤销自治之议本是蒙古王公发动的，但外蒙古统治集团内部黑黄两派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激烈。黑派为蒙古王公，黄派为喇嘛教。当时活佛是最高统治者，喇嘛干预政事，与王公争权。王公一派发动撤治运动，想利用撤销自治，“恢复前清旧制”，以夺取黄派掌握的政权；而与督护使陈毅接头谈判的，正是黑派代表人物、自治政府外务总长车林多庆济。

经过多次谈判，陈毅与王公代表商议了一个“外蒙善后条例六十三条”（草案）。陈毅电告北京政府称：“至喇嘛方面，王公既愿，彼必无词，且活佛亦久向中央，殊无可虑。”

就在都护使陈毅认为高枕无忧之时，哲布尊丹巴派信使接二连三赴北京，否认陈毅与黑派达成的协议。嘉亨尊活佛亲自莅京，表态不承认所谓的“六十三条”。

1919 年 10 月，西北筹边使徐树铮抵达库伦。他了解了黑派与黄派的矛盾，认为“外蒙活佛强制之力尚在，纵全数王公迫请，而活佛不应，终无如何。故喇嘛人物，未可过于抛荒”。他与外蒙自治政府总理兼内务总长巴特玛多尔济接触后，认为此人是掌握政府实权的核心人物。所以“撤治之事多向此人身上加工，定可得手”。

徐树铮指出，“外蒙善后条例六十三条”有七不可，希望政府授权，将外蒙撤治一事交自己全权办理。国务总理靳云鹏称：“撤治之事已经内阁决定，断无反复之理，取消自治案由陈（毅）都护专办，勿庸他人越俎。”徐树铮并不罢休，又致电国务院谓：“撤治但求成功，何分畛域？”坚持要求直接负责外蒙撤治之事。在徐的强烈要求下，北京政府明令，筹边使署设于库伦，外蒙撤治一事，由筹边使署直接处理。

徐树铮接手外蒙撤治重任后，去见活佛哲布尊丹巴，劝其取消自治，又派兵监视佛宫。他与哲布尊丹巴协商制定外蒙善后条例，并直接交由外蒙政府总理巴特玛多济尔负责办理。他电北京政府：“撤治已定，军队即北发边防。”造成大军压境的气氛。

在徐树铮恩威并重的攻势下，11 月 17 日，外蒙古黑黄两派的王公、喇嘛联合具名呈文北京政府：“情愿取消自治……所有平治内政，防御外患，均赖中央竭力扶救。”库伦当局正式宣布外蒙取消独立，仍归属中国，并宣布前与沙俄政府所订各项条约“概无效力”。

11 月 22 日，北京政府明令：“应即俯如所请，以顺蒙情。”宣布取消外蒙自治，废除 1915 年《中俄蒙恰克图协约》，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外蒙“翊善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册封女活佛为外蒙“昭敏净觉额尔德尼车臣敦都布喇木”。

大总统徐世昌特任徐树铮为“外蒙古活佛册封专使”，交其七狮金印及册封令。令曰：“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赞助取消自治，为外蒙古谋永久治安，仁心哲术，殊堪嘉尚，著加封为外蒙古翊善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以昭殊勋。此令。”

徐树铮出使外蒙行前，段祺瑞总理曾率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在故宫保和殿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徐树铮于 12 月 27 日再次抵达库伦，受到外蒙喇嘛、

王公大臣、绅商及民众代表热烈欢迎，他们郊迎十里，百姓也夹道相迎。库伦大街小巷皆悬挂中华民国五色国旗，意味汉、蒙、满、回、藏五族和睦、团结，真正体现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为此，孙中山欣然发贺电致徐，云“此得来电，熟知外蒙回心内向，吾国久无陈汤、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宣举国欢欣鼓舞之不已”，给予极高的评价。

1920 年元旦，庄严隆重的册封大典在库伦佛宫举行。当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从徐树铮手里接过册封令与七狮金印时，库伦全城乃至全中国都沉浸在普天同庆的欢乐中。

1920 年 7 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军阀在战争中失败，北京政府下令将督办边防事务兼管理将军府事务的段祺瑞免职。中原板荡，自顾不暇，无力顾及边陲。

1921 年 1 月 9 日，沙俄白匪恩琴部在参谋长山田的策划下，使用日本供给的枪炮大举进攻外蒙古，与第二十五混成旅激战。旅长褚其祥急电援库总司令张景惠速派援军。14 日，白俄恩琴率俄蒙兵等五千多人分三路进攻多伦，褚其祥部死伤四百五十余人，褚急电北京政府速予援助。2 月 3 日，陈毅、褚其祥等逃往恰克图，未及撤离的商民及受伤官兵约三千余人惨遭杀害。在恩琴的胁迫下，2 月 21 日，外蒙成立自治政府，活佛哲布尊丹巴再次宣布独立，重登大汗宝座。恩琴被册封为亲王，成为外蒙的实际统治者。

6 月 15 日，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齐趋林照会北京政府：恩琴之攻击已引起广大军事动作，使俄军不得不越入蒙古境内反击恩琴，俟目的一经达到，蒙古境内之俄军即行撤退。6 月 27 日，苏俄政府再次照会北京政府，表示苏俄愿意派兵赴外蒙，与中国会剿库伦白匪，并提出组织中俄蒙地方自治委员会，以期解决中国中央政府与蒙古地方之间一切关系的主张，但为北京政府所拒绝。

7 月 6 日，北京政府电复苏俄，谢绝苏俄出兵外蒙，谓中俄国际关系尚未恢复，故无协定之可能。与此同时，苏俄派遣大批红军和远东共和国红军组成联合军，又派大批红军和蒙军联合，击溃恩琴白匪，占领库伦。11 日，在库伦成立“蒙古国民政府”，仍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为元首。

权益之争　日奉铁路交涉之谜

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之际，北洋军阀统治岌岌可危，日本乘机向北京政府统治者张作霖提出在东北修筑铁路的要求。10月15日，日方与张作霖订立了“满蒙新五路协约”，但张作霖不敢签订正式换文。为此日本政府多次提出交涉，史称“日奉铁路交涉”。由于张作霖最终拒绝了日方的要求，导致后来的皇姑屯爆炸案，就此结束了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1927年，国民革命军横扫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北洋军阀已成强弩之末。6月26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外相官邸召开“东方会议”。参加者有外务省官员，陆军部、海军部官员，亚细亚局长，关东军司令、关东厅长官，驻华公使和奉天总领事、驻上海总领事等。会上，田中叫嚣：“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及国民生存上的重大利害关系，我国不但要做特殊的考虑……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我国在该地的特殊地位、权益有遭受损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将予以保护，应决心不失时机地做出适当的措施。”武滕司令官在会上提出：“在满蒙方面，交通机关以及资源之开发未能实现至我国能满意之程度……日本对满蒙有特别之利益关系，故必须确立坚定之政策，为东三省之居民，亦为日本，努力于交通以及资源开发。”

8月16日，田中在大连会议上决定，扩大满铁的权限，对奉方自办的铁道要加以干涉、控制，提出必须“在满洲实行强硬手段”。

“东方会议”后，日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回到北京，向张作霖提交“满蒙觉书”，要求解决中日间铁路问题、租借地问题、商租问题等悬案。张作霖还是与日本打太极拳，把交涉之事推给东北地方当局，而日使则坚持要求与中枢直接谈判。



奉系军阀张作霖

8月中旬，满铁新总裁山本条太郎拜会田中首相，商讨解决满蒙铁路交涉问题，认为：

“吉田总领事最近在奉天对莫(德惠)省长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中国方面因此极端反感。如果将这种情形继续发展下去,铁路问题终将无希望解决,切望现在不要因为不太重要的‘悬案’而向中国表示强烈的态度,以致累及铁路问题。”同时,山本还提出建议,派张作霖的顾问町野马武和与张私交很深的江藤丰二与张进行秘密交涉,“约定将全部极端保密……不能让外务省轻举妄动”。

町野与江藤负秘密外交使命,以山本条太郎提出的“东北铁路方案”为原则,向张作霖要求,在满蒙修筑七条铁路,即长春大赉线、通辽开鲁线、呼兰绥化线、吉林会宁线、齐齐哈尔昂昂溪线、洮南索伦线及奉天、铁岭间铁路某一点至新丘线。日方要求夺取奉方铁路网中的线路,变包围为反包围,使对方的支线成为自己的培养线,形成干支相衔,以臂收指之效。此项要求,不仅扩大了满铁的权益,同时又可向内蒙伸展其势力,从而达到控制满蒙之目的。

经过双方讨价还价,张作霖提笔在记载铁路线的文件上圈了四条铁路,江藤要求再圈一条,放弃两条,张又圈了一条。最后,张作霖说:“这只是预备性的协商,暂且不要发表。”他的本意是想依靠日本的支持,打败北伐军,继续统治中国,不得已同意日方的要求。但是他内心并不希望放弃东北的权益,特别是一旦打不过北伐军而退回关外时。如果日本帮助他巩固了统治,他的政治中心必然移向关内,不妨秘密让出一些利权。张作霖以铁路为砝码来平衡日奉关系,但是他未能预见到,当他战败时,日本会毫不犹豫阻止他退回关外,甚至制造了“皇姑屯爆炸”来结束他的生命,使他成为一个悲剧人物。

10月15日,日方与张作霖订立了“满蒙新五路协约”,张同意给日本承包建筑敦化至图门江岸线、长春至大赉线、吉林至五常线、洮南至索伦线、延吉至海林线。同时协约中还规定,中国不得将打通线延长至通辽以北,禁止修筑开扶线等。张作霖只是在协约上写个“阅”字,以示同意。

不久,山本与田中达成默契,即“约定将全部极端保密”,但是“不能让外务省轻举妄动”之新五路协约还是让外务省得知,日公使芳泽“以不经外交途径,竟协定类似军事同盟,电田中内阁加以指摘,田中亦因未料到此种项目,乃电嘱日使由张收回原换文。将上项密约,先改成政府间的正式协定”。而张作霖的代表杨宇霆却恐其成为正式换文而踌躇,张作霖也不敢同意签订正式换文,遂使中日谈判又陷入僵局。

不久，日本路透社有意识将密约内容在报端上透露，使张作霖极为难堪。天津大公报亦转载日报，发表了中日关于满蒙新五路交涉的特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日浪潮，国民政府视张作霖为卖国贼，连一直欲染指东北的美国也出面干涉。11月13日，美国国务卿洛格向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提出："中日两国关于满蒙铁路的交涉，如果侵及国际新银团的范围，美国将首先出面反对。"

张作霖引火烧身，对日本人出卖自己的做法极为恼火，他公开否定有此密约，私下说："本人在暗中和极端秘密中为日本利益着想的一切言行，竟全部公之于日本报纸，向外传布，在这种情况下，岂不是任何事情也不能向日本谈吗？"

日方对张作霖的出尔反尔也表示愤慨。杨宇霆在请求日方谅解时说："田中内阁对满蒙政策的真精神是充分理解的，也具有诚心合作，确切实行的不可变易的决心，但看以前与山本社长所缔结协定一事，便可明白。但中国目前的政情，奉天派如把和田中取得的谅解将予实行一事，予以公开发表，南方派固然反对，就在北方，民众也要反对，会使奉天派在中原的地位立不住脚，是势所必然的。因此，在与外国记者谈话之际，他们都以日本报纸所发表的材料为依据而提出质问时，只能以完全否定的口气来解答，此点希望谅解……为此，一切只能作为密约，采取变通手段，实出于不得已。如果强使履行正式手续，势必成为公开问题，因此将使国论鼎沸，奉天派不能保持现在的地位势所必然。"说来说去等于没说，办来办去等于没办，日本人深深体会到张作霖"软磨硬泡装糊涂"把戏的厉害，也使日奉矛盾更加尖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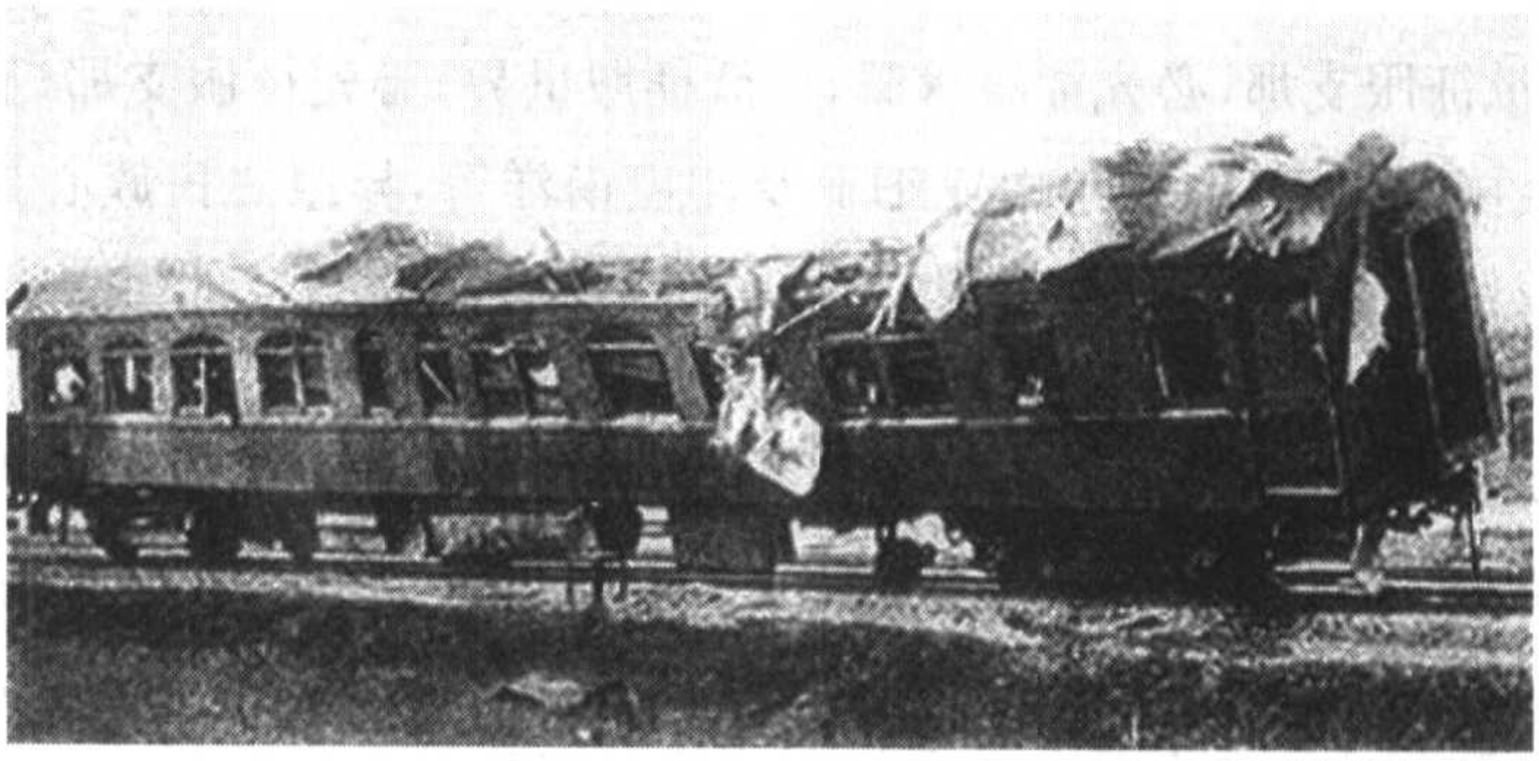
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

1928年5月17日，在北伐军即将兵临北京城下之际，日公使芳泽向张作霖提出最后通牒，强迫张作霖同意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日本乘人之危，掐着脖子要好处的做法激起张作霖的强烈反感，他怒不可遏地骂道："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卖国贼。我们什么都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想要了！"双方彻底闹翻了。当张作霖的专车驰近奉天只有一步之遥的皇姑屯时，在巨大的爆炸声中，他走完了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张作霖死后，父债子偿，日本人加紧逼迫张学良。此时，张学良已向国民政府表示"决无妨害统一之意"并同意易帜。1928年7月，田中首相给新任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电报中指示："有必要把日本强硬的一面叫他领教领教。"在张学良给其父治丧期间，日本前驻北京公使林权助代表日本政府向张学良提出："满蒙是日本付出过重大牺牲后得有的特殊权益的地方。在日本人心目中，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它的命运，日本不能不时时刻刻的关心。"以此威胁张学良接受日本"保境安民，反对易帜"的主张，并重提铁路交涉问题。除张作霖曾答应的五路之外，还围绕下列问题：（1）打通之建设；（2）吉海之建设；（3）吉海、吉长之接轨问题；（4）洮昂路工费决算问题；（5）吉敦路建设工事问题；（6）洮昂路日本顾问问题；（7）四洮铁路借款问题。与此同时，日本大藏省欲以6 000万元之借款给南满铁路公司，通过满铁借与奉天地方政府，"以图实业与铁路之发展"。

张学良痛恨日本人的卑鄙手段，以全国民众的反日浪潮为理由，拖延铁路问题谈判。另一方面，与南京信使往来。蒋介石对日本劝说张学良独立的目的十分担心，恐日久生变，但又说："汉卿似属诚意，东省和平统一，可无问题，但日本对之必更忌恶。"他也看出张学良早晚会成为日本之眼中钉。经过南京、奉天双方折冲樽俎，达成协议，定于12月29日东三省改旗易帜，"惟事前仍持秘密，勿稍漏泄引起他方注意为要"。

东北易帜后，日方仍喋喋不休要求解决铁路悬案，张学良以国民政府早有宣言，有关外交事宜概由中央负责，地方当局无权过问为借口，拒绝日本关于铁路交涉的要求。如果说，在张作霖时代，日本在满蒙还取得不少口头协议，而在张学良执政期间却一无所得。12月7日，日本拓务省召开会议，计划重新制定灭亡满蒙的政略，议决（甲）对奉方决定将满蒙外交权名实共归南京的做法，取外宽内严方法坚决反对之；更借题发挥，强其仍以张学良为外交负责长官，以便保持日本之特殊地位及特权。（乙）对奉方铁路网之建设，取干涉的态度，以阻其实现。特以迫战求和策略，诱其与我协调满蒙铁道运价与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这是张乘坐的车厢被炸后的情形

货物吸收区域之限制，似此方足永保南满铁路与大连港之繁荣，俟天赐机会到来，可达帝国对满蒙最后之目的。

张学良是爱国军人，血性男儿，对日本的无理横蛮要求，彻底予以拒绝，关上了谈判的大门。至此，日方完全对张学良绝望，解决东北铁路问题乃至全部满蒙权益问题，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只有等“天赐机会”，用武力夺取满蒙权益。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当数年围绕铁路的交涉使日方一筹莫展，日本军界终于失去了最后的忍耐力，因此，在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由此也可以佐证，日奉铁路交涉及其破裂，是导致“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雾里看花　《田中奏折》真伪之谜

《田中奏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份重要文件，但从它被披露出来的那一天起，其真实性就受到质疑，日本方面对此竭力否认。然而从事实看，他们在日后的侵略行动却和文件所制定的计划与目标十分吻合。但是持肯定意见者也有疑惑，因为这份披露的文件确实有不少令后人难以解释的谜团。

1927年6月，日本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了中国局势，进一步制定侵华政策。7月，由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内容起草了一份奏折呈给天皇，

其中有语曰：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心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全文为两万余字，它的泄密过程就像一部传奇故事。因为“东方会议”是一次极为机密的会议，田中在开会当天就再三强调，与会者“务请牢记本会内容绝对机密”，也因此成为中国和欧美各国关注的焦点。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外交委员会委员的王家桢因此给住在东京的一位叫蔡智堪的华人富商秘密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打探到“东方会议”的主要内容。

蔡智堪早年参加过同盟会，有爱国思想，与日本上层人士也多有交往，他利用日本政坛少壮派政友会与元老派民政党的矛盾，化装成一个补册工人，在书库官员小下勇的掩护下，潜入皇宫书库，用透明的绘图纸蒙在《田中奏折》上，用了两个夜晚的时间，将长达六十七页的奏折描摹下来，并及时送到王家桢手中。1929 年 12 月，《田中奏折》被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杂志揭露，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1931 年 11 月，英、美、苏各国报纸均披露了《田中奏折》，将此视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纲领性文件，是揭露日本侵略野心的有力证据。



1927 年 6 月，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召开决定对华侵略总政策的所谓东方会议，右三为田中义一

但是，日本方面对《田中奏折》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尽管他们自己也承认“要想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件存在的疑心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毕竟让人们对这份文件的真伪产生了疑问。“二战”结束后，驻日盟军在查抄日本皇宫文件库

时，特别留意了《田中奏折》，却没有找到，而且直至目前为止，奏折原件仍然未见踪影。

因此有人推测，《田中奏折》可能毁于战火，因为美国空军战时曾轰炸过日本皇宫，烧毁典章文书无数。也有人说是日本当局为逃避战争责任有意识地将其毁掉。因为在日本投降的前半个多月内，日本各级政府都在大量烧毁文件。日本史学界更是就《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展开讨论。有的人从形式细节处提出质疑，比如说行文格式、用词等方面，不符合皇家文书的惯例，可断定其伪。所述往事也与史实严重有误。但是，这些研究者同样提不出伪造者是谁，拿不出铁的证据。而且，日本在以后的侵略活动正是按照《田中奏折》演示的轨道进行，这是不能以简单的“巧合”来解释的。

大陆和台湾方面也有人对《田中奏折》的真实性进行过探讨。《田中奏折》传入中国很有些传奇性，当事人蔡智堪、王家桢都有回忆录问世，王俊彦还于1994年出版了《浪人与‘田中奏折’》的历史纪实文学，描绘了蔡智堪智盗奏折的过程。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罗家伦经多方考证，也对蔡智堪抄取奏折的行为表示肯定。还有人著有《台湾志士蔡智堪传》，表彰其爱国情操。就连蒋介石也亲笔提赠“善行流馨”的匾额，从台湾“官方”的角度予以确定。

但是日本方面对此尤为怀疑。一个台湾商人竟擅自闯进皇宫书库，躲藏了两个晚上，而且还摹抄了即便是中译文也要二十五页的文件。这让人更感觉是个传奇而非真实的故事。到了上世纪90年代，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鹏仁也在《历史月刊》上著文，对《田中奏折》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在1995年台湾“华视”制作的“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专辑”的采访中，陈鹏仁更是明确肯定《田中奏折》为伪造，特别对当事人蔡智堪、王家桢的回忆录提出质疑。他甚至认为，蔡智堪此举乃是出于“邀功”心理。

因为陈鹏仁的官方地位，他的谈话在台湾及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台湾史研究会及蔡智堪后人在台北举行了“《田中奏折》真伪争议说明会”，以正视听。台湾史研究会负责人、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和世界传播学院共同科主任王晓波及程玉凤教授都认为



台湾苗栗人蔡智堪

《田中奏折》实有其事，他们论证说：日本侵华的模式与进程显然是以“奏折”为指导纲领的，这一切已经与现实存在相契合；田中义一的对华观点充满了武力侵华思想，日本有通过侵华来化解当时国内经济危机的需要；日本惯于掩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罪行，其否认《田中奏折》并不足奇。蔡氏后人也表示对陈鹏仁的讲话不满，他们认为蔡智堪是基于民族大义才冒险盗抄奏折，事后也并没有获得当局的任何酬劳，“邀功”一说无从谈起。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张力、台湾大学刘广定教授等人也加入了争论，张力认为，《田中奏折》的真伪是个学术问题，坚信奏折为真的学者，需要找出更多的可靠资料，对已经提出的种种疑问作出圆满的回答，否则，宁愿维持对奏折的怀疑。

大陆学者陈红民在其所撰《田中奏折的真伪在台湾再起争议》一文最后这样说道：“《田中奏折》的存在早有历史结论，作为史学问题自还可以继续讨论，但在没有找到新的有力的证据之前，不能轻易否定该奏折的真实性。”

此外还有更让人吃惊的说法。1999 年 9 月 7 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文章，提出这是前苏联特务机关的“杰作”。此说的根据是来自苏联前领导人托洛斯基的一份投在《第四国际》杂志的陈年旧稿，根据这篇文章分析，苏联情报机关在 1925 年左右通过潜伏在日本的特工，从外务省盗取有关日本未来帝国战略的重要内部文件，《田中奏折》就是以这些盗出的内部文件为底稿，加以组装和编辑，在 1927 年以田中义一上奏的文式推向全世界的。

看来，《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还未到水净沙明的时候。

双重面具　　高宗武真实身份之谜

在汪精卫叛国集团中，高宗武是一位关键人物，他是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有名的“日本通”，可以说，没有高宗武，汪精卫就是有心投敌也叛国无门。然而，当汪精卫踏上贼船，签订卖国协定之后，高宗武却立刻反水，与陶希圣一道潜至香港，并公开日汪秘密协定，从而使汪精卫汉奸嘴脸大白于天下，政治上陷入极大的被动。这就是当时有名的“高陶事件”。

对于高宗武这种行为，历史上不外两种解释。传统的观点认为他是悬崖勒马，幡然悔悟。但也有人认为他是身负秘密使命，朱子家在《汪政权的开场

与收场》一书中这样写道："高宗武是最早、也是最热心于谈和的人，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即全面抗战爆发的前两年起，即与吴震修对日人西义显有所联络。至抗战发生以后，他是奉蒋氏之命在港专门担任对日的情报联系工作。他曾经亲往日本与上海，以全力来谋致和平之实现，不幸日本两度拒绝了他经手的与重庆谈和，以致功败垂成。乃转而通过梅思平而拉拢陶希圣，由陶希圣而撺掇汪精卫。汪氏既以脱离重庆而至上海，组织政权也已决定。论理，高宗武大功告成，开国之勋，大可封侯分赏，而他终于到了这最重要的关头，自弃前功，潜行叛逃。别的人还可说因不满于日方所提出的条件而迷途知返，但对高宗武来说，绝无此理。他最知道日本人，而且从战前到战时，一直由他与日方谈判，停战的初步条件，还是由他与梅思平所共同草拟而提交给日本参谋本部的谋略课长影佐祯昭的。他明白日本的态度与日本的底牌，已非一日，又何至于临时变计。"



"高陶事件"当事人之一的高宗武，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因此，朱子家提出了自己的大胆猜测："总括一句话，高宗武搞和谈，对公，是向蒋氏效忠；对私，则要由他包办。他最后的改变目标而抬出汪先生来，则以日本两度关闭了对蒋先生和谈之门，或许是他在失败中想死里求生；也或许他暗中奉到了别一项的使命。"

朱子家的猜测虽然不无道理，但缺乏系统性。而《陷阱——汪精卫叛国案新探》一书，则对高宗武的真实身份作了全面的考察。

首先从高宗武与汪精卫、蒋介石的关系看，尽管高宗武声称蒋介石过于严峻，不如汪精卫热情近人，但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却是非同一般。蒋介石不仅将他从一位普通的教授提拔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有着所谓的知遇之恩，高宗武的夫人还是由宋美龄搭的红线呢。

再从汪精卫叛国的过程看，这件事由周佛海策划，高宗武具体执行，先是由周向蒋介石申请建立所谓日本问题研究所，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将高宗武派至香港开展工作，而真正的目的，则是离开汉口，与日本人接上关系。

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骗过了蒋介石，不仅获得了允许，还得到了每月六

千美金的活动费。然而此事为外交部长王宠惠知道，因不满于蒋介石越级指挥，遂坚决反对，迫使蒋介石在表面上收回成命。

令人费解的是，高宗武却抗命潜出汉口并去了上海。要知道，战争时期，一方的政府要员私自去对方的占领区，这无疑是叛国通敌的行为，高宗武为什么如此大胆？

更让人怀疑的是，在高宗武走后的第二天，周佛海向蒋介石报告："高宗武在汉口得到情报，所以他到上海去了。"蒋介石只是顺口答了一句："是吗？"并未追问下去。要知道，周佛海以前向蒋介石提交的搜集情报的计划与此时报告高宗武的行踪，在地点上是有着很大区别的，一向精明如斯的蒋介石却故作糊涂，岂不是咄咄怪事！

因此，"陷阱"一书作者提出自己的观点，以蒋介石与高宗武的关系，以他驾驭部下的手段，蒋介石并非对此事不知情。然而因情势所限，许多事情他不方便直接出面或表态，如这类私下与日求和的敏感问题。他更愿意隐身幕后，见机而动，成则收其功，败则一推了之。

从史料记载看，高宗武除了此次外出和日本人联系外，还曾再去香港，而且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这一点，在周佛海 1938 年 6 月 5 日的日记中记载得很清楚："晚，武来见，云奉令明日赴港，谈半小时，握手而别，将来再会何处，实难预测。"

此次香港之行，高宗武犹未尽意，竟然跑到了日本，并推出了汪精卫充当"和平"运动的领袖，从而打通了汪精卫叛国的通道。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吃里爬外的行为，蒋介石是最不能容忍的，却为何睁只眼闭只眼，以至于高宗武出入国境如出家门堂而皇之，有时甚至夫妻联袂？像这种已属叛国的行为，为什么事先不制止，事后不制裁？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高宗武所作所为乃是奉命行事，所以才有恃无恐。

根据以往的研究以及一些史料反映，高宗武自去了东京后再也没有回过汉口，因为高宗武声称，他怕受到蒋介石的惩罚，或者再进入汉口就出不来了。

然而，据当时行政院简任秘书兼军事委员会秘书处长、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秘书、后来也落水做了汉奸的罗君强回忆，他清楚地记得，高宗武从东京经香港回到汉口，是蒋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特意命他前往机场妥慎迎接。到机场才发现，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也屈驾在此。接到高宗武，罗君强亲自为其提行箧，以免特务检查，横生出枝节，还送他上了车。高宗武随即与张群同车

驰赴陈布雷处。至于高宗武带回什么文件，与蒋介石谈话情形如何，他一概不知。高宗武的下榻处是在汉口旧法租界德明饭店。要知道，高宗武在汉口时间并不长，以前回来多是住周佛海家，甚至连夫人也一起带去，这一次却孤身一人，足不出户，连此事的始作俑者周佛海都蒙在鼓里。

日本人首先对高宗武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在重光堂密谈期间，他们发现，参加会谈的另一位汪方人员梅思平态度认真，为一些条款争论不休，这种现象是正常的，纵然是汉奸，卖国时也是心有忌惮有心理底线的。而高宗武却表现出很随意，心不在焉，对一些条款很不在乎，甚至是非常随意地同意日本方面的主张。



汪精卫

因此，日本方面对高宗武进行了考察，在香港，有一个日本特务有意识向高提供了一份假情报，还特别虚构了一个细节，不出几天，重庆的报纸就披露了这条假消息，其中赫然就有这条虚构的细节。所以，当后来汪精卫一行前往日本会谈时，日方曾有意将高宗武置于死地，只是汪精卫担心让同党心生寒意，才阻止了日本人的行为。

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三公子犬养健也曾参加过诱降汪精卫的行动，与高宗武私交甚好，战后他还在美国见过高宗武，并因此写了一本回忆录《扬子江在奔流》。在这本书中，他回忆说，日本参谋本部的谋略课长影佐祯昭曾认为，日本方面将汪精卫作为和谈对手是一种失策，而这种失策正是由于高宗武的误导：

> 高这个人不可信，帝国政府之所以选择汪兆铭，就是听了他所传达的信息，重光堂密议，也是他保证汪有力量，能动员十个师的兵力。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我们寄希望的龙云没来，余汉谋没来，刘湘没来，何应钦没来，汪手上根本就没有一兵一卒，没有力量收拾残局，帝国政府弃蒋而用汪，是失策了。这种偏差，是高将我们导入歧途的。

犬养健发现，在上海期间，高宗武有许多反常行为，当时军统特工在沪上活跃非凡，汪派干部慑于对方的暗杀，对外出进行了限制，周佛海、梅思平等人都轻易不外出，只有高宗武行动例外，特别有恃无恐。他也曾与高外出过几次，但每次都莫名其妙地走散。通过调查，犬养健了解到，高每次都是去了

一家叫做"仙乐斯"的夜总会，而这家夜总会原属杜月笙的名下，显然是军统活动的一个据点。就在这家夜总会，高宗武开始了反水的密谋。

在反水之前，高宗武还盗走了日汪《密约》，将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大白于天下，以致人神共愤，群起而指。在高宗武逃离上海前，他甚至还想策反日本国会议员——他引为朋友的犬养健，邀请他去重庆。此事若成功，可以想像到当时能够产生的政治影响。

反水后的高宗武一直保持着低调，从此隐姓埋名，身负如此重大隐秘，这也是适当的安排之一。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忘记他，1940 年 6 月至 1942 年 5 月，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曾三电驻美大使胡适，请他对高宗武妥为照顾，这无疑出自蒋介石的授意。

在隐居的这段日子里，高宗武绝口不提往事，以至其真实身份仍然云山雾罩，以往人们的怀疑与推论还缺少当事人的承认及板上钉钉的铁证。

胳膊肘往外　　史迪威被"炒鱿鱼"之谜

蒋介石和史迪威关系不睦，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赫尔利有所耳闻，为了大局，他在两人中间进行了选择，开始决定支持史迪威，给蒋介石发出"哀的美顿"书；谁知突然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决定撤回史迪威，维护蒋介石的地位。这其中的谜底如何呢？

1944 年 7 月下旬，史迪威奉命前往斯里兰卡的康体，代理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之职。8 月 4 日，一直惦念收复缅北战事的史迪威将军，接到中国远征军攻克密支那的电报，他如释重负，在日记里写道："谢天谢地，今天上午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不管怎样，歇它五分钟。"

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三天后，史迪威就被晋升为四星上将。这足以证明他在中印缅战区所做出的贡献。

9 月 6 日，史迪威飞回重庆。第二天，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到达重庆。赫尔利的使命主要是调解史迪威与蒋介石日益加剧的矛盾，以维护两国共同的利益。蒋介石与史迪威，一个是中国战区总司令；一个是中国战区参谋长，他们长期不睦。

史迪威能征善战，嫉恶如仇，富有正义感。1942 年，史奉命来华担任中缅

印战区美军司令官和蒋介石的参谋长。不久他就发现，国民党军将领素质低，军队的战斗力十分低下，必须予以彻底改组，重新训练；对杂牌军也应一视同仁，迅速提高其战斗力。他还认为，中共领导的军队是抗日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援华物资要分给他们，使这批战争物资真正用来打击日军，而不是被腐化分子拿到黑市上去卖高价。为此，蒋介石曾对人愤愤地说："既然我已经弄清楚，史迪威将军并不打算与我合作，而且他自以为是被任命来指挥的，那么，这一切就到此为止吧！"他多次要求罗斯福撤回史迪威，另派高明。



史迪威学过中文，二战时曾为中国军队的参谋长，但后来与蒋介石关系不睦

1944年春，日军在中国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争，在短短数月中，国民党军队不堪一击，望风披靡，整个抗日形势逆转，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反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向罗斯福总统建议：中国局势日趋恶化，扭转局势的关键在于统一指挥中国地面部队之权授予一人，惟有史迪威足当此任。于是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其将中国所有抗日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这时，日本为挑拨中美关系，在广播里造谣说："史迪威阴谋废黜蒋介石，自己在中国当王。"在这种情况下，史、蒋矛盾日趋严重，已经影响了抗日大局。罗斯福总统为解决中国危机，特派赫尔利来华，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

赫尔利带来了罗斯福总统给蒋介石的一份"哀的美敦书"式的电报，要求蒋放权给史迪威，否则美国将停止援助。赫尔利将此电报交给了史迪威。

史迪威把这份电报内容译成中文后，马上驱车至重庆江北的避暑胜地见蒋，正好遇见也在那里的赫尔利。赫尔利看了电报内容立即嚷了起来："不行，不行！诸事只可协商，万万不可强逼。"

史迪威冷冷地回答说："我无权搁置总统的电文。"

赫尔利见事情无可挽回，叹息道："任何一国领袖都难以容忍如此侮辱，现在有好戏看了！"

史迪威进入会客室后，大家寒暄几句，史迪威把罗斯福电报拿在手中，对蒋介石说："这是罗斯福总统给您的电报。"说着，把电报交给翻译。

赫尔利见状，恐过分伤了蒋的面子，站起来说："电报已附有译文，委员长

可以自阅。”

蒋介石接过电报，看了几行，不禁勃然作色，重重地将电报摔在桌上，低声道：“我懂了！”接着坐下来，愤怒地喘着粗气，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这时，赫尔利出来打圆场，说：“事情需要考虑，我们先回去吧！”他后来对其秘书说：“我们做了一件蠢事，把事情搞复杂了。史迪威硬得很，本来问题就不容易解决，现在火上加油，就更不易解决了。华盛顿把蒋介石看得太简单，把解决中国问题看得太容易，才做出这样的错事。”

危机再次发生。蒋介石立即召集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历数史迪威的所作所为，最后表示不惜任何代价，哪怕是得不到美国人一分钱的援助，也要“豁出去了”，一定要把史迪威赶回去。



史迪威与蒋介石夫妇

赫尔利得知此事，一连几天辗转难以成眠，考虑着他这个调解人应该如何表态。他认为，相对而言，调回一个史迪威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如果失去蒋介石乃至中国，在同盟国共同作战的前途上，麻烦就多了。因此，他在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文中如此写道：“就我所知，再也没有比蒋介石这样富有领导才干的中国人了。蒋介石和史迪威是势不两立的。现在是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刻了，如果再支持史迪威，则将失去蒋委员长，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

这封电报飞越太平洋，传到了白宫罗斯福手中，而且很快产生了作用。为不失去蒋介石和中美关系，维护世界反法西斯的大局，罗斯福终于下定决心，必须撤回史迪威，另派魏德迈接替他。

同年10月14日，“斧子终于砍下来了！”马歇尔召回史迪威的电报到了重庆。中印缅战区被分开，由苏尔坦将军负责印缅，另由魏德迈将军专门负责指挥在华美军。

10月21日，史迪威离开重庆，乘飞机飞往昆明，在那里接见了他曾指挥、合作过的中国军官。之后，飞机专门飞往密支那上空。凝视着曾战斗过的地方，史迪威发出“别了，中印缅战区”的感慨，回到美国。

蒋介石知道，在关键时刻是赫尔利帮了他，因此对赫尔利感激不尽。后

来在罗斯福面前称他是一个“罕见的、通晓人性”的人。

伸张正义　　沈崇事件曝光之谜

所谓沈崇事件，是发生在抗战胜利后驻北平美军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而引发的大规模学潮，并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反美运动。这一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事实俱在。但由于国民党当局掌握着舆论工具，对真相进行掩盖、歪曲，以至今天还有人提出质疑，因此有必要进行再次曝光，以正视听。

1946年12月24日晚上8时许，北京大学先修班女学生沈崇去平安电影院看电影《民族至上》，途中，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两个士兵皮尔逊、杰克拉到东单练兵场小树林里强奸了。沈崇大声呼救，恰好有行人刘玉丰路过听到，急向国民党北平警察局七分局一段报告，由警士关德俊打电话通知中美警宪联络室派人到肇事地点查看。这时，美国兵杰克已经逃离现场，皮尔逊被带到北平警察局讯问，沈崇因羞愤难当跳井自尽，后被救起。

第二天，北平一家民营通讯社亚光社知道后，当即发了一条新闻，将事情捅了出去。北平警察局长汤永咸马上打电话给国民党中央社，中央社立即通知各报不要刊登这条新闻，因为“此事已由警局与美方交涉，必有结果。事主方面因颜面关系，要求不予发表，以免该女生自杀心理更形加强。”

然而《新民报》、《北平日报》、《世界日报》等多家报纸却突破了当局的威胁和封锁，相继报道了这一消息，抗议美军暴行。《新民报》在发表消息时，还将中央社要求各报不准刊登的通知作为新闻予以公布，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公愤。新闻界的介入使事件再也无法掩饰，一场由沈崇事件引发的爱国斗争迅速在北平掀起并延及全国。

然而国民党当局不仅不追究主犯的罪行，反而制造谣言，混淆黑白。北大训导长、后任国民党青年部长的陈雪屏一马当先，27日，他把北大先修班学生名册拿来，把沈崇的名字勾掉，说：“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该女生也有不是之处，一个女人为什么晚上上大街，看电影为什么不坐洋车？”

中央社也出来为美军盟友开脱，12月27日发表消息说，“沈崇似系良家妇女”，“美军是否与沈女士认识，须加调查”，“据悉，是北平某中学肄业的20多岁妇女”，并说“美军酒后失检，各国在所难免”。

美联社更是恶毒诬蔑:“少女引彼等狎游,并曾言定夜度资。”

最让人不可容忍的是国民党特务的造谣,他们在北大校园贴出一张大字报——《情报网》,说沈崇事件是共产党搞的苦肉计,是延安派来的八路女同志到北平引诱美军强奸,然后扩大宣传,制造血案。还说共产党给沈崇七千万活动经费。

国民党新闻机构的种种泼污之举,完全丧失了职业道德,不少新闻单位出于正义,纷纷撰文揭露其中阴谋。其中有中共地下党学运机关报《燕京新闻》决定追踪报道沈崇事件,以一手资料以正视听。当时已有北大女同学会代表通过沈崇的亲戚了解到一些情况,知道她事发前不久才由上海来北平,平时很少出门,更无与美国人交往。北大同学便将这些事实在墙报上公布。但遗憾的是沈崇一直没有露面,如果她直接出来说话,则会更有力量。于是,《燕京新闻》便千方百计打听沈崇下落。

《燕京新闻》采访部主任石美浩终于如愿找到了沈崇,他回忆说:“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叫杨权,同沈是表亲,并且住在一处。他是个失学青年,心中也有正义之火,知道我们在找沈崇,就主动同我们联系,自告奋勇带路。那天,我们来到八面槽附近的一条胡同,福建人说着福建话,躲过胡同口内外的特务监视,大摇大摆地走进沈的住家。”

沈崇的情况终于弄清了,原来沈崇出自名门,其祖父沈葆桢曾是前清一品官员,官居两广总督。父亲也是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的一位处长,其母还是著名学者林琴南的亲戚,绝不是什么延安派来的八路女同志。



沈崇事件发生后,北平学生组织了反美大游行,这是游行队伍经过美军总部门前

回想起当时的遭遇，沈崇疼不欲生，大有一死了之之想。石美浩反复相劝，希望她勇敢振作，但沈崇确是心力交瘁，加上其他考虑，终未答应公开站出来面对媒体。但《燕京新闻》根据次此采访所得，写了一篇《沈女士访问记》，将一个真实的沈崇披露给公众，让那些恶意的谣言不攻自破。

1947 年 1 月 10 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五团司令部在北平召集会议，宣布对被控强奸中国女学生的陆战队士兵进行审判。美国海军军事法庭法官费兹格罗中校宣称：美军享有治外法权，此案由海军军事法庭审判，被害人"沈崇女士只能以证人身份被法庭传讯"，而不是以原告身份出庭。"沈女士的法律顾问，不得在法庭代证人发言或回答问题，亦不能表示本人对此案的见解"。

面对如此的不公正，沈崇当然不愿意出庭，同时也拒绝了带有人格侮辱性的所谓身体检查。于是又有谣言称"沈崇不敢与皮尔逊对质"以及"沈崇已经离开北平"云云。沈崇为洗刷清白，要求《燕京新闻》为其辟谣，于是一篇《重访沈女士》的文章再次吸引了人们的视线，不仅是在国统区，就连解放区、香港都有报纸转载，以沈崇自己的声音回答了谣言。

同月 17 日，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组成的军事法庭在北平东交民巷第五团司令部开庭，不准中国人旁听，除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外，其他新闻记者限制采访。被害人的父亲沈勋、北大校长胡适和法律顾问李士彤、赵凤喈到庭，传讯证人孟昭杰、马文彬、赵泽田、唐文华等人出庭作证。

通过证人证实，沈崇遭美军士兵强奸一事属实。21 日，法庭继续开庭，又出示了王克等人的检查报告，从技术物证角度证明确系强迫，受害人在受害过程中曾有过尽力反抗的事实。

事实俱在，人证、物证齐全，被告辩护人虽为皮尔逊竭力辩护，美军检察官也不得不宣布：强奸罪成立。

然而，美军军事法庭对此案却一拖再拖，迟迟不予判决。一直到次年三月，中国人民的"抗暴"斗争遍及全国，华侨陈嘉庚在海外发起要"美军滚回去"的十万人签名运动，美军当局才被迫宣判，将皮尔逊开除军籍，服劳役十五年。但事隔不久，1947 年 8 月，美国海军部就宣布皮尔逊无罪释放。

因为这次打击，沈崇身心遭到极大创伤，甚至毁了一生，从此遁入空门，大好年华一旦抛。然而至今还有人向她泼污水，或说她是因为爱出风头自取其辱，或说她是受人指使。但我们对照历史事实，应该有一个明白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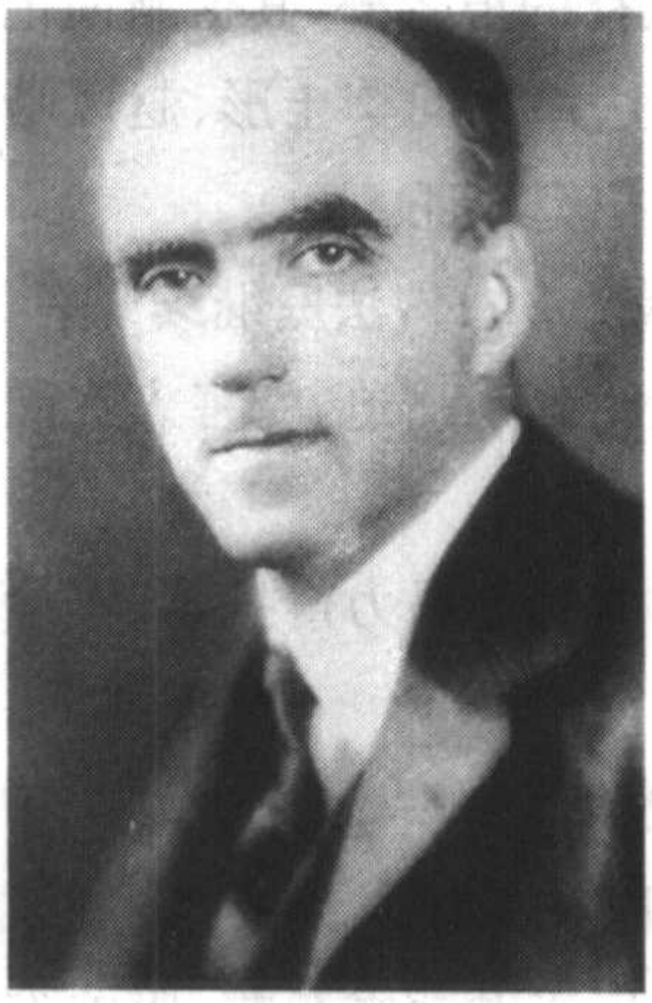
等待变化　司徒雷登滞留南京之谜

随着解放军占领南京，按正常判断，一贯亲蒋反共的美国政府应该采取相应行动，其驻华大使馆当早早撤出。然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滞留在南京达三个多月方怏怏离开，这其中的隐秘，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几十年后外界对此也不甚明白。

经盛志先生对这一问题作了研究，为我们解开这个谜团提供了线索。

抗战胜利后，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目标无非是扶植国民党政府，以“遏制”苏联在亚洲的“扩张”，阻止共产主义力量的蔓延。然而使其失望的是，国民党在与中共的内战中遭遇了全面失败，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已成定局。这使美国的当权人物意识到，在苏美对抗的格局中，不能失掉中国这颗最重要的棋子，至少不能让它完全倒向苏联，这就需要调整与重新确立新的对华政策。

司徒雷登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具体实施者，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是赞同的。还在南京解放前，他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就说过：“目前同共产党人的对抗继续下去要付极高的代价，因此同他们拉拉关系的办法还是值得试一试的。”司徒雷登请求准许他与中共领导人接触，他将提醒中共注意美国方面对中国长期以来善意的帮助，并威胁如果中共方面建立起共产制度，那将威胁到美国的利益。



曾经是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的意见获得美国方面的赞许，国务卿艾奇逊甚至认为，司徒雷登最好连那种威胁语言也不要说，而应该更委婉，只要表达出中心意思就行了。

因此，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并没有走，而是留下来观测风向，随时准备与中共接触，以开创美国对华外交新局面。

中共方面也接受了美国方面发出的信号，只要美国方面放弃扶蒋反共的政策，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可以和美国政府

进行外交对话和谈判。1949 年 4 月，姚依林同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布取得了联系，还通过某些中间人透出信息，中国方面可以在美苏之间发挥缓冲作用，并试探性地提出通过第三国如日本，与美国建立事实上的经济联系的具体设想。这些均反映了中共领导人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至于对待司徒雷登，更是严格尊重其外交特权，比如说，南京驻军的一位营长出于好奇闯进了美国使馆，与司徒雷登发生吵骂，司徒雷登打电话与毛泽东交涉，毛泽东立即下令妥善查处，华东前委即派出八兵团副政委江渭清前往南京妥善解决。

司徒雷登的活动是积极的，他至少从以下几条不同的渠道对中共进行了接触。其一是通过与他有良好私人关系的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罗隆基代转中共领导人，表示美国可以分期借款六十亿美元帮助中国建设，条件是中国“不向苏联靠拢”；其二是通过周裕康等著名人士，为他与中共领导人牵线，打听中共领导人的态度与外交动向；其三则是直接与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黄华会晤交谈，以及委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民革）中央领导人之一的陈铭枢奔走联络。

其中，司徒雷登与黄华的会晤极为有意义，黄华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司徒雷登曾是燕大的校长，两人本来就有师生之谊，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又是黄华在燕大的同班同学，所以双方的接触自然先有了一种融洽的气氛。5 月 13 日，黄华首次登门，双方进行了交谈，显然彼此都有诚意，这从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黄昨天晚上登门到我的府上，停留



司徒雷登故居位于杭州天水桥耶稣堂弄，1876 年，司徒雷登出生于此

了近两个小时，我们的谈话是友好的。”“对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美国承认共产党中国的问题，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6月6日，司徒雷登与黄华进行了第二次会晤，黄华重申了中共愿意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对方必须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司徒雷登则根据国内的指示，不肯作出承诺停止援蒋，但他请黄华注意美国大使馆继续留在南京的深刻含意。老练的司徒雷登在暗示中共，若能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美国将发展与中共新政权的外交关系。

司徒雷登的这种态度，代表了美国政府在与中共调整关系时的傲慢和不切实际，后来他在给陈铭枢的“五点意见”书时更是表明无遗。陈铭枢是北伐名将，后来成为民革领导人，在准备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前夕接到了司徒雷登的邀请信，于是赴南京与司徒会谈了近四个小时，这“五点意见”就是司徒雷登列出的希望中共领导人接受的条件。内容如下：

一、美国人相信，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以和平相处；二、美国对即将由中共掌握的政府，有两点特别关切：1. 真正尊重人权，还是搞成极权或警察国家？2. 是否从事暴力式的世界革命？三、凡是希望美国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人，都对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感到不安；四、中共官员言论似乎不鼓励和美国通商；五、美国的立场是等着瞧，但中共应该重视司徒大使及其他国家使团首长留在南京的事实。

除此之外，他还递交了四个文件，内容主要是强调说明和美国保持关系的重要性。中共方面对由陈铭枢转来的意见和文件十分重视，毛泽东还称司徒雷登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



周恩来与司徒雷登

受到鼓励的司徒雷登决定亲上北京，与中共最高领导人直接会谈，“这是极有希望的努力路线”。他通过傅泾波向黄华提出，司徒雷登是燕大的老校长了，每年6月都在北平过生日并出席燕大毕业生典礼，这已是几十年的惯例。故今年还想去北平。黄华立即请示了中共中央。6月28日，黄华告诉司徒雷登，毛泽东、周恩来真诚欢迎他前往北平，愿为司徒雷登提供从南京到北平的方便，甚至可

以允许他乘自己的飞机。

开创新局面的大好机会就在眼前，司徒雷登第二天就向美国政府请示，详陈了去北平的好处，可以当面向毛、周解释美国的政策，对中国前途的希望，美国的担心等等，还可以将中共意向的最权威消息带回华盛顿。他认为这种接触将有利于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

司徒雷登也分析了这次北上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比如说，可能引起美国国内的强烈批评，有一种背叛老朋友的感觉，说不定让人们造成一种率先承认中共政权的错觉，提高中共和毛泽东在国内外的威望等等。但是经过权衡，司徒雷登还是认为利大于弊。

司徒雷登的观点是既理智又偏见，还有一种傲慢，但美国政府却是摒弃了其中的理智而取后者。7 月 1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否定了司徒雷登北上的建议，由国务卿艾奇逊答复司徒雷登："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其理由就是司徒雷登在自己的请示中提到的那些不利因素。

美国政府这个不明智的决定，不仅使司徒雷登从此失去了同中共领导人直接会谈的机会，也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司徒雷登自己也感觉到"自从告诉黄华不能去北平后，共产党当局上上下下的态度都变了，并且强硬了起来"。7 月 9 日，陈铭枢到达南京，带来了中共领导人的答复，中共方面重申自己的一贯立场和政策，希望美国停止援蒋行为，中共自然以同样友好的态度待之。另外，根据中国数十年的外交史实，认为苏联给予中国很大的帮助，而美国对华援助则应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根据 1937 年和 1947 年的中美贸易数字证明，中美贸易的受惠者是美国而非中国。表明中国绝不会被利益收买而放弃原则。

陈铭枢带来的中共领导人的答复打碎了司徒雷登的如意设想，在完全失望之际，只能于 1949 年 8 月 2 日离宁返美。

司法案件

钱能通神　　东陵盗宝案审理之谜

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孙殿英东陵盗宝案曾轰动全国，为了筹措军费，他竟然不惜挖开前清东陵，疯狂盗取和破坏文物。事发后，许多人都认为他罪不可赦，必受政府严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京国民政府对此竟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个中情由，让人不解。

孙殿英东陵盗宝案被报界披露之后，舆论汹涌，就连南京国民政府也是大动肝火，蒋介石发布命令："呈文具悉，通饬所属，一体严密缉拿，务获究办，毋稍宽纵，此令。"

然而孙殿英却轻松逃过南京政府的追究，个中秘密何在？且看下文。

原来，蒋介石的发怒并不仅针对孙殿英的盗墓行径，他担心的是，孙殿英部此时正驻防于阎锡山的地盘，一旦得到这些珍宝，财力大增，由此而扩充队伍，再与阎锡山勾搭上，将后患无穷。

阎锡山确实也想收编孙殿英这支带有土匪性质的队伍，但孙为人狡猾难羁，对这样的人一味怀柔未必管用，这次擅自掘开东陵窃宝就是明例。必须软硬兼施，方可使其就范。阎锡山也因此采取了一连串的步骤，以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令河北省主席、阎系大将商震派兵保护东陵，商本人赴平调查东陵盗宝案；限令遵化县县政府严缉盗墓正犯，依法惩办；令北平警备司令部派员赴东陵调查；令警备司令张荫梧派兵保护西陵。随即，商震奉令偕同总指挥部参谋长李晓沧及机要秘书许昌威由津来平，与孙殿英顶头上司徐源泉接洽。

与徐源泉洽商此事无异与虎谋皮，东陵盗宝案他就是幕后主谋之一，蒋、阎双方都是虎视眈眈，使他感到担待不起，连忙通知孙殿英，尽快脱手赃物，以防夜长梦多。

孙殿英闻风而动，决定以宝物换军火，谁知派出送货的人刚一踏上青岛码头就被平津卫戍司令部的人逮住。同时，孙的亲信师长谭温江带着一批珠

宝字画约外商看货，也遭到侦缉，被卫戍司令部生擒。

孙殿英大惊，连忙向徐源泉求援，徐大骂一顿孙无能后，派出第六军团驻北平办事处长罗荣衮前往要人。在此期间，又一连打来两次电话，不无威胁恐吓。卫戍司令部也知道徐源泉是个莽夫，又执掌兵符，害怕引起驻军骚乱，忍气将谭温江交罗荣衮领走。

放走了谭温江，卫戍司令部上下怒火难平，徐源泉、孙殿英未免太霸道了。一气之下，将罗荣衮带来的题为《第六军团致北平警备司令部笔函》的秘密公文公布，制造社会舆论，为拘捕孙殿英留下伏笔。

公函云："敬启者，兹有敝部第十二师谭师长源江，于本日敝军点验完毕后来平公干，在清华池洗澡，被贵部役员带去……希暂交敝部驻平办事处处长罗荣衮保出，其中如有特别案情，愿随传随到。"公函由军团总指挥徐源泉签署。这份公函的曝光，等于将他与盗墓贼孙殿英拴到了一起，气得徐源泉七窍生烟，一不做，二不休，亲自出马，找来日本古玩商山水秀义，请他协助将这些珍宝挟带出境，寻机出手。

山水秀义满口答应徐源泉的请求，仗着自己是日本商人，大大咧咧，也不知防范保密，结果又被卫戍司令部的人侦知，在天津装船时被海关扣留。

连连坐挫失利，让徐源泉恼羞成怒，干脆大打出手，将一些兵痞开进北平城，专找卫戍司令部的人挑衅。以牙还牙，卫戍司令部也组织大批纠察队员与之抗衡，假以颜色，双方在北平这座大都市合演了一出全武行。

至此，阎锡山也感到徐源泉、孙殿英闹得太不像话，何曾把他放在眼里，决定军法会审，压一压徐源泉、孙殿英的气焰。

蒋介石正好借机插上一手，他要借题发挥，让阎锡山既遭到舆论谴责，又能敲打徐源泉和孙殿英，让他们对自己产生敬畏。

蒋介石来到北平，侍卫长送来一叠求见的名片，蒋介石扫了一眼，单单将徐源泉的名片抽了出去。

这种冷淡，让徐源泉摸不着深浅，第二天清晨，徐挑出几件名贵的古玩和一对手镯，托蒋介石侍卫送给了新嫁娘宋美龄。



阎锡山

宋美龄是否收到这些礼物无据可考，但下午蒋介石就召见了徐源泉却是事实。蒋介石一付莫测高深的样子，表情冷淡，任徐源泉一旁喋喋不休，哈腰奉承，就是一言不发，弄得徐源泉心里直发毛。站在一旁的陈布雷忍不住提醒他，蒋总司令公务繁忙，徐军团长删繁就简地说说东陵事件始末吧。

这正是徐源泉心病所在，眼看着回避不了，他壮着胆子撒谎说，这都是匪首马福田作的案，他的部队只是在剿匪过程中清理战利品时才发现这些珍宝的。

陈布雷反驳说：据报纸所载，孙殿英才是直接组织者。

徐源泉辩解说：那纯系以讹传讹，是共产党造谣生事。

陈布雷摇摇头，这事和共产党毫无关系。他又追问了一句：那批所谓被马匪所盗的赃物究竟是如何处理了？

徐源泉硬着头皮回答：大部散落民间，只有少部被缴获，正拟运往南京。

就在这个时候，也不知是有意安排还是巧合，戴笠推门而入，直冲冲向蒋介石报告，孙殿英秘密存放的全部文物忽然间不知去向。

戴笠还说，最近一个阶段，不断有外国人向孙部洽谈购买文物之事，随着风声日紧，这些外国人现在也不知去向。

蒋介石挥手让戴笠离去，却冲着徐源泉冷冷一笑，请徐源泉暂回。

徐源泉几乎僵住了，这一笑，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隐藏着阵阵杀机。他不敢再大意，连忙通知孙殿英赶快寻门路，分别打点。他特别强调，不要吝惜钱财，尤其是最高当局和军法处，另外戴笠那头也不能马虎。

出身江湖的孙殿英何尝不懂“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道理，他从赃物中挑出几件精品：慈禧的玉枕送给了行政院长宋子文，绿玉为皮、紫玉为瓢、黑宝石为子的翡翠西瓜送给了宋美龄；慈禧凤冠上的宝珠及口中含着的夜明珠（这颗珠子分开是两块，透明光亮；合拢成一圆球，透出道道绿色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以照见头发，相传可使尸体不腐，价值连城）也成了宋美龄鞋面上的饰物；慈禧朝鞋上的两串宝珠则送给了孔祥熙、宋蔼龄夫妇。至于戴笠，投其所好，将一柄古剑双手奉上，取“宝剑赠壮士，红粉赠佳人”之意。阎锡山那边也没少打点，价值五十万的黄金让一向视钱如命的阎老西两眼都笑眯了。

军事法庭方面，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接受过孙殿英的贿赂，但从审判的结果看，却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味地曲意庇护。该军事法庭审判长为商

震，他是很能体会老长官阎锡山的用心的。当时中国的政局是群雄并立，新的内战即将爆发，蒋、阎之争也是迟早的事，谁都不想将孙殿英推到对手那边。所以，商震很“明智”地网开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纵然不为钱财，也是为了本集团的利益着想。



天津孙殿英旧宅

1928年12月中旬，军事法庭开庭调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主犯孙殿英却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任命，到烟台讨伐张宗昌去了，法庭调查只好被迫中止，直到1929年4月才开庭预审。

整个审判过程都表现得轻率、随便，只提了几位关系不大的嫌疑犯如杨震固、鲍建功等小喽啰。6月19日即通过一份八万字的判决书，声称该判决书“完全根据军法，毫无偏袒纵循之处。”

这份判决书秘而未宣，内情究竟如何，在记者再三追问下，商震模棱两可地表示：“全案判决其罪情较重者当依法办理，其次将判决十一年、九年、七年以至数月徒刑者，均有之，惟希望法得其平，保障军法独立之精神。”

记者不禁哑然失笑，说什么“法得其平”，主要案犯都逍遥法外，孙殿英刚刚被国民政府委任为新编第二旅旅长，正风光得很呢。

就是这样一份判决书，也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军政部军法司批准执行。随着中原大战爆发，蒋、阎正大动干戈，对孙殿英这样的军阀拉拢犹恐不及，谁还有心思受理东陵盗宝案。

手眼通天　施剑翘被特赦之谜

1935年11月13日下午，在天津东南城角草厂庵的居士林，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刺杀血案。一位30岁左右的女刺客，在佛门清净之地，用勃朗宁手枪，打死了昔日威震东南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这个女刺客叫施剑翘。她为什么要刺杀孙传芳呢？施剑翘杀人后只关押了11个月即被国民政府特赦，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1928年6月，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打到北京。孙传芳兵败下野，逃往关外。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三省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孙传芳举家迁往天津，潜心礼佛。斗转星移，时光似水，转眼已是1935年岁尾。日本策划华北五省独立，时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日本特务机关令汉奸四处散发“拥孙倒蒋”传单，蛊惑人心。孙传芳为表示脱离政事，每星期二下午都去居士林听经坐禅。佛教徒出家入寺院者为僧尼，居家带发修行者叫居士。居士林就是专门为居士们提供讲经听法的场所。孙传芳戎马一生，杀人如麻，下野之后却皈依佛门，听上去十分滑稽。

谁知回头也不是岸。孙传芳在十年前发动驱奉战争，将东南一带张作霖的奉军赶回黄河以北。奉系张宗昌率军南下，与孙传芳的五省联军鏖战，欲夺回江南；张的先锋官为山东帮办、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老将施从滨。施从滨率部在皖北与孙军大战，兵败被俘。孙传芳一时心血来潮，令人砍了施从滨的脑袋，结下恶果。



刺杀军阀孙传芳的侠女施剑翘

一晃十年过去，施从滨之女施剑翘也跟踪孙传芳到了天津，侦察到仇家的行踪，伺机复仇。终于在11月13日下午，混入居士林，打坐在孙传芳的后面，乘机连开两枪，将孙打死，又在居士林散发“替父报仇”的传单，后被辖区警察拘留。

施剑翘杀孙传芳之后，孙传芳的长子孙家震以杀父之名起诉到天津地方法院。其时，孙、施两家各请律师，进行诉讼。

天津地方法院根据孙、施两家陈述的事实“真相”，于12月6日做出判决：“施剑翘(谷兰)杀人，处有期徒刑十年，勃朗宁手枪一支，以及上缴子弹三粒没收。”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以逐步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将该五省作为和日本控制下的伪满洲国保持密切关系的一个自治区域，以削弱南京政府的影响和控制。其计划以北洋旧政客王揖唐出面主持自治政府，以孙传芳、曹汝霖为其副手。是年5月，日本特务还指使汉奸在天津等地散发“拥孙倒蒋”的口号。此举令蒋介石与华北当局感到恐慌。蒋介石的中统特务对威胁蒋介石统治的异己分子和可能被日本利用、拉拢的前北洋失意政要，都采取了毫不留情的暗杀手段，即所谓北国锄奸。但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暗杀有很大的风险。例如1934年军统特务在北平六国饭店刺杀张敬尧；又如1935年5月，天津日租界一天内发生两起亲日人员(一是《国权报》社长胡恩溥，一为《振报》社长白逾桓)被暗杀事件。日方一口咬定是南京方面的特务所为，在中日交涉中采取强硬立场，坚决要求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蓝衣社、宪兵三团撤出北平地区。这便是暗杀行动惹起的外交麻烦，负责交涉的何应钦不得不与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签订所谓的“何梅协定”。

另一种暗杀在二三十年代很盛行，尤其是打着“替父报仇”之名的杀人行为，往往为世间喝彩，也为严法网开一面。有些有政治背景的谋杀案，主谋者往往找出个“仇家”，以“复仇”的名义将当事者杀害。当年，冯玉祥杀徐树铮，就是打着陆承武为其父陆建章报仇的名义，将徐枪杀。徐树铮之子徐道邻，后做了蒋介石的西席，又成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高官，为此事专门向法院打官司，结果此案不了了之。例如1932年9月，韩复榘为杀张宗昌，找山东省府参议郑继成，打着替其叔父郑金声报仇的旗号，在济南车站射杀张宗昌。最后只判了七年徒刑。还有北京政府前总理张绍曾，也是被“仇家”杀害。这一类“借刀杀人”的暗杀能引起人们的同情，政治色彩也不浓，结局有可能使“凶手”逸出法律的严厉制裁之外。

同样，施剑翘作为一名女刺客，是打着“替父报仇”的名义杀孙传芳的，即便孙传芳真的有与日本勾结的行为，但他却死于仇家之手，日本方面也无法借此找茬或挑起事端。施剑翘或许不知，在她的身后，便有蓝衣社成员、安徽人张克瑶和施从滨的侄子、南京军官教导队团长施仲达合谋，利用施剑翘替父报仇的心理，为其提供线索和行凶的枪支、子弹，施剑翘的《告国人书》也是

施仲达与其弟仲杰等人共同商量写出的。施剑翘被捕之后，在法庭上谎称手枪是从一个退伍军官手中买来的。其实，这种勃朗宁手枪当时是很先进的，绝非一般人所能得到，只有执行特殊任务的人才能拥有。

1935 年 11 月 1 日，与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拼杀得你死我活的冯玉祥，为了共赴国难，从隐居多年的泰山上下来，来到南京重新与蒋介石携手。冯玉祥在南京受到中枢政要的欢迎，蒋介石、林森亲自登门拜访。第二天，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冯玉祥被选为宪法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及提案审查委员会政治组委员。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冯玉祥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后当选为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2 月 28 日，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在冯玉祥到南京的二十天里，几乎无日不与蒋介石在一起。他到南京的头十天，蒋介石宴请其五次，冯当时的威望如日中天。

施剑翘恰恰赶在冯玉祥到南京以后才动手，是早就计划好的，还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不管怎样，施剑翘在动手之前肯定考虑了冯玉祥的因素，就凭冯玉祥与他的老战友、滦州起义的施从云烈士这层关系，对施从云的亲侄女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因此，冯玉祥到南京重新做高官，对施剑翘来说无疑是个福音。

关于施剑翘的行动，在冯玉祥日记中果然有记载。1935 年 11 月 14 日："归来，知施从滨的女儿在天津打死孙传芳的事，（叫）施则凡来问了详细。"

施则凡即施中杰，施从云之子，施剑翘之堂弟，时给冯玉祥当副官。



冯玉祥将军

11 月 30 日日记："同施则凡、施中达二世兄去见焦易堂、居觉生先生，专为大赦施剑翘女士之事。"

焦易堂时为最高法院院长，居觉生即居正，时为司法院院长。冯玉祥的"后门"直接开到法律最顶峰，这个面子可谓不小。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地方法院于 12 月 6 日，援引郑继成杀张宗昌一案，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七年。

然而，施剑翘对此判决不服，孙传芳之长子孙家震对此判决也表示不服，认为量刑太轻。双方都在活动，要求减刑或加刑。

施剑翘朝中有人，通过施则凡向冯玉祥诉说狱中生活太苦，以谋求重新量刑。冯玉祥则通过关系，设法说服司法部门和政府大赦施剑翘。

1936年9月21日，冯玉祥日记："傅沐波（即傅汝霖，时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内政部常务次长）、赵丕廉（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先生请客，到居（正）、覃（振）、王（即王用宾，时为司法行政部长）、焦（易堂），各位谈些特赦施剑翘女士之事。七年之罪已定，一也；文词批的不好，二也；施从滨曾受国民军委状，三也；覃（覃振，时为司法院副院长）说未见此件公事，四也；焦说大权应在司法院，五也；居、覃说下星期二可提出法院会议，六也。我说施则凡已往北方去，乃之江兄（即张之江，原冯玉祥手下大将）领之去见宋（即宋哲元，原冯玉祥部的五虎上将之一，时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为照（郑）继成之刺张（宗昌）之案也，可先优待之，若只食粗食，诚太伤心也。"

司法部的大员当即表示：自己管辖的范围之内没有问题，只是特赦问题还须国民政府主席来颁发命令。冯玉祥拍着胸脯说："林主席那里我去想办法！"

国民党的司法本来就是"片儿汤"，这么多掌管司法大权的大员在一起研究施剑翘的特赦问题，施剑翘的命运可想而知。事后，冯玉祥写了一封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信，由冯玉祥的老部下，时任第五届中执委员、军事参议院参议鹿钟麟跑腿，串联了八位有头有脸的人物签名，其中包括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于右任、张继等人，要求林主席特赦施剑翘。

9月27日，冯玉祥日记："为施则凡之姐施剑翘特赦事写一封信，请八位朋友署名，送林主席子超先生，为开临时国民政府委员会事，因司法部已经通过故也。瑞伯（鹿钟麟字瑞伯）跑了不少的路，可感谢也。"



1931年，冯玉祥（右）与孙传芳

这样天大的面子，林森也不能不给。1936 年 10 月 14 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布对施剑翘的赦免令：

施剑翘因其父施从滨囊年为孙传芳残害，痛切父仇，乘机行刺，并及时坦然自首，听候惩处。论其杀人行为，固属触犯刑法，而一女子发于孝思，奋力不顾，其志可哀，其情尤可原。现据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纷请特赦，所有该施剑翘原判徒刑，拟请依法免其执行等语，兹据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宣告原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之施剑翘，特予赦免，以示矜恤。此令

国民政府主席　林森(印)

施剑翘出狱后不久便投身于抗日事业，这与她杀人的动机无关。但她刺杀孙传芳，的确替蒋介石除去一个潜在的敌人，国民政府赦免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只是这个面子却给了冯玉祥。

不了了之　徐道邻状告冯玉祥之谜

1945 年 10 月，徐道邻突然向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呈递辞职书，并具状向重庆市北碚地方法院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控告冯玉祥和张之江。这场官司立即引起新闻媒体广泛的报道，成为一时的焦点新闻。那么，这件讼案的原委与结果究竟如何呢？

1931 年，25 岁的徐道邻获德国柏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职于国防设计委员会。1938 年 7 月 3 日，徐道邻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驻意大利大使馆参赞，暂代馆务。1941 年 7 月，徐任考试院铨叙司司长。1945 年 4 月，徐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处处长。正在仕途上春风得意的徐道邻为什么在大显身手之际毅然辞去公职，与冯玉祥、张之江两位高级官员打起官司呢？要了解这桩案件的原委，就要从二十年前的一个严酷寒冷的冬夜说起……

徐道邻的父亲徐树铮是皖系军阀段祺瑞的灵魂，为民国史上叱咤世局的人物。1924 年 10 月，直奉第二次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政变，囚禁了大总统曹锟，后与奉系张作霖共同控制了北京政局，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冯玉祥因与徐树铮有私仇，段祺瑞恐冯对徐不利，委徐为“考察欧美日俄政治专使”，令其出国避

难。徐树铮在海外着实风光了一年，所到之处，均被奉为国宾。1925 年冬徐树铮回到上海，乘专车北上去见段祺瑞。此时北京至天津一带，正在冯玉祥国民军的控制之下，段知徐进京必有危险，曾电阻徐北上。徐不相信有人敢谋害政府专使，从容进京复命。12 月 29 日，徐树铮决定南返沪上，嘱咐铁路局备车。是日下午，段祺瑞去执政府办公，在桌上意外地发现青玉镇纸下压着一张字条，上有触目惊心八个字："又铮不可行，行必死。"又铮为徐树铮之字。段祺瑞吓得面如土色，急令公府秘书黄伯度赶往徐下榻处进行阻拦。黄到时只见徐树铮已束装待发。黄说明来意并将纸条交与徐，徐笑道："我岂信此谰言？"说毕，即拱手告别，弯身钻进汽车，径往前门京奉铁路火车站。

徐树铮的专车开行后，因沿途运兵车很多，走走停停，直至深夜风骤雪急之时，才缓缓开进廊坊车站。

睡梦中的徐树铮被一阵嘹亮的欢迎号惊醒，他拉开窗帘，只见车站上昏黄的灯光下，有许多国民军士兵。这时，车厢门被打开了，张之江的参谋长张钺带着卫士走进来，很有礼貌地向徐树铮敬了个礼："徐专使，打扰了，张师长请专使下车，到司令部休息一下，待天亮再走。"

徐树铮心知不妙，故作镇静地说："请参谋长转告张师长，树铮在京公务劳顿，就不打扰了。"张钺无奈，只得下车。一会儿，又上来一位军法官和几员彪形大汉，他横眉怒目："来人，请专使下车。"几名大汉扑上来，揪住徐树铮连推带搡地强行带下车，那名军法官押着徐树铮走向茫茫的黑夜之中，不知过了多久，车站外的旷野地里响起了枪声。

天亮之后，北京、天津各大小报皆刊出"陆承武替父报仇，杀死徐树铮"的新闻，同时还刊出了陆承武通电。张之江也致电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电文说：兄于感(27 日)抵廊坊后，即赴落垡、杨村一带，分配驻军，并看阵亡官兵，曾经电达。卅日早返廊坊，据侦探队长田云清报称：车站附近发现尸体一具，脑部洞穿，想系被人枪杀。该队长曾向居民调查，据述：昨夜有自称陆某者，率领二十余人，声言其父陆建章，七年前被徐树铮所害，故将徐氏枪杀，为父报仇云云。据报后，当即亲赴尸地暨各处查看，陆某已不知去向，究竟被杀者是否徐氏，尚不得而知。至死者遗体，当饬洪医官妥为照料，此经过情形也。特覆。小兄之江世(31 日)印。

陆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人。早年跟随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后为北洋新建陆军第六镇协统。冯玉祥曾在其麾下任哨长。冯氏勤奋练兵，又好学习，颇得陆建章欣赏。1905 年，陆将其远房外甥女——刘德贞介绍给冯玉祥

为妻。冯玉祥的升迁莫不与陆建章密切相关。辛亥革命时，冯玉祥、施从云、王金铭等在滦州起义，由于叛徒出卖，王金铭、施从云等人牺牲，冯玉祥被押解保定。途次北京时，陆建章将其救下。民国后，陆建章为左路备补军统领，任命冯玉祥为前营营长；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冯升为团长。陆建章任陕督时，冯部扩编为第十六混成旅，陆对冯有知遇之恩。

1918年南北战争时，段祺瑞、徐树铮皖系军阀主战；冯国璋、李纯、王占元、陆建章等直系军阀主和。冯玉祥部在赴湖南作战途次武穴时，按陆建章的指示，发出主和通电，差点没将国务总理段祺瑞的鼻子气歪。同年6月13日，陆建章从上海到天津，皖系国务总统段祺瑞自然将陆建章看作危险人物，徐树铮写信请陆建章到天津司令部一叙，陆不疑有他，应约前来。徐树铮派人将其绑获，就地枪决，引起朝野极大震动。连冯国璋总统都乖乖地在徐树铮拟就的处置陆建章的命令上盖印并发表。但段祺瑞也感到这样做会引起后遗症，于是赠给陆建章家属5 000元治丧费。果然，直系李纯、陈光远电报质问北京政府，陆建章未经审判而被诛，死后又褫夺官勋，此后军官人人自危，从何取得保障？

徐树铮因冯玉祥手握重兵，尚在常德前线与护法军作战，徐树铮担心生变，连忙打电报去解释。当时冯玉祥刚从南方护法军手中攻占常德，段祺瑞为安抚冯玉祥，任其为湘西镇守使，又授以勋四位，冯玉祥遂绝口不提杀陆之事。七年后，冯玉祥控制北京政局后，推出段祺瑞为临时执政。不久，张作霖引兵入关，与冯玉祥国民军剑拔弩张。当此之时，徐树铮又来趟浑水，因此，冯玉祥为了自身利益，借陆承武之名来杀徐树铮，自然也有敲山震虎之意。这回轮到冯玉祥打电报给段执政，请政府对徐树铮“优予褒恤”了。

参与杀害徐树铮的关键人物即张之江的参谋长张钺，在二十年后即1945年讲出了那段秘密：

> 张之江和鹿钟麟都是冯玉祥的心腹干将，不过两人的性格大不相同。张是个忠实的基督教徒，对事对人都极端诚恳。鹿则机警细密，处事谨慎且善于体贴冯的心理，故冯玉祥特别指定他为杀徐第一号“刽子手”……他受命之后，十分谨慎，不敢冒昧从事，怕万一杀徐之后，使冯落上“主谋杀人”的嫌疑，则不惟无功可言，甚至还要受到斥责。因此他曾在电话中与冯往返磋商，始终未获得个“不落痕迹”的绝妙办法……
>
> （12月29日）夜里十二点过后，张之江才接到鹿钟麟从北京转来冯玉祥的命令：“督办要我转告你，如果小徐的专车到达廊坊，要你即刻把

他枪毙，并请你连夜派人去天津，把陆承武接到你的司令部。天亮以后，督办将会派专人到廊坊和你商办一切善后的！”张之江听了，双眉紧蹙，一直摇头，嘴对话筒嗫嚅半天才说：“这样处置法，似乎不妥当吧？小徐现在还是国家的特任官哪！”鹿答说：“这是督办的意思，又有什么办法呢？”张又道：“既然是督办的意思，我们当然服从。不过督办既要派人前来，最好请他下一道手令由来人带来，就叫来人主持办理，我当尽力协助于他。”鹿钟麟知道这位张善人不肯担当这个杀人凶手，也就不再多说，只简单答道：“你就先把他扣住好了，以后的事情，再另说吧。”

30日凌晨1时左右，又铮的专车始蠕蠕开进廊坊车站。徐即被单独幽禁在张之江司令部（英美烟草公司）旁边一所仓库里，其随员则幽禁于附近一处马厩之内。上午8时左右，陆承武自天津乘张之江派出迎接他的卡车匆匆而来，跳下汽车后，由那个去天津接他的副官引导着进了张之江的司令部，刚进到院里，就涨红一副大麻子脸问：“小徐押在什么地方？”嚷了两三声没人接腔。张之江已经听到，即刻掀帘而出，将他拉进屋去，一面安抚他坐下，一面说：“你先不必着急，这回朗公（陆建章字朗斋，故张以此称之）的仇，一定可以报的。小徐已经押在我的司令部内，反正跑不了他。”陆承武仍吵着说：“我现在就去宰了这小子，请你派人领我去！”张之江又拦住说：“冯先生已答应要派人来解决此事，大约快要到了。现在跟小徐同行的几个人，正在会议室内，请你先去向他们说几句话，少时冯先生派的人来到，再去办小徐的问题。”于是陆承武就被引进会议室，对褚其祥等一班徐的随员，发了一顿牢骚。直至下午4点钟，冯玉祥所派的一个徐军法官才乘火车从张家口来到。他见到张之江后，先把冯玉祥的手令交张看过，然后由张把陆承武叫来，三人密谈片刻，张即吩咐一名副官带着四名枪兵，陪同陆、徐二人去到又铮被囚之处，结果了又铮的性命。陆承武当晚即返回天津。



冯玉祥

从1925年12月30日徐树铮遇害，到1945年12月30日就满二十年了。

徐道邻学法律的出身，知道刑事诉讼之起诉权不得超过二十年。遂于1945年8月毅然辞去公职并递上状词。徐道邻有两个重要的证人为其作证，一个是张钺，另一个便是张之江在通电中提到的洪医官。洪医官不姓洪，实姓段，名大洪，是张之江的军医院院长。他在徐树铮遇害的第二天，自称是徐的学生，两次跪求张之江，愿以一门老小作保，请允其寻找徐的遗体装殓。张之江令其写下具结，并必须写明徐系陆某复仇所杀的字样。段大洪写了两次结帖，张遂同意所请。段大洪在雪地中找了一整夜，才发现徐树铮的尸体，又买了村民一口棺材，将遗体装殓后，令徐的卫士张振声用骡车运柩至京郊黄寺。张之江只准段大洪收尸，并未准其将尸体运走，后得知徐之棺运走后，大为震怒，段大洪遭其严厉训斥。此后段便脱离其部，吃斋奉佛，隐姓埋名二十年。当徐道邻上诉后，他将保存的徐树铮被害材料、照片等一大包资料和一封长达5 000字的信寄给徐道邻，讲述了当时的情形。

这桩发生在民国年间的谋杀案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证据确凿。但是冯玉祥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张之江是中央国术馆馆长，他们的地位和势力远胜于“布衣”徐道邻。重庆地方法院和军事委员会均以时效已过二十年为由，不予起诉，徐道邻只能抱恨终天。

杀人灭口　　汉奸缪斌被枪毙之谜

缪斌，江苏无锡人。早年是黄埔军校教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曾任国民党中执委员、立法委员等职，算是国民党的高官之一。抗战爆发后，缪斌落水当了汉奸，在汪伪集团中，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梁鸿志等大汉奸相比，相形见绌。但在抗战胜利以后，却是第一个未经公审就被匆匆枪毙的汉奸，这其中有什么内幕呢？

缪斌与蒋介石不是一般关系。1924年黄埔军校建立时，缪斌就是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北伐时，他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蒋介石总司令部经理处长。北伐胜利后，缪斌为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也算得上是一位响当当的角儿。抗日战争时期，缪斌当了汉奸，先任新民会会长，后为汪伪国民政府立法院及考试院副院长，却没有什么实权。心高气傲的缪斌与汪伪高层关系不睦，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于是闲居沪上。缪斌脚踏两只船，秘密与

重庆国民政府暗通款曲。

1944年，日本政局动荡。新内阁首相小矶国昭与海相米内光政等人上台不久，便面临美国即将出兵在中国华东沿海地区登陆和进攻日本本土的严峻形势。这样，日本将面临两面作战的困境。于是小矶国昭等人主张应与蒋介石实行停火，并使其脱离英美阵营，同时设法与苏联结成统一战线，一举扭转不利的战局。

是时，汪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已病入膏肓，去日本治疗，朝不保夕。由于缪斌吹嘘与蒋介石有很深的关系，于是小矶国昭便通过内阁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绪方竹虎，邀请缪斌访日。绪方竹虎写信给南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代邀缪斌访日，但被日军派驻汪伪政府的日本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所制止。

这时候，缪斌已知道日本方面的意思，与重庆秘密联系，摸蒋介石的底牌，得到的答复是可以继续接触。11月16日，缪斌洋洋得意地来到南京，见到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说："重庆方面希望美军在华登陆前，日本从中国撤兵，蒋先生并不希望美军在华东登陆。"



汉奸缪斌

周佛海问："你何以得知这样的消息？"

缪斌大言不惭地说："我与军统有关系。"

周佛海说："让日本撤兵，只有我可以办到，但日本撤兵后，重庆没有和平表示怎么办？我希望重庆可秘密派一人来进行谈判。"

缪斌神气地说："我就可以代表重庆谈判。"周佛海听后极为反感，认为他完全是胡说八道。

同年12月9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指示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直接办理对重庆的政治工作。冈村命令其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开设与重庆的无线电通信线进行联络，由于日渝双方立场相距甚远，无有进展。

缪斌好大喜功的性格使他认为扭转乾坤的时刻到了，他自告奋勇，要求上海日本宪兵队准其用无线电台与重庆联络，充当日渝双方的中间人。

小矶国昭见缪斌有可利用的价值，于是再次邀请其访问东京。缪斌在东

渡之前秘密与军统联络，请他们将此行报告蒋介石。很快，军统转达蒋介石电谕，准其为秘密使者。

1945年3月16日，缪斌从上海虹口机场乘日本军用飞机直飞东京。在茫茫无际的东海上，自负的缪斌自诩能掌握扭转乾坤的力量，在层层叠叠的云海之上，口吟一诗以言志：

全局黑白愈分明，挽救狂澜在此行。
保得东海一角在，休愁西洋百万兵。
骄横便觉仇人多，患难方知兄弟情。
独惜伊藤早谢世，谁来与我订誓盟。

在这首诗中，缪斌自比李鸿章一类的外交人物，具有掌握中日双方命运的决策大权，认为日本却缺少签订《马关条约》时伊藤博文之流的角色，狂傲之极，可见一斑。

在汪伪政府中，缪斌充其量只是一个三流人物，却以蒋介石的代表自居，到东京被当作国宾对待，住进了首相迎宾馆。当晚，他与绪方竹虎会谈时，便拿出自己拟定的《中日全面和平案》交给日方。

绪方竹虎将《中日全面和平案》转呈小矶国昭首相。3月18日夜，双方进行了会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小矶国昭说："此方案要经过最高战争指导委员会讨论才能决定，我本人没有决定权。"

缪斌说："我与蒋委员长公谊私交极深，此案如能通过，我将在东京直接与重庆方面进行联络，谅必无问题。"

小矶国昭在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报告了缪斌来日经过，以及缪提出的《中日全面和平案》，并说欲以此案为基础，准许缪斌在东京使用无线电台直接询问重庆方面的意见。

陆相杉山元首先发言，斥责小矶首相的荒唐做法，说："缪斌为重庆和南京都不堪大用的角色，此人如今以何种资格来当此重任呢？"

小矶国昭回答："缪斌自称为蒋介石的秘密代表，但没有身份证明。"

外相重光葵说："就缪斌的地位来看，他所提出的方案要日本让步，只会被他个人及重庆方面利用，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目的。何况，驻南京大使谷正之来电说，利用缪斌既违反了过去的决定，又轻视了南京政权，决无成功的希望。"

米内海相也一反过去支持首相的积极态度，表态说："一国首脑轻易与缪斌举行会谈，结果只会让对方获得情报。日本与其会谈，并不能有搜集情报的便利，反而有泄露立场的危险。"

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指出:“即使缪斌策动成功,在美军的威胁下,日军撤退也必发生危险,这样说,与缪的工作是徒劳的。”

在一片责难声中,小矶国昭首相单独晋见日本天皇,将与中国重庆政府的和平交涉计划报告了天皇。

天皇认为:“和平工作通过缪斌这种人是不能成功的,请送缪斌回上海。”

缪斌此行以失败告终,并导致了小矶国昭内阁的倒台。

而缪斌却以此为资本,到处吹嘘自己的能耐。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下令严惩汉奸,有几次军统人员要逮捕缪斌,缪斌就拿出一张电文说:“老子有蒋委员长的电谕,我是派到汪伪政府里去进行策反的,不信你们去问蒋委员长!”果然,画符吓鬼,每次他都能化险为夷。于是缪斌更加狂妄,将他去日本谋和的经历说成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这无疑将蒋介石与日方勾结的秘密宣扬出去。

美国从日本方面搜查到有关缪斌赴日的文件,于是询问蒋介石,为何在盟军取得胜利的形势下,还要单独与日本媾和?蒋介石发誓说,这都是日本的谣言,绝无此事。

1945 年 10 月,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直接安排下,缪斌以汉奸罪被逮捕,1946 年 4 月被押送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受审。在法庭上,缪斌仍夸夸其谈,说:“我与军统局中有联系,民国三十三年冬曾赴东京与日本首相小矶国昭会谈,此行是奉中央之命与日本谈和的,南京与重庆方面的重要人物都知道此事。”

蒋介石对此大为震怒,立马下达手令:“缪斌可杀!”

军统局向江苏高等法院移送缪斌之文中说:“缪对抗战虽不无微功,乃属投机取巧。”不承认缪斌的所谓“功劳”。

缪斌旋即被江苏高等法院以极快的速度进行审判,并宣判死刑。

1946 年 5 月 21 日下午,缪斌在苏州监狱伏法,“崩崩”两声枪响,缪斌倒地气绝身亡,成了第一个被审判并第一个被枪决的汉奸。

黑吃黑　　周佛海被赦之谜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大汉奸进行了审判,其中像陈公博、褚民谊、缪斌等都被实行了枪毙,惟独汪伪二号汉奸头子周佛海却

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这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黑幕呢？

1946年8月6日，大汉奸周佛海等从重庆被押回南京，先关押在宁海路看守所，很快，军统将周佛海的案卷移交首都高等法院，周佛海被移往老虎桥监狱。

10月上旬，首都高等法院起诉周佛海。周佛海对所犯罪行进行了答辩，并聘请全国著名的大律师章士钊为辩护人。章与周的岳父杨卓茂为总角之交，自愿为其辩护。

10月21日上午9时许，首都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在朝天宫文庙大成殿对周佛海进行公审，前后长达五个小时，观者达万人之多，创下审判汉奸以来的最高记录。

周佛海在冗长的自白书中，除了说明自己担任的十数种伪职属空头名义外，着重说明自己早已自首并配合重庆方面开展抗日工作，委婉地否定了检察官指控他“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抗战时期由重庆派往上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中央工作人员马元放、蒋伯诚、吴绍澍、吴开先、程克祥、彭寿等秘密人员，被汪伪特工逮捕，皆经周佛海保释出狱。这些人都愿意为周佛海证明；陈立夫也亲自为周佛海写材料，证明他是“地下工作者”。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也出具了对周佛海有利的证明。从以上的人证、物证来看，周佛海的确与军统有联系，掩护过地下工作人员，抵制过日寇的某些祸华计划，并对策应美军登陆布置了军事上的策应。这些都是不辩的事实。

中共一大时期的周佛海

11月2日，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在朝天宫公审周佛海。上午9时20分，周佛海在法警的押送下来到法庭。当时旁听的民众及新闻报纸上都对周佛海有表示同情者。尤其大律师章士钊的雄辩，“引经据典，娓娓动听，惜其声章稍低，且稍带湘音，听众不能全闻全懂耳。其余两律师一根据法律发言，一根据有利证据立论，均甚精彩”。周佛海在法庭上之辩述，曾博得不少青年人的同情，“鼓掌三次，法警虽禁而不能止”，他不无得意地在日记里写道：“旁听者中对余或有侮辱之言行，乃竟鸦雀无声，听

余陈述，且多表示同情者。乃知民众对余之态度矣。”当法官宣布退庭时，“庭外听众仍以掌声相送，经法警强制乃止”。

11月7日，首都高等法院在南京朝天宫对周佛海汉奸案进行判决。

审判长赵琛高声宣判：“被告周佛海，男，年五十岁，湖南沅陵县人，前中央宣传部部长，住南京西流湾八号，现在押。”

“右被告因汉奸案件经检察起诉，本院判决如左：周佛海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听众中有一位行政院女职员对此判决表示愤慨，当众说：“如果周先生能出狱，我当无条件嫁给他。”此事让周佛海知道后，认为其“感情厚意，至堪感戴”。

周佛海之妻杨淑慧到处托人，找政府及国民党要人洪兰友、陈布雷、陈芷汀、吴鼎昌、谢冠生等人，希冀改判死刑为有期徒刑；同时杨氏向最高法院院长夏勤提起上诉，要求复判，后经高院驳回，维持原判。此时，小道消息满天飞，都认为执行在即。

这时，立法委员马晓军之妻忽然告诉杨淑慧：她认识蒋介石之外宠吴小姐，她已代求吴向蒋介石说情，为周佛海要求减刑。吴已答应，但其手下办事者索要报酬，需金条进行打发。杨淑慧救夫心切，当下应允。谁知这是军统局毛人凤等人欺诈钱财的一个圈套。

马晓军之妻告诉杨淑慧，交金条二十根，并写两件呈文，由杨氏署名，一交国民政府文官处；一交军统局转呈蒋介石，然后静候佳音。

数日后，马妻兴冲冲来见杨淑慧说：“事情全办妥了，蒋主席已将呈文批复交最高法院院长夏勤予以减刑。如果希望特赦，需要另写呈文，不过……”她卖了个关子。

“不过什么？快说啊？”杨淑慧急不可耐。

马妻说：“对方还要再加金条十根，将来如财产发还，要由吴小姐支配，先交半数。”

杨淑慧急赴上海，拿出多年私藏细软，又将女儿结婚的首饰变卖，并向各亲友告贷，凑足了“黄鱼”赶回南京；又写一要求特赦的呈文，交给马晓军，并预付金条十五根。

马晓军夫妇后告杨淑慧：“呈文已交蒋纬国送京面呈主席。”

杨淑慧不解：“何得以托到二太子处？”

马晓军诡谲一笑:“纬国之妻石静宜是吴小姐做的大媒,而且吴之二女儿与纬国夫妇共住一处,不过嘛……”

杨淑慧对“不过”早已心领神会,咬着牙问:“还要打点多少?”

马晓军双手指交叉做十字状:“必另送二太子金条十根。”

杨淑慧狠狠心,将余下的金条如数交给马晓军。

12 月 28 日,马晓军告诉杨淑慧:“吴小姐从上海打来电话,说佛海兄的大赦令十几天后便发表,并要我转告嫂夫人,为佛海兄安排住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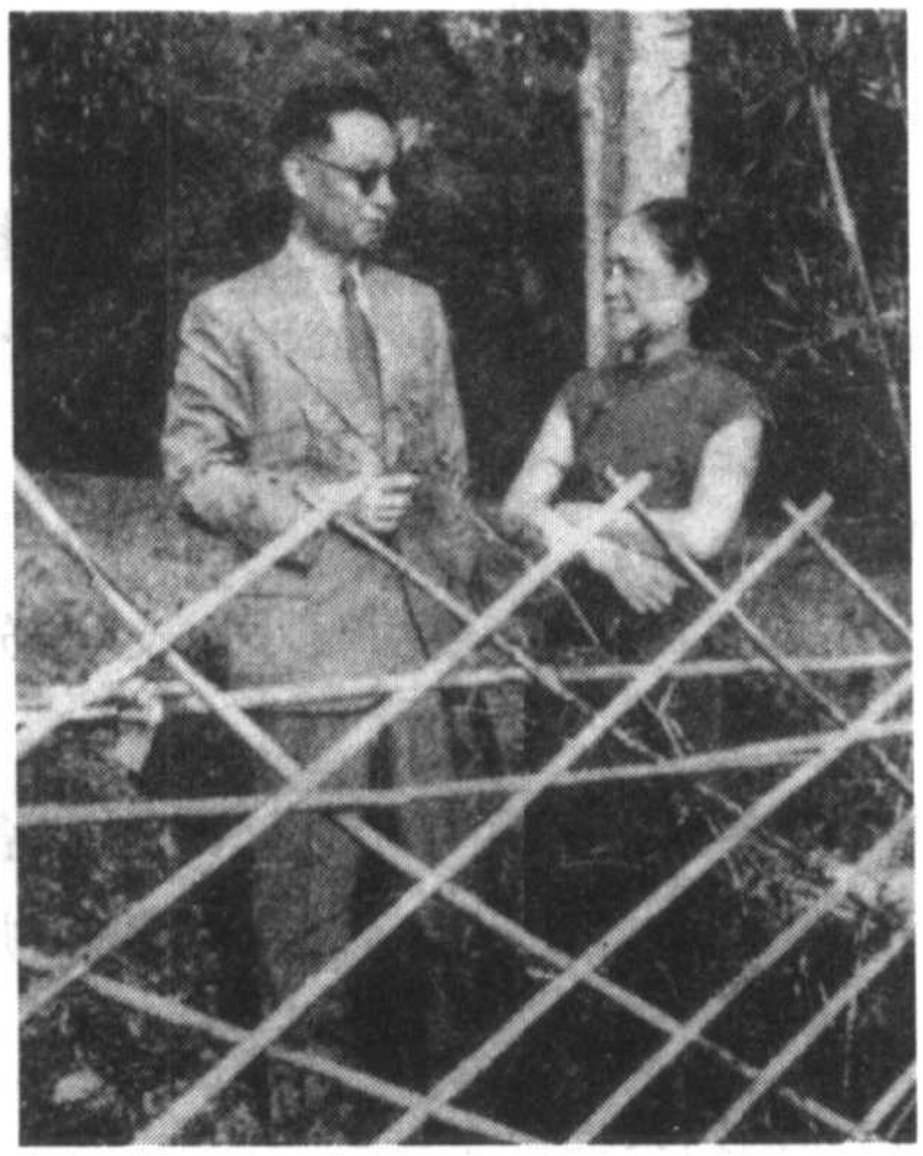
杨淑慧焦急地说:“住处? 西流湾的房子都被法院查封了。我现在住在朋友杨医生的家里,这两天我就去租房子。”

马晓军摇摇手:“不必如此,不必如此,佛海兄大赦令一经公布,法院还不得将西流湾的故宅发还你们?”

杨淑慧将此消息告诉周佛海后,周大喜,竟一夜辗转,“当时相传元旦有大赦,余等同案亦在赦内,或大赦时对余发表特赦欤? 余亦竟作此想矣。”

1947 年元旦,周佛海兴奋之极,“有人来谓今日已颁大赦令,我辈在减刑之列,群情欣然……后阅报始悉除外,群情沮丧万分。盖希望数月,一旦冷水浇头也。”杨淑慧也懊恼万分。

马晓军亲赴老虎桥监狱安慰周佛海,说:“佛海兄,原来说元旦要特赦,吴小姐特来电话,要我转告你,元旦来不及了,因为必须交司法院呈请,来往约需十余日,请嫂夫人借一步说话。”



周佛海与其妻杨淑慧

杨淑慧暗暗叫苦,只得出来。马晓军一脸贪婪,伸出四个指头:“黄鱼还要四条。”

“马先生,行行好,我实在拿不出来了。”

马晓军说:“谁不知周先生有银子? 当过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与财政部长。拿钱换命,公平交易,晚了我可不负责任。”他补充说:“我可没得一个铜子儿,这是打发文官处承办各员的。”

周佛海在日记中绘声绘色地记下了这一敲诈经过,心疼不已地写道:

“淑以功亏一篑与之。伊辛万苦筹集之三十条，仅余一条矣。”

1947年1月8日，马晓军告诉杨淑慧：“公文已于6日送达司法院，佛海兄出来后，我当上门贺之。”

周佛海夫妇又在幻想中数日子。1月20日，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公布：“被告周佛海……原判决核准。”周佛海听后呆若木鸡。

杨淑慧暴跳如雷，她怒气冲冲打上马府，大声喧嚷，吓得马晓军一把拉住她胳膊：“姑奶奶，小声点，进房间说行不行？”

杨淑慧不依不饶：“瞎了你的狗眼，骗到老娘头上，人财两空，鸡飞蛋打！好吧，事到如此，我们鱼死网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马晓军哭丧着脸：“我说，全说，只是……您先别动怒，小点声音。我实在不认识什么主席外宠吴小姐，这一切均为军统局副局长毛人凤之妻所为。”

“原来是向影心那个骚货，”杨淑慧柳眉倒竖，“为何不早告知老娘？”

“毛家那个骚货不让我说，真是该死。”马晓军破口怒骂，以图平息杨之恶气。

杨淑慧叉着腰：“你去告诉毛人凤那个王八蛋，不把老娘的条子交回来，我也拼死闹将出来，怪不得说我们是汉奸，不这样，军统局那帮家伙如何发财？”

杨淑慧打草，毛人凤蛇惊。周佛海日记中记载：向影心托蒋介石侍从室胡静安之妻转告杨淑慧之弟媳：“请淑慧不必声张。盖郑介民与毛人凤，郑妻与毛妻均不洽，如知此事，必藉此倒毛。并谓金条将在沪退回二十条，交杨宅，南京由马退回九条。乃迄今上海仅退十六条，而马反退一条。淑慧虽允不声张，但已有知者。军统局曾派法官常书记询淑，究不知系郑或毛所派。淑不愿扩大，矢口否认。但虽如此，毛等究不安心。必欲得淑一短处以相要挟或抵制。”

果然，3月上旬，军统局再次设了个圈套。一名特务冒充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之特使，找到周佛海妻，说毛泽东、周恩来欲救周佛海，派他前来主持，并要杨淑慧写一信，回复陆定一。杨将此事告周佛海后，周“断定为军统人员所为，居心险恶……且所言营救方法为劫狱，更觉幼稚。中共岂作如此荒唐难成之事耶？另有阴谋竟无疑义，嘱淑此后拒与再见。”

周佛海之子将此事告陈芷汀及陈立夫，陈立夫认为：“可能系军统人员所为，因决定将此事告毛人凤，看其如何处置。”从此，那个“中共特派员”再也没敢露面。

其后，陈立夫、陈果夫联名给蒋介石呈文，要求予周佛海以减行。2月2日，蒋介石令秘书致代电司法行政部："关于汉奸周佛海判处死刑一案，查该犯早经自首，虽未明令允准，惟在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戴故局长笠呈请前来时，曾令其奉谕转告该犯，如于盟军在江浙沿海登陆时能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则准予戴罪图功，以观后效。"

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当即将蒋介石代电转达首都高等法院院长赵琛与首席检察官李师沆，嘱其核办，赵等人不敢怠慢，决定予之减刑。

3月27日，国民政府明令减刑，改为无期徒刑。周佛海由首都高等法院审判定为极刑，到最高法院复审仍为极刑，又到国民政府明令减刑的这段日子里，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中度过，受了极度惊吓，心脏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得了严重的心脏病，身体状态急遽恶化。他在日记中每每流露出这种刺激，使他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例如1947年7月13日日记："去年九月十六日，解京时刺激之大，前已言之。盖座上客忽为阶下囚，变化过剧也。尤使人有沧桑之感也。"

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心脏病复发，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

情迷法乱　　昆明胡致中案之谜

这本来是一桩普通的民间刑事案，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政治背景，但却在昆明酿成轩然大波，甚至闹到了国民政府监察院，惹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大动肝火。这桩本来并不复杂的刑事案也从此雾罩云锁，真相难明。笔者选取此例，主要是揭示民国时期民间百态之一角。

从1946年8月起，将近二十余天，昆明地方法院的门前就没有安宁过，围观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驱赶不散。一位形容枯槁的老妪席地袒腹，冲着法院大门高声怒骂，言辞不堪入耳，观者一片沸然，议论不绝。

围观者中有人认识这位老妪，系昆明市居民高杨氏，家中薄有资产，为人本分厚道。如果不是悲愤至极，何至于不顾廉耻，抛头露面？又有何胆量公开向法院挑战，向检察官叫板？

一向耀武扬威的法院推事李实、检察官李希源面对骂声，居然心虚地躲在房间不敢出头，法院门口的岗警也捂着嘴做着怪相，乐得看热闹。昆明的

市民算是开了眼界，平日里谁敢在法院门口这样肆无忌惮？明摆着法院理亏嘛。

此事终于惊动了上层，这样的胡闹，成何体统？立即组织调查。闹事人高杨氏不请自到，骂一声，哭一声，字字血泪。

据高杨氏称，她年轻时即守寡，只有一养子胡致中床前尽孝。未想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9月14日晚突然暴毙，面色乌紫，七窍流血，经法医验尸官鉴定，系中毒而亡。高杨氏怀疑是儿媳刘秀芳下毒，因为胡致中临死前，曾服下刘某亲手煎熬的汤药一碗，胡死后，刘某不知去向，有邻人告知，曾发现刘某在昆明市西大街某处隐匿。

高杨氏按图索骥寻到了正在与奸夫姘居的刘秀芳，并将其扭送到昆明地方法院，提起公诉。

审理此案的是该院推事李实和检察官李希源。最初审理的态度还颇认真，问明情况后，认为刘有重大杀人嫌疑，理应拘押收监。

晚间，李实邀来了李希源，两人来到女监，提出刘秀芳。原来李实早就心怀鬼胎，白天在庭上看见刘秀芳袅袅婷婷，杏眼含春，不禁被其美色所惑，迅速收监并非为了替死者伸冤，而是为了一泄私欲。

两个人提出刘秀芳，来到法院对门的杨小脚家，这是一家烟馆，三个人厮混了一夜。第二天，刘秀芳就成了自由之身。

刘的奸夫后来曾去找李实，威胁说：刘秀芳付出去多少，就应该得到多少，大家心中彼此有数，希望法院今后不要再为难她。

见刘秀芳已经出监，高杨氏来到法院质问。李实却说，放了刘秀芳是为高杨氏着想，他已罚刘出一万元，为死者超度亡灵。

高杨氏表示，一百万也买不回儿子的命。

李实却沉下脸来：就是这样处理，不服，可以上告！

一向软弱的高杨氏为了儿子的血海深冤，表现出少有的倔强，孤身展开了调查。刘秀芳为了摆脱罪责，制造假证。当然，这一切都由李实为她打理，很快法院也认定了刘秀芳提供的伪证。

高杨氏开始怀疑起李实的公正性了，特别是她了解到法院二李曾将刘秀芳带到杨小脚处嫖娼，更是气愤难当。1945年3月的一天，高杨氏与刘秀芳在街上不期而遇，立即扑上前去，重新将刘扭送到法院，并随即写信向省高院上告，请求复查。

5月，昆明地方法院正式开庭，李实仍高居堂上，一开口，偏袒的意向便暴

露无遗。他引用诉讼程序里“亲告乃论”的原则，拒不承认刘秀芳与胡致中为夫妻，那么，胡致中养母高杨氏更与刘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上诉权利。

原告律师据理力争，被告刘秀芳与胡致中乃属明媒正娶，并共同生活了数年。抗战期间，胡致中服役在外，刘秀芳不甘寂寞，与张绍武勾搭成奸，并于1942年单方面在昆明《云南日报》刊登启事，声明离婚。其时，胡致中正在服役，并不知道此事。另根据保护军人婚姻之规定，刘秀芳单方面声明离婚当属无效。胡致中复员后，双方又继续共同生活，也并未脱离夫妻关系。因此，作为胡致中养母的高杨氏，与刘秀芳仍属婆媳，为法定关系。

李实又继续刁难，连珠炮般提出一连串问题：胡致中系中何种毒物而亡，刘秀芳毒药又买于何处，还余多少，藏在哪里？等等，已完全丧失秉公断案的法官身份，俨然如刘秀芳的辩护律师。

原告律师讽刺说：如果高杨氏知道刘秀芳何时下毒，下的什么毒，从什么地方买毒，她就能防患于未然，不至于让儿子死于非命了。再说，这些问题，理应由检察官调查，岂能去责问原告。

尽管李实一再袒护，无奈原告方义正辞严，并提供了大量人证物证，证明刘秀芳早有奸情，案发后举止乖张，实有重大嫌疑。李实毕竟心中有鬼，不能不有所忌惮。为了应付眼前局面，心一狠，宣布刘秀芳构成刑法三百七十一号第一项之罪，再度收监。

其实，这只是李实的缓兵之计。不久，他就为刘秀芳设计开脱，吩咐张绍武找来一些无业游民，为保释刘秀芳做准备。

很快，李实为刘的保释办好了一切手续，按照规定，保释犯人除应交一笔保释金外，还需要寻找具有一定身份、一定财产的殷实人家作保。李实不仅未向刘要一个子儿，而且保人都一一找好。

刘秀芳临出监时，李实再度关照，跑得越远越好，否则再被抓到，他就爱莫能助了。

闻知刘秀芳再度出狱，并已与奸夫一道远遁不知去处，高杨氏再上法院，问个明白。李实毫无愧色，拿出保释书，回答高杨氏，他是一切按章办事，请其不要妨碍公务。

高杨氏号啕大哭，恨天不公，恨地不道。哭至伤心处，索性卧地打滚，引起众人围观，终于惊动了舆论，有人甚至将案子捅到了国民政府监察院，于右任指着案卷痛心疾首：岂有如此办案者！

负责下来调查此案的人员私下里也责备李实做得过分，为一坠落的女

子，不惜自毁名声，让法院也跟着一起受辱。

毕竟是官官相护，在调查人员的报告中，依然避重就轻，称二李携刘秀芳到杨小脚处吸烟有之，嫖娼宿妓却查无实据，纵放人犯也就无从谈起。至于此案最终结局，因被告已不知去向，只好搁浅，留待被告到案再行审理。

反共有功　冈村宁次被释放之谜

冈村宁次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被中国人民视为第一号战犯，也名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战犯名单之列。然而他却躲过了与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一样被判处绞刑的下场，而且躲过了牢狱之灾。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45年8月10日下午，南京中山北路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冈村宁次听到了日本投降的广播，犹如晴天霹雳。他当即发电报给日本的陆军大臣、参谋总长，表示要率领全体派遣军作战到底。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后，冈村宁次准备效忠天皇，切腹自杀。

8月27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冷欣作为“前进指挥所”主任，率领少数军官从湖南芷江先行飞往南京，部署接管南京以及洽谈日军受降事宜，一位神秘人物邵毓麟也一同搭机前往。

邵毓麟何许人也？此人为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是蒋介石身边的日本通，专门负责研究日本情报。1944年底，蒋介石派邵毓麟赴美国出席“太平洋学会国际年会”，此次会议的主题是“战后如何处置日本”。日本宣布投降以后，邵毓麟立即从美国飞回重庆。8月21日，邵毓麟前往湖南芷江，与日本洽降代表、日军总司令部参谋副长今井武夫秘密接触，就有关日军投降和对待冈村宁次问题达成某种协议或者说交易。

就在抵达南京的当晚，邵毓麟在今井武夫陪同下，前往中央路龙公馆会晤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

邵毓麟单刀直入地说:“目前战局已定,所在问题乃为善后之事,听说将军有以一死报国之念,其心情我亦能理解。然而作为日军统帅,这绝非一种负责的做法。日本侵华八年,中国民众死伤何止数千万,财产损失何止数千亿,如今贵方战败投降,将军不从赎罪着想,却置百万日军官兵和数十万日侨之生死于不顾,欲图以一死了之,这样做,如何对得起已宣布对日本以德报怨的蒋委员长和中国民众?更如何面对贵国忍辱负重的天皇和将军属下的官兵、侨民?”

冈村神色黯然地回答:“阁下说得有道理,我应该如何去做?”

邵毓麟说:“蒋介石要求总司令官做到以下两点:一、当前的首要任务,应约束各地日军留驻原地,不得对中国正规部队再有军事行动;但对非蒋委员长统辖的任何部队,即新四军和八路军前来扰乱,则可以武力自卫,毋庸踌躇。二、不能将武器、弹药、装备缴予非国民党部队。作为回报,蒋委员长开出条件:不以俘虏对待、处理日军投降的军队,由总司令官(冈村大将)属下的各级指挥官继续执行指挥权;并允许日军自身办理复员工作,中国方面则给予充分支持与便利,使日军、日侨的遣返能顺利进行。”

8月30日,邵毓麟和冈村宁次进行了第二次密谈。根据邵的日记:“冈村大将已经决心负起结束战事的任务……日方似已更深切了解我们的态度,因此我和冈村的第二次谈话,也比较更坦白自由了,内容也更广泛、更进一步了。”

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上有同样的记载:“侍从室邵毓麟来访,邵系熟悉日本情况的亲日派,为我旧友,共进午餐,并就各项问题及日、中之将来,肯谈约两小时。”

冈村还记载:“邵毓麟来访,就上次所谈两国关系问题继续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他很理解我方的主张,对将来中日两国之关系尤多考虑,使我非常钦佩。”

9月8日下午,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抵达南京。冈村宁次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一时在城内机场,迎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何应钦是我中国好友之一……他是一个亲日派,如今向这位亲密友人投降,是一段微妙的奇缘。”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日本投降仪式。冈村宁次坐在何应钦的正对面,仅在何应钦到达会场时,向何起立敬礼一次。仪式开始时,由日方总参谋长、陆军中将小林浅三郎代表冈村接过受降书,送给他签名盖章,再送呈何应钦收下。

冈村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看到我这位老朋友(何应钦)的肚量和品格,不禁想到,毕竟是东方道德。”“据中国参谋透露的内部消息说,会场布置,最初中国方面为避免威胁感,拟采取圆桌方式,但由于美军方面的反对,才改为长方桌对立方式。”冈村感慨地写道:“从8月10日以来到9月9日,所接触的中国方面要人的态度颇为亲日,而又是向老友何应钦投降,从而产生一种轻松之感,在今天签字仪式上也未特别紧张和担心。”

日本投降以后,原“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改换为“中国战区日军官兵善后联络部”,冈村宁次的总司令改称为总联络部长官,投降的日本官兵不叫“俘虏”而叫“徒手官兵”。日军统治系统不变,允许日军前往领军需品,作为在特殊时期生活之用,同时还允许日本官兵在遣返时携带武器到乘船地区为止,以保证其安全。冈村宁次一切待遇不变,生活优渥。

同年10月21日,何应钦单独会见冈村宁次,大谈中日过去不能“亲善”的错误,以及中日今后必须“合作”的重要意义。

12月23日,蒋介石在陆军总部接见冈村宁次,频频询问冈村“身体怎么样?生活有什么不便?请勿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来”之类的话,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冈村在会见后又写下感想说:“蒋委员长始终面带微笑,和蔼近人。他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意相慰,深为敬佩。”

直到1946年7月,在华的日俘已经全部遣返日本,冈村宁次及其联络总部的使命已经结束。这个时期,正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大肆逮捕日本战犯加以审讯判刑的高潮,冈村宁次也被列入东京战犯名单之列,一旦遣返日本,自然难免和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同样的命运。但是国民党内部却做出决定:对冈村宁次等,藉口还有许多事未了,既不令其归国,也不予以监禁。从1946年7月起,给冈村宁次以“联络班长”名义留在南京,并对外界封锁消息,禁止记者报道有关冈村的消息。

1948年,国民党当局将冈村宁次秘密转移上海,匿居在虹口黄渡路上一所洋房内,成了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将其视为上宾,几次和冈村密谈,就有关防守长江的问题向其咨询,试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江南挺进。

为了应付国内外舆论的责难,7月5日,国防部战犯军事法庭派人到冈村的住处,面交了国防部长何应钦给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的训令副本,内容为:(1)冈村宁次病已痊愈,对该俘的战犯嫌疑部分应该立即开始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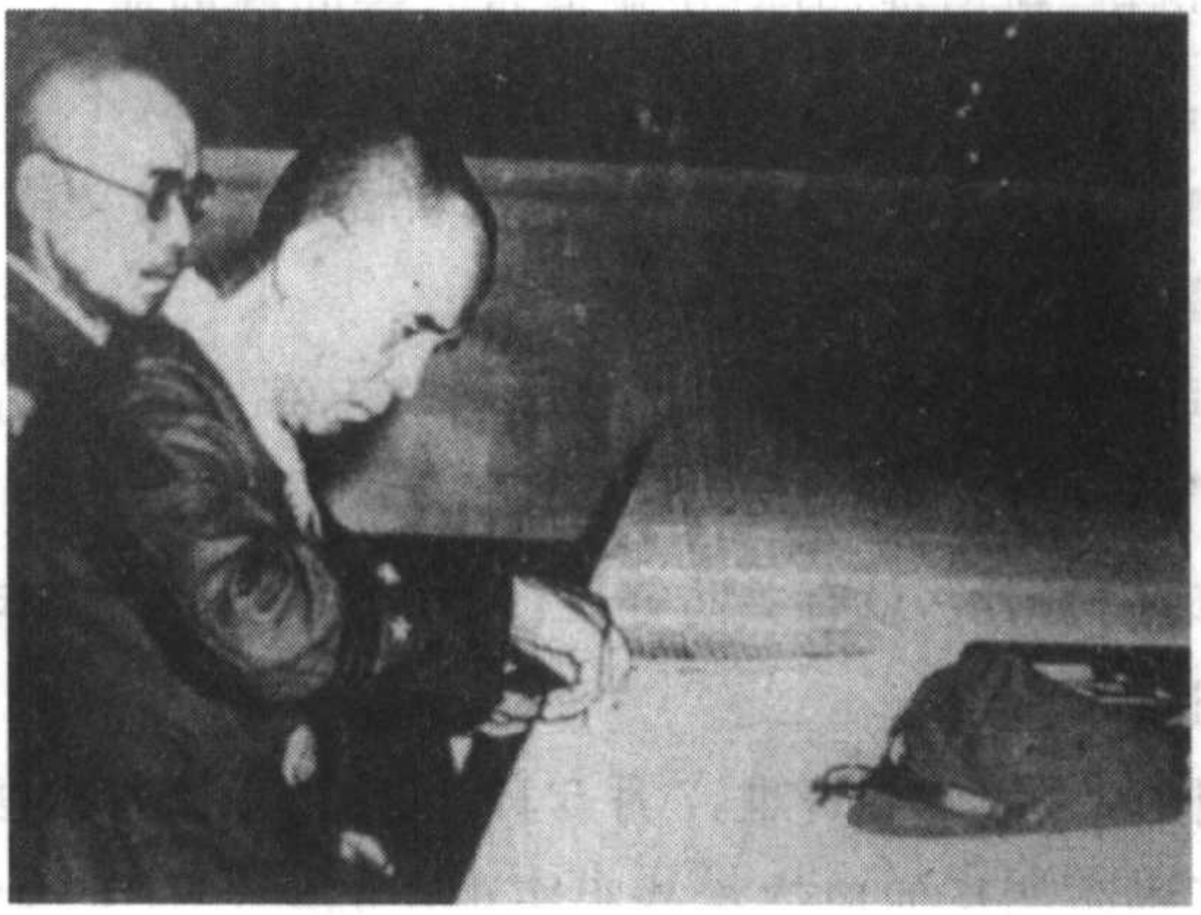
(2) 根据规定进行,随时报告情况。

7月12日上午9时20分,国防部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对前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以战犯罪进行起诉和法庭调查,检察官对他的作战经历及其对部下所犯罪行应负的责任问题提出质问,冈村宁次拒不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并狡辩说即使下属有不法行为,应由他们自己负责,与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和总司令官无关。

之后,冈村宁次被送往高境庙战犯监狱,但生活条件仍然相当优越。在公审前一天,典狱长孙介君来到冈村宁次的居室进行密谈:“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的影响,不得不如此。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十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保释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和入狱只是形式而已。”

8月23日9时30分,军事法庭开始公审冈村宁次及其他战犯,邀集中外记者及驻沪各国领事参加旁听。由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对被告和证人进行庭审,再由辩护人进行辩护,从表面上看,法庭气氛相当紧张。公审结束以后,冈村心领神会地在日记上说:“今日的公审,是考虑到对民众和国际的影响,是一次大型的公开展览。”

同年12月23日,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滕章等七人在东京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司法行政部长主张参照舆论与东京军事法庭量刑一致,以判处无期徒刑为宜,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按照冈村宁次侵华罪行,认为应当处以极刑,国民政府司



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下签字盖印

法部和外交部也对此予以声援。何应钦、汤恩伯等坚持主张将冈村宁次无罪释放。为此，负责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在年底愤然辞职，却未获批准。

1949 年初，在冈村宁次一案最后公审前，国内形势已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被迫下台，李宗仁代理总统。为了和中共进行和谈，他不得不接受中共方面的要求，命令将第一号战犯冈村宁次逮捕法办。蒋介石却亲自电令石美瑜："据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于照准。"

1 月 26 日，国民党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宣布：冈村宁次无罪，樱庭子郎亦无罪。

1 月 28 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严正声明，严重警告南京政府："你们必须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对于其他日本战犯"一概不得擅自释放或纵令逃逸，违者严惩不贷。" 31 日，南京政府发表声明，对中共中央发言人 28 日声明做出所谓答复，声称冈村宁次被释放是一个司法问题，"完全与和谈无关"，拒绝重新逮捕冈村宁次等侵华战犯。同日清晨，冈村宁次和其他在押的日本战犯九人，连同其他侵华战犯二百六十人，在军事法庭的护送下，登上美国海轮"约翰·堆克斯"号，从上海返回日本。2 月 4 日，冈村宁次等抵达东京。

代人受过　赵秉钧暗杀宋教仁之谜

几乎所有的史料和文章，众口一词地得出结论：赵秉钧谋杀了宋教仁，这已成历史的铁案。事实真相果真如此吗？

1913 年 3 月 20 日，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站候车准备前往北京，突然，一个刺客向他开枪，伤在要害。延至 22 日晨 4 点 47 分，宋教仁在医院不治身亡。悲痛万分的黄兴将此噩耗致电袁世凯、国务院及参议院，袁世凯当即下令缉拿凶手。

"宋案"的凶手武士英、应夔丞很快就被上海租界捕房擒获。搜查出来的证据表明，他们与国务院秘书洪述祖有密电往来，而洪直属赵秉钧领导。黄兴致电袁世凯，明确指出："此案牵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上海的民众团体通电袁世凯、赵秉钧："宋案铁证披露，涉及二公。望



宋教仁遇刺时，年仅三十二岁

总统以国法为重，挈同总理即日辞职，接受法庭之裁判。”其实，洪述祖隔过赵总理，直接听袁世凯的指令，赵秉钧对此并不知情。根据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回忆：

1913 年 3 月 21 日上午，国务院正开国务会议。总理赵秉钧与各部总长、秘书长出席。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和第三科科长担任会议记录。突然有国会选举事务局长顾鳌突然闯进会议室向赵总理报告：“前门车站得上海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车站遭枪击，伤重恐难救活。”

赵秉钧听完脸色大变，猛然站起来，环绕长长的会议桌转圈，口中喃喃地念叨着：“人家岂不说是我打死了钝初（宋之字）吗？”（《张国淦文集》第一〇九页，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年 3 月版。）赵秉钧知道，社会舆论会将杀宋教仁的罪名栽到他的头上，因为宋教仁北上的目的是要通过国会竞选，争取国民党组阁，当责任内阁总理。那么，宋教仁即是赵秉钧的政敌，人们肯定认为宋之死与赵秉钧有关。他这种失态的举动，给在场的人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3 月 28 日，赵秉钧径直去总统府见袁世凯，拿着《申报》说：“大总统，报上说我主使洪秘书，收买杀手谋杀宋教仁。听说几天后上海会审公堂要进行审判。我不能再保持沉默，我要辞去总理之职，去上海与凶手进行对质，到底是不是我干的，总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袁世凯却另有一番说辞：“你不干总理才会授人以柄，如果单凭洪述祖与应夔丞的往来电报就算证据，黄兴不是也与应夔丞有密信往来吗？就算洪述祖有罪，就能说是总理犯罪吗？”

3 月 30 日，国民党本部在北京召开追悼宋教仁大会，参加者有千余人。赵秉钧特派亲信王治馨为代表，前往参加追悼会。群情激愤的国民党员看见赵秉钧的代表，更是火上浇油，纷纷要求赵秉钧到会说明。王治馨为赵秉钧辩白：“洪述祖虽说是内务部秘书，但他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与赵总理无关，总理对此毫无预闻。我这里有洪述祖与应夔丞的来往电文，请主持会议的吴景濂先生查收。现在有人要杀宋先生，但绝不是赵总理！赵总理不能对此事负责，此责自有人负！”显然，王治馨的话意有所指，在场的记者们迅速将其讲演内容见报。次日，袁世凯怒气冲冲将这段消息的剪报递给张国淦，说：“措辞

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登报后也不声明更正，想干什么？”

“宋案”发生后，赵秉钧称病，向袁世凯递交了辞呈，避入法国医院。数日后回自己家，约张国淦见面。赵秉钧神色张皇，口称：“有一件事求君帮忙！”张国淦诧异地问：“何事？请你只管说。”赵说：“我现在只求免职，才可免死。”张问：“何至如此？”赵说：“此事此时不能谈，但我不免职就非死不可。须君向各个方面进行转圜，由段祺瑞做总理，事事好办！拜托，拜托！”

当时有国务院一位庶务秘书程世经，了解一些内幕，在案发前曾对人说：“洪秘书（即洪述祖）奉赵总理之命去沪，临行前进总统府谒见总统。洪秘书到沪后，有数封密电是经我手转给总统府的。”“宋案”发生后，程世经畏祸，避至青岛。



这张照片是宋教仁遇刺身亡后拍的

袁世凯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要杀人灭口。王治馨后来招来杀身之祸，根子实基于此。

4月3日，赵秉钧在北京《新纪元报》发表了一段谈话，他说：“我和宋教仁，一任内务总长，一为农林总长，以同僚而为至友，他住西直门外的农事试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来不及出城，他总住到我家中，我们感情甚洽，无话不谈，他离北京南下时，欠了五千余元的债，都是我替他还的。”这其实是实话，当时刊登出来，却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上海会审公堂在审问“宋案”凶手时，武士英一口咬定：“因为宋教仁要当总理，所以我要杀他！”但在4月24日，武士英七窍流血，暴死于监狱的牢房中。

黄兴闻讯立即怒气冲冲致电袁世凯：“此案牵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即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能上诉至中国法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相扰，此实为一大疑问。会审公堂应将此案移交中国方面，在上海组织一个特别法庭来进行审理。”

赵秉钧通电说：“关系洪（述祖）案，自出于本总理及政府意计之外，且洪

述祖虽系内务部秘书，然内务总长于其行政法上之犯罪，虽有怠于监督之责任，于刑法上之犯罪，则无代为受过之理。”

司法总长许士英认为司法程序不符，无此先例，反对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理。结果，弄巧成拙，越描越黑。

1913年5月3日，赵秉钧借口有病，要求辞去国务总理和内务总长职。袁世凯不准，令给假十五日，“俾资调理”。6月15日，赵秉钧再上辞呈，袁世凯批令再给假半月，所请仍毋庸议。赵秉钧第三次辞呈，袁世凯知道赵对他有意见，遂于7月16日，令准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辞职，改任步军统领兼管京师巡警事务。没过几天，袁世凯又任赵秉钧为北京警备司令，令赵秉钧的亲信王治馨代理内务总长，后令署内务次长。

1913年12月16日，袁世凯任命赵秉钧署理直隶都督，调其去了天津。某晚，赵秉钧与其书记官黄季刚饮酒长谈。赵神色惨然地说：“天下杀机已开，我也不知杀了多少人，然而我被人杀的日子也不远了。”黄大惊，急问：“何出此言？”赵摇摇头：“你等着看吧！”

赵秉钧不欲代人受过的言行令袁世凯如芒在背，他知道赵秉钧喜欢吃葡萄，遂将新疆进贡之葡萄，用针将毒剂射入其中，派人给赵秉钧送去葡萄。赵虽有怀疑，却不敢推辞，勉强吃了一串，便感觉腹疼如刀绞一般，急忙上厕所，则大泻不已。其家人奇怪为何赵进去半天不出来，等进去看时，赵秉钧已僵死在厕所之中。时为1914年2月。

“宋案”的参与者与知情者，皆没有好下场。王治馨虽任内务部次长、代理总长，赵秉钧一死，王就被免官。肃政使夏寿康等人在袁世凯的授意下，联名弹劾王治馨在京兆尹任内，定价卖缺，其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14年10月21日，袁世凯以贪污500元的罪名，将王押入死牢。王治馨为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旧人，在未经过司法审判的情况下，被袁世凯直接下令“立予枪毙”。23日深夜，由江朝宗监刑，将王押赴刑场处死。

事后，袁世凯假惺惺地对江朝宗说：“王治馨素为赵智庵赏识之人，且与我相知二十年，不忍见其有此结局。不是我非要他死，而是宪法刚刚颁布，不可枉法。而王治馨的案情重大，不得不以公义而灭私情。”袁世凯遣人发给王的家属1 000块大洋，令厚葬之。

洪述祖潜逃后，在京奉铁路火车的包厢中暗杀了另一个知情者、越狱逃跑的应夔丞。洪述祖逍遥法外，几年后在上海的大街上被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撞个正着，扭送捕房。1919年3月，洪被京师高等审判厅刑事庭判处死刑，

在西交民巷京师分监执行绞刑。此时，赵秉钧已死多年，而洪述祖在辩护书中却未涉及宋案为赵秉钧指使。如果真系赵的命令，洪亦无需替其遮掩，如此反而能减轻其罪行，何乐而不为呢？还有一名原国务院庶务秘书程经世，在1919年也病死了。总之，案件的一系列知情者都死了。然而，赵秉钧却代人受过，背了几十年的黑锅。

此恨绵绵　　廖仲恺被刺之谜

1925年8月20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工人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兼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偕夫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女士一起，上车前往中央党部开会，在党部大礼堂前突遭刺客袭击，伤重不治而亡。

事情发生后，广东政府极为震惊，当天就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织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以应付时局。25日，又设立审理廖案特别法庭，并随即逮捕了一批嫌疑人，可谓雷厉风行。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廖案的真正幕后凶手至今未能查明，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后来，何香凝女士曾撰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廖仲恺》，她回忆说：在追查廖案的过程中，从被击伤逮捕的凶手陈顺的身上，搜出红十字会会证一个，枪照一张，另有阜康押店当票一张，以及分钱的单据等。从当票和分钱的单据可以看出，凶手几天前还很穷，后几天就分了钱，显然他是被收买的。陈顺在昏迷中连声呼唤“大声佬”，这正是一个叫做朱卓文的右派分子诨名，而刺客所用的手枪，也是朱卓文经常使用的（按：经调查，手枪系一向追随朱卓文的郭敏卿私人用枪，子弹也系朱卓文向军工厂申请配领）。后来陈顺还供认，这次刺杀廖仲恺是朱卓文一手布置的。另外，胡毅生、魏邦平、梁鸿楷、林直勉等人均参与其谋。这些人都是国民党右派圈子里的人物，其中胡毅生还是广东政府头面人物胡汉民的堂弟。



廖仲恺

廖仲恺被刺杀的原因很清楚，那就是他遵循孙中山的遗志，坚持联俄、联

共的方针，因此遭到包括胡汉民在内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仇恨。特别是胡毅生等人，他们隔数日即密谋一次，总计开会达十一次之多，咒骂廖仲恺“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甚至考虑要采用非常手段来对付廖仲恺。

然而这些涉案人员中，除胡汉民、林直勉等人被先后拘捕外，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林树巍等重要嫌犯皆闻风而逃，再加上凶手陈顺地位很低，并不清楚内情，后来又因伤重而死，这就为破案工作增加了难度。

涉嫌最重的是朱卓文，他是一位老同盟会员，逃跑后长期隐姓埋名。后来露面后虽然声称“廖仲恺骤遭阻击，实为民众最后之裁判”，但否认自己亲自参加了这一计划。

而林直勉虽然思想右倾，但为人却很正直，他曾是孙中山的秘书，当年陈炯明炮击观音山的时候，就是他和林树巍两人强挽孙中山离开总统府的。据调查，在“廖案”发生前，他曾与朱卓文讲到“非杀死廖仲恺不可”之类的话，逮捕后，他承认对廖仲恺怀有敌意，但坚决表示与案件无关。根据他的一贯性格，不是那种做事不敢承担责任的人。

至于胡汉民，虽然在政治观点上与廖仲恺相左，但交情匪浅，长期以来共同追随在孙中山左右，他可能对胡毅生等有纵容之嫌，但亲自操纵布置刺杀廖仲恺，似乎不会如此心狠手辣。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杀害。图为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在廖仲恺遗体旁

另一重大嫌疑犯胡毅生逃到上海后，发表《告国内外同志书》，否认与凶案有关。

对此案最为关切的何香凝则有自己的怀疑，为什么那天中央党部开会，

门岗没有一个警卫人员？最大的嫌疑犯朱卓文漏网，这又为什么？廖仲恺当时身中四枪，三枪伤口较大，查明是大口径手枪射击的结果，这与凶犯手枪口径是一样的。但另一处伤口较小，应是小口径手枪所射，但凶手没有这种枪，这又是谁射的呢？

何香凝认为，当时身为公安局长的吴铁城也是有责任的，他为什么不派卫兵警戒？朱卓文逃跑与他无关吗？

可是，1936 年，朱卓文化名朱玄鼎办了一份《中山日报》，曾在报上称："在廖案发生之前的一星期，曾有将鲍罗廷、汪兆铭、廖仲恺等一起暗杀的计划，但被获悉情报的公安局长吴铁城所制止，以致未能实行。"

对照凶手陈顺的口供，在他们的计划里，暗杀名单上是没有汪精卫的，这份供词朱卓文并不清楚，这就排除了他为吴铁城有意开脱的嫌疑，因此对吴铁城的怀疑还缺少直接的证据。

何香凝还怀疑那一发左轮手枪的子弹是从中央党部里面打出来的，那天本来是九点钟开会，一贯反共的邓泽如却很早就来到中央党部，所以这一枪怀疑为邓泽如卫士所发。

可惜这些都是事后回忆，再也不能查实清楚了，别看当时蒋介石对"刺廖案"很重视，但他是借"廖案"扫清政治上的对手，如软禁胡汉民，驱逐许崇智，并没有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侦破此案上。到后来，更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廖案"更是无人问津了，当年那些嫌疑人也都公开出来活动，也从无人追究，所以廖仲恺一案迄今仍为疑案，让人"此恨绵绵无绝期"。



何香凝画《烹茶论诗》图

血泪黄花　　黄慧如情奔之谜

1928 年，明星电影公司推出了新片《血泪黄花》。该片由著名导演郑正秋与程步高合作导演，由电影皇后胡蝶出演黄慧如，龚稼农饰陆根荣，夏佩珍饰

陆妻潘氏，郑正秋客串记者。12月17日在上海中央大戏院首映，创造了极高的票房价值。当时，《血泪黄花》的轰动甚至盖过了此前轰动上海滩的蒋介石、宋美龄结婚的风头，这到底是为什么？

《血泪黄花》电影是以1928年发生在上海的黄慧如、陆根荣主仆情奔案件为原形创作的。黄慧如是出身名门的阔小姐，肄业于上海启明女子中学。其父黄静之原籍浙江湖州，在北京当官，做过几年收入颇丰的电话局局长，挣得一份不小的家产。黄静之病故后，抛下其母、其妻黄朱氏、大儿子黄澄沧、二儿子黄澄济和小女黄慧如，黄家便举家南返，移居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春平坊居住。

1927年，黄慧如已经二十一岁，与上海富商贝家定了亲。但其兄黄澄沧则认为贝家门头太高，且男方比慧如小三岁，一旦婚成，恐慧如受气，反对其妹与贝家的亲事。黄澄沧通过常给贝家看病的医生去造谣，说黄慧如古怪刁钻，并且有妇女病等，贝家退了婚。黄慧如认为其兄破坏了她的名誉，于是赌气绝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黄澄沧命男仆陆根荣去劝黄慧如。陆根荣，二十一岁，吴县人，1926年8月到上海，经人介绍到黄府做茶房，人很勤快，模样也还说得过去，黄家都信任他。

陆根荣本来对小姐就有好感，于是进了二楼小姐的闺房，对正在哭哭啼啼的黄慧如说："小姐，你年纪还轻，家里又有钱，贝家的亲事不成功，还有别家可配，别哭坏了身体。像我一个乡下人，一月只赚几块钱，尚且要养活一家数口，还舍不得去死。你要想得开，千万不可一时糊涂去寻短见，被人笑话。"

黄慧如止住哭泣，问："阿根，啥人叫侬来劝我？"

陆根荣说："是大少爷。"

"阿根呀，你不知道，我在外面的名誉已经被他说坏了，贝家不要，别家也不会要的。既然侬来劝我，我看你的良心很好，我就跟了你吧。不论尊卑贫富，只要你有良心，肯真诚待我，我是情愿的。如果你不肯，那么你也是白白的来劝我，我总归是要寻死的。"

从此，黄慧如与陆根荣常常在楼下的亭子间幽会。到了1928年农历春节期间，黄家老太太、太太、大少爷都去外地走亲戚时，黄慧如便和陆根荣偷尝了禁果，一夜风流。到了二月份，黄慧如便有了身孕。

黄慧如和陆根荣的关系被其兄探得一点风声，于是黄澄沧便调陆根荣去他的交易所工作。一天，黄澄沧令陆写英文号码，陆说："我只会写中文，不会

写英文。”正巧，陆又听错了一个电话，黄澄沧大发雷霆，骂道：“交易所听错一个电话，进出很大，你是个饭桶，马上滚蛋！”于是陆根荣便去黄家取东西，黄慧如质问陆：“为何要离开我家？”

陆根荣无可奈何地说：“少爷已歇掉我的生意，我不走怎么办？”

黄慧如哭哭啼啼地拉住陆根荣的衣袖：“你走了，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我怎么办？要走我们一起逃走，去你们乡下，我不能留在家里了。”

陆根荣急了：“我乡下是有老婆的，你怎么去？再说我也没有钱养活你这位阔小姐啊！”

黄慧如说：“管不了许多了，你明早六点多叫一辆出租车在路口等我，其他的事情我去安排了。”

陆根荣走后，黄慧如偷偷拿了一些金银首饰放进一只皮箱里，然后藏到楼下柴房的杂物堆中。第二天一早，黄慧如提着箱子，出门上了车，直向南京路方向而去。黄慧如先到汇文银楼兑换了一部分首饰，换了四百二十块银元，然后去吴淞与陆根荣会合。两人商议后去了苏州，经朋友介绍，陆在阊门外朱家庄毛家弄二十二号租下一间房子，买了几件家具，原想可以过一段太平小日子。



曾经拍摄《血泪黄花》的明星电影公司

黄慧如离家出走后，黄澄沧和黄朱氏发现家里丢了东西，便去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报案，控告陆根荣诱拐黄慧如并盗窃了贵重首饰潜逃，要求通报缉拿。

几天以后，陆、黄二人尚未起床，便被两名侦探堵住，搜出了一些首饰衣物，于是便将二人移交司法科，并通知上海黄慧如的大哥黄澄沧和母亲黄朱氏来苏州报案。

黄澄沧和黄朱氏来到苏州公安局，要求将诱拐犯陆根荣严办，并准备将黄慧如带回上海，黄慧如坚决不肯与其母及兄回去，苏州公安局便将黄陆二人送桃花坞苏州地方法院审办。

黄陆案见报之后，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8月25日下午2时，苏州地方法院正式开庭，审问陆根荣诱拐、盗窃案。

法官命法警将黄慧如带上法庭，黄将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法官问：“你为什么要跟茶房陆根荣逃走？”

黄答:“因为我爱他。”

问:“你们几时姘的?”

答:“今年正月里。”

问:“是你自愿的,还是他强要你的?”

答,“是我自愿的。”

问:“你的那只箱子是不是他帮你拿出来的?”

答:“不是,是我自己拿出来的。”

问:“为什么你要同他一起去呢?”

答:“因为我有喜了,不能再待在家里。”

问:“带出来的东西,都是你带来朱家庄的?”

答:“是的,这全是我一个人干的。”

法官只好宣布退庭,定于三天之后宣判。黄陆案经报纸刊载后,人们对此褒贬不一。

有人认为黄慧如是一个奇女子,是个大胆追求爱情,打破门第观念的有主见的女子;也有人认为她是掉进陆的圈套,上当受骗。不管怎样,“黄陆恋”触动了封建等级婚姻的神经,当时的社会是容不得这种不顾门第的婚姻和自由恋爱的。而广大市民对此却极为关切,等到宣判的那一天,上海、南京、杭州、无锡、常州等地不少人专程前往苏州观审,就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邵力子也偕沪上一些报纸记者,从莫干山赶到苏州采访此案。

8月28日上午10时,法庭开庭宣判:判决陆根荣犯诱拐与实施帮助盗窃两罪,应执行徒刑两年。

陆根荣表示不服,法官准许他在十日内提出上诉。黄慧如身染疾病,面黄肌瘦地去探监,给陆带去衣物,并哭泣着说:“阿根,是我连累你了,我要帮你上诉的。你放心吧!”

江苏高等法院受理此案上诉后,于10月23日下午开庭审理,是日从各地赶来苏州旁听的人更多,加上本地的居民,法庭内外人山人海。

法官先审问陆根荣,又审问了黄慧如,然后由控方黄朱氏回答法庭提问。黄朱氏矢口否认黄慧如因贝家婚事不成,企图自杀的事实,又否认要陆根荣去劝慧如的经过,一口咬定陆根荣是个无赖,诱奸慧如并盗窃金珠饰物。

黄慧如为陆根荣请的律师宋铭勋为其辩护说:“原判陆根荣诱拐与实施帮助盗窃两罪,都不能成立。据刑律,诱拐系指女子年龄未满二十岁者,而黄慧如已经二十二岁,诱拐当然无法成立。实施帮助盗窃,必须被告方实施方

可成立，黄慧如已明明供认是她自己拿出家中金珠首饰，并未假手他人。原告没有看见被告有帮助盗窃的行为，原判仅凭黄朱氏一面之词而下判断，理应撤销。因此，请法庭重新审校，撤销原判，宣告陆根荣无罪。”

法官最后宣布退庭，准于10月27日宣判。10月27日下午，高等法院开庭宣判，陆根荣出人意料地被判为“意图奸淫而拐诱罪”，判有期徒刑四年，剥夺公权三年。这一晴空霹雳使黄、陆二人惊呆了，一时毫无思想准备。宣判之后，陆根荣被押往第三监狱，但仍表示不服，上诉到江苏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鉴于此案影响太大，予以受理审核。黄慧如则坚持留在苏州，后只身一人回到吴县乡下陆根荣的家中，在草屋农舍中生活，等待生产和陆根荣的出狱，更糟的是，还要忍受陆妻潘氏的白眼。

从过去大鱼大肉到如今粗茶淡饭的生活，潘氏还有意不往黄的饭菜中放油放盐，令其难以下咽，这些黄慧如都默默地咬牙坚持下来，这时她已有六个月的身孕了。

黄陆一案经新闻媒体“炒作”，已掀起轩然大波。上海滩有经济头脑的商家纷纷看好黄慧如，中商烟草公司总经理张友亮抓住有利契机，不失时机地推出了“黄慧如”牌香烟，并抢先在商标局进行注册，成为专利产品。此烟一面世便十分红火，立即在上海滩小市民中引起轰动。

此时，戏剧界也大动脑筋，从1928年11月起，上海舞台等剧场推出京剧《黄慧如与陆根荣》，由京剧名角赵君玉饰黄慧如，赵如泉饰陆根荣。剧场还别出心裁，随戏票赠送黄陆二人1928年春节时在南京路兆芳照相馆拍摄的合影照一张，以满足小市民的好奇心理。

此外，剧作家洪深与导演张石川一起去苏州监狱探望、采访陆根荣，拟以此事编写一部电影。是年12月，上海电影公司老板顾无为和新婚之妻、电影明星林如心专程从上海来到吴县乡下陆家，约黄慧如产后去上海拍电影，顾无为拿出一笔定金，并介绍黄慧如去苏州志华医院待产，增强营养，保证母子平安。

黄慧如此时已失去经济来源，于是同意与顾无为签订了十个月的拍片合同，并于是月底住进志华医院。

1929年2月4日，上海《申报》刊出上海影戏公司和黄慧如两则启事。上海影戏公司启事：“本公司兹与黄慧如女士订立常年合同，聘为基本演员，一俟春暖即从事摄制富有艺术之影片。特此登报公布之。”黄慧如启事：“慧如兹应上海影戏公司之聘，从事电影工作，潜心艺术，贡献社会，不以个人经过

藉作投机，恐各界不察，特此启事。”

黄慧如本人当演员拍电影的消息传到黄家后，立即引起黄家极大的不安。本来他们已在报上申明，黄慧如今后一切去向与黄家无关。现在见慧如又要加入演艺界，败坏黄家名声，于是便由黄朱氏赶往苏州，劝说慧如回心转意，并答应她生产后可继续上学，或去医院学做护士，只要不去拍电影，怎么都行。

1929 年 3 月 8 日，黄慧如在志华医院产下一白胖男婴，黄给他取名叫“永年”，母子均平安。

黄朱氏赶往苏州，苦口婆心再度劝说慧如。几天以后，黄慧如上吐下泻并发起高烧，此时，黄朱氏向院方提出要接女儿出院，回上海治疗，并不顾医生劝阻，于 3 月 19 日天不亮时，带慧如离开医院。在两名女护士陪同下，打着灯笼从医院后门大儒巷河埠上船，摇至闽门外，由小火轮拖带，经阳澄湖向上海方向行驶。据说在湖上遇到大风浪，船剧烈地颠簸，船上的人都呕吐了，黄慧如身体本来就虚弱，再加上如此折腾，口吐黄水，奄奄一息。辗转至下午四时，心力交瘁死于舟中。

是晚，小火轮在苏州河垃圾桥附近停靠。黄家已安排好汽车，接尸上岸后回家，此时已是万家灯火。黄府连夜将慧如入殡，天明后即将尸体送往闸北湖州会馆暂厝，殡人只有黄澄沧和包车夫二人。

3 月 20 日这一天，闻黄慧如死讯者络绎不绝将春平坊围了个水泄不通。在此后三天之中，前来问讯者达五六千人之多。黄家大门紧闭，只是用白纸写了一个启事贴在门上：“此间不幸，遭兹惨变，合家哀悼，诸君苟不予同情，亦不宜幸灾乐祸，似宜稍顾人格。因必要有所垂询，亦须先日函约方有接见余地。幸祈垂鉴。”

就在报上刊出黄慧如死讯之时，也刊出了江苏最高法院接受陆根荣上诉，认为高等法院判决陆根荣罪名的条款不能成立，发还高等法院重审的决定全文。然而黄慧如作为此悲剧的主角却没有看到这一天。黄慧如之死，又给影剧界、商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看《黄慧如与陆根荣》戏的人更多，剧作家们又创作了《慧如产后血崩》等戏，吸“黄慧如”牌香烟的人也更多。直到陆根荣出狱后，《黄慧如与陆根荣》之剧还经久不衰，剧场竟想出用陆根荣做活广告的噱头招徕观众，每天晚上戏闭幕时，饰演陆根荣的演员赵如泉便将陆根荣拉上台向观众谢幕，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身着蹩脚西装的陆根荣向观众深深作九十度鞠躬，在“慧如牌”香烟的袅袅烟雾之中，全场情绪达到高潮。

黄慧如死了,《血泪黄花》、《黄慧如与陆根荣》的影剧和"慧如牌"香烟却延续了好多年。

沪上奇案　　张伯驹被绑架之谜

抗战期间,上海滩曾发生一桩绑架案,中国著名的收藏家张伯驹遭不明身份人绑架,后幸获释放。但此案的主使者是谁?其目的何在?被害人张伯驹又如何死里逃生?这些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抗战期间,上海滩曾发生一桩绑架案,中国著名的收藏家张伯驹是受害人。由于张伯驹名列"民国四公子"之一,颇有盛名,此案曾轰动一时。当时上海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了此案,但对其中内幕却是多猜测而无实据。有的认为是黑社会所为,其目的在于索金。有的认为张伯驹是国内有名的收藏大家,前不久才收藏了号称"墨王"的陆机《平复帖》,此乃无价之宝,因此另有背景,甚至不排除有日本人幕后指挥的嫌疑,借此获得中国文物。因为在张伯驹被绑架期间,曾有人找到张的家人,欲以低价收购其所藏文物换取索金。也有人认为这是汉奸伪军所为,借机敲诈一笔巨资,甚至还有人怀疑这是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工的一次行动,以此阻止国内有影响的人来沪,防止他们不慎落水成为汉奸。

任凤霞、迟秀才曾撰有《张伯驹与潘素》一书,似曾采访过当事人的妻子潘素,因此史料翔实,但在叙述这一章节时,对绑匪的具体身份及目的语焉不详。寓居沪上的孙耀东曾在《上海滩》上发表过有关文章,对这桩疑案作了详尽的描写。

孙耀东与张伯驹交情匪浅,乃世交,作为大汉奸周佛海的秘书,孙耀东在当时上海还是有一定势力的,因此平时对张伯驹也多有照顾。据他称,张伯驹此行来沪是接任上海盐业银行经理之职,因此引起了上海盐业银行襄理兼营业部主任李祖莱的嫉恨,此人对上海盐业银行经理一职早就志在必得,没想到张伯驹却横亘在前,而且张家在盐业银行是个大股东,根本扳不倒。另外,李祖莱平时就劣迹多多,许多账面都不清楚,如果张伯驹深究起来,马上就要东窗事发。

于是李祖莱使出阴招,他与汪伪特工组织"七十六号"素有联系,特务头

子李士群和吴世宝都想捞钱做生意，办了许多“三产”，如交易所、公司、酒楼等等，让他们的太太或亲属打点，由于不懂生意经，平时是李祖莱帮助他们打点，生意颇为红火。李借着这层关系说动吴世宝，将张伯驹除掉。

吴世宝将绑架张伯驹的活儿交给他的徒弟张国震，绑架的地点在张伯驹的上海临时住处陕西北路培福里弄堂口。绑匪按照李祖莱的要求，先将张伯驹绑架到上海郊区某地关押起来，却没有结果张伯驹的性命。因为他知道张伯驹乃有名的富家子弟，想勒索一笔巨款后再撕票，于是要价二百根金条赎票。当张伯驹夫人潘素向盐业银行请求垫款救人时，却遭到李祖莱的拒绝，其理由为这是张伯驹的个人私事，非为银行利益遭绑。就在这走投无路之际，请得孙耀东进行营救。孙以吸引外地商人来上海投资为由，请求周佛海要给上海营造一个比较良好的投资环境，而张伯驹被绑架则会使外地投资商裹足不前。对孙耀东的说法，周佛海深以为然，于是进行了干涉。因为周佛海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李士群、吴世宝不得不有所忌讳，所以在勒索了二十根金条后释放了张伯驹。

孙耀东的描述非常详尽，但依然有诸多疑问。作为当事人的张伯驹及张夫人潘素女士，对这桩绑架案的内情应该是明白的，但却从来没有说明此事是由盐业银行李祖莱策划，汪伪特工所为。“文革”期间，张伯驹也曾提及此事，也只是说当年的伪军是绑架他的匪徒。另外，对“七十六号”的研究近一段时间也开展得很深入，李士群、吴世宝的许多恶行也被披露，他们虽然胆大包天，无恶不作，但却没有发现确实的材料证明此事是他们所为。按理说，像这样具有轰动效果的大事不会不留下蛛丝马迹的，况且以他们的胆大妄为，也不在乎留下痕迹，因为他们在当时杀人越货几乎是公开的、无所忌讳的。再说李士群与周佛海素有矛盾，吴世宝及其手下更是胆大妄为，他们连日本人的东西都敢抢，根本就不会忌讳周佛海。再说，若是给周佛海面子，为什么还要勒索二十根金条？

以上种种疑点，此案定论为“七十六号”所为似乎还为时过早。

月黑风高　　永和金号案之谜

湖南省邵阳市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小城，然而在1947年5月3日夜，正是这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永和金号案。此案涉

及毒、劫、烧、杀，性质特别恶劣。长沙《晚晚报》曾于案发的第二天，即5月5日，披露了这一事件。

本市永和金号，三日晚发生一起劫财害命放火灭迹巨大惨案。据该店店员鄢子和称：十时许有人来店，胁迫各服丸药十枚，即昏迷不省。黎明火势大张，伊睡后进，得免于死。计烧毙学徒金海水，杀死管钱店员饶某，房屋中进被毁，仅余金饰二十余两，钱洋十余元。

地方当局很快介入此案。

不久，案情大白，湖南省第六区行政专员公署竟然涉案其间，主凶者即为该署机要秘书傅德明，就是他在5月3日晚上闯进永和金号，以搜查中共地下组织为名，强迫店员服下麻醉药，实施杀人、放火、抢劫等暴行。

在案件进一步调查过程中，发现公署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孙佐齐、科长王雪霏也参与此案并在案发前已经合伙数次敲诈该金号，实为其幕后操纵者，这就更引起社会的关注。5月13日，《国民日报》披露说：

邵阳地方法院受理此案后，曾于五、六两号传讯傅德明及永和金号中毒人等，以傅嫌疑重大，当交押看守所。八日晚，看守所外枪声突起，据传言系傅之同党所为，意图劫监欤？抑有意捣乱欤？

14日，湖南长沙《中央日报》刊登了邵阳各界声援永和金号惨案委员会通电吁请严惩凶手的报道：

近据邵来人谈，本月三日晚永和金号血案发生后，全市民众无不表示痛恨。报纸方面因某署之恫吓，不敢披露其内幕。迄七日后援会成立，士绅激昂慷慨，深为愤怒，八日报纸始揭载真相，又法院于五日传讯傅德明，当拟扣押，比为孙专员保释。于提讯六个中毒之被害人时，傅尚为陪审官，法院检察官与士绅对此尤为不满。六日下午再讯时，因检察官之严厉抗告，傅始被押。

此案本来并不复杂，然涉案者乃居当地权力之中心，因此有足够的力量混淆视听，傅德明还在邵阳《民报》和《铁报》上刊登启事，企图嫁祸共产党：

本人从事铲除奸匪工作，遂为奸匪所积怨，永和金店惨案，实其暗算成果。现自赴法院请求侦查，同时设法破案，为被害人雪恨，誓与奸匪奋斗到底。

孙佐齐、王雪霏也配合傅德明的行动，他们买通邵阳同业工会理事长喻纯，诬陷喻让贤为惨案凶手，一口咬定案发之夜被诬陷人衣着整齐来到他的店中，形迹可疑等等，一时间，此案扑朔迷离。

邵阳地方当局因此加大侦破力度，终于取得了突破，5月25日，长沙《中央日报》报道说：

> 举世瞩目之邵阳永和金号惨案，案情已大白。傅德明昨(二十一)晚七时在法院监狱，供认毒、杀、劫、烧为彼一手造成不讳；所劫赃物——金饰二十六两一钱四分六厘、珍珠二十八颗、玛瑙十颗、银洋二十元，一一已由地方法院检察处在六区专署二科科长王雪霏之皮箱内检出，法院正究讯余党中。

该报同时指出，虽然此案已取得重大进展，但案情并未水落石出，此案明显非一人所能为，因此"肃清余党，安定社会，确定地方治安，乃属当务之急"。

正如该报担心的那样，此案的审讯到此为止，再没有深挖下去，一时间民情沸腾，文电交加。湖南省商联通电全国说：

> 呜呼！此种惨寰之劫杀案主角，竟出自堂堂官署之重要幕僚，不惟史无前例，即敌伪之暴戾恣睢，亦无逾于此者！凡有理性，宁弗发指!?且值行宪伊迩，此种变相匪盗，若不彻底戡除，则商人之生命财产，今后将益无保障！现邵阳各界已组织声援委员会呼吁予以究办，我工商同人兔死狐悲，尤宜一致奋起，坚决要求政府当机立断，治官邪，用重典！庶几沉冤昭雪，良弱幸甚！社会幸甚！民主幸甚！

声讨"官匪"的浪潮很快波及省外，就连国民参政会也开始干预此事，就永和惨案向内政部长张厉生提出质问，并表示，此案如果在国内司法上得不到公正解决，则将提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讨论。湖南省政府也决定派出省府委员毛秉文前往邵阳彻查此事，并同时撤销孙佐齐专员职务。5月25日，《中央日报》及时地报道了这一消息：

> 王主席昨巡抵沅陵，闻悉邵阳永和金号惨案详情后，甚为震怒，当电省府，即将六区专员孙佐齐撤职，并派毛委员秉文克日驰往查办，及慰问被害人民，安抚地方。省府奉电后，已分别遵办。并闻毛委员于本日清晨启程，赶往邵阳彻查……据毛氏表示：本人到邵阳后，决遵照主席指示，究治余党，不稍姑宽，藉平民愤。将召开一座谈会，听取地方公正士绅之意见，以作彻查本案之南针。本案倘不水落石出，匪特为湖南之耻

辱，抑且为中国政治之污点。

毛氏似乎决心甚大，国民党中央社也推波助澜，连着发了几则消息，均云邵阳金号案影响之大，败坏国家纲纪，必须严查彻查，尤其重点在调查孙佐齐是否为血案主谋。长沙《中央日报》还举行了民众测验，信件如雪花般飘来，对于傅德明、孙佐齐的处理都是一片杀声，罪不容赦。

然而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邵阳地方法院对此案草草作了调查就忙着结案，因为傅德明自知死罪难逃，因此对所有情况坚不吐供，邵阳法院遂借机认定傅德明单独作案，判处死刑，而孙佐齐、王雪霏等则因为以前曾有过敲诈事实，仅以“连续借势勒索未遂”，判有期徒刑各十二年。

显然，这一判决有失公正，其中必有隐情，试想此案已惊动国民党中央，震动全国，且性质恶劣，民愤极大，孙佐齐不过区区一专员，为何能死里逃生？有人猜测说，这是因为孙佐齐的后台为蒋介石手下第一号宠将陈诚，是陈诚请求法外开恩的。但这种说法没有依据，因为陈诚与孙佐齐之间不知隔了多少层，且陈诚为人比较自律，似这种丧心病狂之举，他是不会袒护的，因为也有损自己的名声。那么为什么邵阳地方竟敢抗拒全国舆论，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孙佐齐开脱呢？而各上级法院尽管对邵阳地方法院的判决认为“法理欠通”，为什么又一一首肯呢？孙佐齐究竟有多大能力、多大神通，竟然一手遮天地摆平了此事？

永和金号案远远没有真相大白，就在对傅德明实行死刑前，他在上海的父亲傅晋山寄来了两封信，其一给当地法院院长，另一给傅德明。在给傅的信中，对其罪行大加鞭挞，并严令傅德明说出真相，方对得住受害人和国家。一直死抗硬顶的傅德明突然长泣不止，似乎良心发现，然而一切已晚。在行刑前，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此案若能延缓两周，他将会把真情一一吐露。

永和金号案就这样草草收场了，留下一个让人猜不透的谜团。

怀璧其罪　　蒋范卿投匪之谜

1919年1月19日，昆明《滇声报》登出一则消息：

“水月轩主蒋范卿，在模范工艺厂总理任内，挪用公款甚巨。后经官府追缴，家事逐渐零落。去年，伪造纸币之案事发，逃回曲江，勾结匪类，自为领

袖，由通海、河西一带，分途劫掠，聚众千人，附近各县受扰。日前，由省派军队一连，前往剿办。”

这一消息让云南人氏大吃一惊，曾几何时，蒋范卿还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在云南也是个有名人物，平时醉心于文化事业，是他办起了云南第一个戏院、第一家电影院，引进外省文化，揭开了京剧入滇、鼓书入滇的历史，还筹办滇池航运业，并将生意推向上海等地。为什么好好的生意人不做，却甘心为匪？

万揆一先生的《一双碧玉镯累及一位实业家》一文揭开了这一谜团。

1914年6月，巴拿马出品协会云南分会和云南省第一次物产品评会在昆明南城外公园联合举办展览。其中的古玩专馆向当地名流征集展品，蒋范卿本来就热心于公共事业，把家中的一双碧玉镯借给展览会陈列。

这对玉镯非等闲之物，出自清宫，是慈禧太后赏给李鸿章的，后来归李鸿章后人李经羲所有。宣统三年九月，革命军炮轰云贵总督署，时任总督的李经羲仓皇出逃，慌乱中丢下了这对碧玉镯，后被蒋范卿重金购买。这副玉镯通体翠绿，滑润欲滴，内行人都一致赞为无价之宝。

果然，展览会上，这对玉镯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云南督军唐继尧有个族人，也在军中任职，当时就在玉镯前挪不开脚步，他找到蒋范卿，愿意出一万大洋收藏此镯。

蒋范卿为人正派，在当地也有影响，所以他一口回绝了唐家的要求。展览会一结束，他就索回玉镯，干脆离开云南去了上海。临行前，他辞去原来所兼的云南模范工艺厂总理之职。

来到上海不久，蒋范卿就收到其弟的来信，说工艺厂的继任者指控他亏空了6 000多元公款必须追赔。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工艺厂原是一家官办企业，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是蒋范卿让它起死回生的。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唐家人带话给他，只要交出碧玉镯，亏欠公款的事一笔勾销，还可以等待机会，保他当上云南省实业司长。

蒋范卿却是个倔脾气，当即吩咐妻子，绝不与唐家人妥协。为了防止对方仗势欺人来抄家，他还搞了假分家，将自己与弟弟的生意分开，以防连累。

唐家毕竟势大，运动了云南各级官府，硬是强加了蒋范卿亏空公款的罪名并查封蒋家财产，还采取扣押的手段，从蒋氏妻子那里搜出了碧玉镯。

唐家人终于如愿以偿，本案也就此收场了。但蒋范卿却咽不下这口气，他要报复。

蒋范卿来到通远县大土匪吴学显的山寨，吴学显知道蒋范卿是个能干的人，当然收留了他。他让蒋范卿到香港伪造假钞，这样不仅可以增强经济实力购买军火，也会使云南经济混乱，加速唐继尧的垮台。

只要能搞垮唐家，蒋范卿一切在所不惜。很快，云南市面上就流通着大量假钞，这无异给原本衰弱的云南经济雪上加霜，因为云南当局不断滥发钞票，地方纸币信誉早就一落千丈了，再有假币捣乱，只怕引起金融恐慌。而吴学显匪部则因有充足军饷，枪多弹足，西犯河西，南掠石屏，横行滇南，让唐继尧十分头疼。

警厅和银行会同研究，发现假钞印制精美，绝非本地所产，极有可能是在香港印制的。于是派出警员调查，很快查出此案与蒋范卿有关。他们经化装后与蒋范卿交上朋友，将证据搞到手，并摸清了制作地点，然后在英方的协助下将蒋范卿缉拿归案。

大堂之上，蒋范卿供认不讳，但他对自己的作案动机作了声明，绝不是贪图钱财，而是事出有因。云南方面出于前述原因，也惧怕将案情公布于众会动摇人心，因此仅以“投伙入匪，为害闾里”的罪名将蒋范卿处以极刑。

经济疑云

扰乱金融　　直奉战争中的假币之谜

反间之计，历来为交战双方所采用，但利用假钞在对手内部制造矛盾，破坏对方经济，以达到乱中取胜的目的，却是在北洋军阀混战时出现的特殊案例。这桩民国时期制造假币的案件原委和经过究竟是怎样的呢？

1924年9月，直奉两系剑拔弩张，战云密布。关外的张作霖依仗兵强马壮，威胁大总统曹锟，要“用飞机以问阁下起居”。曹锟也不甘示弱，叫嚣“功名利禄都是挣来的，全不要了”！表示要破釜沉舟，与奉系拼个鱼死网破。他急调大将吴佩孚部署三路兵力迎敌，吴亲赴山海关指挥战事。很快，奉系大举对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展开了猛攻，双方各有胜负，僵持在山海关一带。

由于战争的影响，直系的老巢奉天（即今沈阳）市面萧条，人烟稀少。9月下旬一天傍晚，在小东门附近一家回族人开设的小面馆，门帘一挑，进来一位年龄在四十岁上下商人模样的人。生意清淡的老板见终于来了一位客人，立即热情地迎了上去。



张作霖

这位特殊客人，操着一口天津口音，他找了一张比较干净的桌子坐了下来，随手将头上的礼帽递到老板娘的手里。老板上下打量着这位惟一的客人，只见他身穿阔绰的长袍马褂，抽着哈德门香烟，气派不凡。

老板一面为客人端上牛肉面，一面琢磨着他的身份。自从直奉第二次战争开战以来，京奉铁路的车辆全是运输军械的，一般的客车几乎都已停运，而眼前这位天津商人为何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到奉天来呢？又为什么不进大饭店吃饭，而在这样简陋的小面馆吃饭呢？

那位客人吃完面后，拿出一张东三省官银号于1917年发行的“一二大洋汇兑券”（即关东流行的奉票）结账。这样面额的钞票，正是奉天省财政厅通告过的，因为在城里发现伪钞，财政厅要求各大小商号及店铺，凡发现来历不明的外省人或可疑的“一二大洋汇兑券”，必须上报。

老板接过客人手里的钞票后，感到关系重大，给老板娘使了个眼色，借口换不开大票，要外出兑换，抽身出门报警。那位天津客商似乎已从老板的举止中看出破绽，便不顾老板娘的挽留，仓皇夺门而逃，没跑出几十米，就被带着警察赶来的老板当场捕获。

警察局将人犯关押进北大营监狱后，几经刑讯，人犯就是坚不吐实，只说自己叫孙德利，是从宽城子（长春）来找东三省官银号经理彭相亭办事的，身上所携数千元“一二大洋汇兑券”，均为彭相亭所给，而警察也看不出这些钞票有什么破绽。奉天省财政厅长王永江对此案却格外重视，召集东北造币专家来鉴别，在放大镜下，钞票背后的香山图案左角云卷花纹中，有一条被刻版者故意截断一点，如不细察几可乱真。王永江在犯人的口供中得悉，此案牵连了东三省官银号经理彭相亭，而彭相亭又是张作霖磕头换帖的把兄弟，自知案情重大。因此连夜搭专车赴山海关前线，在天泰栈内见到大帅张作霖，面陈一切。张听后大发雷霆，骂彭相亭：“他敢趁吴子玉（佩孚）与我打仗的时候，干这种损事，一旦查实，不论何人，一律处以极刑！”

总参议杨宇霆认为其中有诈，劝张作霖冷静处之，但是张作霖还是电令奉天军事留守官吴俊升：即刻将彭相亭逮捕。原因不仅只是“孙德利”的口供，更令张作霖盛怒的是，“一二大洋汇兑券”的钞票底版就保存在彭相亭处。就是说彭相亭监守自盗，有从官银号内调出钞版并秘密盗印之嫌。

原来，从民国六年（1917）起，东北银行的大洋票和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一二大洋汇兑券”就归北洋财政部印刷局督制，不仅流通于东北三省，而且流通于热河、直隶。自张作霖督奉期间，对这两种维系奉军军饷民资的奉票，一直严加控制，严防滥印，因此该票在东北、华北享有美誉。但是在本年春天，张作霖有心与曹锟、吴佩孚之间再起战火，便派遣杨宇霆、彭相亭亲往北京，与财政部印刷局交涉，请求将一直由印刷局代管的东三省官银号“一二大洋汇兑券”及东北银行十元钞的底版交彭相亭运回奉天自管。印刷局长崔承炽初时不肯，后因杨宇霆请黎元洪出面说项，崔承炽只好妥协。但经崔承炽讨价还价后，只允许将东三省官银号的“一二大洋汇兑券”钞版以火漆加封以后，由杨宇霆和彭相亭两人专列运回奉天，东北银行的十元钞票底版则仍然

留在北京。现在，令张作霖为之愤恨的正是由彭相亭所保管的“一二大洋汇兑券”钞版发生了问题，所以一再电令军法处长常荫槐对彭相亭严加审讯，然而彭相亭却大喊冤枉，死不承认。

不久，直奉战争形势开始对奉军有利，张作霖与财政厅长王永江专车返回奉天。次日，即在奉天大南门张作霖帅府旧址提审东三省官银号经理彭相亭。彭还是大喊冤枉，拒不承认盗印伪钞之事。

张作霖只得命令将在案犯押来与彭相亭对质。彭相亭一见此人就发誓不认识他，而嫌疑犯却一口咬定：彭相亭如何与他在宽城子结识，又如何将伪钞交与他到处散发，以图扰乱金融市场等，甚至还“交代”彭相亭与他在什么时间，亲手将十万余元“一二大洋汇兑券”（伪钞）寄存南满铁路日野洋行客栈内。张作霖当即派人前往查抄，果然搜到大量伪钞。至此，张作霖、王永江认准彭相亭就是盗印伪钞者，亲自批准将彭相亭打入死囚牢，拟不日行刑。就在彭相亭即将被张作霖明正典刑之时，张作霖接到天津发来的一封密电。

发这封密电的人是东三省官银号天津分号经理刘春轩，他报告张作霖：曲同丰无意中从北洋财政部获悉，大总统曹锟密令财政部印刷局火速盗印东北官银号百元钞五百万元，伪币已开始在京、津、热河及东三省流通。曹锟之所以这样做，除为解决直军军费外，更主要是扰乱东北金融，务请刘春轩尽快将此事秘密电告张作霖。还有北洋政府秘书长王承斌给印刷局长崔承炽的手令：“兹奉大总统面谕：兴军以来，军需孔亟。着将东三省官银号和东北银行钞票，迅即各印五百万，以济军用，缓解燃眉。事关机密，不得泄露，违者决以军法从事……”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大总统曹锟

曲同丰是皖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曾被直军俘虏，为报一箭之仇，后与杨宇霆、张作霖结识，成为挚友。曲同丰从财政部得到消息后，立即由北京赶到天津，秘密约见东三省官银号天津分号经理刘春轩，将此事详细告之，并说：北洋印刷局的工人在盗印东三省官银号的钞票时，也恐怕日后为奉军所知，有推卸不去的罪责，故而在重新制版时，有意在百元伪钞的背面花纹上暗做手脚，截掉一块花纹，留下可供识别伪真的暗记，请张作霖在查

搜伪钞时多加小心，以便能将这批流入东三省的伪钞一一查清，以防祸及东北财政。

张作霖看后，方知是曹锟在北京暗中捣鬼，自知冤枉了老友，当即亲自打开牢门，向彭相亭赔礼道歉，并设宴为之压惊。

1924 年 10 月 22 日凌晨，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前线倒戈，反旆回京，发动政变，囚禁了大总统曹锟。山海关前线直军大败，第二次奉直战争结束，奉军控制了热河及华北等地。

在此之前，张作霖已经获得密报：曹锟在下台之前便将私印的奉币数千万元，秘密派兵押运至天津匿藏。先是密封在天津的兴业银行，后因战事不利，曹锟又密令将这批伪钞藏到英租界日本洋行地下室里。1925 年 3 月初，张作霖到天津后，命令杨宇霆和英国领事馆、英国工部局洽商，于 3 月 10 日将所有匿藏伪币起出，并于 3 月 12 日在天津东亚造币厂将伪币悉数化成纸浆，彻底销毁。张作霖本想惩治伪币的主要制造者曹锟，由于两人曾经是亲家，加之他已经下台，只得下令天津地方高等法庭，将参与贩运伪钞的案犯分别处以重刑。至此，民国年间首次盗印伪钞大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谁在操盘　　江浙财阀之谜

1926 年 7 月，蒋介石从广州出师北伐，不出一年便攻克沪、宁，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除了军事、政治诸种因素外，在经济上倚靠江浙财阀，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当无疑问。但何谓“江浙财阀”？蒋介石是如何与江浙财阀建立联系的？这一直有争议。

史学界一般认为，“蒋介石原籍浙江宁波，他早就认识了几名上海资本家当中的浙江帮头面人物，最著名的有张人杰（静江）、虞洽卿和王震（一亭），蒋介石和这些人的联系，是由他早期资助人陈其美介绍的，陈曾是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地区的军事领导人。他在 1916 年逝世前，把蒋介石介绍给有名的商人、孙中山的亲密支持者张人杰和曾一度担任过浙江财政厅长的周佩箴。1920 至 1921 年间，当蒋介石在政治上失意时，曾利用他和周、张的关系，在上海做过证券交易经纪人。因此，1927 年 3 月蒋介石与上海财阀中的主要人物接触是早有渊源的”。“1927 年 3 月 27 日，虞（洽卿）在商业联合会报告他和

蒋介石商谈的情况。两天后商联会的代表会见了蒋介石。表示只要他和共产党决裂，就给予经济支持……1927 年 4 月 1 日与 4 日，商人和银行家垫付了第一笔为数三百万元的短期借款”。

以上论点表明，蒋介石与浙江财阀取得联系，主要是靠张人杰（静江）、虞洽卿等人的力量，张静江、虞洽卿即代表江浙财阀。

还有一种说法，即江浙财阀是张嘉璈、陈辉德、李铭、钱永铭四人。张嘉璈（号公权）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陈辉德（字光甫）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李铭（字馥荪）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钱永铭（字新之）为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

这四家领袖银行实力雄厚，控制了上海银行公会二十二家会员银行中的十四家，1925 年，这十四家银行掌握着全部会员银行资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四。

1915 年 6 月 16 日，“国务院电令中国、交通两总行，自即日起，对所有两行发行之纸币，及应付之存款，一律不准兑现与付现，并饬令将中国、交通两行总分行所有现金准备，一律封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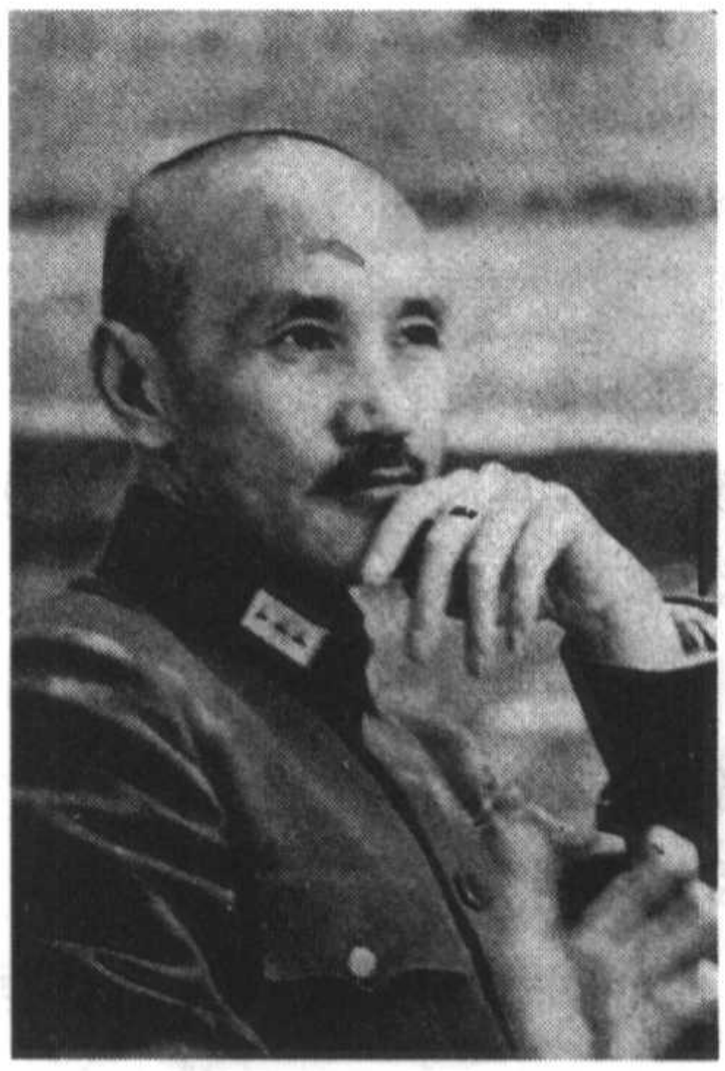
北京政府发布的“停兑钞票，止付存款”的命令，影响到所有在中、交两行及分行所有股东与存款者的利益，特别是依赖银行才能生存的江浙地区工商业大股东的利益。如照此执行，“中国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而中国整个金融组织亦将无由脱离外商银行之桎梏”。于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总经理张嘉璈与总经理宋汉章紧急商议后，立即与其他三家领袖银行磋商对付的办法，在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葵初、常务董事蒋抑卮、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李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及大股东刘厚生、大实业家张謇等支持下，决定抗令。同时张嘉璈还取得上海汇丰银行、德华银行等外国银行经理的支持，并得到北京公使团的首肯后，毅然宣布“为维持上海金融市面，保全沪行信用起见，已联合全体股东，公请律师代表主持沪行事务，督饬该行备足准备，所有钞票仍一律兑现……沪行所有存款，均一律届期照付”，公开抵制北京政府的停兑令。6 月 19 日，上海中行兑现风波平息，这不仅是上海分行经济上的一次胜利，也是江浙财阀向北京政府要求政治上的分庭抗礼的一种表现，它显示了江浙金融财团左右政局发展的能力。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战频仍，兵连祸接，民不聊生。每当战事发生，首当其冲便是金融业发生恐慌，挤兑风潮不断。而且军队搜刮现金，勒索借

款，抢劫银行，导致金融业停滞破产的情况甚为严重，不能进行正常的经营业务。对此，张嘉璈深恶痛绝，希望有个安静的和平环境来建立中国现代化的金融组织。因此，他把目光投向了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国民政府，而帮助张嘉璈与广东国民政府拉上关系的关键人物是黄郛。

黄郛字膺白，早年留学日本东京振武学校，结识蒋介石与张群。辛亥革命时，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他与陈其美、蒋介石为“盟兄弟”，在北京政府内阁中任过外交、教育总长和代理国务总理等职，后蛰居天津。

张、黄二人过从甚密。每当政潮起伏之际，张嘉璈都前往问计。在黄的努力下，张决心资助南方革命政府。1924 年 8 月，广州大元帅府任命宋子文为中央银行行长。其时，广州市面金融混乱，中央银行因没有充分的准备金而滥发纸币，造成兑现竭蹶，通货膨胀等现象。宋子文派人赴香港，与中行香港分行经理贝祖诒商借部分现金。贝祖诒向总行副总裁张嘉璈请示，张嘱贝祖诒亲往广州与宋子文面谈。宋子文提出借款二百万元，经张嘉璈同意后，贝祖诒先期借给宋子文五十万元。广州中央银行得到这笔款项后，有了基本的准备金，纸币逐渐流通，金融得以维持，从而实现了财政统一。正因如此，1926 年 7 月当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宋子文电令出发各部队：“我军到达各地，当加意维持中国银行。”当时，张嘉璈也正准备策应北伐，他藉口就近指挥南方行务为理由，以中行副总裁名义前往上海。



蒋介石戎装像

1926 年 9 月初，国民革命军进入江西时，急需军饷。部队到达赣州后，当地商民只认银元和中国银行发行的能兑换银元的钞票。当时，上海及东南各省在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统辖之下。一方面，孙调动大军，准备入赣与北伐军殊死搏斗；另一方面，他残酷镇压五省境内的人民反抗，收缴上海商团武装并严密注视金融界的举动，禁止资金外流。张嘉璈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秘密汇款到赣州前线银元三十万，极大地支援了江西战场。

1926 年 11 月，蒋介石进驻南昌以后，又得到中行南昌分行的支持，北伐

军遂得以获胜。孙传芳狼狈逃回南京，除扩军备战外，对辖区内更加严密控制，张嘉璈又秘密拨汇二十万元给蒋介石，而孙传芳仍旧懵然不知。

是年底，蒋介石特派张群至天津黄郛处，请黄郛出山，黄决定南下助蒋。临行前，张嘉璈指示北京总行，让黄郛携带密函，令汉口分行经理汪翊唐在蒋的北伐军抵达汉口时，凭蒋介石总司令部公函，可借支一百万元。此款后在上海支付。黄郛到了南昌后，向蒋介石提出要与江浙财阀合作。

在北伐军出师广州至上海的这段时间里，蒋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共计获取一百五十万元军费的支持，对于顺利进军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1927 年 3 月 26 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后，立即成立苏沪财政委员会，罗致江浙财阀及银钱业、商会代表为委员，并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为主任委员，同时任命前交通银行协理钱永铭为财政部次长，实际负责部务。苏沪财政委员会的权限范围经中政会议决："江苏及上海财政完全由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负责办理……所有江苏全省原有中央直辖财政收入，应均解缴本会，其属于旧财政厅所有各项收入，应均解缴南京本会办公处，分别接收，概不得擅自拨支。"

一句话，所有的赋税均由苏沪财政委员会统一收拨，尽管如此，每月所有各项收入相加不足五百万元，根本不够维持一个政府及其军队的庞大开支，因此需要发行大量公债。

同年 6 月 1 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行以上海海关"二五"附加税作抵之国库券三千万元，月息七厘。本息自 1927 年 6 月开始，分三十个月还清，设立基金保管公库，复由政府委员三人及上海银钱两业暨商业商会等团体公举保管委员专司其事，以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为主任委员，江浙财阀的主要成员几乎都参与了支持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经济活动。



张静江与妻子朱逸民

这次发行"二五"国库券，金融界首当其冲垫款一千三百万元，并在其中认购五百万元。但认购库券的行动遭到了部分外国银行、厂家、公司的抵制，因此，不与新政权合作的资本家被定为资助军阀、奸商等罪名而遭逮捕，如上海与无锡的棉纱、面粉

大王荣宗敬就是一例，当他捐款二十五万元给政府后，便得到释放。

因此，如果没有江浙财阀在经济上的支持、帮助，国民政府是维持不下去的。1927 年 9 月 15 日，钱永铭在报告中说："自国府成立以来，军政所需，支出达四千余万元之巨，财政部筹款异常困难。幸赖财政委员会诸君，暨银钱业、商会各界协助，得以发行二五库券于短期内募集足额。此外原拟再发盐余库券，因江北经敌军扰乱，盐税未能统一，故议而未行，仅以垫款抵押品，按所发二五附加库券收入二千万余元，银行垫款一千三百万元，其他各项收入只一千余万元，军费支出占去四千一百余万元。"收支约略相当，这种财政状况，要维持一个政府，完成统一大计，是不够的。

1928 年 1 月 7 日，宋子文就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当时国民政府每月收入不足三百万元，而军政费开支需一千一百万元。1 月 10 日，宋子文提出发行第二次海关二五附加税国库券四千万元，利息八厘，前两年付息，四年四个月本息还清，由上海金融业承受，先行垫款，而此次又是以中国银行为首的几家银行摊派的百分比最大。

由于库藏支绌，同年 3 月 27 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卷烟税为担保的国库券一千六百万元，利率月息八厘，三年七个月还清。而负担此项库券垫款的仍然是江浙财阀，中国银行又作为认购之大宗。

以上事实说明，在北伐战争前后，张嘉璈等江浙财阀有力地支持了广东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没有江浙财阀，也就没有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



张静江的故居在浙江南浔

强取豪夺　中国银行被吞并之谜

1935年3月28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训令中国银行，在该行原有股本二千五百万元，官股五百万元的基础上，新增官股二千万元。30日，中国银行股东大会通过此项部令，并根据其指示，宣布原董事长李铭、总经理张公权辞职，由部派宋子文为董事长，宋汉章为总经理。中国银行的这一改组，标志着中国金融界最大的民族资本商办机构已经被国民党政府控制。

国民党政府这一举动让中行股东大为震惊，其手段之露骨，已经到了不顾社会舆论的地步，也因此引起了诸多猜测。当时美国《密勒氏评论报》曾认为，这是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为推行他的财政赤字政策所采取的行动；也有人认为这是以宋子文为代表的亲英美势力对政学系的打击，因为张公权本人就是政学系重要人物之一。（见《关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见闻》，载《文史资料选辑》十一辑）

其实，身为漩涡中的人物张公权对此事也有过分析：财政部决定派宋子文为董事长，调自己为中央银行副总裁，而与中国银行情形相似的交通银行人事则未予变动，“显见其中尚有人事关系”，牵涉进了私人的好恶恩怨。关于这点，他在该年4月1日的日记中又一次明确指出：“此次中国银行增加官股与变动人事，于三月中旬，孔宋两先生自汉口归来，方始知之。因在行二十三年，几于年年在奋斗中过生活，与事斗争，即不免牵入人事恩怨……眼看国难近在眉睫，何可因小愤而害大局，且因人事斗争，更难登大雅之堂。”

张公权所指的“人事恩怨”究竟是什么？有一篇名为《1935年中国银行改组及蒋介石与张嘉璈的矛盾》的文章认为，实际上指的就是他与蒋介石的矛盾。而中国银行的突然改组，即为张、蒋矛盾激化所致。

张公权是当时中国金融界的巨子，特别是因为1916年领导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抵制北洋政府停兑令而闻名于金融界，他也是蒋介石曾倚为财政支柱的江浙财团中一位重要人物，与蒋介石的关系一度也很亲密。早在北伐战争前，张公权和中国银行就以实际行动给予广东革命政府以同情和帮助。1924年8月，广东政府为筹措军费而成立中央银行，为了提高银行的新纸币信用，张公权曾指示中国银行借款五十万，以助中央银行走好第一步。北伐军抵达赣州时，需款甚急，又是张公权设法在上海汇寄三十万元巨款。此举对张公

权及中国银行来说是承担风险的，当时孙传芳正在南京调动军队与北伐军决一死战，而上海也在孙的控制范围内，如若被孙传芳察觉，立刻大难临头。

蒋介石对张公权也很笼络，北伐军出发伊始，就电令各军对沿途之中国银行一律保护。蒋介石到达上海后不久，张公权因母逝而居丧在家，蒋介石也降尊纡贵，亲往张宅吊唁，以示优宠。平时也常和包括张公权在内的其他金融界巨子一起讨论财经政策。

随着蒋介石逐步稳定了自己的统治，蒋与张公权的矛盾也逐渐产生并扩大，这也表现为官僚资本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蒋、张之间的矛盾产生有以下几条具体原因。

其一，经济上的掠夺与控制。蒋介石到达上海后，很快就向上海资本家强征硬索，中国银行则首当其冲，比如发行了大量公债，均由金融界承受，先行垫款，张公权当着蒋介石的面就大叹过苦经，甚至表示不能事事都如蒋介石的意，这种不甘驯服的态度是让蒋介石不能满意的。

为了达到控制和吞并中国银行的目的，国民政府还计划将中国银行改为中央银行，这也遭到了张公权的坚决反对。他认为，多少年来，中国银行这块招牌已经深入人心，是一笔无形资产，如果改为中央银行，则改变其一贯坚持的独立精神，随长官意志为进退，不久必将被摧毁。

其二，私人感情的恶化。张公权长期在金融界高层工作，对蒋介石常流露出来的江湖习气不能习惯。北伐开始时，张公权本答应蒋介石，到达汉口时如需用款项，可向中国银行预支一百万元，后因军事发展迅速，这笔钱未提现。蒋介石到达南京后，派军需处长俞飞鹏去上海中行提取以前所允之款，但上海分行因为不清楚此事，故向俞飞鹏索取担保，遂引起蒋介石大怒，竟将借款增加到五百万元，还命令俞飞鹏在上海银行经理办公室内坐索，后虽经张公权解释并将一百万借款照付了事，但蒋这种近似无赖的作风颇令张公权不满。

作为一名金融巨子，张公权自视甚高，因此在与蒋介石的交往中往往口不择言，态度傲慢，也引起了蒋介石的强烈不满。比如在一次谈话中，张公权因对蒋介石与各派军阀互相倾轧混战表示不满，就引起蒋介石的猜忌，担心他有勾结桂系与奉张的可能。更有甚者，在 1928 年 9 月，蒋介石电邀张公权去南京见面，张公权因担心蒋介石委任他为财政部长，故复电拒绝。这一抗命行为让蒋介石大怒，随即从南京赶到上海，召集留沪中央委员开会，提出查封中国银行并准备下令对张公权进行通缉。此事后来虽经人调停而消弭，但

两人的感情却产生了很深的裂痕。

其三，财政政策上的分歧。由于连年内战，军费开支庞大，政府财政拮据，国家预算无法平衡，只能通过赤字开支政策来筹措所需军费，诱使银行界转向购买政府公债以谋取利润，这种投机现象对恢复生产极为不利，并且酝酿着金融风险。因此张批示中国银行着手抛售政府公债。

以上种种，促使蒋介石采取断然手段驱逐张嘉璈（字公权），1935 年 3 月 22 日，蒋介石密电孔祥熙，称："国家社会皆濒破产，致此之由，其症结乃在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能统一，其中关键全在于中、交两行固执其历来吮吸国脂民膏之反时代之传统政策，而置国家与社会于不顾；若不断然纠正，则革命绝望，而民命亦被中、交二行所断送，此事实较军阀割据破坏革命为尤甚也。今日国家险象，无论为政府社会计，只有使三行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乃为国家民族惟一之生路。务望转达林主席、汪、孙、于、居、戴诸公，坚持主张，贯彻到底，以救垂危之党国。闻中行总经理张公权君有意辞职，弟意应即出劝其决心完全脱离中国银行关系，而就政府其他任命或调任。"

至此，谜底似乎已经明了，但仍有人提出质疑，侵吞中国银行是一个复杂的经济行为，蒋介石作为一个经济上的外行，是拿不出一个具体的方案的。然在他发出密电前，胸中显然有了腹稿，这个制订方案的人才是促使蒋介石拍板的关键人物。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显然还有深入开展的必要。

以权谋私　　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之谜

1944 年，傅斯年在重庆的参政会上，对行政院院长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之事提出了质询，从而引发了一场政坛大地震。蒋介石亲自出面请傅斯年吃饭，希望他收回提案，但被傅拒绝。最后，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下台，随即远离政治中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政府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军事攻击，为了稳住中国的抗战局面，使之牵制更多的日军，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同意借给中国政府五亿美元贷款。1942 年春，中美两国政府正式签订协定。行政院长孔祥熙决定以三亿美元向美国购买黄金，存在美国；一亿美元作为发行美金储蓄券

的准备，一亿美元作为发行美金公债的准备。储蓄券和公债券都按照商汇牌价用法币购买，汇率是二十元法币折合到美元。

孔祥熙大肆宣传："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人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并向储户许诺，等抗战胜利后，向储户兑还美金。

公债发行的最初阶段很不理想，只有少数人购了一些债券，政府遂以配额方式强制各地推销，已购者见此，纷纷又折本抛售手里的债券，想尽量减少些损失。这样一来，在黑市上，美金公债一度由官价二十元跌到十六七元。有些奸商虽然握有大量游资，但将投资领域的重点放在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上，以此途径来大发横财，也不愿意去购买美金公债。因此，从1942年冬季开始，到1943年9月为止，实际售出的数额仅为五千万美元左右。1943年"双十节"前，情况却悄悄地起了变化，由于国民政府滥发纸币，通货恶性膨胀，法币币值日益低落。美金公债券价值开始日渐回涨，由十七八元购买到一美元公债券，涨到二十多元，在两个星期之内，又涨到了三十多元，其势头仍旧继续看涨。

10月14日，孔祥熙接见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郭锦坤，嘱咐以美金公债全部售完为名，将剩余的五千万美元公债由业务局全部吃进。



孔祥熙

郭锦坤心领神会，立即往各地下达命令：一律停止销售美金公债，并授意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立即转令各省中央银行分行，迅速将各自未曾出售的剩余美金公债如数归解国库局。孔祥熙面谕吕咸，以犒赏行里推销公债的有功人员为名，从中拿出一部分售给国库局职员；又以调剂行中同仁生活为名，从中拿出一笔分给中央银行内副处长、副局长以上干部。并指使手下做假账，以假名、假地址的方法，制造套购美金公债的迹象。一旦事发，也无法核对验证。吕咸等人第一批购买美金公债券金额三百五十万四千二百六十美元，照官价折合法币七千零八万五千二百元，全部送给了孔祥熙一人。第二批又购买七百九十九万五千七百四十美元，按照官价折合法币一亿五千九百九十一万四千八百元。此后，又分两批先后购买了一千五百

三十万美元和七百十万美元公债。半年内，五千万美金公债全部被鲸吞完毕。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外界先是传闻中央银行职员私分剩余美金公债，到后来，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的消息也传了出来。重庆几十家报纸的记者纷纷跟踪报道此事。由于新闻界的介入，舆论大哗，国民政府不得不把郭锦坤、吕咸等人抓捕查办。所以没有多久，傅斯年等人就基本了解到案件内幕。他与参政员黄炎培商量后，又联络到陈赓雅等参议员，决定在参政会上公开揭露孔祥熙贪污美金公债案。他与陈赓雅等人把有关材料集中起来，拟成提案，提交大会秘书处。

大会主席团成员、外交部长王世杰害怕事情扩大，出面找提案人和联署人谈话，劝傅斯年不要把此提案正式提出。王说："案情性质尚属嫌疑，若政府调查事实有所出入，恐怕对提案人、联署人（大会规定，提案须有五个以上参政员联署才能成立）以及大会信誉都会有损的。傅先生是否再考虑考虑，拟请自动撤销，另行设法处理？"

"此案证据确凿，必在会上提出，王部长不必劝了。"傅斯年坚定地说。

王世杰将此事向蒋介石侍从室报告。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遂向蒋介石报告了此事，说："参政员提案，孔院长鲸吞美金公债，当此困难时期，孔趁火打劫，置国计民生于不顾，实在太失公职人员体统。"

蒋介石说："这事很糟糕，庸之只好辞退，所吞美券只好分期吐出。但是不宜在参政会公开提出，一列入提案，对友邦将造成极坏影响，对我们抗战将不予继续支持。"他要陈布雷以新闻界前辈身份给参政员说一说这种利害关系，将提案改为书面检举。

陈布雷遂去见傅斯年，违心地按蒋介石的意思说明："傅先生此提案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美、英、苏等友邦更会认为我们堂堂民国实乃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很可能不继续予以支持，那么，后果之大，就不堪设想。前此不久，想来傅先生也是知道的，那就是政府决定黄金加价，被财政部高秉坊泄露，掀起轩然大波。高秉坊虽说被查办了，可友邦朝野人士啧有烦言。现在大舞弊案发生，必然会引起友邦的更大失望与不满，这点，想来也不是傅先生与各位参政员所愿望的。"

傅斯年历来敬重陈布雷的人品，而陈的分析又不无道理，傅不得不做退后一步的考虑："请问陈主任，那么尊意以为如何办？难道能让此等人大发国难财？"



这座欧洲式花园住宅位于上海永嘉路，它的主人是孔祥熙

“我想是否可以将议案改为书面检举，由主席团负责人亲交蒋主席查办，相信蒋主席是会严办的。这样既可达到查办目的，也可照顾到影响。”

傅斯年表示要考虑考虑。但傅斯年要揭露孔祥熙的事在社会上传开后，很多人为他担心，连远在美国的胡适也专门写信劝他，停止抨击孔祥熙。傅斯年回信给胡适，表示一定要揭发孔祥熙。

1944年9月7日，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对孔祥熙提出了质询：“中央银行可以说是一个谜，因为许多情形我们不知道，不过里面山西同乡很多。这个银行究竟是国家一个机关，抑是私人的结合？是国家的组织，何必一定用山西人？我们希望中央银行国家化、机关化，还有关于账目也要查明。”

“黄金问题。我们知道去年黄金发售，裕华银行买了大批黄金。他卖出来金价高，买进金价低，这是重庆社会上都知道的。上两个星期，黄金停止出售，而黑市高出一万。美国借给我们的黄金，据孔副院长报告，这个黄金用飞机运到后作调剂金融之用，请财政部报告美国的黄金运到多少？要卖的多少？以及每周出卖的情形与以后还卖不卖，运不运？我们觉得，对于美国借给的黄金应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不能枝枝节节为私人发财之用。”

“黄金储蓄券。去年大家知道，市场固然有这个东西，据孔副院长说，过去很少买。可是有人过去曾买过却没有买到，而孔副院长最近出国前，以大批储蓄券分送给人。这券是国家的，不能分送给人，这种情形是否有对国家大员行贿之嫌？”

“我刚才所询问的一切对本会负责，对会外也负法律责任。我坚决要求对我上述所提出的四点予以彻底清查并报告本会驻渝委员会。”

对傅斯年的质询，财政部不得不硬着头皮进行答复说："黄金储蓄券初发行时，多方劝募，购者甚少，嗣因涨价，又争先恐后，此系社会人心关系，一则发财念切，一则可以觇其希望胜利之信心。买不到者，或因步人后尘；买得多者，当系捷足先登。至分送黄金储蓄券一节，并无此事。"

蒋介石则请傅斯年吃饭。席间，蒋介石问："傅先生信任我吗？""我绝对信任。"傅斯年回答得很干脆。

"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委员长也就应该信任委员长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说到这里，傅斯年有些激动起来，在座的人都为傅斯年捏了一把汗，蒋介石虽然不悦，只得说："吃菜，吃菜！"

1945 年，傅斯年再次联络部分参政员，向国民参政会提交《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积弊，严加整顿惩罚罪人案》。傅斯年等人在提案中说："中央银行实为一切银行之银行，关系国家之命脉。然其组织直隶国府，不属于财政部或行政院，历年以来，以主持者特具权势，道路虽啧有烦言，政府并无人查询。而一有事实暴露，即为触犯刑章。如黄金案主角郭锦坤已在法院取保矣，而国库局私自朋分成都未售美金公债一案，至今尚未送法院。由此例之，其中层层黑幕，正不知几许。至于中央信托局，亦每以触犯刑章闻。如前者之林士良案，今者黄金案中钟锷、王华以下皆涉及。此等机关如不彻查严办，必不是以肃国家之政纪……"



南京高门楼 80 号，也曾是孔祥熙的公馆

在傅斯年的穷追猛打下，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免去孔祥熙的职务，改由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院长。据后来联邦调查局向美国政府的报告，白宫前后援助蒋介石共计38亿美元，被孔祥熙、宋子文先后共贪污了7.5亿美元。

上下其手　　黄金风潮之谜

1942年，美国政府向重庆国民政府主动提供了五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以支持中国战时财政。国民政府用其中的三亿美元向美国购买黄金，约合市两五百六十九万两。加上孔祥熙早先购存美国的价值二千万美元的黄金，中国政府在美国共存放了约六百万两的黄金。1945年3月因私分美金公债，导致了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下台。1946年因为黄金风潮，导致了宋子文的下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944年，存放美国的黄金转运印度加尔各答，陆续经驼峰航线空运回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财政部与中央银行随即于当年9月开始举办“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即储蓄人按当日牌价在银行存款法币，到期可以提取黄金。

1945年3月28日下午，财政部长俞鸿钧召集中央银行等各重要行、局的负责人，宣布从3月29日起，黄金储蓄价格从原来的每两两万元提为三万五千元。此时，重庆各银行已经打烊，第二天又是黄花岗起义纪念日，照例各单位停止办公，所以财政部认为是不会出什么漏子的。但是，内部有人事先泄漏了消息，当晚，各银行、公司、企业、机关互相串通，连夜办理黄金储蓄业务。有的单位因时间短促，筹不到现金，竟用空头支票、银行间互相流通的本票订货，一夜之间，售出黄金万余两。

第二天，这桩抢购黄金风潮一经新闻界揭露，轰动重庆。当局被迫宣布核查，结果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锦琨因泄漏消息被判刑三年半，中央信托局业务处经理王华因为局中女同事哭闹，大家合伙舞弊购买黄金事泄露，亦被判刑。另外一个被审判的主角是中央信托局经办黄金储蓄的主任戴仁文，他用公家存款购入黄金五十两。财政部总务司司长王绍斋也被揪出判刑。

但是，时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的杜月笙购入的黄金更多，事发后避往安徽屯溪。俞鸿钧的亲信秘书、大业公司经理李祖永在宣布加价的当天购入黄金三千三百两，在有关方面的庇护下，不予追究。中央信托局局长钟锷也

是“从缓处理”。

由于此次黄金风潮，行政院长孔祥熙被迫辞职，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下令凡购买黄金存款的储户，一律“捐献”四成给国库。当时，“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共二百二十万两，国库得捐献八十二万两。有不少大户得到消息早将黄金提走，被迫捐献者多是中小储户，很多人血本无归，纷纷破产。对于这种巧取豪夺、不守信用的行径，美国的舆论给予了强烈的抨击。为挽回民心，国民政府于1945年6月停止黄金储蓄，并禁止黄金自由买卖。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量日伪资产和美军剩余物资，价值达一百亿美元以上，又将实际为一比二十五的法币对伪中储券比价改为一比二百五十，捞取了不少于一百亿美元的不义之财，大量回笼了货币。宋子文组织黄金价格评定委员会，逐日公布买卖价格，指定中国银行在重庆买卖黄金。到1946年2月28日止，共买入六十八万余两，卖出二十二万余两。

然而，一时得到平抑的物价仅维持了短暂的时间，又呈现急速上涨的势头。社会游资纷纷转入流通领域，大肆抢购物资，囤积居奇，逐渐形成了投机风潮。美国顾问杨格向宋子文建议，向社会大量抛售黄金现货以回笼货币，稳定物价。1946年3月4日，中央银行开始在上海出售黄金。

中行总裁贝祖诒、业务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选择了三家金号，即同丰余、太康润、大丰恒和两家银楼方九霞昌记及杨庆和发记作为抛售黄金的代理人，以两种方式向市面抛售黄金。一是明配，每天上午十点，由业务局公布牌价，上述五家金号、银楼申请当日购进的黄金数量，由央行配给，下午收市后，各配售金号、银楼将价款上交国库；二是暗售，当时市场抢购黄金之风甚烈，明配的黄金总是不敷需求，于是有黑市的产生，中行就按最高黑市价格委托上述几家金号、银楼向市场抛出大量金条，以压制黑市。当时五家金号、银楼的总资本为六千七百七十万元，从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黄金停售为止，共售出黄金八百五十万两，以1946年3月每两平均价一百五十六万计算，值十三万二千六百亿元。



1946年的黄金风潮，导致宋子文下台

詹莲生是上海金业同业工会主席、同丰余经理，他是抛售黄金的主办者，其余四家的

配售、暗售额均由他决定。每天中行决定牌价后，林凤苞、杨安仁就用专线电话通知詹，詹就这样操纵了市价，上下其手。詹莲生还捞到改铸金条的肥差，当时中行库存金条都是四百两一块，市面上出售的是十两一条，贝祖诒就以每条三分的火耗委托詹莲生改铸。据詹自己后来承认，每天可得二百四十两火耗，总共得了八万六千两之多，自然少不了有关当权者的好处。詹在 1946 年 3 月到 1947 年 2 月的一年中，总共经销四百五十万两黄金，除了火耗，还有三分的利润，又得了十三万五千两左右，赚进巨额黑钱是可以想见的。

原来，同丰余的后台老板是徐补荪，他才是上海金业中的真正老大。詹莲生和贝祖诒是苏州同乡，又是亲戚，贝祖诒是宋子文的亲信，宋担任行政院长后，又任命贝为中央银行总裁。林凤苞、杨安仁则是贝任职中国银行时的亲信。他们上下其手，沆瀣一气，结成了一张关系网，在黄金抛售中翻云覆雨，从而直接引发了黄金风潮。

从 1946 年 3 月开始抛售黄金后，直到 6 月，价格波动不大。但自 1946 年 6 月下旬，国民党部队进攻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挽救财政危机，依靠滥发纸币来支撑局面，导致通货膨胀，人们纷纷抢购黄金以自保，造成黄金销售价格迅速上涨，使五家金号、银楼售出更多的黄金，于是黄金库存日渐减少，外间听说消息赶紧抢购，价格于是不断攀升，形成恶性循环。

到了 1947 年 1 月中旬，上海中央银行国库库存金块终于售罄，宋子文命令用运输机将重庆库存的厂条也运来抛售，市面见渝条出现，知道国库黄金已临枯竭，更加疯狂地抢购，价格攀升到五百三十三万元，宋、贝见形势不妙，于 2 月 8 日下令停止暗售。暗售一停止，黑市无人压制，直窜而上，竟达一千万元之巨。由于黄金抛售只在上海一处进行，其他各地只有牌价，买金人在当地中央银行交款登记，随时到上海领货。央行宣布停止暗售后，各地牌价比上海高出二百万元左右，于是，各地投机者纷纷赴沪抢购。广州、重庆、武汉、南京、北平等大城市到上海的飞机常常被包占，以至机票价格也同黄金一起飞升。

各大公司、大企业停止生产，把所有的资金拿出来搞黄金投机，而且还向四行大量贷款，从 1946 年 3 月到 1947 年 2 月，四行贷出此类“生产贷款”六百五十亿元，其中 1946 年 12 月一个月中就贷出五百六十亿元，各行对这些贷款的用途未作核查，使得无论抛出多少黄金，市场购买力仍然保持旺盛势头。

在抢购黄金的带动下，市面上又兴起抢购美钞外汇狂潮，仅 1947 年 2 月初的十一二天里，美元价格就涨了一倍半。美元抢购与黄金抢购互相攀升，

使美元、黄金库存急速减少，到1947年2月中，黄金只剩下二百三十余万两了，美元则濒于枯竭。蒋介石此时才明白，他的舅子几乎要把国库掏空了，于是大发雷霆，中央银行被迫于2月15日正式公告停止抛售黄金。

1947年2月1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宣布禁止黄金及黄金制品在市场买卖，禁止黄金作为货币在市面流通，冻结黄金价格。并决定由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等组织调查团，调查军人在此次风潮中挪用军费抢购黄金情形；由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组织“经济监察团”，调查商民投机倒把，违反金融管理规定的行为；由何汉文、谷凤翔、万灿、张庆桢四监委调查公务人员贪污渎职的情形。

何汉文等四监委对詹莲生和同丰余进行调查，发现同丰余做如此大的买卖，连账本都没有，平常到中央银行领收黄金，并不按规定用现金缴款，而用支票；到国库领金，没有填写有关票据；董事会名单中还有两个假名不知何人；2月8日最后一次抛售黄金时，同丰余承购五百四十条之多，上交价款中有一张二十五亿元的票据并未兑现，又没有换成转账申请书以便日后兑取。四监委再向上海社会局查核，发现同丰余居然未经注册。四监委决定以詹莲生为突破口，詹对高达二十余万两的火耗和销售利润直言不讳，对黄金交易的内幕也当趣事来讲。杜月笙即派他的徒弟、军统少将特务、立法委员王新衡请何汉文吃饭，劝何汉文不必太认真，不妨把笔录改改，叫詹莲生拿出二百根条子来打点打点，大家都很方便，并说他转达的就是杜月笙的意思。



杜月笙

何汉文抓住狐狸尾巴后，决定对詹莲生等人继续调查，不久，将黄金风潮案中的舞弊情形送交上海地方法院。在全国舆论的压迫下，法院判詹莲生十二年徒刑，判林凤苞、杨安仁七年徒刑。

不久，监察院数十名监委由何汉文领衔，又提出了弹劾宋子文、贝祖诒案，并将宋、贝玩忽职守，收受贿赂，勾结商界人士以牟取暴利的调查报告全文公布。立法院院长孙科召开立法院临时会议，召来宋子文、贝祖诒进行质询，立法委员对其展开了尖锐抨击。宋子文恼羞成怒，中途退席。贝祖诒见形势不妙，就把责任往宋子文、林凤苞、杨安仁身上推，并抖出了许多内幕。

监察院、立法院虽然掌握了宋子文失职的材料，去征询蒋介石的意见，蒋批示道："事到如今，有何办法！"原想包庇宋子文过关，因为他手上有美国二十亿美元贷款，这笔贷款是抗战末期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向当时任中国驻美采购团团长的宋子文承诺的。当时预计，对日战争必将持续一段时间，这样，中国战场就具有牵制二百万日军的重大战略价值。没想到原子弹和苏军出兵东北使日本迅速投降，中国战场没有太大的价值，于是中美二十亿美元贷款谈判就此陷入僵局。后来蒋介石见贷款希望渺茫，于是决定罢免宋子文，也好对国内外舆论有个交代。



立法院长孙科

1947年3月，蒋介石批准了宋子文的辞呈，派其去当广东省政府主席。但轰动一时的黄金风潮案并没有就此降下帷幕，不久，监察院调查了宋子文贪污外汇和侵吞美军剩余物资的事实，再次对其提出弹劾，宋子文最终避走美国。

内部作案　币制改革泄露之谜

1948年8月20日，国民党当局颁布了币制改革方案，用金圆券代替发行多年的法币，但由于事先被泄了密，有神秘人物在头一天抛出了手中大批股票，利用币改大发横财。一经报端披露，引起全国舆论大哗。这事件又是怎么发生和了结的呢？

1948年，国民党军事力量同人民解放军相比已渐处劣势，而维系国民政府命脉的经济体系由于法币的破产亦渐趋崩溃。国民政府长期以来由于滥发法币，到1948年8月，法币流通量已达六百四十万亿元，是1937年6月流通量的四十五万倍，国民党政府为挽救危局，决定实行币制改革。

8月2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王云五在南京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政府从即日起实行币制改革，用金圆券代替法币。他一再强调：币改早有准备，

却未透露一点风声，直到公布，大家才知晓。这是社会的进步，政府的进步！然而，一桩惊天大案已经发生了。

第二天，《大公报》上一条消息震惊了全国。在大标题“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下，添加一条“豪门巨富纷纷搜购金公债，隐名之人曾大批抛售”，消息说：“19日上午，有某隐名之人从南京乘夜车抵沪，下车后直至某熟悉证券号，一个上午向市场抛售三千万股永纱股票，照昨天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大约可获利四五千亿元。”全国各大报纸争相刊登有关消息。

风声传开，王云五坐立不安。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林崇墉和刚到上海任上海区经济管制副督导员的蒋经国震怒不已。南京政府亦深感事态严重，任凭谣传发展下去，刚发行的金圆券信誉岂不毁于一旦？

财政部给上海金融管理局和上海交易所监理员办公处接连下了几道密电：事关行政纪律，无论是否事实，均应彻查查究。该案报载既有具体日期、地点、种类、数量，根据此项线索严密追究，并从多方彻查，必可求得真相。合行电仰该局长、该监理员克日严密查究，务将事实真相于电到三日内详细报部，不得稍有隐纵为要，并加派周德伟参事赴沪，会同侦查。

8月26日，南京检察院也签发了“宪机字第五六七五号通知”，委派唐鸿烈、孙玉琳两委员火速赶赴上海，急查《大公报》所载“隐名之人”真相，以正视听。

唐、孙二人于次日晨抵沪后，顾不得旅途劳累，驱车直奔上海路二一二号《大公报》经理部。李经理一见来者，知道事情闹大了，遂告知此消息乃本报记者季崇威采访所得。当晚，唐、孙寻到季崇威，晓以利害，希望合作。哪知这位“老记”软硬不吃，唐、孙二人终无收获。

此时，财政部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理员王鳌堂也急忙与《大公报》联系，并驱车亲自拜访该报老板王芸生，查寻消息来源，未获线索。王监理回去后召集下属商量对策，最后决定立即召见证券交易所各经纪人询问，进行账目检查，但仍无结果。

财政部上海金融管理局一方面派人到证券交易所调查8月19日各经纪人证券买卖情形，另一方面先就20日沪报所载19日证券市场交易过程中有卖出股票之各经纪人分别派员检查，但检查结果各经纪人账内客户委托买卖股票数量并不多，最多的仅八十到五十万股，并无任何违法之举。金管局的官员们推测，“如无巨额抛空，必非场内交易”。便与其他调查机关取得联络，并派精干人员在场外调查，以期获得线索。

8月28日上午，蒋经国召集有关方面在上海市警察局开会，商议破案之事。会议开了一半，突然接南京总统府电令，全文只有五个字：

“限七天破案。”

在座者皆面露难色，蒋经国给大家打气说：“现在看来，肯定有这等事，希望各位同仁通诚合作，互通消息，各位都是有经验的破案高手，相信我们一定能将此事搞个水落石出，给总统和民众一个交代。”

会后，上海金融管理局立即派人与王鳌堂接洽联系，王将调查的当日各经纪人证交数量表记录全部提供给该局。恰巧上海交易所将各经纪人证券成交数量表亦送至该局。两相对照，仔细核查，在上海二百三十七家经纪人中，选择其中卖出永纱股票数量在三百万股以上及其他有场外交易嫌疑的经纪人进行重点检查，共查出五五、八五、九五、二二四、二三五、二〇四、一九〇、二三七等二十二家嫌疑单位。然后，金管局抽调大批精干人员会同上海市警察局，兵分几路前往检查，特别注意有无场外交易及支票存根、送款簿等记载。这次检查大有收获，有场外交易行为的一九〇号经纪人林乐耕浮出水面。他在8月11日和12日两天，买进二三七号经纪人杜维屏永纱股票一千六百万股。

林崇墉一声令下：“马上拘传林乐耕！”警察便迅速拘捕了林乐耕。谁知这位股票市场上做“多头”的老手，由于政府公布币改方案，引发了股市连续下跌，眼见自己股票放水，本就一肚子怨气，于是“竹筒倒豆子”，便将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交代出来。

林乐耕说：“我的证券号自7月份后交易清淡，直到8月16日始有大户交易，因为16日有杜维屏向我抛出一千六百万股（杜抛出我买进），到18、19日杜维屏又抛空，他问我要不要？我说不要。后来杜信屏在19日下午就抛给一六号经纪人泰丰证券号五百万股，除杜维屏抛空外，还有二八号、二三七号、六五号、一四五号、三八号、二三一号等经纪人亦有抛空。另外，我还在市场上听人说，有从南京来沪的某要员将证券交易所要停业的消息告诉杜维屏、盛老七、潘序伦三人。”

杜维屏何许人？此乃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亨杜月笙的二公子，谁敢动他？警察局颇感棘手，只得汇报给蒋经国。蒋经国下令：“不论是谁，都给我拿下！”

9月2日上午，在上海市警察局七楼会议室，检察院检察委员、市警察局、金融管理局及财政部特派员等传讯了杜维屏。上午10时半，审讯开始了，杜维屏带来了下属证券主管邱云峰，以下即为审讯的原始笔录。

“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

“杜维屏、二十七，上海，鸿元证券号老板，住霞飞路新康花园九号。邱云峰，二十八，上海，鸿元证券号经理，住证券大楼四六五室。”

“据我们调查所得，贵号于8月11、12日有永纱股票一千六百万股卖与林乐耕。”

“我不清楚，请问我号中的邱经理，他知道。”

据邱云峰坦白：“19日早晨，未开门即有客户李伯勤携两女人来等候，一开门，每人抛出二百万股，本来本号限制每人交易一百万股，然彼等云愿即付保证金，故允与交易。一抛后即跌停板，故本号亏本甚大。这几个人下午又来了，在和其他客户闲聊中，透露出那个男人是一早由南京赶来的，其中一女子为李伯勤的妹妹，另一女子系北方口音。”

警察立即去李伯勤登记的地址，到后才发现这里并不是李伯勤的家，而是其妹李国兰的家，李伯勤只是长期借住于此。警察在屋内没有搜到李伯勤的踪影。于是将其妹李国兰拘捕，讯问其兄的去向。她只说其兄已离开她家半年多了。后来，警官乐嘉芳从李家仆人处探悉：李伯勤有时寓于复兴路瑞华坊57号其友高祥生家。警察赴高家四周布控，守候李伯勤。通过掏李国兰的口供，将住在湖南路343号中国石油公司宿舍内的另一嫌疑人杨淑瑶也拘捕归案。

几经审讯，李国兰供出她的丈夫陶启明，在南京财政部资料室做秘书。

警察问：“你丈夫18日晚回来和你谈起抛空的事吗？”

“谈过，当时我们大家以为最近报上有变动消息，所以预备做股票，我丈夫表示同意。”

“那你抛空事先你丈夫知道吗？”

“知道的。”

“二百万股赚了多少钱？”

“约二十四亿。”

“你同杨淑瑶是怎么碰见的？”

“我去找她的。”

“怎么开户的？”

“没有开户，我是托我兄李伯勤代开‘兰’户做的，一切手续托他办的。”

在警察局接受审讯的杨淑瑶，生性胆小怕事，警察一问，马上道出了事情的经过：8月19日上午8时许，李国兰来约她去华美做股票，说有消息，这次包赚不赔。上午9点到那里，由李伯勤为她及李国兰开了“淑记”、“兰记”账号。9点

半开市即做好抛出永纱股票的准备，在16450点时抛出一百万股，在16000点时续抛出一百万股，赚到的钱托李国兰存了起来，其他的她一概不知。

案情调查至此，一切都已明了，这个“隐名之人”就是陶启明。

财政部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林崇墉马上接通南京财政部部长办公室电话。当时王云五已下班回家，接电话的是王云五的心腹、该部秘书长徐百齐。徐百齐一边做着笔录，一边淌着汗，等王讲完挂了电话后，他还机械地重复着：“好，我马上呈报部长。好，我马上呈报部长。”

原来，陶启明进财政部是徐百齐保荐来的，币改的消息也是他漏给陶启明的。徐百齐立即去见王云五，向他报告事情的原委。

震惊之余的王云五手书一函，派人交给首都警察厅长黄珍吾：“本部秘书陶启明，据报19日曾抛售永纱股票，该员泄漏公务秘密，嫌疑重大。身为公务人员，竟有如此不法行为，实堪痛恨，应请贵厅即予逮捕，依法究办。”黄珍吾派人去财政部三楼单身宿舍捉拿陶启明，陶不在。王云五又让人事处长吴兴周调出陶启明的档案，取出陶的二寸小照，交给黄珍吾，请警察厅协助缉命。当晚南京警察厅派出警员达千余人之多，在各交通要道、车站、中山码头巡查，以防止疑犯潜逃。其实陶启明并不知道发生的一切，他赴宴去了，到了深夜才回宿舍，当即被带到警察局。

9月3日上午8时，警察开始审讯陶启明。熟知法律的陶启明百般抵赖、狡辩，死不认账。坚持到5日，他终于招出同案犯还有他的上司徐百齐。

徐百齐原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从1931年到1942年任商务印书馆法律书籍主编，深得王云五赏识，后又到上海律师事务所工作。1946年，经王云五提携，任经济部主任秘书。1948年王云五任财政部长时，徐便改任财政部秘书长。同年6月，本在台湾法院任推事的陶启明因“法律、英文均好”，被徐引进财政部当秘书。

就在陶被捕的第二天上午，徐百齐自感罪责难逃，主动找王云五密谈了数小时，尔后由王云五电话通知警察厅黄珍吾：“徐百齐为表明心迹，自请看管，请派员来部监管。”次日，王云五在给行政院报告中说：“全国银行封关两天的电令是由徐百齐拟的，用人不当，深至欠愧！”

在陶启明供出徐百齐后，王云五又发函致黄珍吾：“本部停职秘书徐百齐，因为陶启明之介绍人，自请看管。倾据贵厅刑警总队审讯陶启明之口供，认徐百齐有重大嫌疑，请自行逮捕，拘押法办……”

于是，徐百齐被“请”到了南京警察局。

至此，由于财政部泄密而引发上海证交所发生抛空大案的案情已全部明朗。9月28日下午，上海法院宣判杜维屏、李国兰等人。判词云："买卖股票本属合法交易，但须在交易所法许可范围以内。否则，就是违反交易所法。"根据这一罪状，李国兰被判处徒刑10个月，杜维屏被判处徒刑8个月，杨淑瑶被判处徒刑7个月。违法经营场外交易者，财政、工商两部根据情节给予处分，经纪人杜维屏被吊销营业执照。

监察委员孙玉琳等联名纠举王云五用人不当，严重失职。但南京检察院认为该案与王云五无关。他先于9月22日飞赴美国，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去了。财政部和上海金管局派人会同调查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理员王鳌堂失职一事，王鳌堂也就成了替罪羊，不久即被免职。

1949年1月19日上午10时40分，南京地方法院做出如下判决："徐百齐、陶启明共同对于非主管或监管之事务利用机会图利，各处徒刑七年。"

所谓的宣判只是一纸空文，徐百齐的七年牢，只坐了二十二天，2月10日即离开娃娃桥监狱，离宁返沪。陶启明不久亦被释放。

这场财政部泄密而引发的证券抛空大案曾轰动全国，但随着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而草草收场。

"窝里斗"　蒋经国"打老虎"失败之谜

1948年，国民党军事战场节节失败。与此同时，在经济战线也濒临崩溃。"印刷纸币的费用已经赶不上货币的兑换价值"。物价飞涨，使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势下，蒋介石制定了"经济紧急处分方案"，蒋经国临危授命，去执行"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贯彻新经济政策"的"救国大任"，蒋太子的这一行动被称为"打老虎"。然而，仅两个多月，这场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就失败了，内阁倒台，蒋太子铩羽而归，"打老虎"彻底失败，这其中的内幕如何呢？

1948年8月初，国民政府决定：在行政院下设立经济管制委员会，任命俞鸿钧、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委员会正副督导员；经济改革的内容：(1) 自8月19日起，以金元为本位，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10月20日前)收兑已发行的法币；(2) 限期收兑人民手里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3) 限期登

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4) 整理财政并加强经济管制，以稳定物价，平衡国际总预算与开支。

按国民政府公布的物价管理办法，规定所有的货品必须停留在1948年8月19日的市价上，即官方所称的“八一九防线”，企图整顿与管制上海的财政金融与市场物价。



蒋经国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面前，许多工商业者只能忍痛把现存的无法藏匿的商品亏本销售，有办法的大户则把商品囤积起来，造成有市无货的局面，于是，一批违法者就遭到严厉的处罚，这就是“打老虎”运动。在蒋经国的统一指挥下，上海的军警全部出动，到全市各市场、仓库进行搜查，“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至9月底，惩治豪门巨商进入高潮，一批违法者相继被枪决，六十四名工商巨头被逮捕。蒋经国踌躇满志，公开演讲道：“在上海应当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要毫不留情地送你进监狱，上刑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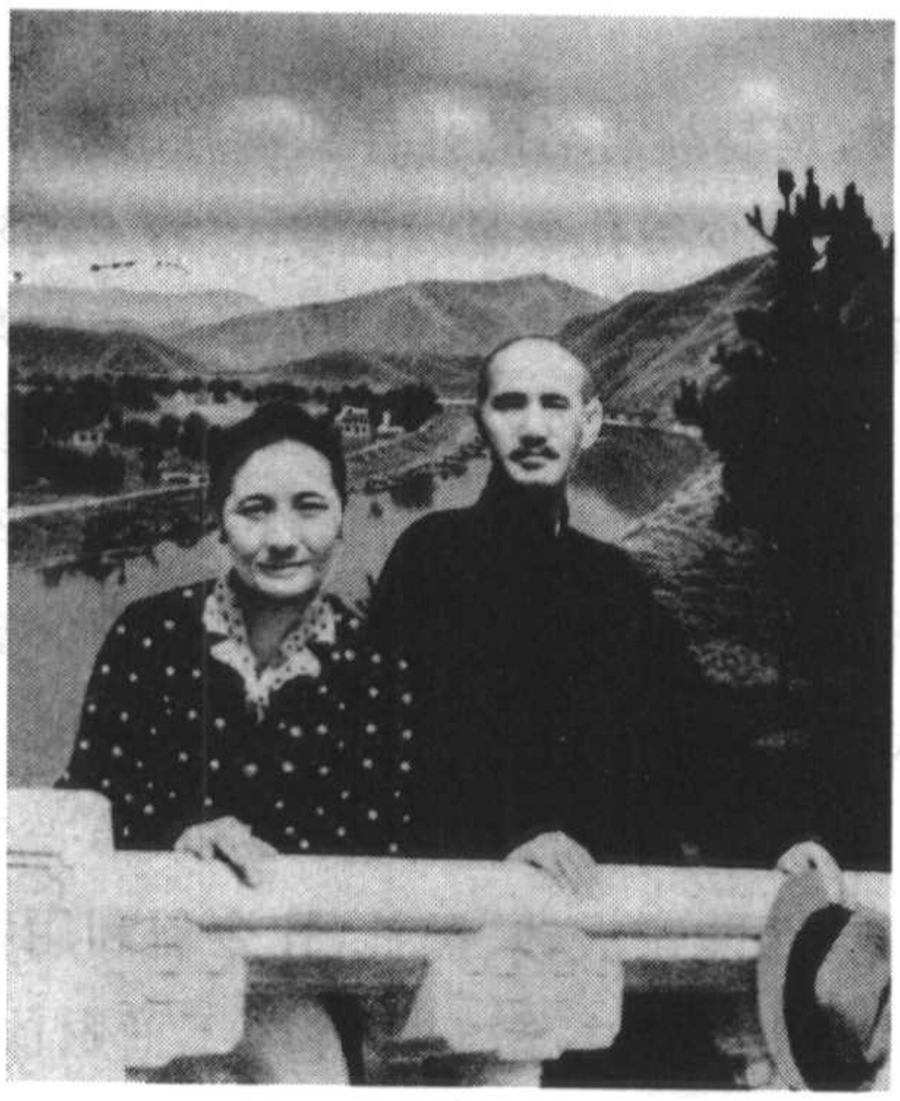
繁华的南京路与四川路口的迦陵大楼，是赫赫有名的孔祥熙家族的“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总部所在地，董事长是孔大少爷孔令侃。往常，一跨入迦陵大楼，里面的电梯不断地上上下下，办公室内的职员忙忙碌碌，来往的客户熙熙攘攘，公司规模和气派简直堪与中央银行媲美。9月29日，扬子公司总部情况异常，公司职员个个惊恐不安。原来，就在这天午后，扬子公司囤积于利喊汽车公司二楼仓库的大批物资被查封，旋即大连路277号仓库及虹桥路仓库亦告急。事起仓促，坏消息纷至沓来，向来有恃无恐的孔大少爷也出了一身冷汗。

扬子公司自1946年4月创办以来，依仗孔祥熙的权力、财力和“第一夫人”宋美龄的庇护，业务飙升，发展极速。为了能赚大钱、黑钱，孔令侃利用特权，窃取国家的经济情报，获得汽车进口“合法”权益，邀宠于各国工商财团，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垄断货源。走私、逃税、套取官价外汇，无所不能。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便赚取了大量的黄金美钞。据《工商天地》杂志1947年8月第1

卷第9期刊载的《扬子孚中案全貌》一文云，扬子公司“官僚资本的庞大，挟其政治特权，经济实力，已威胁到美商利益”，因而美商亦起而攻击。“1947年美国合众社最先揭发扬子公司，继而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由国民党政府内对孔宋极端不满的一部分人发难，选择在魏德迈来华，联合美商群起指摘之际，来一个总攻击，企图整个拔除孔宋官僚资本”。

国民政府监察院甚至蒋介石都直接过问扬子案，但孔令侃似乎有“回天之力”，飞了一趟南京，风波便很快平息。然而，眼前发生的扬子公司仓库被封的事却颇为棘手，不好对付，因为孔大少爷的对手是他“铁面无私”的表兄蒋经国，他脑海中甚至闪过要不要去香港避避风的念头。但孔令侃自有一套应付的办法，此人精明能干且心狠手辣，为攫取巨额利润，哪怕是嫡亲娘舅宋子文也要狠杀一记，1946年那一幕甥舅夺标的丑剧便是明证。此次囤积居奇，本想发一笔横财，如何甘心束手就擒？

就在扬子公司囤积物资被查封的当晚，有关查封的消息就有人通过电话传到了南京。据印度驻华大使潘迪华在其旅华回忆中所记：“南京官邸正在宴客，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来一紧急电话，蒋夫人接完电话后神色至为不安，乃先行离席。翌晨(10月1日)飞沪，经宋美龄从中干预，此一丑闻，喧嚣中外。”至于孔令侃如何求援于姨母，外人无从知悉，总之宋美龄飞沪是事实。据《大众新闻》杂志云：此案一经破获，南京便飞来一位“太上人物”，此人与孔家有极深渊源。“太上人物”即指宋美龄。孔令侃不仅求援于宋美龄，而且还亲自登门拜访上海市长吴国桢，请其为扬子公司转圜。还通过各种关系、各种渠道放出流言：查封之新小汽车非扬子公司所有。10月2日，上海警察局发言人“正式发布”扬子案时，有意维护扬子公司，说“所抄查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又特别说明“所囤大批汽车并非孔令侃所有”。10月3日，《申报》亦发消息云：“至外传查获大批新汽车及呢绒等，则并非事实。”孔系的《时新晚报》还写了社评，将扬子公司的问题洗刷得干干净净。



蒋介石与宋美龄

10月3日，有关“扬子案”的消息

不胫而走，迅即传开。上海、南京、北平各家报刊争相报道。《申报》以《抄获扬子建业物资——呈候经管当局核示》为题，《大众新闻》以《首席豪门一大杰作——孔令侃惊人囤积案真相》为题，作了详细报道。也有的报刊称扬子公司为"某大企业公司"，而称孔令侃为"某大豪门少爷"，语焉不详地作了报道。据报刊披露："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有新型汽车近百辆，呢绒、西药、钢铁、颜料、玻璃等三四千箱，种类不下三四百，把占地七八亩的仓库堆得没有一丝空隙。"

市民震惊了！社会震惊了！人们或涌向位于外滩中央银行二楼的经济督导办公室，或投书报刊，或寄语蒋经国，要求"清算豪门！"《大众新闻》杂志以醒目的标题刊登"大老虎不打，小老虎死得太冤枉，中老虎牢里要叫屈"的评论文章。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监察院诸公这一次不甘"痴聋"了。一年前，监察院曾过问"扬子案"，终因豪门权贵干政而受挫，因而对扬子公司憋了一肚子气。这次欲借彻查之机，狠狠地杀一杀孔令侃的威风。10 月 8 日，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委邱在渭、金越光抵沪，看来，孔令侃和扬子公司这一次是在劫难逃了。

孔令侃深知蒋经国那一关不好过，硬顶只会把事情搞糟，迂回周旋方可拖延时间。于是，他写了一封称兄道弟的信给蒋经国，为自己百般辩解，说扬子公司所有物资都已"合法登记"，措辞之中似认为警察查封他的仓库违反了法律。

宋美龄把扬子公司和蒋经国以及孔令侃之间斗争，通告了正在北平的蒋介石。蒋正在圆恩寺主持对东北军事行动，他立即飞回南京。傅作义气愤地说："军事如此紧张，总统家事重于国事，如何能不败？"

10 月 9 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抵沪。有关方面曾把"扬子案"提出陈诉，孔令侃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直接请宋美龄出马。据《大众夜报》1948 年 10 月 9 日报道，当天上午 10 时，宋美龄亲自驾车"'携'孔令侃晋谒总统，孔氏御灰西装，神态怡然"。另据曹聚仁的记载，"当宋美龄带着大公子（孔令侃）去看蒋先生的时候，经国已经束手无策了"。宋美龄请来蒋介石，将蒋经国训斥了一顿，指责蒋经国"太露！过火！"蒋经国只好偃旗息鼓，对外界则称"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的"。他在日记中无奈地写道："本星期（10 月 3 日至 9 日）的工作环境，是工作以来最困难的一段。"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称，"第一夫人"直接干预扬子案，使该案追查不下

去，这是“不争的事实”。嗣后，《大众夜报》、《正言报》因热衷报道扬子案消息被迫停刊，蒋经国变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政治小丑，而孔令侃又恢复了往日的威风，从此更加有恃无恐。

家族干政，豪门当道，群情哗然的后果是“市民人山人海，抢购物资忙”。总崩溃前夕的这一幕，在观众的惋惜声中黑灯暗场。

12月21日，国民政府监察院发表了对扬子建业公司囤积案之纠举书，全文长达一万二千字。其中这样写道：“公司总经理孔令侃有仗势逃税，囤积居奇，非法牟利之嫌，扬子建业公司应受停业处分，其涉及司法部分应移送法院办理。”（原档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对这一纸空文，孔令侃根本不予理睬。此后，法院又多次传讯孔令侃，他拒不到庭，舆论界虽议论纷纷，却也奈何他不得。

轰动一时的“扬子案”不了了之，孔令侃依靠家族权势终于“化险为夷”，蒋经国声势浩大的“打老虎”运动就这样失败了。

走私与缉私　　蒋桂鸦片争夺之谜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设置了全国禁烟委员会，以厉行禁烟大政。1928年11月6日，全国第三次禁烟会议上，蒋介石亲临训词：“禁烟一事，事关国家社会及民族生存，禁烟委员会务须雷厉风行，破除情面，实地去做。应先从中央着手，如在政府内有任何人敢于以身试法、吃烟运烟者，中央必铁面无私，严厉处置，绝无宽恕！”离蒋介石的讲话不过半月，上海就发生了数量巨大的鸦片走私，是谁有如此胆量顶风作祟？

1928年11月23日，上海《申报》曝出特大新闻。警备司令部侦查队于13日得密报：招商局江安轮将由汉口私运大批烟土，于21日晚上到沪。即派侦探往查，共查获烟土二万两许，即移往小轮运至大达码头，再用搬场汽车运回队部。现已将此项情形呈报警备司令部，再由部电报中央核办。同时，该报又刊登了淞沪警备总司令熊式辉致全国禁烟委员会的电文：“南京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张（之江）主席勋鉴：顷接敝部侦查队报告，昨晚在招商局码头，抄获江安轮夹带之烟土二万两，已饬封存，定期焚毁。除令侦查人员严密缉拿，以期净绝根源外，特电奉闻。”

11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通过《申报》曝出一则耸人听闻的消息：据属区报称，22日凌晨一时许，有身着武装者三十余人，在大达码头起卸烟土。巡官李存正率警查拿，当以人少，反被掳劫，迄今仍拘禁白云观警备司令部侦查队队部。所有烟土，被武警运往租界，无法阻止。武装运烟，国法何在？应请迅赐查究严办，以严军纪。当日《申报》还登有上海市公安局长戴石浮致南京的"十万火急电"：南京分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军政部长冯（玉祥）、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钧鉴：武装运烟，掳劫官警，计邀垂察。刻悉是项烟土，运至白云观后，立即武装向租界运去。当此厉行禁烟之日，发生此种行为，深堪骇异，应迅赐查究严惩，以申法纪。

由上面两则截然相反的报道来看，警备司令部所发的消息，缉拿烟土似极为顺利，而公安局的消息中称遇武装运烟，掳劫官警。武装运烟掳劫官警者，显然系指警备司令部方面。

其实这次鸦片走私案的后台是财政部长宋子文。他利用招商局的船只贩运烟土至上海，由蒋介石的亲信、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保护经销。当时蒋桂、蒋冯交恶日甚一日，上海市长张定璠属桂系人物，他从冯玉祥的老部下、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处得悉江安轮运烟土到沪的密报后，通知公安局长戴石浮缉拿。戴石浮即布置警士昼夜监视水陆码头，21日深夜，当警备司令部侦查队起卸烟土时，公安局巡官李存正带着六名警士上前盘查。侦查队依仗人多势众，将李存正等掳去。

警备司令部因天机泄漏，干脆先发制人，抢先播发了查获烟土的消息。同时由市新闻检查处主任、警备司令部方面代表李德钊扣发公安局的新闻。市长张定璠怎能心甘就此罢休？便利用掌握宣传工具的优势，在沪上各报大登警备司令部武装包运鸦片的丑闻。市党部宣传部长陈德征、社会局长潘公展又公开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揭露并指责警备司令部扣押公安局的新闻稿及禁登戴石浮局长致南京的电报。

为了给中央施加压力，张定璠又特电蒋介石，大意谓江安轮运土案发生以来，上海乃至全国各界群起瞩目，议论鼎沸，若非迅予追究，易启民众怀疑，万恳迅派大员来沪彻查，公之于众，以利禁烟而慰众望。警备司令部自恃靠山硬，公然称公安局"妨碍公务，拦路劫夺烟土"。一时间，军警唇枪舌剑，互相攻讦，异口同声，请求中央彻底查究。公众闹不清真假，如堕九天云雾之中。上海各公团纷纷集会或登报声明，同声谴责，又致电中央，请求迅速派员来上海，查明真相，严办作案者。

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国民政府致电上海市长张定璠："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即日派员到沪，会同彻查，依法严惩。"

两天后，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司法行政部部长魏道明、司法行政部刑事司长王淮琛带领人员抵达上海。下车伊始，张之江即向新闻界表示说："此案若不加严查，则不仅有丧中央威信，亦且贻笑国际，禁烟委员会亦大可撤销。"有记者问："中央对此案有严办之决心否？"张之江不假思索答道："有决心者有之，也有不一致的，但本人决心履行职责，彻查到底。"

张之江确实想使此案水落石出，一到上海，便夜以继日调查核实，逐一审问了军警双方当事人及证人，掌握了案情的内幕情况。在这个节骨眼上，国民政府文官处致电上海市政府："奉主席谕，上海市公安局长戴石浮令停职来京，听候审讯。"

有关鸦片大案尚未全部调查清楚，就要将当事人之一的戴石浮停职并审讯，显然这其中有猫腻。蒋介石与宋美龄结为伉俪不久，新夫人的面子总要给的，再加上蒋介石与英美等国拉关系，也离不开宋家这根支柱。所以蒋介石下令罢免戴石浮，对张之江的所谓"彻查"也是一个警告。戴石浮停职候审令一出，桂系立即做出反应，张定璠致电蒋介石："此案起因，实由职府遵国府禁烟会密令，转令公安局严缉，戴局长奉行职责，职府似宜连带负责，应请一并停职，以明责任而昭法治。"上海各公团似已揣摩得几分案中奥秘，与上海律师公会、商民协会、拒毒会、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寰球中国学生会等举行联席会议，联名致电蒋介石，对戴石浮停职候审深表不满，内中有语云："钧府令戴局长停职候审，或系运土案查讯中不可少之程序，但与戴同样当事之人，是否须经同样或较重之程序？切盼昭示大众……恐非国府所以自处也。"

12 月 3 日，张之江依然我行我素，返回南京，对记者说："运土案调查已告一段落，回京后，即将调查内容呈报国府，由中央处置。此案虽不能最后定论，但从调查结果来看，本人感到公安局方面理由似占上风。"他回南京后，得悉江安轮正由汉口来宁，遂会同招商局、江宁地方法院截扣了该轮，将十五名涉嫌船员拘捕审讯。同时敦促上海警备司令部，把侦查队长傅肖先等有关人员押解来京待审。上海市政府、市党部及市地方法院也联合组成了"运土案调查委员会"，继续审理此案，并急电行政院，请求即刻查办各方涉案人员。

12 月 11 日，张之江列席行政院会议，报告了江安轮运土案调查结果并提出处理意见。然一周已过，杳无音讯。记者们天天等候在禁烟委员会门前，张之江均避而不见，得到的答复是："张主席已将具体意见呈报国府，因事关机密，

在未奉国府指令之前，不能发表。”记者们纷纷猜测情况可能有变化。事实正是这样，直至12月20日，张之江才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其要点为：一、禁烟委员会接到密报，云有大宗烟土由外洋至沪，因分函上海市政府及警备司令部密拿，故此次军警双方均系奉命办理公务。二、军方侦查队先得眼线报告而往搜查，警方保安队见起卸烟土而上前盘诘，由此发生争执，实属误会。三、此次运土案，为在逃之江安轮火仓头目王道余、厨师金大生等四人所为，已着缉拿。四、侦查队抄烟土时，既不查拿烟贩，又不追究船员，处理已有未合，该队队长傅肖先复又扣留警方李巡官，应负违法之责。公安局长戴石浮未察究竟，以军方武装运土等语登报，有损革命军人之声誉，交由警察总署论处。

紧张的幕后活动，平衡了双方的利益，迫使张之江改变初衷，发表这一通违心的谈话后，自感愧对国人，便以“近有沪土案及明年国际禁烟大会之准备，劳苦过度，故拟稍事休息”为托词，请求辞职。蒋介石当时的主要政敌是桂系，不希望再结怨于冯系，故而慰留张之江：“该主席办理禁烟渐著成绩，肃清毒害悉心规划，努力进行，盼勿以微疴遽萌退志，所请辞去禁烟职务之事，应毋庸议。”

随之而来的是江安轮运烟土一案大事化小，该案原拟由国民政府司法院直接审理，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称：“因案发沪上，为管辖及调查证据便利起见，应归上海地方法院受理。”

1929年1月7日，上海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江安轮运土案，各人所供大同小异，均称烟土由在逃的火仓头目王道余等四人装载船上。至于货从何处来、运往何处、属何人等等，一概不知。1月16日，审判长宣判云：“据各被告及证人供认证实，私运烟土主犯为王道余、徐阿大、金大生、李元子，案发时业已外逃，应予缉捕归案，所有烟土予以没收。王建美、王建实、吴秋生、工德文帮助贩运烟土，触犯刑律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各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其余王忠明等，尚未构成犯罪，当庭释放……”

2月下旬，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节节胜利，上海市长张定璠“因病乞退”，自请辞职。4月中旬，桂系被彻底击败，李宗仁、白崇禧逃回广西，张定璠也逃离上海。国民政府下令对张定璠“严缉究办”。至此，蒋介石取桂系而代之，掌握了上海党、政、军、警全部大权。于是，轰动一时的江安轮运土案就此销声无闻，运土案的后台宋子文毫发未损，武装包运烟土的主犯熊式辉也照样当他的淞沪警备总司令。

至此，国民政府的所谓禁烟运动成了官样文章。

以毒攻毒　中日假币大战之谜

抗日战争期间，在国统区的市场上，突然出现了大批假币在流通，银行、商店紧急拒收，老百姓叫苦不迭。不久，沦陷区的市场上也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伪币，给日本企业及汪伪政权以沉重打击。利用假币进行斗争，这其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1935年1月31日，面对日本对华北的步步侵略，财政部长宋子文打电报给返美述职的美国驻苏联大使布里特："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尤其是货币方面所面临的危机，不可避免的危机可能在3、4月间，肯定6月以前就要出现……在我们这样一个组织不健全的国家里，而又当日本为了控制中国目前正逼着摊牌的时候，届时中国政府只能作出如下选择：要么在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接受日本的贷款；要么就面临着事实上是在日本人庇护下各省使用不同的货币。"在这封电报里，宋子文向美国政府传达了一个信息，希望美国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来帮助稳定中国的币制。

然而美国不愿意得罪日本，国民政府只得转而求助英国。在英国的支持下，1935年11月，国民政府成功地进行了币制改革，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中国货币为法定货币。以白银为本位，并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法币政策结束了中国货币的混乱局面，有利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稳定并扩大了财政收入，也使中国方面能最大幅度地掌握现金和集中贵重金属白银等，以作为从国际市场购买军火之用，这对中国反侵略战争是十分有利的。因此，法币政策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日本陆军省次官古庄指责中国此举"显系放弃亲日政策"，日方"将断然排击之，虽诉诸武力，亦必阻止实现"。在日本的指示下，日本浪人在中国大规模走私白银，并制定了《华北金融紧急防止措施要项》，明确严禁法币在华北地区流通。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大片国土。由于英美等国的支持，战时中国法币仍可以在上海租界及香港等地中外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以及在沦陷区流通，这对日伪确立金融统治、推行伪钞和使用军用票是很大的障碍。于是，日本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便密令日本特务机构，研究对中国的货币战。这项恶毒的计划，由参谋本部陆军少佐山本宪藏具体负责。他和造币专家、日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社长兼巴川造纸株式会

社社长井上源之承等人，研究伪造中国法币。这一行动得到了当时日本陆军次长东条英机的支持，他指示山本、井上源从速策划，并要求有关部门尽力协助这一绝密计划的完成。制伪小组选中了中国银行发行的五元面额法币作为试验对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匆匆印制出几十万元成品，火速运往中国，以打入中国流通领域，一部分作套购中国物资之用，一部分补特务机关经费之不足。很快，从中国传来了令他们震惊的消息：中行五元面额法币此时已退出市场流通领域。他们几个月的心血都付诸东流。为此，山本和井上源受到上司的严厉斥责。

于是在1940年4月，日方又成批伪造了中国农业银行一元、五元、十元面额的法币，共五百多万元。为不易被识破，这些假币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使其在外观上成为成色不新的旧币。这些运抵中国的假币，由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或在华的“商社”机构，如上海的华新公司、民华公司、诚达公司等，真假币混合，打入中国金融流通领域，成为日本侵略者抢购物资、套取真法币及谋取侵华军费的重要手段。在日本的支持下，1940年汪伪上台后，成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新“法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的租界和香港，利用在上海租界内的中国四大银行钞票票版与印刷公司大量制造假法币。同时，日军特务机构查获了中国政府设在香港的造币厂，强掠造币机器及相关材料。在九龙中华书局内存放的新近印刷、由中国农业银行发行的十元券法币及一批印钞机也落入敌手。商务印书馆密存的一批将由中国交通银行发行的五元券半成品及印钞机等也装入日本口袋。日本东京的“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专人研究从香港掠来的法币半成品及编码、暗账废册，改进伪造技术。1942年，日本南洋占领军又截获二十亿中国银行小额法币半成品。不久，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上一艘美国商船中查缴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仅缺号码和符号的法币半成品十多亿元。日本从德国手中购进这批半成品并进行加工，然后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据估计，战时在日本国内制造、加工而输往中国的假法币就达三十亿之多。

对日寇制造的假法币，国民政府采取了相应对策，通令严禁假币流通，贩卖牟利者严行究办，举报者有奖，并对大案要案及时曝光，警示世人。如1943年广西桂林、全州等地贩卖中行百元券案，1940年浙皖等地中华版假钞案，江西吉安、泰和等地中行、交行五十元券假钞案的破获，都及时予以报道。1943年10月，在广西敬德县参议员秘书周某住所，捕获推销假钞贩子胡持中等三

人，当场从他们身上搜出伪造交通银行五十元券共一万五千元。1943 年、1944 年，《中央日报》又追踪报道在香港被敌缴获并加工后流入大陆的 1940 年中华版券的动向，提醒百姓加以识别，帮助中央银行“查缉和吸收”。

在反假钞的斗争中，国民政府还采用“以假对假”的办法，以彼之道，施诸彼身。

有资料表明，为扰乱日伪统治区的财政金融秩序，蒋介石曾令军统局与英美两国造币公司合作，在重庆秘密筹建一所伪造日伪钞票的造币厂。为这一计划的顺利实现，中国政府从美国购买纸张和先进的印钞设备，又从中国银行造币厂中挑选精干的技术人员，潜心研制。戴笠通过汪伪财政部长、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周佛海，获取了日伪银行的最新钞票版样，送往重庆炮制，其成品总数超过一万五千箱。这些伪造的货币被悄悄运抵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上饶，从这里偷运到日伪控制区。1943 年的一天，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匆忙宣布，该行发行的十元票面的储备券有大量假币在市场上流通，该行不予承认，现金交易中也予拒收。一时间人心惶惶，市场混乱。被宣布的假币正面纹样以蓝色为主，印刷质量与汪伪储备券几乎不差毫厘，只是“中央储备银行”的“储”字上一个小点有些斜，一般人不仔细分辨是很难觉察的。这些真假难辨的假币，令敌伪伤透脑筋。用假币对假币，是抗战时期对敌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既挫败了日伪货币的信用，又使国民政府套购到大量紧俏物资，在一定程度上予敌以沉重的打击。

军事斗争

并非“原创”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口号出处之谜

“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是谁先提出来的？史学界一般认为，这个口号是蒋介石最先提出来的，意思为在日本侵略之际，首要是镇压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叛乱”，然后再全力对外。于是这个口号便一直戴在蒋介石的头上，成为他打内战的“标签”。

其实，“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并不是蒋介石提出来的。先于蒋介石提出这个口号的是军阀石友三。

石友三，字汉章，原为冯玉祥手下“十三太保”之一，作战英勇，屡建战功。但其人生性狡诈，反复无常。

1929年4月下旬，蒋冯战争爆发。冯系大将韩复榘因被蒋介石的大洋收买，联络把兄弟石友三、马鸿逵共同反冯投蒋。韩复榘后被蒋介石任命为河南省政府主席，石友三被任命为安徽省政府主席。

1929年5月，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召开“共产宣传大会”，哈尔滨警察局以“非法集会”为借口，派警察搜查苏联领事馆，查出了有关宣传“赤化”的文件，导致中苏两国关系恶化。

7月上旬，东北当局授意中东路中方理事长吕荣寰通知苏方铁路局长：今后凡以中东路铁路局局长名义发布的命令，均须由苏方局长和华方副局长共同签字，车务、机务、商务、财务、电务各处，原设苏方处长管理之业务，均交由华方副处长管理。总之，要将原属于苏方管理的路权收归华方所有。

7月11日，中东路中方理事长吕荣寰下达“对于中东路执行紧急处置”令，停止苏方正副局长职务，派华方副局长暂代局长；并以“反抗命令”为由，遣送五十九名苏方铁路员工出境。这样，双方矛盾陡然升级。

7月13日，苏联政府向国民政府发出照会，声明愿意以和平谈判解决中东路问题，并提出三项建议：（一）从速召集会议，解决中东路一切问题；（二）中国方面应立即取消对该路之专制行为；（三）从速释放被拘捕之苏联

人员，停止排苏行动。照会并警告中国须顾及拒绝此项提议后所产生之不良后果，限三日内给予答复。

7月16日，中国外交部复照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宣称对于中东路之处置，“纯系阻止骚乱治安事件之突发目的，不得已而有此权宜之处置”。

7月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照会中国驻苏代办夏维菘，宣布与中国绝交。略谓：“中国政府否决苏联三条和平提议，用友善态度调解中东铁路争执问题之方法业已罄尽，苏联政府不得已采取下列方法：（一）召回苏联在华全体外交官、领事及商务代表；（二）召回苏联政府任命之中东路全体职员；（三）停止中苏间全部铁路交通；（四）命令驻苏中国外交官、领事即时离开苏联国境。”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欲使张学良的东北军和苏联红军发生冲突，而张学良肯定受挫；然后再由政府出面解决，从而达到以“外交手段解决东北军”之恶毒目的。他致电张学良，告以对中东路事件方针：“务须保我主权决不受其胁迫，惟中俄接壤，绵亘万里，狡谋侵占，不可不防。”怂恿张学良率东北军与苏联红军开战。7月20日，蒋介石致全国将士电：“舍一致对俄以外无出路。”

果然中苏冲突加剧，苏方开始向边境地区调兵遣将，扣留中方车船，派遣飞机进入中国领空。9月7日晨，苏军三千人向绥芬河、马桥河之间的东北军进攻。同日，东北军坦克车队开往绥芬河增援。9月9日，苏军猛攻满洲里附近的东北军所部，激战竟日，被中国军队击退。

10月5日，苏军骑兵又向满洲里发动进攻，至次日凌晨2时，被东北军守军击退。11日，苏军在同江与东北军激战；次日，苏军陆海空配合袭击三江口，占领同江，东北舰队“江平”、“江安”、“江泰”三艘军舰被击沉。

11月17日晨，苏军大举进攻满洲里及札赉诺尔，与东北军第十七旅韩光第部激战；19日，苏军攻占札赉诺尔，旅长韩光第、团长林选青等相继阵亡，团长张季英重伤后自杀。同日，海拉尔失守。20日，苏军攻占满洲里，守军被包围后解除武装，旅长梁忠甲等被俘。

东北军的惨败震惊了全国，拒俄呼声甚高，形成一股浪潮。然而在内地，军阀间内战正酣。10月，蒋介石与宋哲元等部大战；11月，蒋军又与桂系和张发奎部开战。

就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的石友三位置未坐热就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要其赶到南京。石友三面见蒋介石后，蒋命令石友三：率部南开广东，去打李宗仁、

张发奎逆军。石友三不敢违令，只得率所属第二十四师到浦口候船，前往广东。

这时，唐生智已接受汪精卫“护党救国”的主张，暗中联络反蒋。他派袁华选到浦口见石友三。袁告诉石友三：蒋介石对异己是不信任的，势必去之而后快。你此去的下场一是与李宗仁、张发奎火并，两败俱伤；另一可能是老蒋利用你部在浦口上船之机，将你部分别缴械并遣散。

生性多疑的石友三听了这番话果然跳起来，大骂蒋介石，随即一不做二不休，命令炮兵在江干上架起大炮，冲着南京下关一带乱轰一气。一时间，炮声隆隆，硝烟升腾，人心惶惶，首都震动。

蒋介石听说石友三反了，但自己身边没有机动部队，南京城中只有一个宪兵团和中央军校几千名学生，仓皇间不知如何应对。政府各机关纷纷收拾文件细软，雇佣汽车向中山门外杭州方向而逃。

谁知石友三也很心虚，乱轰一气后连夜拔寨向北而逃。他命令将津浦路上全部车皮裹胁而去。不久，蒋介石命令从上海赶来的熊式辉第五师过江追击，又令中央军第五十六师刘和鼎部截击石友三。石友三沉不住气了，1929年12月3日，他在蚌埠发出通电，主张息争对外，并在通电中首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电文如下：

> 慨自国民革命南北统一以来，海内人民喁喁望治，果能上下一心，永戢干戈，力图建设，则政治渐就范围，国际足臻平等，正义日昌，国基自固。不幸数月以来，兵戈迭见，始而长江，继而西北……嗟外侮之凭陵，乃乏人而过问，中外古今，无此怪象，岂徒长帝国主义者之野心，实足贻我中华民族之奇辱。倘非亟息内争，一致对外，则沦胥之祸，宁待蓍龟。抑有进者，攘外必先安内，而政治修明，尤为安内之本。迩者言党治则率筹日替，统系混淆，即失党内之重心，安乐人民之信仰。言政治则金壬竞权，贿赂公行，税目纷繁，度支凌乱，取事之滥，莫可究诘。而对外条约之屈辱，不当借款之承认，举旧军阀不敢为者，而又悍然为之，而不顾政体，于斯为极……友三军旅余生，罔知政治，而救国救民之念，未敢后人，蒿目时艰，枕戈待旦。顾欲政治之刷新，必先政局之改造。用是躬率健儿，陈师苏皖，待时势之推移，仍奋力以迈进。伏望国内贤豪，不吝指导，我各方武装同志，共起图存，力拯兹危局，党国前途，实利赖之，谨布腹心，伫候明教。石友三率第一路司令孙光前、第二路司令秦建斌、第三路司令沈克及师长旅长全体官兵同叩　江午印。

石友三后见形势于己不利，便请求时任清乡督办的西北军老长官李鸣钟和青岛市市长马福祥出面斡旋。石本人也通电表示支持中央，拥护蒋介石。1930年1月20日，蒋介石复任命石友三为河南清乡总指挥，归韩复榘节制，石部开往河南，反蒋之事遂告结束。

目前所能见到的蒋介石关于“攘外必先安内”的讲话，最早应为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出的《告全国同胞书》，其中提出：“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

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要求抗日的呼声如大海怒涛。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宣誓会上，再次提出臭名昭著的“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的反动政策。

蒋介石认为：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共产党及其武装，日军在关外的占领与红军在江西等腹地的割据相比，前者是肢体之患，而后者则为心腹大患。他这样说：“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的媒介。所以我们要想攘外，必先安内……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

石友三虽先于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但与后者的内涵不同。石说的“攘外”是指对付苏联；“安内”是指平息当时新军阀间的战争，息争罢战。而蒋介石的“攘外”系指日本对华的侵略；“安内”既是指平息军阀内战，更指剿灭中国工农红军和各地的红色政权，而后者是“安内”的重点和重心所在。

权宜之计　马占山“落水”之谜

马占山是一位抗日民族英雄。他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日伪军的进攻进行了有效抵抗，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声援与支持。但他一度“落水投敌”，成为伪黑龙江省主席，后又加入抗日阵营，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由于东北军奉行蒋介石“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的电令，致使在一夜之间丢失了沈阳城。9月2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阐述“政府现时既以此案

件诉之于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不久，辽宁全省沦陷。紧接着，吉林也被日军占领，黑龙江省成了日本军队下一个夺取的目标。当时，黑龙江形势相当危险，日军诱降了洮辽镇守使张海鹏，积极准备进犯黑省。

1931年10月15日，在日本飞机掩护下，张海鹏率部进抵嫩江江桥，黑龙江省防军情急之中将嫩江桥炸毁，以图阻止日伪军的进攻。

是日，张学良令黑省军队对张海鹏伪军进行誓死抵抗，同时电令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副司令长官，除原黑龙江省各军队归其节制外，所有临近部队亦归马占山调度。

马占山立即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人物，各方对其都很注意。马一上任，立即着手部署江桥阵地，发表宣言，准备抗敌。

1931年11月3日上午，日军两辆铁甲车掩护士兵几十名，不断向桥北边防军阵地开火，以武力强行修桥。他们用枕木垫在炸坏的桥面上，直到天黑，终于将桥面修复。

11月4日上午，日军在边防军左翼渡江，天空有五架飞机向桥北阵地掷弹，在日军的猛攻下，边防军死伤数十名。马占山忍无可忍，下令还击，打退日军的进攻。下午6时，日军又以炮火掩护步兵渡江，携带山炮多门，另有飞机七架和铁甲车四辆配合，轮番向我阵地猛攻。在马占山指挥下，边防军官兵同仇敌忾，奋力拼杀，终将日军击退。

5日，日军改变战术，令张海鹏伪军在前，日军督饬于后，又向桥北阵地发起进攻，激烈的战斗持续到天黑。据日方事后发表的战报，马占山部死一〇七人，伤六百余人，张海鹏部死伤七百余名。

6日拂晓，日军步兵两联队、野炮四十门、重炮八门、铁甲车四列、飞机八架向我阵地轮番攻击。阵地上硝烟弥漫，一片火海。边防军虽经浴血拼杀，但死伤惨重。不得已，马占山下令守军退往三间房一带。

是日，马占山通电全国：“大难当前，国将不国，惟有淬砺所部，誓死力抗，一切牺牲，在所不惜。”

7日，日军配合张海鹏伪军进占三间房，省会齐齐哈尔岌岌可危。马占山亲赴前线，当场枪毙怯退的一名团长和一名连长，士气为之一振。中东铁路护路军一部赶来增援，苑崇谷旅抄了张海鹏的后路，马占山部转败为胜，复进守江桥。是日，在三间房抗敌的军队还击落了一架耀武扬威的日机，俘获了

驾驶员三名。马占山通电全国，表示“一息尚存，不敢使寸土之地失于异族”。

黑龙江各界代表三百余人，在国民党省党部召开抗日救国会，支持爱国将军马占山的英勇行动，决心与日本决一死战，并恳请中央派飞机来黑省助战。

8日，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决议：各省市设立抗日救国言论机关；电慰马占山部全体将士努力作战，保守国土，并吁请国民政府派兵援助。

上海声援马占山将军抗日的爱国运动轰轰烈烈，先是上海市抗日救国义勇军委员会、上海律师公会以及上海一百六十余同业公会分别电慰马占山，支持其率部挥戈抗日。上海市抗日救国会分别致电蒋介石、张学良，请政府明令慰勉马占山，并赶派大军驰援黑省。上海邮务工会等在慰问电中称：“鼓励将士，继续奋斗，全沪工友，誓为后盾。”

11月12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以最后通牒电致马占山，要求其下野，黑省军队向齐齐哈尔撤退。马占山即电张学良请示，张电令马占山“严词拒绝，死守到底”！马占山驳复本庄繁通牒，谓：“本人下野，须有中国政府命令，否则决不交出政权；关于撤兵，在中国领土内，日方无权干预。本人奉令保卫疆土，在未有政府命令放弃之前，决不退让。”他还对前来采访的哈尔滨各报记者表示：我们已准备好了，“即剩一兵一弹，亦当与战壕共存亡”。

11月15日，日军大举进攻，马占山部在离昂昂溪二十五里处的汤池、蘑菇溪一带与日军激战，马部骑兵团长沙力布身负重伤。本庄繁派代表林义秀会晤马占山，威胁称：日方所提要求马占山既未照办，日军将截断中东铁路西线，以断马部归路，然后直取省会齐齐哈尔。马占山答复：“守土有责，自当严重守卫。”

上海各界纷纷汇巨款支援马占山部抗日。上海国民党市党部汇款两千元，中兴银行转汇菲律宾华侨救国委员会捐款一万元，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汇款一万元，华商纱布交易所汇款一万元，面粉交易所汇款一万一千五百元，印染公司汇款五千元，杂粮业同仁汇款两千元，中国红十字会汇救济药品费两千元，爱国女校汇款三百元等。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对新声社等记者发表谈话说：“黑龙江省军队为国苦斗，奋勇抗日，吾人决不能隔岸观火，应竭力筹款急济，勿使黑龙江省成为台南第二。”意指1895年，日军进攻台湾，刘永福率军民坚守台南抗日，后因无人支持，饷断弹尽援绝，终于失败。

马占山电复上海各公团说：“国难方殷，军人重责，仍当督饬将士，努力自

卫，即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务乞唤醒民众，一致御侮，后援有人，前锋必锐。”

11月17日，日军调动一万七千人，在十二辆坦克、三十门大炮和十二架飞机的掩护下，向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大举进攻。马占山部在血与火中拼杀，战壕均被日军炮火摧毁，仍与日军作最后之抵抗。苑崇谷的步兵旅、程志远之骑兵旅皆伤亡过半。战至天黑，马占山下令各路军队后撤，日军第二师团攻陷齐齐哈尔。马占山率部掩护省政府各机关职员、商民千余人向后撤退，于20日抵达海伦，并在海伦成立省政府。马部将士分驻海伦、拜泉、克山一带。

黑龙江的抗战，中方虽然失利，但是马占山毕竟领导了东北的抗战，敢于面对敌人的炮火实行坚决抵抗。消息传来，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爱国军民的抗战决心与信心。各地支援马占山的电报如雪片飞来，抗日团体、爱国人士的捐款捐物，汇成巨大的爱国声浪。

1931年底，上海中国福昌烟公司在总经理姚继光等人创意下，隆重推出了“马占山将军”香烟。《申报》头版上中国福昌烟公司做的马占山将军广告。上有“当代英雄、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将军、黑龙江将士的血才是中华民族的血”，还有名人题字“铁血卫国，男儿自强，精忠神勇，万古流芳”。

爱国民众已一致改吸马占山将军香烟，有以下四种原因：（一）全国一致景仰马占山将军；（二）每箱有慰劳金国币十元；（三）色香味悉能抵抗舶来品；（四）破天荒精美花听（由华商康元制罐厂特制），每元三听，各烟店均有出售。广告上还有海上闻人黄金荣的题字“愿人人都学马将军”。

香烟听筒上印有马占山将军半身像，旁有马占山的题字：福昌烟公司

占山于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六日由前方回省摄影纪念

该公司将马占山的爱国行为和全国同胞的抗日决心，与商业炒作结合起来，获得了极好的经济效益。几天之内，“马占山将军”香烟由每元三听减为每元两听。为取得更大的轰动效应，中国福昌烟公司又于1932年1月15日在《申报》上做广告宣传：

> 马占山将军代表韩立如先生今日下午二时参观福昌烟公司制造厂，并报告马将军血战经过，欢迎各界参加。凡我大中华爱国同胞应一致改吸马占山将军香烟，拾支纸匣即日发行。每元两听。
>
> 厂址：胶州路武定路一百十号，总发行所：贵州路十六号，电话九四二二五。

当时，爱国同胞关心和声援马占山将军抗日事迹，争睹前方代表的风采，都欲聆听马占山抗敌经过，是日下午，将中国福昌烟公司武定路厂址围得水泄不通。厂家不失时机，将改装纸盒十支装的香烟隆重推出。此举更加适应市场，使普通市民、贩夫走卒、工人苦力都能掏得起一角钱，买一包马占山将军香烟。且人人都认为，买一包该品牌的香烟，即是爱国的一种表现，也是对抗日的一份贡献。

然而，就在沪上风风火火、大张旗鼓推销“马占山将军”香烟，人人争买“马占山将军”香烟之高潮时，马占山却与日军接洽和谈，退出黑龙江省。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2月上旬，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派参谋板垣自沈阳赴哈尔滨，与伪东三省特别区治安维持委员会会长张景惠商洽黑省政务，板垣令张告知马占山与日方直接会谈。在张景惠的说服与安排下，板垣等在绥化车站与海伦马占山通话，板垣要求马占山与日方“彻底合作”，马则答称：“黑军此次行动纯为自卫，日军不加压迫，我自不进攻。”

此时又有马占山的熟人、黑龙江省的劣绅赵仲仁为说客，引板垣一行到达海伦，同车而来的还有哈尔滨各报的中国记者。板垣下车伊始即要求会见马占山，参谋长谢珂挡驾，说：“马主席现在很忙，贵官可将来意说明，我向马主席报告后再决定会见时间。”

板垣则狡猾地说：“本人钦佩马主席的英勇，此次专为亲善拜见而来，别无他意。”马占山遂答应，先与中国各报记者见面后再与板垣会见。马随后在与中方记者见面时表示：“此次中日事件，实属不幸，不过本人守土有责，不能不谋自卫。”并说：“无论日人来此如何利诱威胁，我绝不能为降将军，或与日方妥协。”然而，当板垣与马占山会见时，提出“双方冲突已经过去，此后当各不相犯，保护东亚和平；东北在目前环境下，中日双方必有合作之必要。关东军司令官尊重马主席意旨，希望马主席改变抗日举动，双方立刻停止军事行动，仍将黑省军权交由贵主席担任，以维持东亚和平”。

马占山当即答道：“关于贵代表所提第一项，本主席极端赞成。前次冲突，本主席为保全守土，实为环境促成，此后尚望双方遵照贵代表意见施行。关于第二项，亦极同意，但必须尊重中国之主权，为诚意的亲善。对于中日间的一切纠纷亦望贵国政府与我国政府早日获得正当解决。”

之后，双方接受记者拍照。在赵仲仁的劝说下，双方终于达成妥协条件。

12月11日，张景惠偕秘书长梁雨襄等由哈尔滨过江，至松浦镇与马占山

会晤。马占山答应张景惠任黑省主政，但不得有日本人干涉，并且省方仍拨给马部军费。就这样，马占山同意停火，黑龙江抗战遂告平息。关东军改变战略，于1932年1月初，调集重兵南攻锦州等地，不久，关外尽没，沦为日军铁蹄之下。

消息传来，沪上各团体、机关、工会对马占山的举动难以置信。当时发行量多达十五万份、影响极大的《生活》周刊，从路透社和联合社的消息中风闻马占山已向日方妥协，特致电马占山请其表示态度，以释群疑，电文如下：

齐齐哈尔探投马占山将军，路透社及联合社均电传将军已飞行至沈阳，与本庄繁妥协，如所传果确，将军个人虽生犹死，为事尚小，贻羞民族，为憾极大，请速表示态度，以释群疑。生活周刊社。巧(即2月18日)。

1932年2月16日，马占山到达沈阳，参加伪奉天省省长臧式毅召开的“联省自治”会议。开会前，受日军的威胁，改变会议名称与内容，讨论伪满洲国建国问题，决定新国体为满蒙独立共和国，溥仪为终身元首。17日继续开会，正式决定国体为君主立宪共和国，政体为联省自治共和制。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为委员长，马占山为伪黑龙江省省长，臧式毅为伪奉天省省长，熙洽为伪吉林省省长，汤玉麟任伪热河省省长。限七日内与南京中央政府脱离关系，并令各人签字。马占山未允签字，于2月18日由哈尔滨转赴海伦。

2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宣言，否认东北“独立”及一切伪行政组织。声明“凡东三省或其一部分之分离或独立，与东三省内之一切行政组织，未经国民政府授权或同意者，一律否认之”。

马占山则在是日通电说：“现在惟有一面应付事机，一面另谋瓜代，于最短期间接替有人，应即负咎引退，以谢国人。”他一边宣布引退，一面暗中有所布置。一个多月以后，马占山率队以视察为名出走黑河，重揭抗日旗帜，再次英勇抗日。

4月9日，马占山电北平张学良称：“占山一息尚存，誓本以身许国之初衷，决不负期许之至意。”并称“所有军政机关，即时成立，照常办公”。表示了继续抗日之决心。他稍作部署即率部出发，辗转赴佳木斯与李杜率领的抗日队伍会合，共同作战。

是年7月28日，马占山率骑兵二千余人行至庆城县东山里张河白石柱子山口时，遭到预先埋伏的日军步炮兵千余人的袭击。马部猝不及防，竟全军覆没。少校连长于俊海率官兵一百多人和马驮子五十多匹向北突围，吸引日

军注意；马占山仅率卫队四五十人向东逃入大山。于俊海等被日军追上，于本人及马占山的少校副官刘景芳、少将参议韩述彭等全体官兵被日军悉数杀害。日军搜得马占山图章一枚，而韩述彭血肉模糊，身躯又矮小，日军误认为马占山被击毙，大肆拍照，四下宣传，敌伪各报均载马占山死亡之“新闻”。

马占山在大山中跋涉四十余日，后转道海拉尔投奔抗日将领苏炳文。苏、马等人对日作战失利后，退入苏联境内。

马占山继续抗日后，一度沉寂的“马占山将军”香烟再次出现在上海的市场上。

旁观者清　　西安事变被预测之谜

西安事变发生前，除了张学良、杨虎城等极少数人知道外，连蒋介石安置在张学良、杨虎城身边的特务都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消息。然而，张、杨将要发动兵谏这一天大的秘密，居然被千里之外一个不相干的外人得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蒋介石对其军队的控制、防范是非常严密的，几乎是天衣无缝，他们的一举一动几乎都逃不过蒋介石的眼睛。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将他的得意门生、心腹曾扩情和晏道刚安置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身边。

据曾扩情自己说：1936 年 9 月初，我见张学良和东北军对“剿共”产生动摇，不与红军作战，特以书面详报蒋介石，同时还建议“增派中央劲旅为剿共



西安事变中的两位主角：张学良（左）与杨虎城

主力军；并在西安设一个剿共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营以上军官，施以有关的思想与技术训练；再把在鄂豫皖等省实行的保甲制度广泛地推行到西北地区，以加强民众组训而严整'剿共'的壁垒"。

当时，蒋介石为处理两广事变正在广州，住在黄埔岛上。曾扩情还亲自到广州，当面汇报并将报告交他亲阅。"西北剿总"的调查科长江雄风报告得更为详细，连东北军平时对国民党与蒋介石发的牢骚，讲的怪话，什么人与张学良来往，甚至张学良与谁在一块吃饭等行踪都一股脑儿报告给蒋介石。对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的情况侦探得也很详细具体，报告的内容除了与张学良相同外，对杨的部队中有多少共产党、他们的活动情况、杨虎城的夫人也是共产党员等等情况也都报告了蒋。

蒋介石有时也将特务报告的部分情况转给张学良，但这并不表示他对张学良的信任，其目的之一是让张学良感到他的大度；二是让张学良答复特务密报的问题；第三也是告诉张学良，你做的事我都知道。

蒋介石所进行的特务活动，给张造成了很大的惶恐与心理压力，这点从张学良在1936年7月20日给晏道刚的亲笔函中可知：

> 甸樵吾兄：弟自入关以后，对蒋委员长极端忠诚，弟曾替他解决许多困难，万怨不辞。今日弟处此痛苦环境，这些特务人员对我严密监视，挑拨离间，令人气愤。譬如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学员对提起"蒋委员长"四字没有立正，岂是我教给他们的吗？前线官兵与共产党私有来往，这是秘密，我何能知道，我又哪能管这许多？他们甚至说我与共产党曾有联系，真是无中生有。兄自动去电替我解释，爱我之情，不尽感激。

8月里的一天，晏道刚到南京去见蒋，汇报西安方面的情况。适逢当时蒋介石正在听蒋廷黻讲白皮书的意义，蒋让晏在办公室的外面等待，待蒋廷黻讲完，胡宗南又来向蒋介石汇报，胡讲了好久才退出。因胡宗南汇报的也是西安方面的问题，况且江雄风向蒋报告得更为详细，因此蒋介石对晏道刚的汇报已不重视，只是站在客厅门前听晏的汇报，晏讲了几句，蒋已显露出不耐烦，便对晏说，要东北军配合阎锡山向陕北与陇东的红军进攻，晏道刚本来想向蒋介石汇报东北军的动态，解释张学良的一些想法，由于蒋持这种态度，不能尽其所言，更不能消除蒋、张之间的成见，便返回陕西。10月，蒋介石电令"西北剿总"限期向红军进攻，并直接电令胡宗南一个军三万人编成一个纵队，东北军王以哲部编成一个纵队，在胡宗南部的右翼，齐头推进，进攻红军。胡宗南得蒋介石的命令后，既不向"西北剿总"报告，也不听张学良的命令，又

不与邻军联系，孤军冒进，在山城堡被红军歼灭了近一个师。胡宗南部的被歼，像揪了蒋介石的心头肉，他震怒后又电斥张学良，声言要惩办王以哲。张学良身边有特务们的严密监控，现已遭军事上的失败与蒋介石的责难，上下为难，心情沮丧，数日不到“西北剿总”办公。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

11月29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到洛阳，张学良到洛阳见蒋后，蒋冷眼相向，不容张讲话，张一提抗日即遭其痛骂。后张学良屡次就抗日问题向蒋介石劝谏、苦谏乃至哭谏，都遭到蒋介石严厉拒绝，他甚至大声呵斥张学良：“你们拿手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我的剿共政策！”张学良哭道：“委员长真的不能听我们的忠告吗？”在以惯常手法已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决心进行兵谏。

对张学良、杨虎城将要举行非常行动，识之者有之，这个人就是曾经担任过张学良秘书的钱公来。钱公来，字希古，辽宁黑山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过郭松龄倒戈反奉，郭失败后被关押，出狱后在东北大学任教授，是国民党东北籍老资格的党员。钱公来于1936年12月初从北平跑到南京，对时任民众训练部长的周佛海说：“张汉卿已和共产党妥洽，你知道吗？”周佛海回答：“我一概不知道，这恐怕是谣言吧？”

钱公来说：“事情确凿，张汉卿入陕之后，给共产党打了几次败仗，损失了好几万人，此后他的东北军见了共产党差不多望而生畏。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又有两个近因，第一个是自张汉卿离开北平，他的底下许多人失了业，譬如王卓然他们就加入了人民阵线，有人还说他们加入了共产党。这班人早已钻入

陕西张汉卿幕下，自命为东北军的新派，日日怂恿张汉卿‘左’倾。第二个原因是五全大会张汉卿提出王树常和他的秘书为中央委员，然而陈立夫选出不知名的CC系派人物，使张汉卿和他底下的人都不满，这班失意的先生们更日日怂恿他反对南京。我们为着国家，为着汉卿个人，也应该设点法，周先生，你和汉卿是好朋友，所以我请你有机会劝劝他，以免他走入自杀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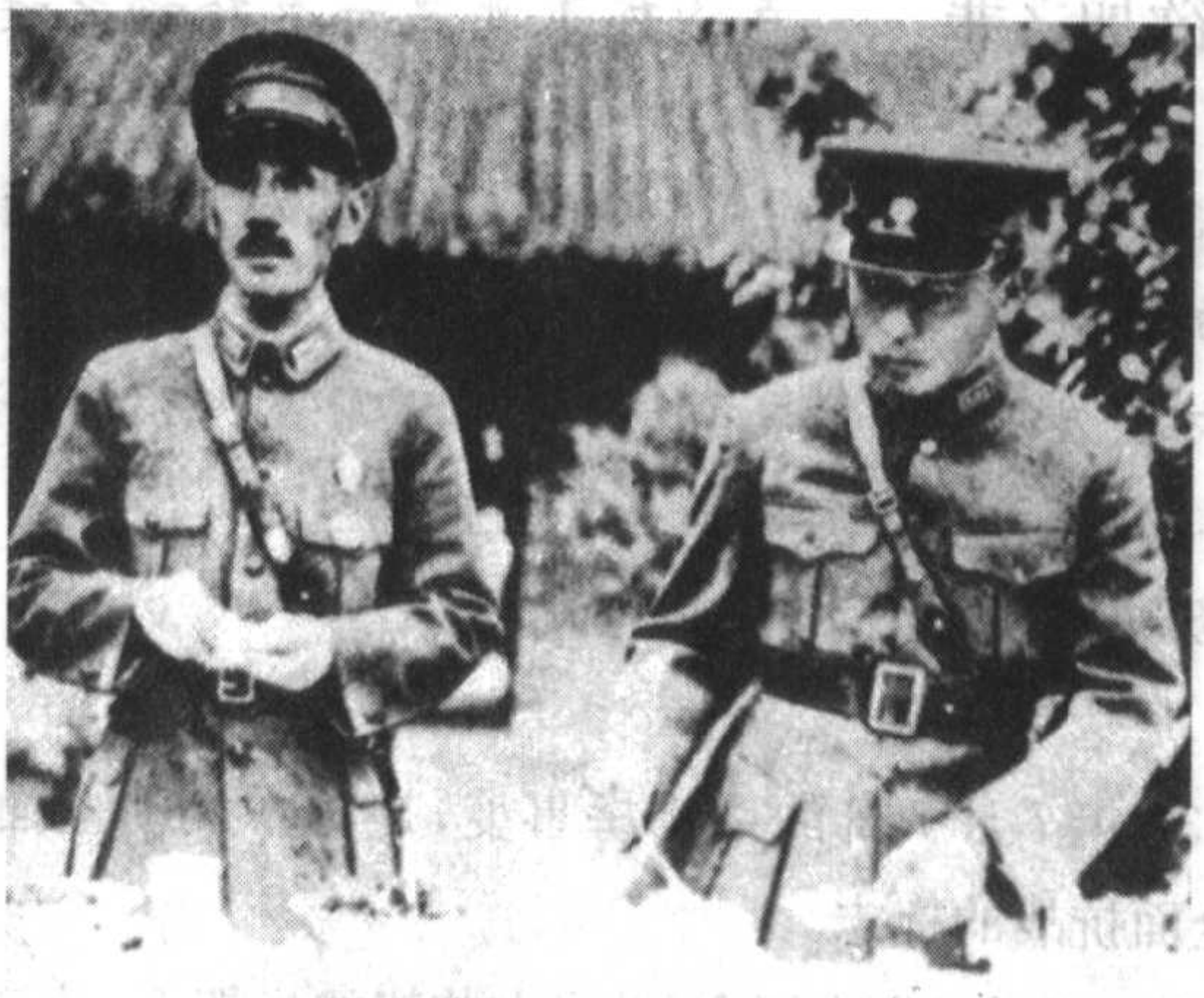
周佛海进一步问：“他怎样和共产党妥洽？”

钱公来说：“东北军不打仗已大半年了，他们不打共产党，共产党也不打他们，听说他们还做军械的交易，东北军预先把军械埋在指定的地下，共产党来时一哄就走。等到共产党拿到军械，把购买军械的钱埋在原处，东北军又哄回来去拿，这样的交易，各得其所。”

周佛海问：“这样的大事介石毫无所闻吗？”

钱公来说：“这个我不知道，蒋介石也许知道一点风声，但知道又哪能奈何张汉卿？”

周佛海又问：“他们为什么不打共产党？”钱公来说：“他们主张抗日，收回失地，打回老家去。这样下去，我看最近西安要发生事情……”



张学良与蒋介石

周佛海对钱公来的话将信将疑。恰巧12月8日，蒋方震由上海来到南京，他是应蒋介石的电召到西安晤谈军事，顺便到西北考察的。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曾到日本与德国学习、研究军事。曾任保定军校校长，在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和唐生智等幕中参襄决策，对国内外军事知之甚详，料事如神，是国内外公认的军事战略家，被称为“兵学泰斗”，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顾问。

周佛海将从钱公来口里得到的张学良与东北军的情报告诉了蒋方震，并对他说："你最好只到洛阳为止，再不要上西安，恐怕东北军旦夕有变，不要受那无辜池鱼之累。"蒋方震认为这是天方夜谭式的消息，根本不相信，还是决定去西安。

11日，蒋方震从南京飞到西安。时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军事大员云集西安，蒋介石驻跸在临潼的华清池，调兵遣将，准备大举围攻陕北红军，西安的气氛异常紧张，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内战一触即发。

12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囚禁了蒋介石，将蒋方震等国民党军政大员一网打尽，关进了西京招待所。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制止了内战，使蒋从内战的战线上转到抗战的战线上来。

月晕而风，见微知著，钱公来能从表面现象中预测到西安将要发生变故，还是很有预见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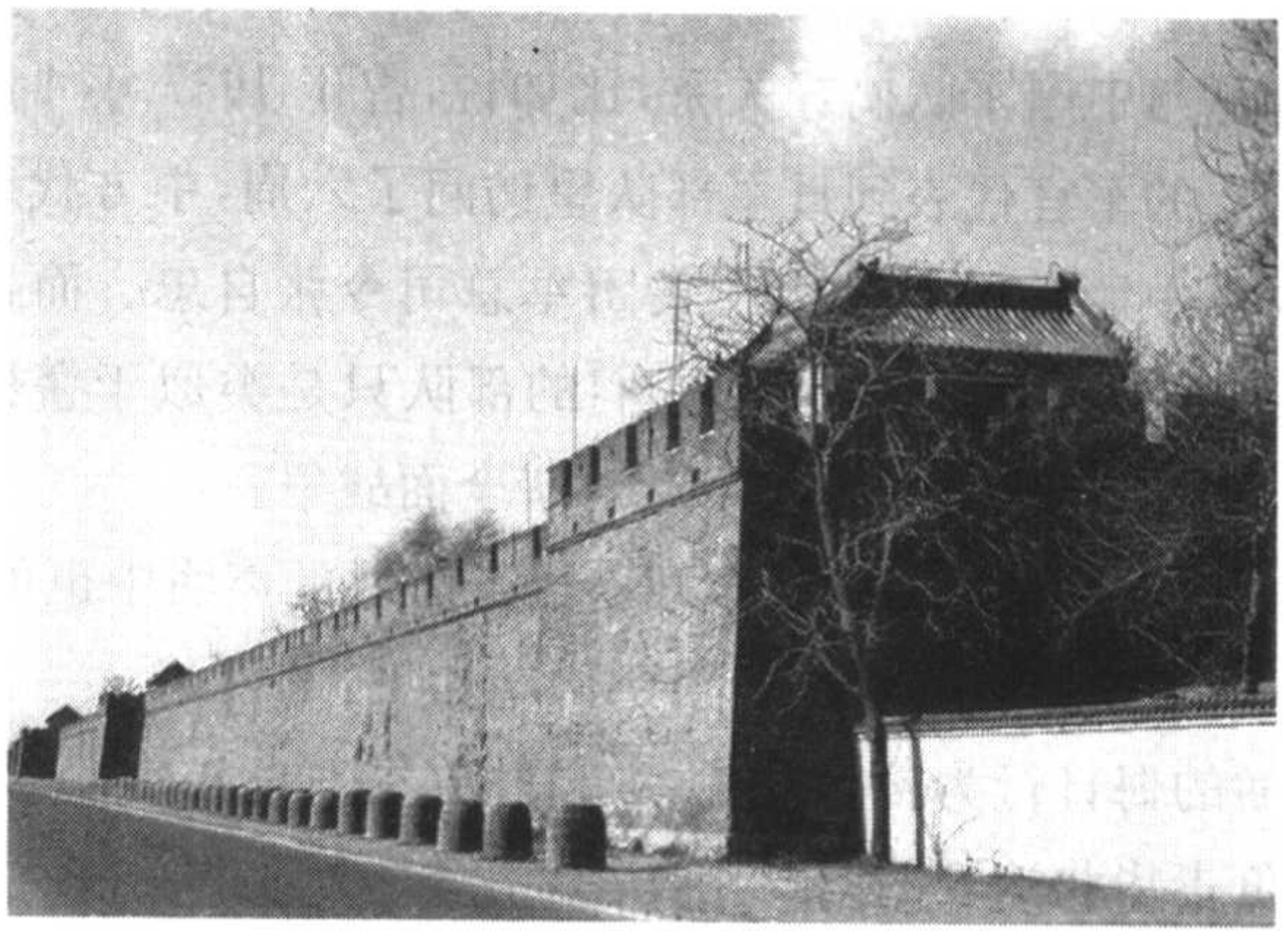
欲加之罪　　卢沟桥事变第一声枪响之谜

发生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为了推脱战争责任，日本方面一直声称，战争的"第一枪"发自中方军队，而正是这一枪才引发了后来的战争。中国方面则否认了这一说法，认为这是日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日本侵略者在栽赃。

让我们把历史拉回到六十年前的那个夏天。

发生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全面抗战的标志。

7月7日下午，驻丰台日军在大尉清水节郎的指挥下，故意将演习地点放在我卢沟桥驻军二十九军驻地附近。晚10时30分左右，日军演习场上突然响起几阵枪声，这是日军所射。但清水节郎却向上级报告，诡称听到宛平城内发枪数声，一名士兵去向不明。其实那个叫志村菊次郎的传令兵只是在队伍行进过程中因为小解临时掉了队。二十分钟后他就归队了。可是日本军官却借题发挥，立刻包围了宛平县城。中方派出人员与日方谈判，但日方根本没有诚意，坚持要到城内搜查。最后双方决定共同派人到宛平城调查，待



宛平城因一场战争永远载入史册

真相大白后再商谈处理办法。可是没等中方人员走出日军兵营，就发现日方三百多士兵已分乘八辆大卡车向卢沟桥方向开去。中方谈判人员也向卢沟桥赶去，在距宛平县城半公里处，发现日军已经布防，准备进攻。此时，日军限中方人员十分钟内作答，否则战事爆发由中方负责。我方人员进城后，城外日军便向城内开火，不久又使用了大炮，多枚炮弹命中专员公署。此时驻扎在卢沟桥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吉星文部接到上级命令后予以还击，至此，七七事变发生。

然而多年来，日本方面有相当一部分人否认这第一枪是由他们而发，或者认为其真相已无法查清。即使在抗战胜利后，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当追究日本战犯在战争中的责任时，关于这一点也是语焉不详。因为日本是战败国，故所有的机密档案都是公开的，人们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当年日本关东军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全部材料，却未能发现日军策划卢沟桥事变的材料。因此，战后远东国际法庭认定了九一八事变的责任方，但却没有弄清卢沟桥事变的内幕。后来原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在远东国际法庭提出的起诉材料，也未提到谁开第一枪这个敏感的问题，这益发引起学术界的争论。

按照日方的说法：1937 年 7 月 7 日晚，一支日军小分队在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突然间传来一阵枪声，随后，日军在清查人数时，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日军认为刚才的枪声来自中国军队的阵地，他们已遭到袭击，遂下令还击，故冲突乍起。但当晚的冲突过后，那个失踪的士兵又回来了。士兵称，他当时闹肚子，方便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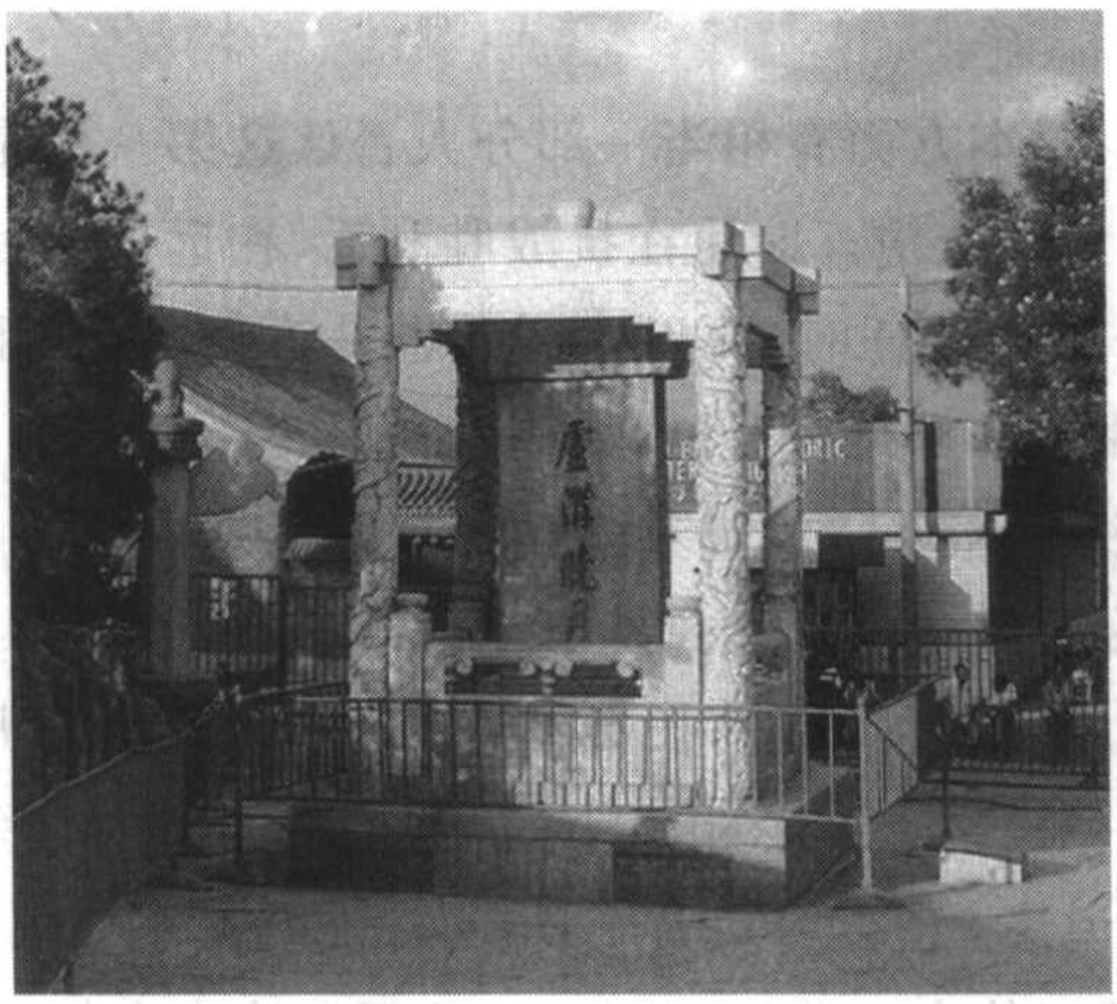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们还指出，要考虑中日双方在卢沟桥的驻军兵

力，当时驻扎在卢沟桥的是冯玉祥系的二十九军，而日本军队则是“天津驻屯军”，他们还有意与中国军队搞好关系，比如说，曾于1937年4月主动邀请了二十九军连以上的军官代表到日军部队里访问了六周，中方代表团团长就是后来在宜昌战役中牺牲的我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而日方竭尽讨好之能事，就是出于底气的不足，因为他们的部队只是类似于警察的维持治安部队，人数少，质量差，根本不足以发动对华全面战争。

另外，从1937年7月11日日本政府出兵华北的声明中也可以看出，日方从一开始就认为是中方首先开枪。声明内容如下：

“中国方面的侮日行为接踵发生，中国驻屯军对此正在隐忍静观之中，一向与我合作、负责华北治安的第二十九军，于7月7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内一片亢奋，他们一致要求严惩中国。在当时的日本，大部分是事态扩大派，一片喊打之声。但在这时，也有一些较为理智和清醒者，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当年九一八事变的具体策划者，时任陆军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就极力劝阻扩大派说，卢沟桥事件最多扩大到华北，不可向中国全面开战。因为凭着日本有限的国力、人力，远不可发动对中国的全面进攻。否则，必将陷入中国的持久抗战之中，日本很可能会被拖垮。



卢沟桥上的“卢沟晓月”曾经引起多少文人墨客的想像，曾几何时，它又成了一段屈辱和灾难的象征

那么，到底是谁开的第一枪呢？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认为，卢沟桥事变很有可能是隐藏在二十九军中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或受共产党鼓动的青年学

生首先向日军开枪而引发的。因为从动机上看，共产党最希望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而当时的苏俄也最希望中日开战，以减轻自己在东方的压力。而且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仅一天多时间里，远在延安山沟里的共产党便发出了坚决抗战的通电，反应之快让人吃惊。而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则迟至事变发生后的第十天，才在庐山发表了对全体国民的抗战宣言。

以上种种说法均为猜测之言，并无确实之证据。当时枪响的情况，据日方统计，大概为十八响，然来自何方，弹着点何处，均无说法，也没有一个人受伤。至于说驻防在卢沟桥附近的日本军队有意向中方讨好，那不能仅以邀请中方军官代表团参观定调。因为日军的挑衅行为也同样数不胜数。另外，虽然在日本高层人物中不乏所谓的“稳健派”人士，但他们在侵华的目的上是一致的，分歧的只是策略问题。而且，对那些在基层军队的狂热分子也是鞭长莫及的，不足以阻止他们做出疯狂的举动。



卢沟桥的石狮子

而所谓是中共地下党员或热血青年首先开枪的说法也没有真凭实据，因为当时日方在这一地区演习频繁，平时也是枪响不断，为什么单单“七七”晚间的枪声突然演变为全面进攻中国的信号，显然这一主动权是由日方掌握的。而中国共产党反应迅速，那是一贯坚持的抗日方针。而国民政府方面，对于战与和则有非常复杂的考虑，需要时间做出判断，这些都是能够理解的。

其实，七七事变的发生并不在于谁先打的第一枪，许多有识之士早就指出，这场战争就像一块被推上悬崖的巨石，什么时间落下来是必然的事。卢沟桥不是在日本，而是在中国，在中国境内响起的枪声，不应是日军发动大规模侵略的借口。

事实上，由日方打响第一枪的证据却历历在案，卢沟桥事变七年后，当时指挥日军挑起事端的最高长官牟田口已升任中将，任侵缅第十五军司令官。他追忆当年之事，曾对人说："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人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本人对此必须负责任。"（见[日]儿岛襄《太平洋战争》，东京 1975 年版）牟田口在笔记中也写道："我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导致卢沟桥事变，终于发展成这次大东亚战争。"（见[日]小俣行男《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太平洋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年中译本）虽然有人辩解说，牟田口指的这"第一颗子弹"只是个抽象的概念，但由日本挑起这场战争的事实却是抵赖不了的。

以水代兵　黄河决堤策划者之谜

1938 年 6 月，日军沿陇海铁路向西进攻，妄图夺取郑州，南下武汉。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以滔滔黄水阻挡日军的进攻。蒋介石的这一不光彩的"抗敌"手段，至今仍遭到历史的谴责。但是，这个计划并不是蒋介石的主意，而且在抗战爆发的两年前就已经制定出来。这个秘密，直到翻阅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密档后才显露端倪。

1938 年 6 月，日军沿陇海铁路向东进犯开封、中牟等地，7 日，赵堤附近黄河河堤被炸决口，汹涌的河水阻止了日军的前进，打乱了日军的军事计划。

当时中央社报道：七日敌轰炸黄河河堤，赵口附近河堤崩溃，水流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敌我遂沿黄泛两岸成对峙形势。而日方报道是：中国军队在三刘砦（中牟西北十七公里）及京水镇（郑州北十五公里）附近掘开了黄河。汹涌的浊流向东南方奔流，中牟首先进水，逐日扩大，从朱仙镇——尉氏——太康，一直到影响到蚌埠。

其实，黄河决口以水代兵是蒋介石抗日计划的一部分。

1938 年 4 月，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正在举国欢腾之际，陈果夫首先提出在黄河决口，阻挡敌军的建议。他在汉口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呈函："惟黄河南岸千余里，颇不易守，大汛时且恐敌以决堤制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水反攻制敌。盖沁河口附近，黄河北岸地势低下，敌在下游北岸任何地点决堤，只需将沁河口附近北堤决开，全部黄水即可北

趋漳(河)、卫(河),则我之大厄可解,而敌反居危地。敌人残酷不仁,似宜预防其出此也。”之后,还有一些将领也提出决口黄河阻敌之建议。

5月,日军云集徐淮地区。中国军队放弃了战略要地徐州,战事转移到陇海线上来。17日,日军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一部,由新兴集向兰封以东的仪封前进。18日,土肥原部主力由山东菏泽南下,从濮阳渡河,向铁炉集南进,直插兰封,企图截断中国军队的退路。19日,进至仪封的日军与宋希濂部发生激战,到21日,该敌进至兴隆集附近,罗王砦、白砦附近均有战斗。俞济时、李汉魂、宋希濂三个军向兰封、杨堌集急进。胡宗南军团由开封方面沿铁道东进,与进至罗王砦、三义砦的日军展开交锋。然而日军不断增援,有一部已开始由陈留口南渡。在兰封方向,日军已突破宋希濂部防线。

28日,战略要地归德(即商丘)沦陷敌手。另一路日军沿陇海路东进,29日进至宁陵附近。此时,日军对中国军队的合围之势已形成。第一战区司令程潜决定应避免与敌主力决战,命令各军向平汉路以西地区撤退,兰封西侧之敌趁势向河南省会开封前进。6月6日,中国军队放弃开封,敌占开封后,即分攻中牟和尉氏,旋即占领。

中牟距郑州不及二十公里,日军此刻如无人之境,向西猛进。当时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西退计划尚未完成,日军一旦占领郑州,控制了中国的铁路枢纽,再沿平汉线长驱南下武汉,切断长江,将中国从南到北一刀两段,那中国的抗战大计就会遭到破坏。在关键时刻,蒋介石决定实施以水代兵计划,炸开黄河,阻止日军迅速前进的步伐,迫使其改道,逆长江西上武汉,而中国军队则可以沿江布防,节节抵抗,延缓日军进攻速度,为国民政府西撤四川赢得宝贵的时间。

1938年6月8日上午8时,蒋介石命令炸开郑州花园口段黄河大堤。随着“轰隆”、“轰隆”几声巨响,世界发生了变化。滚滚黄河洪水失去了控制,没有了理智,一泻千里,泛滥成灾。夺去了无数人民的生命、土地和家园,黄泛洪涛挟巨流入贾鲁河、淮河。据国民政府的报告:百万人死于洪水,五百万人流亡他乡。然而,日军的战车、大炮及重型装备都陷入泥沼之中,狼狈不堪。日军的战略计划被破坏了。据敌方的报道:“黄水南流入淮,不仅对于华北战局发生重大影响,将来华中战局亦将受其影响。”

六十多年后,一位当年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东史郎对此记忆犹新。1997年8月,他来南京参加日本南京大屠杀学术讨论会,谈及豫东之战时,东史郎眯起眼,陷入沉思。半晌,他在纸上写下“开封——大洪水”的字样。可

见，此事在他脑海中的深刻印象。

蒋介石成功实施以水代兵的计划后，密令程潜对外宣传“敌机炸毁黄河堤”，经手制造黄河决口的负责人之一商震，奉命拟定“日寇掘堤”的对外宣传电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还公开发表“敌机炸毁黄河堤”及“救济灾区”决议等三项报道。

抗战胜利后，当年这段秘密大白于天下，蒋介石的这一不光彩的“抗敌”手段，至今仍遭到历史的谴责。然而，向蒋介石建议“黄河决口”的“罪魁祸首”却另有其人。

此人就是蒋介石的秘密之剑——德国顾问法肯豪森。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1878～1966)，德国陆军上将。1900 年，法肯豪森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参加过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回国后，他进入柏林东方学院学习，曾出任德国驻日本东京大使馆武官。1930 年，法肯豪森退休。

1934 年，法肯豪森被蒋介石聘为军事顾问来到中国。1935 年 7 月，法肯豪森秘密为中国统帅部制定抗日计划，奉命起草了绝密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将中日矛盾摆到了目前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委婉地批评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政策，认为政府若无抵抗的意志，会影响人民的抗日决心。

法肯豪森分析未来的中日战争：一旦中日军队发生军事冲突，华北即面临直接的危险。如果中国军队失利而放弃黄河以北，则纵贯南北的平汉、津浦铁路以及东西方向的陇海铁路和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如开封、巩县、洛阳，皆面临直接危险，黄河防线有被敌人从山东突破进而席卷而下的可能。为了防止出现上述不利局面，必须设法将日军引到东部。一旦东部出现战事，敌人侵入的路线有三：上海、乍浦和镇海，该三处俱在长江流域。敌如沿长江而上，迅速占领中国最重要的中心点武汉，将中国一分为二，切断国民政府西退重庆之长江水路，抗战大局将无法收拾。因此，“东部防御有两事极关重要，一是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即南京)，两者有密切之连带关系”。他驳斥了“屡闻长江不能守之议”，认为必须在上海、南京等地作坚决抵抗，迟滞敌军沿长江直达武汉。如此，敌军必欲打通平汉线，由郑州直达武汉，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以沧县(沧州)、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万一敌军打到开封、郑州时，法肯豪森建议：“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这就是说：必要时将掘开黄河，以水代兵，挡住敌军的进攻。蒋介石在旁边批示“最后抵抗线”，表示赞同法肯豪森的建议。

三年以后，中日战争的发展基本上按照法肯豪森的预测进行。七七事变

后，日军占领北平、天津；为防止日军在保定附近击溃中国军队，沿平汉线南下，中国军队在上海主动出击，“八一三”事变爆发。在作了三个月的坚强抵抗后，中国军队撤出上海，沿长江西上，节节抵挡。日军占领南京后继续北上，企图与山东南下的日军南北对进，会师徐州。同年5月下旬，日军占领徐州后，沿陇海路西进，准备夺取郑州后，沿平汉线南下，一举占领武汉。就在日军即将打到郑州的前夕，蒋介石命令炸开了黄河。

当中日两国全面大战之际，德国与日本站在一边。1938年5月下旬，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召回所有德国在华军事顾问。7月8日，法肯豪森和二十多名顾问被迫离开了中国。回国后的法肯豪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德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陆空司令，后因涉嫌谋杀希特勒而被捕入狱。1966年死于柏林。

不择手段　冈村宁次偷地图之谜

冈村宁次在侵华战争中曾担任过日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他指挥的日军使用的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不是日军测绘的，而是1927年冈村宁次从北洋军阀、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司令部中偷走的。那么冈村宁次怎么会干出“蒋干盗书”那样鼠窃狗偷之事呢？

冈村宁次，绰号泥瓦匠。1884年5月15日生于日本东京石坂町。少年时代的冈村宁次渴望当一名真正的军人。他在中央幼年学校毕业后，便报考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毕业后，又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步兵科。在校学习努力，训练刻苦，并在头脑中植入了效忠天皇的愚忠思想。他认为万一在对外战争中阵亡，“肉体虽死，灵魂犹存”，“贯彻忠节无死无生”。他最感兴趣、最着魔的问题是研究中国问题，梦想使那块广袤神奇的土地，变成殖民者的乐园，因此



孙传芳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和冈村宁次是同学

把侵略中国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

冈村宁次以优异的成绩从士官学校毕业后，被授予陆军少尉军衔分派到步兵第一联队补充队任队附。他兢兢业业，干得很卖劲，并盼望立即有战争爆发。

1904年日俄战争的锻炼，使冈村宁次成熟了不少。以后只要有战争，他都要求去前线，接受战火的磨炼，增长才干。日俄战争结束后，冈村宁次调驻朝鲜。1907年12月，他奉调回国，在母校东京士官学校担任学生队队长。与此同时，他为了晋升高级军官，在校任职的同时，又学习专业知识，准备报考陆军大学。当时，清朝政府向日本派了大批留日学生学习军事，1907年秋天的这批留学生共一百零八人，校方将他们分别编入学生队的第三、四、五、六队，冈村宁次是第三队队长，这个队中不少人日后成为驰骋疆场的一代名将，例如孙传芳、阎锡山、陈仪、卢香亭、周荫人等。冈村宁次对他们管理很严，经常打骂。一个星期天，孙传芳和他的结拜兄弟卢香亭、杨文恺、周荫人等外出喝酒，个个醉醺醺而归，被冈村宁次撞见，当场打了他们的耳光，并骂道："像你们这种散漫、落后、不思进取的民族，早晚会被我们消灭掉！"都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孙传芳仗着酒劲也回骂了一句，于是两人抱做一团，打了起来。虽然，冈村宁次占了便宜，将对手打得鼻青脸肿，但他也佩服孙传芳的胆量。不打不相识，从此两人过从甚密，竟成了朋友。日后，冈村宁次成了孙传芳的高级军事顾问，也有这一层旧关系。1909年，孙传芳在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回国，冈村宁次则于次年考取陆军大学第二十五期继续学习。

1914年8月，冈村宁次被调到参谋本部任中国班员，这是专门综合分析研究来自中国的情报的一个部门。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加入英、法等协约国，对德国宣战，出兵强占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围。冈村宁次以参谋本部派遣人员的身份，到"青岛围攻军"司令部工作，任务是搜集日德战争的相关情报。

从此，冈村宁次就与中国"结缘"，经常在中国北方的土地上往来，搜集情报，从事间谍活动。几年间，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一套间谍网。当时，他的学生阎锡山已成为山西省的统治者，他数次去山西造访阎锡山，与之建立了密切关系。在他的牵线搭桥下，阎锡山将山西一个铁矿的开采权让与日本财阀三井株式会社，而三井则供应阎锡山所需的各种器材和装备。冈村宁次与阎锡山还保持了密切的私谊，抗战期间，冈村宁次在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任内，双方之间达成一种默契。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日本投降及国共内战结束，蒋介

石逃离大陆，还余音袅袅。

1923年8月，冈村宁次升任中佐，为参谋本部第二部（中国班）部附。12月来到中国上海，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这时，中国政局动荡，军阀混战，他的学生孙传芳已是直系军阀的得力大将，在中国军事舞台上崭露头角，授陆军上将。

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孙传芳与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联手，乘机进攻浙江，夺取杭州，进军上海。北京政府任命孙传芳为浙江军务督理兼浙闽巡阅使，孙有了属于自己的地盘，崛起东南，令各方刮目相看。冈村宁次不断到杭州与孙传芳讨论局势，帮助他出谋划策，企图让孙成为东南霸主，从而使日本获得更大的权益。

江浙战争的结果，皖系军阀惨败，直系力量空前膨胀，引起关外张作霖的嫉恨，发兵进关。直系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大总统曹锟，吴佩孚大败。奉军南下，长驱上海，与孙军对峙。孙传芳以屈求伸，遂与奉军妥协，退回浙江。

1925年10月，孙传芳联络苏、皖、赣、闽各省军阀，吹响反奉号角，分兵三路，进攻上海、南京等地。奉军战线太长，顾头不顾腚，仓皇北逃。孙传芳组成东南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杀进南京，渡江挥军北上，一口气将奉军撵到山东境内。反奉战争的迅速胜利，奠定了孙传芳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的霸主地位，开府金陵，雄踞五省，自成一系，野心大炽，想吞并全国。他特别感激冈村宁次的情报和谋划，为了再进一步扩大地盘，特聘冈村宁次为高级军事顾问。冈村宁次将此事请示参谋本部，该部认为日本支持孙传芳，对排挤英美势力，发展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力量大有好处，于是将冈村宁次作为军务局编外人员，同意其到孙传芳处充当军事顾问。冈村宁次在东南五省联军中应付裕如，得心应手，原因是他的学生在五省联军中多充当要角。如浙江总司令卢香亭、浙江第一师师长陈仪、福建总司令周荫人、总参谋杨文恺等。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以消灭北洋军阀为目标。北伐军在国民的积极支持下，势如破竹，迅速夺取湖南、湖北，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原是抱着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想等两败俱伤时再动手击败北伐军。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长沙会议上决定，分兵进攻江西，打到孙传芳的五省地盘上来。孙总司令只得慌忙发兵援赣，自己亲自坐镇九江，将总部设在“江新号”轮船上，冈村宁次的舱房就在孙指挥室的隔壁。当时，孙传芳的舱房内挂着一幅五万分之一的华中地区军用地图，那是他为进取武汉，彻底打败北伐

军而准备的。这种军事地图是留日学生回国后，运用所学专业知识测绘而成的，绘图方式与日本完全相同。由于印制很少，各指挥机关都极为珍视，按绝密文件保管，极难获得。尽管冈村宁次备受孙传芳尊敬，经常请教作战事宜，但却不让其接触地图。

一次，正当孙传芳站在地图前思索军事方案时，冈村宁次突然跨了进来，孙传芳连忙拉起幕布将地图掩上，而冈村宁次用眼角一瞥，便发现是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宝贝”，顿时心中狂喜，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应付几句便退了出来。军事地图对军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地图。尤其在当时的条件下，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对一个间谍出身的军人来说具有何等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于是他下决心将地图偷到手。

某次，冈村宁次去南昌前线协助卢香亭作战。当冈村宁次做好作战计划后，卢便要求他将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带回九江的联军司令部，冈村宁次如获至宝。他到达九江时，战局发生急剧变化，孙传芳“江新号”轮船下锚的旁边，停靠了从下游来的装满弹械、军衣的“江永号”轮船。在北伐军逼近九江时，中共九江地下党为支援北伐战争，派便衣爬上轮船，点燃了堆放军衣的船舱，引起大爆炸，该轮下沉。孙传芳急令“江新号”起锚，驶往下游。此时，岸上的北伐军炮火又向江面上开炮轰击，冈村宁次乘机雇了条小船，在船夫的帮助下，将小船摇到停泊于九江江面上的日本旗舰“安宅号”旁。旗舰上的日本军官看见冈村宁次一身中国士兵的打扮，不准他上舰。突然冈村宁次看见甲板上有一名他认识的参谋，这样，舰上才放下软梯，惊魂未定的冈村宁次才得以脱险。在仓促中，他丢弃了所有的行李物品，却冒着生命危险，将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军用地图“偷”了出来。

冈村宁次回国后，将那份地图交给参谋本部，获得嘉奖和一笔巨额奖金。一年之后，那份地图被印制出来。

1937 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曾洋洋得意地说：“武汉作战时所用的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大部分是我秘密搞到的。”当时，他被陆军大臣任命为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官，隶属华中派遣军，参加攻取武汉的战役。武汉地区地形十分复杂，这些地图使日军便于熟悉华中地区的地形地貌。冈村宁次每天都用有色铅笔把部队的进展情况标绘在桌子旁边的那份地图上，他甚至把被日军占领的山头一个一个地标记下来，随着部队缓慢西进，那份地图上渐渐出现了一些细小的碎点，这些碎点看起来很像衣服上的碎点花纹。冈村宁次望着地图，“常常希望这些碎点早日连

成一片”。

在华中作战中，尤其是在武汉地区作战中，一位日本军官曾说：“武汉作战和中国大陆各次作战，多亏有这份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只是由于局部（特别是距主要道路较远地区）不够精确，也曾为作战带来一些差错。”在以后日军发动的南昌作战、襄东会战、赣湘会战等战役中，那张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都派上了大用场。

“不带刀的将军”　冈村宁次军刀下落之谜

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军刀，可以称得上是“第一军刀”，因为它代表了最高指挥权。按照国际惯例，战败者必须向胜利者交出象征权力的军刀。而在日军受降典礼上，冈村宁次并没有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交出自己的军刀。那么，冈村宁次的军刀又到哪里去了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宣布投降。投降的主要仪式之一，便是由战败方代表在受降典礼上向战胜方代表呈交军刀，即举行收缴副武器之仪式。然而，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考虑到战后东西方战略新格局，为遏制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美国还需要利用日本以牵制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因此对日本网开一面，不做犁庭扫穴的打击，在政治上允其保留天皇制。另外，还规定日本投降时，不举行象征屈辱性的收缴副武器仪式。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致冈村宁次“中字第十七号备忘录”内容如下：

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规定：

一、日军缴械时，不举行收缴副武器之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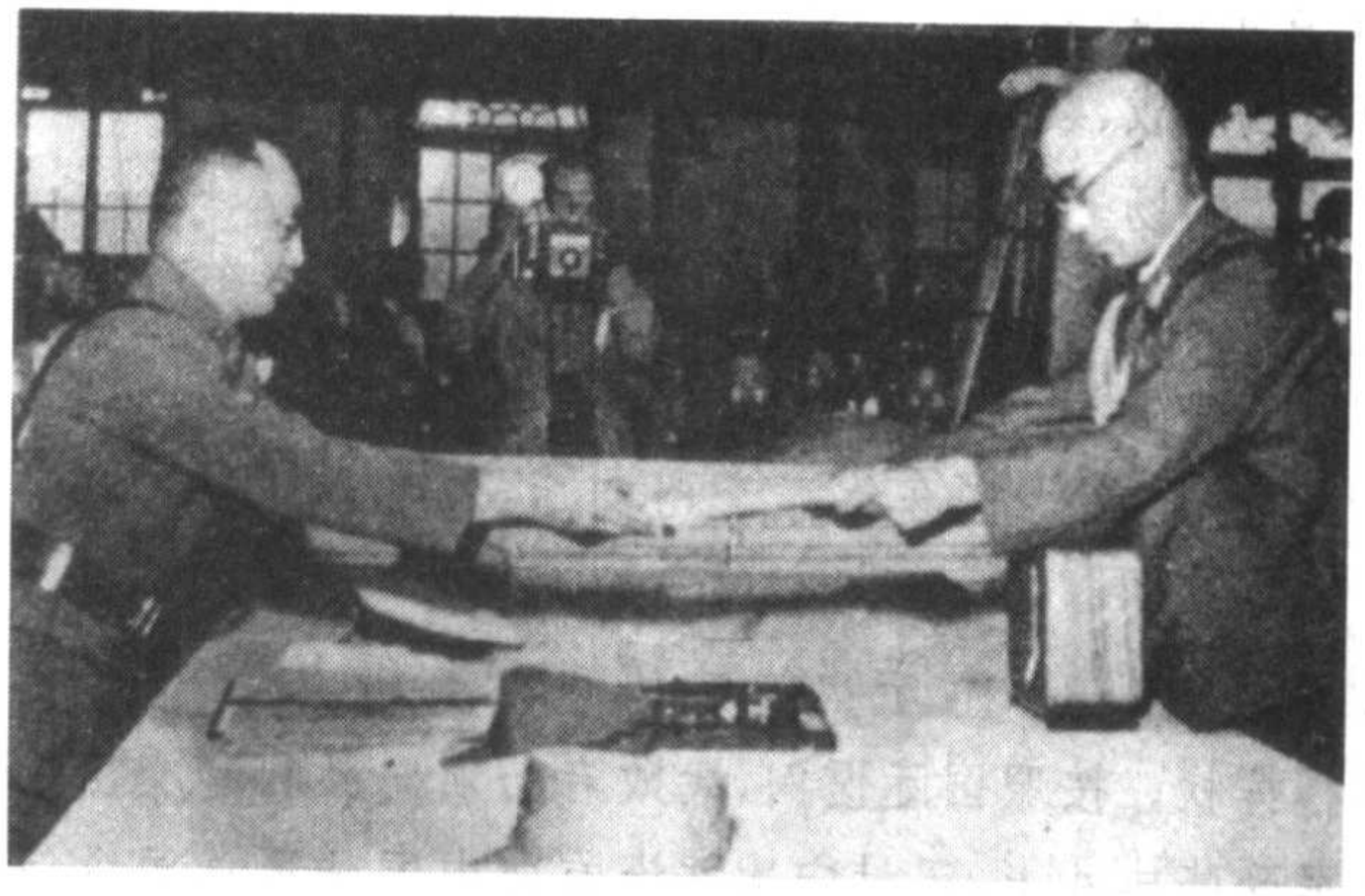
二、日军代表于正式投降时，不得佩带军刀。

三、凡日军所有军刀，均应与其他武器一律收缴，一俟正式投降，日军即不得再行佩带军刀。以上规定，在中国战后一律适用。



何应钦

9月8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到南京，便秘密派参谋去冈村宁次的住处，告诉冈村："在举行投降礼时，可以佩带指挥刀，但必须呈缴给何应钦，也可以不带指挥刀，事先呈献。"



1945年，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向何应钦将军呈递降书

冈村宁次感激万分，愿为"不带刀的将军"。这样，两下达成默契。中国方面决定在日军投降签字那天，在私下里解除冈村宁次和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的军刀，并将这三把有特殊意义的军刀分献于参与受降仪式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和副总参谋长冷欣。

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仪式的会场，设在黄埔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即原中央军校大礼堂）。

9月9日上午8时45分，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大将等七人乘车而来，在中外记者频频闪动的镁光灯下，苦着脸进入礼堂的左侧休息室。他们当即解下所配军刀，请中方人员转交何应钦等人。

8点56分，何应钦等中国政府受降官员走进礼堂，全场中外来宾不约而同地纷纷起身，热烈鼓掌。摄影记者纷纷拍照。何应钦坐在受降席的正中，左边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右边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

8点58分，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次等七人由中国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从礼堂正门入场。他们走到受降席前，脱帽向何应钦等人弯腰鞠躬。何欠身作答，命令他们在投降席就坐，并宣布"摄影五分钟"。

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交证明文件，冈村命小林浅三郎总参谋长递交给何

应钦。何一一检视，然后将日军投降书中文本两份及受领证交给萧毅肃，转交给冈村宁次。冈村起立，毕恭毕敬双手接受，坐下匆匆翻阅降书，然后手握毛笔，分别在两份投降书上签名，又从上衣右上袋中取出一枚圆形水晶图章盖于签字之下，起立将降书呈递给何应钦并向其点头。何微笑起立答礼，接过降书。何的这一举动违反了盟军的规定，使在场观礼的盟军军官们交头接耳，表示不满。

冈村宁次心里充满了感激，后来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心中的感受："看到我这位老朋友的温和品格，不禁想到，毕竟是东方道德。"

何应钦在降书上签名盖章后，将其中一份交给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此刻时钟正好为9月9日上午9时。

何应钦宣布："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已在南京顺利完成……"

冈村宁次等日寇大员的军刀就这样到了何应钦等人的手中。不久，何应钦将冈村宁次的军刀带回老家贵阳。他在贵阳市八角岩建造"敬之植物园"，并将冈村宁次的军刀转赠于亲信张涛保存。

张涛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生，久随何应钦任副官。1941年冬任第一四〇师（师长李棠）副师长时，他被蒋介石以"私树党羽，破坏团结，图谋不轨"的罪名撤职查办，后在何的庇护下任重庆行营警卫团团长。1948年底，国民党大批主力部队被消灭后，蒋介石决定在贵州成立新军。何应钦力荐张涛任第三二八师师长。任命发表后，张涛由重庆到南京接受蒋介石的召见。次年4月，该师组建完毕，隶属刘伯龙第八十九军。



顾祝同

1949年11月，解放军进入贵州以后，国民党第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向解放军某部接洽投诚，在安顺被谷正伦诱杀，张涛接任第八十九军军长。而此时，张涛亦有意向解放军投诚，在地下党的联系下，12月，张涛第八十九军终于通电起义。

在此之前，张涛已将冈村宁次的军刀转送给同乡史肇周。此人是贵州凤冈县臭名昭著的大恶霸地主，解放军进入贵阳以后，他感到末日来临，1949年底，他纠集了土匪几千人，自封司令，挎着冈村宁次的指挥刀，指挥手下一帮匪徒袭击解放军小分队，杀害了不少干部和积极分子，无恶不作，一时间成为

凤冈县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他的嚣张气焰直接影响了解放军发动群众和肃清残匪，为此，贵州军区多次组织部队围剿史肇周的土匪武装。史肇周遭到重创，手下只剩下一千多人，但他仍不死心，企图负隅顽抗。

1950年夏，史肇周在德江县落入解放军的包围圈。疯狂到极点的史肇周，腰间挎着冈村宁次的军刀，手中挥舞着两把盒子枪，左右开火，拒不投降。解放军为瓦解土匪，向密林深处的史肇周连续喊话，要他放下武器，立即投降。打红眼的史肇周连连开火，垂死挣扎。于是，解放军用两挺机关枪瞄准，专打史肇周。“哒哒哒”，一阵清脆的枪声，子弹像长了眼睛，一起打在史肇周身上，史立即毙命。后来一数，他全身上下共中弹二十多处。

史毙命后，冈村宁次的军刀遂成为解放军剿匪的战利品，曾被贵州军区作为剿匪成果公开展览，至1951年秋结束。此后不少实物和图片资料都被装箱封存在贵州军区政治部的一间小库房中，冈村宁次的那把军刀从此便无消息。

刀下留人　　孙元良逃生之谜

孙元良，黄埔一期生，台湾著名演员秦汉的父亲，官至国民革命军中将、兵团司令。国民党溃败后撤退至台湾，闲云野鹤，悠哉晚年，已活到一〇四岁，至今仍健在，是黄埔一期惟一在世的人了，堪称寿星。

然而奇怪的是，根据档案上的记载，早在北伐期间，他已经明令被军法从事，白纸黑字，至今犹存。

此事发生在1926年10月初，该年夏天，北伐军已经取得两湖战场的胜利，于是挥师江西。孙元良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团长，在打下南昌后，其部负责牛行车站的守卫。因为孙传芳军队突然反扑，以至惊惶失措弃阵而逃，致使南昌失守，北伐军遭到出征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

这事让蒋介石恼羞成怒，因为自北伐以来，由于将共产党人清洗出第一军，第一军的战斗力已是江河日下，因此有必要对部队进行整顿。另外，根据国民党军队的“连坐法”，孙元良也确实罪无可逭，正好以此为儆。果然，在10月3日及4日两次对部队训话中，蒋介石都重申了这一点：

“这次失败，是我们革命军最不名誉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

页。倘使第一师不退下来的话，我们的战事一定不会失败。所以孙团长没有命令擅自退了下来，一定要按法枪毙。我们第一师从前是最有光荣、最有名誉的军队，现在被孙团长个人毁坏，难道我们还能容忍这种败类不枪毙他吗？”



抗战时期担任八十八师师长的孙元良（中）

蒋介石的话在当时甚至得到友军的赞赏，认为如果蒋介石真能挥泪斩马谡，对于整顿当时已经日渐涣散的第一军军纪，提高战斗士气都将很有好处，否则必然助长“天子门生”的意识，自我特殊化，革命阵营便无法兼容并蓄而后患无穷。

上述资料引自毛思诚所著《蒋介石年谱初稿》，毛思诚与蒋介石本有师生之谊，后又追随蒋介石，1937 年告老还乡。蒋感于其忠心耿耿，遂将个人部分日记、电报、书牍手稿赠予相阅。毛思诚在此基础上完成《民国十五年之蒋先生》及《蒋介石年谱初稿》，虽然在政治观点上不免有美化蒋介石之嫌，然而其史料却很珍贵和翔实，特别是此类训话、演讲，均为原始档案。

然而孙元良却是一直活得很滋润，他销声匿迹一段日子后，又出现在日本士官学校，后来回国在军中供职且官运亨通，淞沪抗战之前，已经升任师长，因作战有功，还受到嘉奖。

孙元良为什么躲过军法的处置，这成了不解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出版了《天之骄子——中央军传奇》，书中对此作了解释，认为这是由于胡宗南一帮将领的求情：

“就在孙元良人头即将落地那一刻，蒋介石突然手软起来，追悔说出的话。孙是黄埔一期生，又是孙文学会（当时在黄埔军校内成立的一个右派组

织——笔者注)的骨干,平时对自己忠心耿耿,杀之未免可惜。胡宗南也瞅准时机来求情,他说:'我刚见过孙团长,孙团长言,他视校长为父母,此次不幸辱命,愿以死谢罪,只求来生再追随校长了。'蒋介石因此感情大动,只能自食其言,放了孙元良。但是,他为了塞众人之口,吩咐胡宗南让孙元良暂时藏匿一段时间,找个机会再送到国外留学,以躲过这场厄运。"

以上说法似乎十分合理,蒋介石或许一时手软饶过孙元良。但考诸事实,大约过了五十天后,蒋介石在给黄埔军校第四期第二总队毕业生训话时依然声称:"孙元良不是连坐法枪毙的吗?"这里用的口气很肯定,可见在他以为,对孙元良的惩罚已经实施。而且,以他当时在军中的威信,怕是也没有人敢手下行私,欺骗蒋介石,对孙元良明杀暗放,毕竟军法如山。

然而孙元良确实逃过了这一劫。事隔数年后,蒋介石在修改毛思诚所订《年谱》时,对 1926 年 10 月 3 日及 4 日的讲话保持了原样,然对 11 月 21 日的讲话稿作了修改,特别抹去了"孙元良被枪毙"的内容,因为那时孙元良已在中央军重新任职,他也默许了这一事实。

此外,还有另一种说法,即所谓"缺席审判",因为当时部队已被打散,孙元良并不在军中,而是畏惧军法惩处而躲了起来,所以蒋介石的话也只是纸上具文而已。后来,孙元良通过何应钦向蒋介石说情,方求得原谅。

考诸当时情况,倒也极有可能,何应钦与孙元良有师生之谊,也有为孙辩解的理由,当年兵败南昌,祸首是第一师师长王柏龄,是他贪功冒进擅打南昌造成的。且打下南昌后,又马放南山,钻进了妓院酒楼,以至孙传芳军队反攻时,军中无主,张皇失措,再加上敌强我弱,孙元良团被击溃也是情理中事。另外,根据"连坐法",师长王柏龄、师党代表缪斌才是首罪,而他俩也在战后躲了起来。既然蒋介石能放过王、缪,也应该对孙元良网开一面。再加上蒋介石本来就舍不得杀孙元良,随着时过境迁,怒火渐消,自然也就俯允所请,手下留情了。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可能,蒋介石的这次训话只是即兴发挥而已,当时军务繁忙,紧接着就是二打南昌,他没有精力来过问这具体的事情。黄埔军人历来是手足情深,很有可能以没有经过正式军法审判来延宕此事。等战场形势好转,瞅个机会向蒋介石说情,饶过孙元良的性命也是可能的。

以上各种说法仅为猜测之言,尚缺少当事人的自述。孙元良当时如何能保住性命,又如何得到蒋介石的原谅并重新重用,依然让人雾里看花。

顾问之死　鲍尔猝死之谜

鲍尔是蒋介石的军事顾问，1929 年 5 月在武汉突患急病，连夜送往上海就医，但抢救无效于 6 日去世。其死因至今不明，外界传说莫衷一是。

鲍尔是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德军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善于规划组织，也是一位杰出的炮兵专家，后经德国原参谋次长鲁登道夫的推荐，来到中国，并为蒋介石所欣赏，聘为军事顾问。1929 年蒋桂战争爆发，鲍尔也随军出征，赞襄军机，起到了重要的参谋作用，蒋介石也对其忠心耿耿和朴实严谨的工作作风予以了很高的评价。

然而，鲍尔却在蒋桂战争以蒋方取胜后不久患病死亡，据官方发布的消息，乃是鲍尔患上天花，不治而亡。但是据了解，鲍尔在德国时已注射过天花疫苗，应该具有免疫力的。所以，天花致鲍尔死亡一说不能成立。

而民间另一种说法却是让人毛骨悚然，传闻鲍尔乃是被人用一种蛊毒整死。1999 年，太岳文艺出版出版了《秘密之剑——德国顾问在中国》一书，此书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自蒋介石取得蒋桂战争的胜利后，鲍尔也赢得了进一步的信任，于是趋炎附势之辈如过江之鲫，蒋介石身边的人自然成了巴结的对象。当然，鲍尔也成了各家宴请的座上客，门庭若市，宾客盈门。本来鲍尔也不习惯这些，倒是蒋介石让他入乡随俗，这也是联络感情的一个重要手段嘛。于是鲍尔也只能硬着头皮参加各种应酬。有一天，鲍尔本来就患有感冒，本想好好休息一天，但因为武汉地方豪绅贤达的宴请，让他推托不掉，鲍尔也有心想接触中国各个层面，也就勉为其难，出席了宴会。宴会十分丰盛，鲍尔在热情款待下也失去了节制，喝了不少酒，散席后他就烦躁难安，又开车去了江边兜风，可能是着了点凉。直到夜深时，鲍尔才回到寓所，卫兵注意到，这一夜鲍尔折腾得厉害，起床，喝水，呕吐，呻吟，至天色大亮，卫兵推门进来后大吃一惊，鲍尔尚未起身，通红的脸上布满疱疹，一声声咳嗽揪人心肺。请来医生诊断，从表面现象看，鲍尔顾问是出了天花。病情迅速恶化，蒋介石命令将鲍尔送到上海诊治，并且指示不惜代价，让鲍尔恢复健康。但经过紧急抢救，依然无法挽回鲍尔的生命。

因此鲍尔的病因成了不解之谜。有人说，这是西南实力派对鲍尔暗中下

的毒手。

这些人言之凿凿，称：自鲍尔成为蒋介石军事顾问后，就一直强调要加强中央集权，对地方实力派进行抑制，前不久蒋介石推行的“削藩策”，那份关于裁兵的“军事整理案”就有鲍尔的心血。还有果断向中南用兵，发动蒋桂之战，也是鲍尔的怂恿。更令人难安的是，自蒋军占领武汉后，桂系已经溃不成军，失去了还手的能力。何应钦念及与李宗仁、白崇禧的友谊，私下里认为“穷寇勿追”。然而鲍尔却认为要“除恶务尽”，唆使蒋介石采取“根本铲除”的政策。这一条计策如果执行，那么他们哪里还有宁日？所以那些西南实力派人士对鲍尔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两广多大山，多密林，多毒虫奇卉，自古就有“制蛊”一说，十分神秘诡异，被下蛊的人往往死得不明不白，死状也极为恐怖，全身溃烂。蛊毒的制作方法也让人匪夷所思，据说其中一种制作方法就是采集百种毒虫，置于瓦盆之中，让其互相撕咬，最后留下仅存的那只毒王，取其毒素，再佐以其他特别配置的毒液、香料，混合而成，或成块状，或成粉状，或成液状，或无色无味，或奇香扑鼻，视需要而定。鲍尔赴宴的那天，就有人持此蛊毒交付佣役，吩咐将其涂抹在递给鲍尔擦脸的毛巾上。席间曾有人注意，那天鲍尔使用的毛巾散发着一种特别的芬芳，有一股来之大山里的清新，沁人肺腑，鲍尔忍不住地抽动着鼻翼闻吸。

鲍尔终于死了，死得蹊跷。临死前，他甚至握不住笔写遗嘱，只是请航空顾问傅克斯少校代为笔录，他请求蒋介石能够照顾他的家属。因为感念鲍尔的勤奋和忠诚，也为他以这种死法惋惜，蒋介石将鲍尔的儿子也招来中国做随身顾问，算是对鲍尔的一点补偿。

害蒋？救蒋？　　何应钦主张讨伐西安之谜

西安事变发生后，掌握着军事大权的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表着强硬派，力主讨伐，并准备不惜派出飞机轰炸。因此有人认为他这是居心叵测，是不顾惜蒋介石的生命安全，是想通过“玉石俱焚”，来达到取蒋而代之的目的。因此，后来宋美龄去了西安，就警告蒋介石，南京城里“戏中有戏”，而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也因此对何应钦更加猜忌。上述观点无论在史学界或在一般大众的印象里，已经是基本固定。

熊宗仁先生所著《何应钦传》一书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颇有新意，也言之成理。

首先，何应钦明白，以他的资历和声望及实力，取蒋而代之是不可能的，汪精卫、胡汉民乃至李宗仁、阎锡山之流都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他的现实经验看，在权力角逐的过程中。他“拥蒋则升，抑蒋则降”，多少有自知之明。再说，国民党政府已明确孔祥熙代行政院长，居正代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因有冯玉祥这副委员长在旁，连暂代之名也没有给何应钦，而由五常委中在南京的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三人共同协商，军队则归何应钦指挥调遣。这样的格局已十分显然，即使是蒋介石死了，他的权力也要分而享之，怎会全部落在何应钦身上？何应钦自追随蒋介石以来，还没有治党和主持政务的经历和经验，充其量只能取代蒋介石掌军，成为黄埔系的惟一首领。

正因为他自度不能一手控制国民党的中枢，12 月 14 日，何应钦致电正在德国养病的汪精卫，欢迎他回国，“主持中枢大计”。而汪精卫是公认的国民党二号领袖，是代蒋的最合适人选。何应钦的这一举动，已明确说明了他并无代蒋的野心。

在西安事变期间，南京虽然存在着两派之争，但主张和平解决者也并不全是亲蒋的，比如冯玉祥；而讨伐派并非全是蒋介石的政敌，比如吴稚晖、戴季陶，等等，他们都情绪激动，力主用兵，而这些人一向都是亲蒋的。此外，黄埔系的少壮派军人更是视自己为蒋介石的嫡系，也多主用兵，甚至举行什么白衣出征，以鼓舞士气。他们的这种行为，其目的出于武力救蒋。当然，其后果可能置蒋于死地，但是“从军事为政治的策略来说，应视为南京政府的当然之举，无可厚非……张、杨的通电中已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昭示了武力诤蒋，对蒋保其安全。何应钦的讨伐之举，虽大张



蒋介石与张学良在南京

其势，但飞机也只轰炸了渭南等地，并未直接轰炸西安，陆军也未大进。可见，他并非没有顾忌”。

对于何应钦以上的行为，蒋介石是理解的，哪怕宋美龄提醒他南京城里的“戏中戏”，他也明白，即使何应钦有所打算，也并不见得如宋美龄猜测的那样浅薄。他也希望何应钦能给西安方面一点压力。虽然他在宋美龄的要求下，于17日给何应钦下达了手令，但请注意，这道手令只以三天为期，目的只是迫使张学良、杨虎城迅速放他。到了12月19日，也就是三天期限已满，见张、杨仍无放他之意，他也开始认为何应钦的武力逼迫并非没有价值，因此对宋子文私下交代：“此时非迅速进兵，不能救国家脱离危险。”他还指示应如何进兵才能大收实效，反复告诫宋子文：“照余之计划，五日内可围攻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所惧。”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何应钦及党政要人都往机场迎接，并按官阶大小排成一列，当蒋介石的飞机着陆后，因为前拥后挤，“何应钦便以救蒋第一功臣的身份，首趋机前致敬，蒋介石也对他回报以特别的笑容。而被推为代表致词的林森……挤上前去致以慰问，但蒋介石只微微躬身作答，显出腰部痛楚之状”。这一亲一疏是很有意思的，林森是国民政府主席，而且德高望重，他也是主张强硬的，蒋为何薄林而重何，让人寻味。

27日，国民政府又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举行“庆祝蒋委员长回京大会”，据说有20万人参加，人们一直以为蒋委员长会出现的，岂料竟是由何应钦致答词，毫无疑问，这是蒋介石对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营救领袖措施得宜”所给予的殊荣。

根据以上种种史实，熊宗仁先生写道：在西安事变中，何应钦一夜之间成了中外瞩目的南京政府中最显赫的人物，在“讨伐派”与“和平解决派”演出的这戏中之戏里，他扮演了主角。戏已演完，阴谋也破产了。他究竟是假戏真做，还是真戏假做，他是想救蒋，以便给中共和张、杨施加压力，还是真要置蒋于死地，取蒋而代之，多少年来众口一词，认为他是想置蒋于死地取蒋而代之。而他本人也避而不谈这戏中之戏的真意。在蒋介石、何应钦均已作古的今天，确实留下了似有似无的历史之谜。如果按照传统的说法，那么如何解释一贯心狠手毒的蒋介石，对并不想置他于死地，为了抗日团结，以身陷囹圄而想替蒋挽回面子的张学良予以了终身软禁。而对必欲置他于死地后取而代之的何应钦反倒如此宽厚仁慈？事实上，何应钦一派所施加的军事压力，客观上从反面增大了西安事变必须迅速和平解决的紧迫感。

熊先生继续写道：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要人中，除了真正忧国忧民，同情张、杨联共抗日主张的以冯玉祥为代表的左派人物之外，无论何应钦为代表的讨伐派或是孔、宋代表的主和派，他们在反共的立场上是一致的，在救蒋的问题上只是谁唱白脸，谁唱红脸的区别。无论何种办法奏效，抑或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都是一个目的，最后殊途同归。

代人背过　杜聿明解决龙云之谜

抗日战争胜利后，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指挥中央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云南主席龙云及其军队发动突然袭击，五十分钟后，即告平息。三天以后，龙云即高升为军事参议院院长，离开他经营了几十年的云南。很快，《中央日报》以头号标题公布了蒋介石对杜聿明撤职查办的命令。其实，这竟是一桩蓄谋已久的阴谋。

1945年10月3日凌晨5时左右，昆明市东门、北门和北校场等地枪声大作，火光冲天。对于抗战八年都未曾遭到炮火袭击的西南重镇昆明来说，一时人心惶惶，惊恐不安。

位于威远街的龙公馆被中央军包围，听到枪声，龙云知道大事不妙，立即换上一件普通长衫，把呢帽压得很低，从后院一个隐秘的小门溜出来，他的副官刘兴才腰里藏着双枪尾随其后。双方约定：如有盘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龙云抬手揭开帽子，刘兴才便立即开枪，以引开盘查者的视线，掩护龙云脱身。

天尚未明，路上没有什么行人，静悄悄的。突然，匆忙而行的龙云在走到四古堆转角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迎面飞驶而来了一辆美式吉普车，刺眼的大灯，将路面照得雪亮。龙云本能地抬胳膊挡住眼睛。就是这一挡，保存了他一条性命。原来车上就坐着他的对头——中央军第九十六师师长黄翔和四名手持美式冲锋枪的卫士。黄翔是认识龙云的，却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清晨一个人在路上



杜聿明将军

行走的小老头，就是那个出入前呼后拥、威风张扬的云南王。一个紧急刹车，吉普车停在龙云身边。黄翔吼道："老倌，清早出来干啥子？快回去！"龙云连连点头。吉普车油门一踩，飞驰而去。

当龙云从小路快到五华山时，又与一伙"中央军"相遇，原来是警卫营派出接龙主席的。他们保护着龙云避入五华山。天亮了，市区的枪声渐渐平息下来，除防守五华山的两个连和北校场的两个营以外，龙云所部或被缴械或被围困，都成了釜底游鱼。

不久，龙云的二儿子、暂编第二十四师师长龙绳祖和滇军名将张冲也相继脱险上了五华山，部署五华山的两连警卫抢修工事，加强戒备，准备与中央军拼个鱼死网破。惊魂未定的龙云立即向全省各县发出戡乱电报。电报说，杜聿明叛变，要各县大兴"勤王"之师，派兵进攻昆明杜聿明部。又令在越南的卢汉率部回攻昆明。一天、两天、三天过去，援军杳无音信。龙云甚为焦急。杜聿明则催促龙云速离昆赴渝，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蒋介石也来了几次电报，催龙云去重庆。龙云皆置之不理，形成僵局。

原来10月3日，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抵河内，给卢汉送去蒋介石的亲笔信，大意说：抗战胜利，国家急需统一军令政令。为加强中央，巩固地方，特任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委你为云南省政府主席，未到任前，由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卢汉的滇军此时已被中央军挟持、包围，动弹不得，卢汉无可奈何，只得镇静以处，若无其事，以免发生新的变故。

原来，龙云从1927年起就担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他属于地方实力派。在军事、行政、财政和人事等方面，对国民党中央政府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使得蒋介石耿耿于怀。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蒋介石即以抗战统帅的名义，将滇军主力调出参加抗战。日军入侵越南、缅甸，蒋介石又以保卫西南大后方和保卫缅甸国际交通线为名，调中央军首次进入云南腹地。1942年，缅甸北部和云南西部战事紧急，蒋介石中央军源源不断开入云南，先后达十多个军。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蒋介石打出了"统一抗战，安定后方"的招牌，决定加快解决龙云的步伐。4月，担任昆明防守司令的杜聿明接到蒋介石的命令，立即飞往重庆。蒋介石见面的头一句话就问："来的时候看到什么人没有？"杜答："在昆明没有任何人知道。"又问："到重庆见到什么人？"杜答："谁也未见。"蒋介石连声说："好，好！"又说："目前准备对日反攻，必须先安定后方，统一云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以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现在拟调龙云到中央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但是恐怕他不服从命令，你要在军事上作彻底解

决龙云的准备，先将昆明附近的国防工事全部控制，然后我再明令调遣龙云。于命令到达的同时，即以武力解决龙云的全部武装，并限龙云三日内到重庆。”杜聿明说：“龙云仅有两个步兵师、一个宪兵团在昆明，另有几个交通大队及地方保安团在云南境内，在军事上解决龙云是没有问题的。”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说：“你立即回昆明准备，要守秘密，要慎重。”

这一年8月，日本投降。蒋介石命令滇军全部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龙云对此有所戒备，除卢汉第一方面军主力入越外，要求将滇军三个师留在云南，同时密告卢汉：“如果后方有事，闻讯，即火速回师。”然而，蒋介石只准许留龙绳祖暂编第二十四师在昆明，其余全部开赴越南。留昆的一个师，完全处在中央军的包围之中。而入越的滇军，也处在中央军的监视之下。

9月27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等三十余人，分乘专机两架，抵西昌小庙机场。同日，蒋介石派王叔铭秘密到昆明，给杜聿明送去一封亲笔信，大意说：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在云南军事政治本兼各职的命令，调他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最好一枪不发，绝对保证龙云的生命安全。万一龙云不接受命令，就立刻集中火力轰击五华山。

10月2日上午，两架飞机由重庆直飞西昌，机上有宋子文、陈诚、何应钦、关麟征和李宗黄等军政大员。他们到达后，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改组云南省政府。同日下午，由王叔铭亲自驾驶飞机，与何应钦、李宗黄、关麟征同飞昆明，带去蒋介石的手令：

一、免去龙云军事委员会云南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本兼各职，军事委员会云南行营撤销，行营所属人员由中央统一安排；云南地方部队交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接收改编；云南省政府交卢汉接收，在卢汉未到任以前，由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

二、任命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

三、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

当晚，杜聿明在昆明北郊岗头村临时指挥所召开团以上军官及由西昌飞昆人员会议。杜聿明在会上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后，对所部进行了安排和部署。

10月4日晨，龙云的把兄弟胡瑛持蒋介石的信上五华山进行斡旋。龙云气愤地说：“妈的，老蒋说老子拥兵自固，日本投降后叫我派卢汉去越南接收，我不仅让第一方面军全部开进越南，连龙绳武的第十九师也一齐开进去了，等我的人调空后，他便叫杜聿明对我下手。好嘛！老子今天就是不走，五华

山是他老蒋的昆明行营，我是行营主任，要死，我也死在这个岗位上，让国际友人也看看，究竟是哪个拥兵自固？是哪个背信弃义，排除异己？”

胡瑛见龙云气极，劝道：“大哥，您有什么值得生气的？从北伐以来，老蒋的为人难道我们还看不清楚？和他硬拼没有任何好处。首先，把昆明打烂了，几十万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有违大哥十多年的苦心。再说，也要知己知彼嘛，现在卢汉全师远在越南，他背后有关麟征、杜聿明的部队，归路已断；昆明又为邱清泉、周福成的部队所包围，滇西还有王凌云、霍揆章的部队。我们的几个保安团被分割包围于各县，用什么来对付人家？大哥还是三思而行吧！”

龙云沉思良久，说：“我提三个条件：第一，云南省政府要正式移交；第二，立即释放被他们缴械关押的云南军警及其他人员；第三，第五军全部撤离市区，立即解除戒严。”

胡瑛到岗头村，向杜聿明转达了龙云提的三个条件。杜聿明表示：“前两条不成问题，但第五军撤出昆明，再进来又要流血，立即解除戒严，秩序也无法保障。还是请您转告龙主席，我们奉有委座电令，要他在5号以前到重庆，否则，我们也只有执行命令，强行上五华山了。”

胡瑛说：“蒋先生给我的亲笔信，说是调龙主席去军事参议院，并没有讲要拿死的去嘛！搞僵了怕不好交代吧！他手边只有被围在北较场的两个步兵营，五华山也只有两连人驻守，连黄翔部队也难应付，第五军撤出昆明还怕什么？”

杜聿明说：“据我们截获的电讯，龙主任正分别令各县武装团队向昆明集结，如果他不服从中央命令，企图负隅顽抗，我们只有动用空军和装甲部队，硬上五华山了。”

胡瑛不悦地说：“我看龙主任的条件并不苛刻，若诸位无视公论，一定要打，那就请打吧！我只有自叹无能，就此告退了。不过你们要对昆明的老百姓负责，是非曲直，国内外的舆论会做出结论的。”

李宗黄等人见此情形，纷纷劝胡瑛坐下，请他继续为和谈斡旋。杜聿明只好表示请胡瑛继续做龙云的工作。经过反复磋商，龙云仍坚持其条件，杜聿明则要求龙云无论如何必须在10月5日动身去重庆，并且威胁说，如果不走，只有下令疏散五华山附近居民，硬攻上去。

不久，蒋介石来电：“中央同仁均仍盼志舟（龙云之字）兄五号来渝。如逾期不至，则将以违抗命令，别有企图视之，中正亦爱莫能助矣。”



龙云

10月5日中午，何应钦从越南河内飞往昆明。杜聿明等向何汇报龙云的情况后，何沉吟不语。胡瑛说："志舟是您的陆军副总司令，事情迫在眉睫，您应当出面缓和一下才能说得过去呀！"何应钦打电话给龙云说："志舟兄，委员长的意思是请你就任新职。因为你抗战八年也辛苦了，应该休息下啦！"龙云提出一个条件：要宋子文来谈才行。何应钦遂与西昌行营通话，蒋介石答应派宋子文来昆明。

当天傍晚，宋子文的专机到达昆明，上五华山与龙云见面，劝龙云从"大局"着想。他说："你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比省主席职务高了，也说明中央对你的重视。其他一切困难，包括生命安全在内，我负责。"宋子文又答应了龙云所提的一些条件，龙云遂允诺于10月6日与宋子文一道飞往重庆。

龙云到了重庆后，名义上升了官，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实际上受到了软禁。而杜聿明却为蒋介石背黑锅。蒋对杜说："解决龙云，你对国家是立了功的，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我先公布将你撤职查办的命令，然后再调你到东北去当保安司令长官。"10月16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杜聿明处理云南问题失当，着即撤职查办，调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这项命令在《中央日报》以头号标题发表，目的是平息龙云和云南人的怒气，但龙云从此对蒋介石离心离德，最后投向共产党；而杜聿明则在淮海战役中也被解放军俘虏，经过改造，最终和人民站在一起。龙、杜二人可谓殊途同归。

曹营汉心　　卫立煌东北战场用兵之谜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曾坐镇东北战场。卫立煌本是一善打恶战的勇将，却在这一阶段表现得非常保守，只是谨守城池。这究竟是老成稳健还是保守怯战，抑或另有目的？许多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解放战争爆发以后，东北战场就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自1948年始，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连遭败绩，蒋介石被迫走马换将，以卫立煌取代陈诚为"东

北剿总司令”。然而卫立煌上任伊始，就与蒋介石在东北战略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

赵荣生先生在其所著的《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中这样写道：

从卫立煌就任“东北剿总司令”第一天起，一直到末后，原则是按兵不动。对一些外围据点被吃掉很少去救援，多数工作是整补训练，修筑工事之类的事。解放军在冬季攻势之末已把沈阳和锦州之间的铁路截断，锦州完全陷入了孤立。东北和华北两个战区无从联系，蒋介石想撤出他在东北的数十万军队也断绝了归路。蒋介石见卫立煌按兵不动，一再严令催卫出击，由沈阳出兵辽西，把沈阳的主力部队撤到锦州，然后再由锦州退入关内。卫立煌说：“这样不行，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惯用的办法，就是‘围城打援’，我们已经上当多次了。如果我们的主力由沈阳而出锦州，正好循着共军辽北、辽西根据地的边沿，他们早已埋伏好了。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我方在沈阳的部队残缺不全，非以相当时期的补充不能用，因此我们只有坚守沈阳，等待部队整补完毕才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打通沈锦线。”

卫立煌这套战术，曾被后来的国民党战史研究专家反复批评，认为有被动挨打之嫌，从全盘战略考虑，蒋介石的退守锦州，打通沈锦线的战略规划倒是毛泽东最担心的，因为这样蒋介石就将他的精锐部队保全了下来。然而这也只是理论上的设想，当时东北战场局势微妙，绝不是局外人所能评价的。当时国民党的一些少壮派将领如杜聿明、廖耀湘等都欣赏其厚重与稳健。关于这一点，杨火昆在其所撰《辽西战役补述》中认为这与蒋介石放弃东北，固守锦州的方案相比，有明显两个优点：

其一，东北国民党所辖的区域虽然日渐缩小，但东北的精华还掌握在手中，如抚顺的煤，本溪的铁，鞍山的钢，以及每月产品可以装备一个师的沈阳兵工厂。如果继续固守下去，不但可以与共产党作持久的抗衡，而且是消灭解放军的重要基地之一。

其二，东北的国民党军主力牵制着整个东北共产党的力量，如果放弃东北，不但将东北的资源拱手资敌，而且东北解放军得以全部顺利入关，华北势难抵住，华中亦将蒙受重大影响，等等。

然而让人吃惊的是，解放后，已经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专员的杜聿明访问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时，他们畅谈往事，杜聿明说：

“当时我和卫先生都是一个想法，都是想把国民党的军队保存起来不打，

等军队补充充足装备好了再反攻……”

对于杜聿明的这种说法，韩权华并不以为然，他认为杜聿明对卫立煌完全不了解，其所言与事实谬以千里，完全抹杀了卫立煌当年的良苦用心。卫立煌去东北并不是为蒋介石打仗，而是促成蒋介石失败的。因为卫立煌在东北战场上的按兵不动，就是不让蒋介石的死棋走活。他提出了一贯与蒋介石对立的战略，让他什么也干不成。对许多文件不签署，不下达命令，让你蒋介石自己把军队送掉。他曾当着廖耀湘的面说：“总统要我们什么时候闭眼睛，我们就什么时候闭眼睛。”好像对蒋忠心耿耿的样子，到了最后辽西兵团离开沈阳以后，则假借种种理由，拖延不给廖兵团补给弹药，不补给汽油，让他很快完蛋。他还亲口对韩权华说，让蒋介石盲人瞎马怎么走。

卫立煌旧将，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陈铁等人也持以上看法。认为卫立煌当时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是在暗暗地帮助共产党了。

赵荣生先生对此提出了质疑，他本是中共秘密党员，曾长期在卫立煌身边工作，抗战胜利后离开卫。他提出：卫立煌到东北如果不是帮蒋介石打仗，为什么不和解放军方面进行联系？

解释是：抗战胜利后，卫立煌曾旅居法国一段时间，原想通过旅法进步学者汪德昭传递代电，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到了东北后，他又把汪找到东北，也是这个目的。可惜汪德昭并不认识共产党。再加上中共组织严密，上下级层次太多，如此层层相转，也担心泄密。所以他当时特别想念赵荣生，常念念有词：“要是赵荣生来就好了，那就通了气了。”

赵荣生还问：他在兰州曾给卫立煌去过信，卫有回信，为什么不乘机让他去东北？

解释是：卫立煌到东北以后，百务丛集，对于纷至沓来的贺电贺信，都授权让秘书处长王翰存批阅，只把武官将级以上，文官简任以上的官员的信件开给卫立煌过目。而校尉级的旧部下和同乡们的信件，都由科员处理，王翰存批发，连个名字也不用报告卫立煌的。过去王翰存只在卫立煌兼河南省主席期间任过两年秘书，中间还隔了一个秘书长，不像第一战区长官部里的秘书和卫直接接触，所以他很怕以前第一战区长官部里的秘书来沈阳，会夺走他秘书处长的位置。所以王翰存更不会向卫报告赵秘书来过信，他自己代卫作个答复就完了。

赵荣生认为以上的回答及他对卫立煌的了解，可以说这种推论合乎情理。但有人不同意，认为卫在东北期间，赵荣生并未参加这一段活动，发言权

有限。关于卫立煌在东北的战略仅是与蒋不同，抑或是有意促蒋失败，还不能妄下结论。

醉翁之意　　蒋介石急欲出兵朝鲜之谜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发生大规模内战，北朝鲜人民军直逼釜山、汉城，南韩李承晚政权无法招架，向美国连连告急。6月2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要求追随国援助南韩，蒋介石唯恐行动不速，于第二天晚间即急电驻美国"大使"顾维钧，转呈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愿派国民党精兵三个师三万多人，飞机二十架赴朝鲜助战，军队五日内便可以出动，望美国尽快派船接运。蒋介石是真心解李承晚之危吗？他有这样的实力吗？当时台湾国民党当局危如累卵，自保尚难，他为什么有如此举措？谜底何在？有一篇《蒋介石急欲出兵朝鲜参战真相》为我们揭开了这一谜团。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采取了向美国一边倒的外交路线，他认定，只要坚持反苏反共，美国就不会抛弃他。然而因为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美国政府已经对他逐渐失去了热情，甚至想中途换马，比如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及逼蒋介石下野都有美国方面活动的身影。1949年2月，美国驻华大使参赞莫成德特意从南京飞往台北，游说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背叛蒋介石，断绝台湾与大陆的来往，美国方面将每年给陈诚二千五百万美元的"经济援助"。8月，又公布了对华关系的《白皮书》，表明对蒋介石的失望。美国方面已经准备在中国脱身，对华政策采取"等尘埃落地"的观望态度。

蒋介石到了台湾后，美国方面也依然对之冷淡，美国驻华使馆只派一名秘书到台北，美国政府与台湾方面的文书，都拒用"照会"，而仅以"备忘录"代替。1949年4月，国民党代表在联合国提出"控苏案"，要求各国不要承认苏联支持的新中国。而美国代表则提出，只谴责苏联就行了，要将决议中"不承认中共政权，不许中共入联合国"等字样删去。1950年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在联大安理会上表示，如安理会多数国家同意中共进入联合国，美国将不行使否决权。同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声明，停运所有供给国民党方面的军火。并且暗示，美国不承担台湾安全的义务。5月，美国国务院竟向菲律宾政府试探，是否接受蒋介石流亡菲律宾进行政治避难。由此可见，到朝鲜

战争时，美国与蒋介石的关系已降至冰点。

蒋介石对美国准备抛弃他感到愤懑，但又不得不依靠美国，朝鲜战争的爆发给他带来了一线生机，这使美国国内一些不甘心在蒋介石身上花了五十亿美元而落得两手空空的人叫嚷着要重新审视台湾的战略地位。6月25日，麦克阿瑟上书美国政府，认为对于美国全球战略而言，台湾是美国太平洋防线的重要一环，如敌人占领台湾，可使其成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对美国攻击能力增加百分之百。杜鲁门、艾奇逊等人也有同感，他们甚至萌发占领台湾的计划，并决定派遣第七舰队武装进驻台湾。

美国的决定让蒋介石松了一口气，但台湾还只是美国为谋求自身安全的工具和外交筹码。美国还在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如果情况有变，外交政策上还有极大的灵活性。

所以，蒋介石才急欲在自顾不暇的时候出兵朝鲜，如果美国方面接受蒋介石出兵，就可收一石数鸟之功：其一、蒋介石是以“国民政府”名义，以“联合国会员国”名义参战的，同意蒋出兵，就无疑证明美国确认了蒋介石政府的合法性；其二，如果蒋介石牢牢地捆在美国的战车上，无论结果如何，美国将对他负责到底；其三，蒋介石军队在朝鲜作战，直逼东北，中共必将与美蒋抗衡，美国必定不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四，蒋介石出兵朝鲜，扩大战火，可刺激中共参战。如果苏联出兵，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蒋介石便可借机做“反攻大陆”的文章。

美国方面对蒋介石的用意洞若观火，1950年6月30日，杜鲁门将蒋介石的出兵方案提出讨论。艾奇逊认为，蒋介石的参战，将使局势复杂化，而且台湾本身的防务也很空虚。再说，由日本派船赴台湾运兵入朝，远不如从日本直接运输驻日美军入朝更便捷。况且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也让人不放心。艾奇逊的意见得到了众人的赞同。

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却对蒋介石出兵朝鲜求之不得，7月，他专程赶到台湾与蒋介石商谈，对蒋介石扬言台湾可出兵五十万大加赞赏。他也表示，美国将负责训练和提高国民党部队的战斗力，必要时还可派出大批飞机轰炸中国东北，帮助蒋介石从鸭绿江登陆。

为了让麦克阿瑟不致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美国方面派去了哈里曼解释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人不希望看到他们在东方大打而让苏联人坐看虎斗，不愿意同新中国军队的冲突白热化而无法收场。

蒋介石不甘心计划受挫，在请求出兵朝鲜被拒后，又向麦克阿瑟另献“围

魏救赵”之计，即美国帮助蒋介石武装出兵大陆，在福建、浙江方面开辟第二战场，减轻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对美军的压力。麦克阿瑟从纯军事角度出发，居然也为之鼓吹，叫嚷要把战火扩展到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这种战争狂人般的叫嚣，连美国政府也不能容忍了，杜鲁门不得不于 1951 年 4 月宣布立即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蒋介石企图出兵朝鲜以“反攻大陆”的幻想也随之破灭。

虽然蒋介石请兵一事受挫，但让他欣慰的是，美国毕竟开始改变对蒋介石政权弃之不顾的政策。1950 年 8 月，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国民政府，不管它辖下的土地是如何狭小”。蒋介石应该感谢朝鲜战争。有的台湾学者称：“韩战是历史性的转折点，若非韩战爆发，美国早已步英国后尘承认中国”，台湾当局能支撑到何时就成了疑问了。

替罪羔羊　　长沙大火案之谜

抗战期间发生的长沙大火案是国民党政府实行“焦土抗战”政策的一大败笔，非但没有伤及日军丝毫，给日军以任何打击，反而使两万多民众因来不及脱身而葬身火海。数十万老百姓因家园被毁流离失所。一座繁华的文明古城惨遭涂炭，几成废墟。

然而，造成这场大火的元凶却迄今未能查明。

当事人之一的张治中曾撰写过回忆录，对此事有详尽的描述。一些研究者也投入了精力，虽然取得一些进展，理清大致的脉络，但对其中一些关键问题却仍莫衷一是。

事情的经过大体如下：

抗战发生不久，国民党当局就酝酿了“焦土抗战”计划，一位苏联军事顾问拟就了一份“火烧武汉，火烧广州”的计划交给蒋介石，这就为后来火烧长沙计划的制订开了先例。武汉会战失败后，蒋介石来到长沙，获悉武汉、广州沦陷时因种种原因并没有按预定的计划加以彻底破坏，因此特别强调了“焦土抗战”的重要性，并制定了更为详细的“火烧长沙”计划。

随着战事的发展，日军逼近长沙，蒋介石曾数次面谕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长沙一旦失守，在撤退时必须彻底焚毁。”后来又打电报，语气十分严厉：“长

沙撤退之时，彻底烧毁一切财物，勿使资敌，违者定予严惩不贷。”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张治中又责成湖南省保安处处长兼省府行署参谋长许权和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拿出执行计划。很快，在酆悌的主持下，形成了一个具体的火烧长沙计划。



张治中

该计划具体步骤为：调用一个团的兵力，装成从前线退下来，先期分驻全市各处，以五人为一小组配备放火器材，若干小组为一队，由队长统一指挥，按指定地区执行放火任务。在放火前，先放假防空警报，让居民先期逃避。对此计划，张治中又做了若干修改，原则上予以同意。至1938年11月12日，焚城工作基本准备就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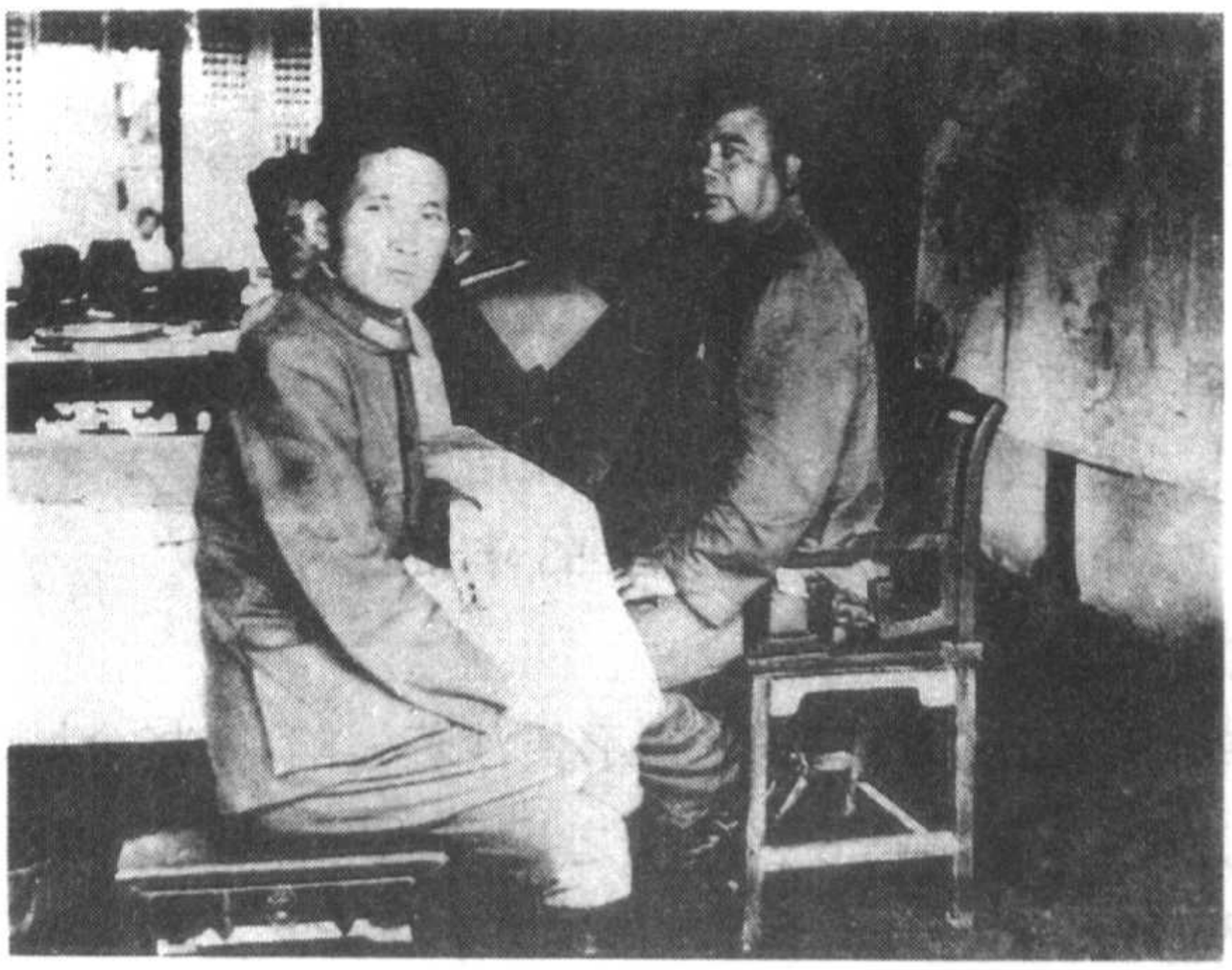
同日上午，蒋介石又亲自来电，指示长沙若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到了晚间，前方却传来情报，日军在攻占岳阳之后，停留在汨罗以北而无南进迹象，形势稍缓。然而长沙城里却是谣言四起，警察局长文重孚甚至已经撤去所有巡逻警察，长沙城已呈现失控状况。至午夜时，天心阁方向突然冒出火光，随后又有几处火起，早就准备妥当的放火小组误以为焚城计划开始执行，于是分头行动，很快，长沙城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长沙大火过后，引起全国人民的震惊，要求严惩放火凶手。大家都把矛头对准张治中，有一副对联在当时广为流传：治世无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有愧，三条人命万家空。横批：张皇失措。若将横批和对联的第一个字连在一起，便是“张治中”三字，暗示他应对这场大火负责。此外，还有一首七言诗《长沙大火》也是隐指此事：

山外红霞霞外天，秦燔楚火后兼先。
定王台畔空遗迹，贾传祠前腾野烟。
不复朱门嗟酒肉，只余白骨代箕然。
将军偏擅留名术，一炬功成万骨传。
张王在后项王前，未到咸阳火已燃。

张治中本人也在事后发表《告公民书》承认过失：“用人失察，疏于防范，遭此巨灾，深明内疚，罪戾实深。”这里，他将蒋介石应付的责任全部揽过来，但他没有承认是他下的放火令。

然而这场大火究竟是谁下的纵火令？除了对张治中的指责外，还有其他说法，有的说大火起因是因为纪念孙中山诞辰大会后的火炬游行，根本无人下令放火；有的说是南门外的伤兵医院失火，士兵误以为是放火信号。然而以上都没有确实证据。还有人说，此次大火就是由后来被蒋介石枪毙的酆悌和负责放火事宜的原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下令的。



张治中(左)与冯玉祥

大火过后，蒋介石迫于压力，指示彻查此事，并逮捕了酆悌、文重孚、徐昆，文、徐二人都声称是酆悌下的命令，酆悌自恃是蒋介石的得意弟子，也有为上级承担责任之意，因此承认自己负全责。但是，他也没承认是他下的放火令："我非常惭愧，没有脸面再见湖南的父老兄弟，我生长在湖南，怎能忍心烧毁自己的家乡，真是万死难抵这场大火损失的亿万分之一。"在法庭上，审判官蒋除欧是酆悌的老乡，对其深表同情，极想保其不死，因此极力诱使其说出真凶，但酆悌始终无法说出他人，可见他对是谁下令放火也是不知情的。

酆悌最终被蒋介石下令枪毙了，但其死因并非是他下了放火令，而是做了替罪羊。张治中对此也很自责，曾力保酆悌免于一死，然未能成功。

蒋介石杀酆悌也是一个不解之谜，因为 酆悌是他的得意弟子，复兴社的创始人之一，当年蒋介石那篇著名的《告黄埔同学书》，就是为回答酆悌的信有感而发的。有人说，酆悌之死是由于陈诚的落井下石，但也有人说是因为在大革命期间，周恩来不幸被捕，酆悌有感于周恩来的崇高人品而大义放人，这件事后来被蒋介石知悉，从此对酆悌失去了信任。以上种种，也尽是推测之言而无切实证据，故为一说而已。

名人与文化

妻妾成群　　蒋介石婚姻之谜

蒋介石的婚姻情况如何？他有几个夫人？一直存在着争议。按通常的说法，蒋介石有三个夫人，即结发之妻毛福梅，下堂之妻陈洁如，政治之妻宋美龄，此外还有一妾即姚冶诚。

对这种说法，蒋介石本人予以否定。

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在中国最大一家报纸《申报》上发表一则启事："民国十年(1921)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

这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呢？蒋介石与原配毛氏的婚姻是其母王采玉包办的，婚后感情一直不合，他在启事中提到与毛氏离婚确有其事。

1921年，蒋介石与发妻毛福梅的感情日趋冷淡，他在日记中说："甚至不愿同衾。"4月3日，蒋介石在溪口丰镐房看《通鉴》，"见毛氏与经国擅自城舍归，忿不可遏，与之拼命大闹"。此时，蒋介石与毛福梅的婚姻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

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于毛氏，平日人影步声，皆足刺激神经，此次因事寻衅，竟与我对打，实属不成体统，决计离婚，以蠲痛苦。"他对母亲的抱怨在日记中也有记载："母亲老悖一至于此，不仅害我一生痛苦，而且阻我一生事业，徒以爱子孙之心，强欲破镜重圆，适足激我决绝而已，今日拟发最后离婚书。"

蒋介石与毛福梅离婚具体是哪一天？是1921年11月28日。蒋介石是个孝子，他在母亲生前就想与毛氏离婚，但始终没有提出来。一直等到他母亲于是年6月14日去世以后，才将离婚之事正式提出。11月28日，蒋介石召集亲友商议离婚之计，几费口舌，最后终于离婚。有日记为证：

1921年11月27日："下午，为离异毛氏事，忿怨交并。"

1921年11月28日："上午，会议离婚事，亲戚意见参差，虽(致)无结果，心殊恼恨……后卒解决此事，然已不知费了多少精神矣。"

可见蒋介石关于与发妻离婚的申明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与其他二氏，即姚冶诚和陈洁如有没有婚约呢？姚冶诚肯定没有，而陈洁如否定了她与蒋介石无婚约之说。她在《我做了七年的蒋夫人》的回忆录里，拿出了一张与蒋介石结婚的喜帖作为证据，并且以较多笔墨渲染他们结婚的经过。

她特意强调，“孙中山作见证要我们尽快结婚”，“结婚典礼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五日很安静地举行，地点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旅馆大宴客厅内”，“张静江福证，季陶为介石主婚”。婚后三日归宁，与蒋介石启程赴宁波，在溪口陈洁如与毛福梅相见，然后是一系列的祭祖、喜筵，为蒋母上坟、游雪窦寺，“共住了十天”等等，非常详尽。



蒋介石、陈洁如夫妇在黄埔军校

但这是不是真实的？笔者查阅了《蒋介石日记》，从1921年的10月8日起，到12月10日止，蒋介石根本未离开过溪口，正以孝子身份忙于其母王采玉建坟之事，不可能有时间与陈洁如在上海结婚。请看《蒋介石日记》：

1921年10月8日：“下午三时抵家。见纬儿面部疮疤犹在，颇讶，旋往抚母棺。”

10月9日：“下午，登高与纫秋往鱼鳞岙，察勘母墓地。”

10月10日：“上午，看新建厅屋。下午，与纫秋周历……各祖墓，并先考坟前，观察风水。”

10月10日：“下午，又往鱼鳞岙，看先妣墓地。”

10月12日：“下午，走往宋春姊家。”

10月13日:“侵晚,同纫秋乘簏墨斗潭。”

10月20日:“晚,与纬儿玩物。”

10月21日:“日间监厅屋工程。”

10月23日:“晚,颖甫来谈养精屋事。”

10月24日:“下午四时,由雪山回家。往观新屋,大门地磐石已铺上矣。”

10月25日:“下午,携冶诚、纬儿往观先母墓地。”

10月27日:“下午,挈纬儿往视青弟基地。”

10月28日:“下午,会客商议办理母丧事。”

10月30日:“今日立石青弟墓。”

11月4日:“下午,处理家书事。”

11月5日:“余时监造屋工。”

11月6日:“上午监造屋工,下午如之。”

11月7日:“竟日督造屋工。”

11月8日:“晚,往溪西庙观剧。”

11月9日:“上午,督造屋工。”

11月13日:“竟日料理丧事。今日胞兄归自粤。”

11月14日:“上午,筹办丧纪。”

11月15日:“上午,藻饰堂室。”

11月16日:“终日布置丧次。”

11月17日:“下午,筹备丧事,给讯璐妹。”(笔者注:这里提到的璐妹即陈洁如,当时陈在上海。)

11月18日:“是日整洁室舍。”

11月19日:“上午,筹备丧事;下午,集客议礼。”

11月21日:“上午,悬设丧幕;下午,议定丧礼。”

11月23日:“下午,举行祭礼。”

11月23日:“上午八时半,返柩出门,十一时半到鱼鳞岙墓地……安窀后回家,奉主入祠。”

11月24日:“上午,送沪来各友行。”

11月25日:“下午,往省母墓。晚与胞兄谈办武岭学校事。”

11月26日:“上午,拟谢唁函稿,下午检录各友挽诔。”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婚照

11月27日:“下午,为离异毛氏事,忿怨交并。”

11月28日:“上午,会议离婚事,亲戚意见参差,虽(致)无结果,心殊恼恨……后卒解决此事,然已不知费了多少精神矣。”

11月29日:“下午,诣文昌阁散闷。”

11月30日:“晨起,视冶诚病,仍未见愈,甚念也。下午以有人来访,无暇打文昌阁屋样。”

12月1日:“上午,填发谢唁笺,下午陪王观海医生诊冶诚病。”

12月2日:“冶诚病未好,甚念也。”

12月3日:“上午孙舅父来谈,下午伫视先母墓工,晚编先妣哀思录。”

12月4日:“晨,调药;下午往视先母墓工。”

12月5日:“晚,辑先妣哀思录。”

12月6日:“上午,往省胞兄,又诣文昌阁量墓址;下午,绘改建文昌阁为图书馆基址屋样,往视母墓。”

12月7日:“上午,测量文昌阁墓址;下午,往母墓监工,回家拜奠母诞生忌辰。”

12月8日:“下午,往视母墓。”

12月9日:“终日在母墓监工。”

12月10日:“上午,游览文昌阁,准备出门事,下午往监母墓。”

12月11日:“下午,别母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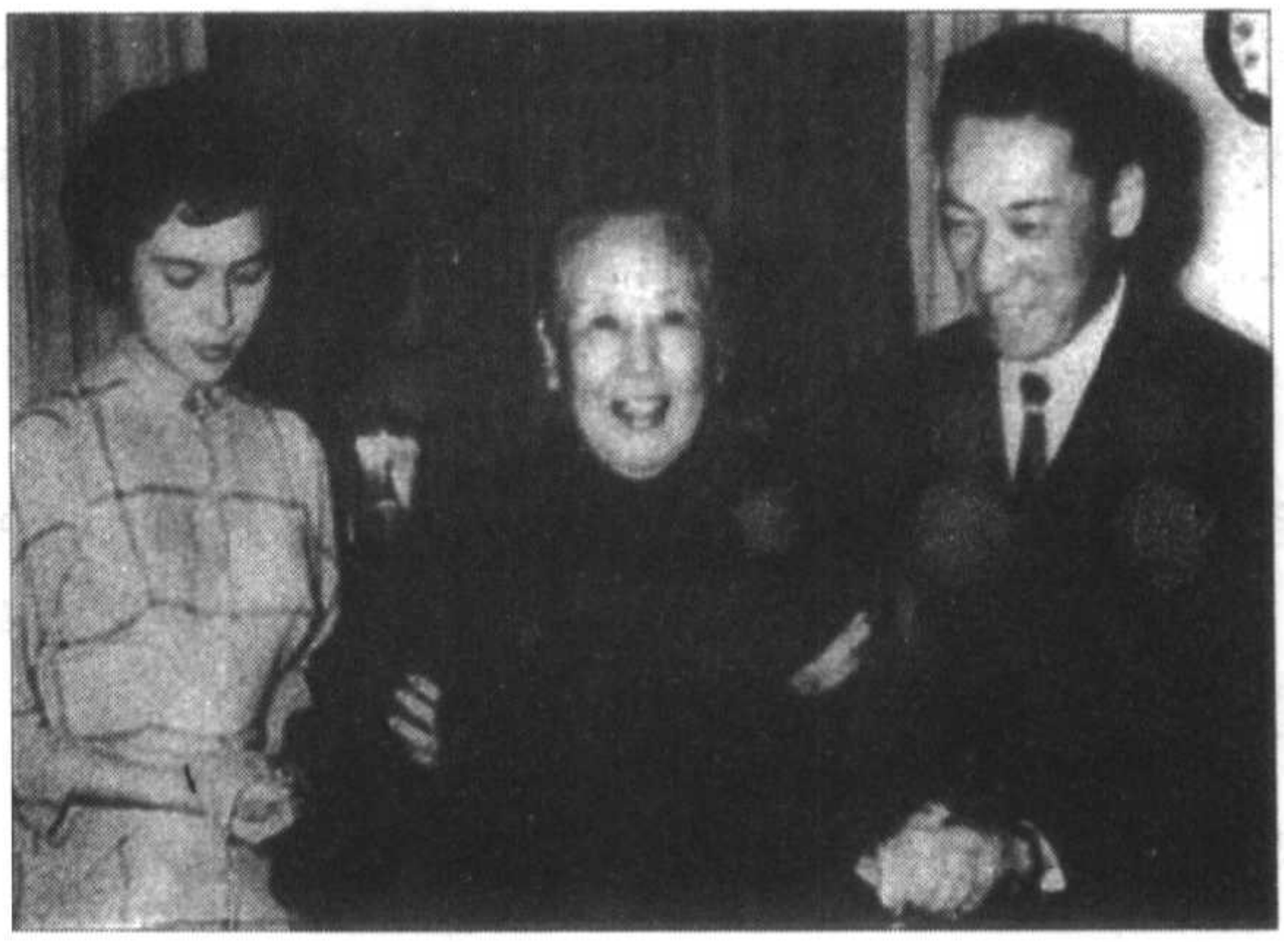
蒋介石送给宋庆龄的签名照

陈洁如会不会将结婚日期记错了，也许是在1921年10月以前？似乎也不存在这种可能。1921年6月14日，蒋母王采玉病逝，蒋介石为其母举丧，直至8月10日，在孙中山的电催下，蒋介石勉强至上海，拟去广西。“留旬余，时值大风雨，因念母灵柩在堂，恐被水淹”，故于8月24日复返溪口，迨至9月3日又动身赴粤，13日至粤，10月8日返回溪口。蒋介石在8月11日至8月23日滞留沪上，会不会在这一段时间里与陈洁如结婚呢？但从《蒋介石日记》中找不到只字记载。

陈洁如回忆录也否定了这种可能。她说其父陈学方于1921年9月7日溘逝，陈母在张静江等人的劝说下，决定洁如需为其父守制三个月后才能举行婚礼。这么说来8月中下旬陈父当还健在，因此不可能有结婚之说。

其次，陈洁如回忆录说，蒋陈结婚三日后归宁，然后伉俪同回溪口拜祭蒋母墓，而此时蒋母之棺尚厝堂中。陈洁如回忆录中还说，与蒋兄介卿一同祭蒋母墓，而此时蒋介卿远在广东英德县任上。从这两点看，两人也不可能在此阶段结婚。

那么蒋介石、陈洁如的婚礼会不会在1921年12月12日以后呢？据《蒋介石日记》记载：1921年12月13日，即蒋从溪口返回上海的那天晚上，的确有关于陈洁如的记述：“晚，璐妹来省。”次日，蒋介石便乘轮赴粤，12月18日抵广州。1922年1月18日“晡抵桂林”，直至4月27日返沪，共在两广停留约五个月，也找不出十几天的结婚时间。因此可以判断，陈洁如回忆录中有关蒋介石与陈洁如“结婚”的日期和蜜月描述都是杜撰的。



姚冶诚与蒋纬国、邱爱伦夫妇

由此可见，蒋介石有名分的妻子应该是毛福梅和宋美龄，至于陈洁如只是一个头顶“蒋夫人”名义的夫人。正因为她没有名分，从严格意义上说，蒋介石关于婚姻状况的申明是没有错的。

水落石出　　蒋纬国身世之谜

蒋纬国生活在中国的所谓第一家族中，但处境始终尴尬。尽管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对他呵护备至、疼爱有加，但随着蒋介石、蒋经国的先后西归，蒋纬国更迫切想了解自己的身世。1986 年，蒋纬国由联勤总司令任上被其兄蒋经国降职为联训部总司令时，心情烦闷，曾亲口告诉前来采访他的香港女记者孙淡宁说：“我并不具备第一家族的血统。”是真言还是牢骚？蒋纬国话中不但否认蒋介石为他的生父，更对其生母是谁发出疑问，这里究竟隐藏了一个什么秘密呢？

1946 年，蒋介石指令手下的御用文人纂修《武岭蒋氏宗谱》时，关于蒋介石家世，执笔者绞尽脑汁无从落笔，后来蒋介石只得亲自捉刀。原文如下：

> 周泰，原名瑞元，一名中正，字介石，肇聪次子。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肄业，考送日本振武学堂毕业，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士官候补生。大元帅府参谋长、大本营参谋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陆海空军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第一任大总统。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时生。光绪三十三年加入同盟会。民国十九年受基督教洗礼。
>
> 在“妻室”栏中，蒋介石是这样写的：
>
> 配毛氏，民国十年出为慈庵王太夫人义女。民国十六年继配宋氏美龄，美国韦尔斯莱大学博士，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二月十二日生。
>
> 在“子息”栏中，蒋介石只有寥寥五字：
>
> 子经国、纬国。
>
> 写得好含糊。

当时已过而立之年的蒋纬国，对自己的生母是谁曾提出疑问，搞得执笔人沙孟海无法回答，只说是根据蒋介石亲自编写而照抄的。蒋纬国听后默然良久，失望地说："过三十年再说吧。"要想了解这个谜底，还是追溯到蒋介石与蒋纬国父子早年的感情说起。一段段悠悠往事，至纤至细记载在蒋介石日记中。



蒋介石夫妇与蒋经国、蒋纬国

"纬儿可爱！"这是蒋介石在日记中对纬国的评价。

1919年3月16日，身为援闽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的蒋介石风尘仆仆，从福建漳州赶回上海寓所，见"纬儿伶俐活泼"，由衷地发出"殊可爱也"的赞叹。5月1日，蒋介石回到福建长泰营中。不久，他在风景旖旎的厦门鼓浪屿租赁了一幢房子。南国正是迷人的夏季，蒋介石不甘寂寞，发电报"招姚氏、纬国来此"。6月14日，姚冶诚领着三岁的纬国来到鼓浪屿，蒋介石写下"会见纬国母子，无任喜慰"。这十字的日记中，饱含了蒋介石十分丰富的情感。

有了纬国这个天真活泼的"开心果"，蒋介石孤独的心情起了变化，变得快活起来，可用《蒋介石日记》来证明：

9月18日："下午与纬儿玩笑。"

9月28日："与纬儿玩笑。"

9月29日："上午，与纬儿戏耍。此儿叫笑跳踉，日甚一日，可喜。"

纬国毕竟是个小孩，有活泼可爱的一面，也有淘气捣蛋让大人生厌的一面，有时实在顽皮过了头，"乐极生悲"，《蒋介石日记》记载：

（纬儿顽皮），"禁闭少许时，事后甚怜之"。"纬儿弄药，始则呵止之，继则以其倔强，掌责数下，终不降服，如是良久，听其啜泣声咽'下次再勿'之语，不胜疼怜"。

几段文字，将小纬国顽皮、任性和蒋介石舐犊之情描绘得活灵活现。孩子一旦有病，是最令父母提心吊胆的事情，蒋介石也不例外。

8月16日："夜中纬儿发热，心甚焦愁，卧难安枕。"8月17日："因纬儿热不退，郁闷未纾。"8月18日："日间纬儿寒热未退，心殊担忧。纬儿寒热较烈，

终夕悬悬，寝不能安席。乃知吾母鞠育子女之苦也。”8月19日：“纬儿来厦门医院受诊。”9月17日：“纬儿玩弄点痣药水，伤手背起泡，痛楚堪怜。恨其母冶诚抚育不周也。顷之，渐瘥，心始安。”

纬国的母亲姚冶诚变成蒋介石迁怒的对象，把怨气都发泄到她的身上。一度，由于姚氏的嗜赌、贪婪、无礼、悍妒，搞得蒋介石大光其火，发誓要休掉姚妾，曾与亲友“商谈解决冶诚事”。但“所虑者，纬儿抚育问题，无以措置之”，终于下不了最后决心。由此可见，蒋介石对纬国的感情压倒其他，甚至委曲求全。

蒋纬国小时候的确很可爱，最能引起蒋介石心灵震撼的一次是1921年9月3日，这一天，蒋介石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深夜三时后，离家就道。纬儿始则绕膝依依，必欲随我前去。继则大哭大叫，连声爹爹，用力抱持我身，终为其母强行拉开。及余出门，犹向外嚎啕作欲前进状……”这种情形下，蒋介石难舍难分的心情流露笔端。由于蒋介石长年在外，经常想念纬国，在日记中多次流露出思念之情：

1921年9月7日：“下午，粤行船次，念纬儿不已。”9月8日：“近日念纬儿甚，恨不携之偕行也。”9月15日：“晨四时醒，想念纬儿不已。”告慰思念之余，惟有提笔写信，蒋介石日记中多次出现“寄谕纬儿”的字样。

1922年初，蒋介石随同孙中山在广西桂林组织北伐，住桂林旧藩署八桂厅中。春节之际，万家烟火、鞭炮响成一片，蒋介石独自给远在家乡的纬国写信：



蒋介石与蒋经国

纬儿：我今日在桂林过旧历新年，心里很想慕家庭今日的乐趣，自叹不能在家欢笑一堂，因之更加想念你活泼的神态，不能忘怀……但愿你在家，要好好的孝敬你的母亲，友爱你的哥哥。少年立起一个做人的模样，不致如你父亲的悲伤老大才好。我在桂林，孙公公及胡、许、吴各位伯伯（指孙中山、胡汉民、许崇智和吴忠信，笔者注）往来极其亲热，亦极其有趣，而且我住的八桂厅亦极其幽雅，为桂林省城第一个好地方。今日在此同各位伯伯拍几个照片，将来晒好了，我还要带两张给你看。但是我心里，无论如何快活，总不能忘记家庭乐趣及母亲逝去的悲痛。不知你在家中亦有此感想耶？我心里

很想回家，但不知果能回来否耳……你1月1日发的信，我已于前日接到了。远在他乡度岁之时，得见你们的笔迹，真是如获至宝，以后还要你们时常写信，来解慰我旅中的冷静为盼！父示　一月廿八日。

我接到你们正月十五日所写的信，非常欢喜。我到桂林已有四十多天了，精神天天好起来，旧病已经好了。但一天到晚事情很忙，心思亦很烦。我近来天天骑马，而且骑得很高兴。将来我回家时候，必定给你买一匹小马，教你骑马，我自己买一匹大马同你骑了游行就是了。你今年不晓得有否读书？你如其会写字的时候，还要你写几个字来给我看看，或者我的心里可以快活一些。我清明决意不回来了，你快快把家里和学校里的事情，详详细细写封信来，使我可以放心……　三月三日

纬儿：我三个月没有见你了，心里非常记挂。我今天看见人家小孩子，在大本营前空地放风筝，我更加想起你去年在城中放风筝的趣味，不晓得你今年在家有做风筝去放没有？我在抽屉里找出两张画图贺年片来，一张是富贵花，一张是小孩游戏，其中也有放风筝的，所以寄给你白相，不晓得你快乐吗……

从以上蒋介石的日记、信函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蒋纬国有着深厚的父子情谊，如果不是亲生而是“螟蛉子”，蒋介石会有这么浓重的感情吗？

蒋纬国自己也充满感情地回忆：“我最记得，每当父亲在前方打仗最危急、最激烈时，或当父亲遭受到国内外各方大压力时，他总喜欢把我叫到他身边，以舒解他所承受的压力。”

另据黄埔一期学生宋希濂等人回忆，蒋介石当年在黄埔军校官邸，“傍晚，蒋陈（洁如）携手散步，有时牵着活泼天真的纬国，我们经常看见”。

蒋介石的侍从室副官居亦侨说：“蒋介石对天真活泼的蒋纬国非常喜爱，兴奋时会让儿子骑在肩上，逗笑玩耍。”不是亲生儿子，会有这样的父子情深吗？

早在蒋介石生前，有关蒋纬国的身世就一直沸沸扬扬，一般多猜测纬国是蒋介石的义子，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儿子。蒋纬国曾说：“我与安国，情同手足，血浓于水。”从蒋纬国与戴季陶之子戴安国不同寻常的关系中可以看出端倪。1957年2月，蒋纬国与邱爱伦小姐结婚时，是由戴安国陪同前往东京的。1984年，宋美龄在纽约病重，蒋纬国于7月29日专程由台北飞往纽约探候。但不到一星期又匆匆飞回台北，因为台北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病情也很危急。这就是“血浓于水”的证明，由此可见蒋纬国与戴安国是同父异母之

兄弟，蒋纬国的生父应是戴季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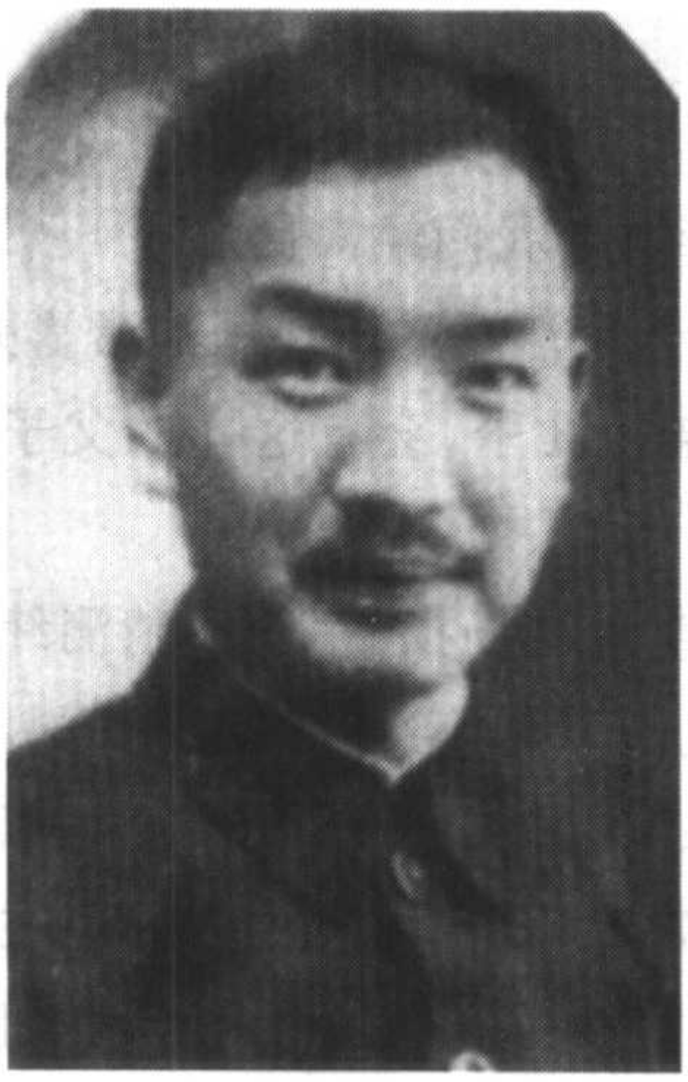
但蒋纬国的生母究竟是谁却是一个悬而未解的谜。

1913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进行武力讨袁，爆发了“二次革命”。由于军事行动仓促，加上内部分歧，很快失败。孙中山、蒋介石等亡命日本。这一阶段，不少革命党人意志消沉，无聊之至，经常找日本下女以抚慰孤独之心。戴传贤（季陶）与蒋介石共同认识了一个叫重松金子的日本女子，两人都与她发生了胶漆之情。蒋介石回国后，戴季陶依旧与之往来，春风几度，暗结珠胎，1916年10月6日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后来蒋介石的义子蒋纬国。由于戴季陶的原配纽有恒非常厉害，戴季陶不敢把这个私生子带回家，只得将其送给蒋介石做义子，交由姚冶诚抚养。

我们从蒋介石日记中的零星记载也能略窥端倪：

1919年10月25日，蒋介石突然从上海到日本，前后共二十多天，于11月16日乘轮返国。蒋介石为何专程去日本？目的何在？国民党出版的官书是这样记载的：

“主席因为郁居上海，感觉乏味，想到日本去一次，看看离开了几年的岛国情形，因此就在10月25日上午由上海搭船往日本……到了日本之后，主席访晤旧友与留日同志，在11月3日参观横滨各书铺，以研究其出版文化界的动向。4日在菊池屋购书，5日撰《世界各国政府对付俄国劳农的手段如何》一文。8日撰《打破外交的迷信问题》一文……16日乘轮返国。”但是，国民党官书中不可能记载一个重要的情节，即蒋介石是去会见一个日本女人，即与重松金子的见面，这似乎才是蒋此番出国的主要目的。



有人说，蒋纬国是戴季陶的儿子

蒋介石日记的记载很简单：“上午，致书与胞兄；下午往会纬母重松金氏。八年十一月四日。”（1919年11月4日）

在毛思诚编撰的《蒋介石日记类钞》中，从1919年11月5日到11月21日，一片空白。说明什么？编者要掩饰什么而将此十七天的记载统统隐去——这恐怕是关键所在了。

1921年3月11日，蒋介石日记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到重松金子：“晨起，得季陶书，

知纬儿生母因难产而身亡。异日此儿长成知其事，必引为终天之憾。思之曷胜感悼。”

原来，蒋纬国的生母是日本女子重松金子。

扑朔迷离　　蒋介石“胞兄”之谜

蒋介石是哪里人？国内存在两种说法：浙江一些专家坚持认为蒋介石是浙江人；河南一些学者同样坚持蒋介石是河南人。直到今天，双方的辩论始终没有一个结论。蒋介石的籍贯真是一个难解的谜。

国民党正史中的蒋介石家谱是这样记载的：蒋介石世代浙人，祖居奉化溪口。蒋介石曾祖父名祁增，字怀盛；祖父名斯千，字玉表；父名肇聪，字肃庵、明火。肃庵生二子，长子周康（即蒋锡侯）、次子瑞元（即蒋中正）。

蒋家从玉表公时从商，经营玉泰盐店，后由蒋肇聪接办，先后娶妻徐氏、孙氏、王氏。徐氏生子锡侯，生女瑞春，后故亡。孙氏亦亡，无后。王氏（即蒋介石母王采玉）为浙江嵊县葛竹村有则公次女也。嫁与肇聪填房，生子瑞元、瑞青，生女瑞莲。

据蒋介石考证，蒋姓祖先出自周公第三子伯龄。东汉时有蒋澄者，封函亭侯，其墓在宜兴。蒋澄后人晋时迁台州，唐代由台州迁奉化，到蒋介石时已是第二十八代。

蒋介石在民国九年（1920）12月4日记中记载：

> 吾蒋氏在唐代由台州迁奉，楼隘或即俗呼楼岙者便是之。蒋浚明公，官至金紫大夫，即此派也。其墓在三岭山，子璿与玑附葬。摩诃蒋宗霸公，世传为吾祖。谱中所称为必大公者是也。当五季之周，其居三岭，与岳林寺之弥勒相友善，亦近情理。惟由常州丹阳来之说不可考。据谢山全氏云：由昆陵迁来者为蒋猷氏，与蒋浚明别为一派。则吾祖自台州迁来者，而非昆陵一派审矣。
>
> 来龙去脉，清清楚楚，不容怀疑。

但有不少野史在谈到“蒋委员长”的出生时，都说蒋介石姓郑，叫“郑三发子”，尤其是唐人先生的《金陵春梦》更是妙笔生花，洋洋洒洒，影响极大。该书这样描写：

光绪年间，王采玉先嫁给河南许州繁城镇后郑庄一位郑姓农民，生有三子，即大儿郑绍发、二儿子郑二发与三儿子郑三发（就是后来的蒋介石）。郑家世代务农，老实巴交，惟有三发子好吃懒做，不务正业，而其母采玉偏爱三发子。日子虽然清苦，倒也过得去。迨至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许州一带闹开了大灾荒，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了各自飞。为了活命，郑氏农民与妻子各带一个孩子去逃荒。蒋介石的母亲带着六岁的“三发子”要饭到了开封，后经人介绍，给一位姓蒋的师爷当奶妈，乃至做了填房，又一起随蒋师爷回到浙江奉化溪口镇。

唐人在《关于〈金陵春梦〉及其他》一文中谈到这些史料的来源时说：“1949年冬天，有一位真正的蒋介石侍从室侍卫官退休来港，寻亲访友，希望‘叶落归根’，并且很快获得批准。他回乡之前用‘八行笺’写下了一些有关蒋的情况，内中有五页是记载抗战时他奉蒋之命，在重庆监视蒋的长兄郑绍发的经过。由于事隔三十年，已记不起这五页‘八行笺’由友人送给我的经过了。”

张仲鲁在《关于蒋介石家世的一些传闻》（见《蒋介石家世》，台湾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一书中说：

> 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的艰苦年头。蒋介石因国事正焦头烂额，这时，在重庆校场口附近的河南同乡会内，从河南许昌来了一位叫郑发的老汉，他逢人便吆喝是“蒋委员长的亲哥”。“河南同乡会在一块低洼地，从楼房到街上须爬一个小坡。郑发走上小坡时，从楼上看其背像，与蒋介石十分相仿。他的身段动作，也有许多地方酷似蒋介石。而且他为人忠厚老实，不像虚夸浮冒、招摇撞骗之流”。许多人都确信他是蒋介石的胞兄。
>
> 河南籍军人郜子举（军长、补训处长）、李肖庭（军委会参议）以及蔡芷生（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给郑发出主意，但不敢代其上报。
>
> 知道此事内幕的还有军统特务少将沈醉，他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写道：
>
> > 当时在重庆曾经闹得满城风雨，许多人都听到过的一件新闻：蒋介石的亲哥哥郑绍发从河南到重庆找蒋介石，而蒋介石不认亲兄的丑事，便是由戴笠一手来替他处理的。蒋介石随母下堂到蒋家当“拖油瓶”之



1937年，蒋经国夫妇与母亲毛福梅

前，他母亲所生的大儿子仍然留在河南郑家。几十年后，他的大哥弄清了这一底细，想到重庆见见这位当了委员长的同胞弟弟，叙一下骨肉之情。蒋介石哪肯承认有一个异姓的乡下土老儿是自己的亲哥哥，不但不接见，并立即叫戴笠来处理这一件大不韪的“冒充领袖亲兄案”。当戴笠派特务把这位老头抓去亲自进行了一番询问之后，不用说，一看面孔身材，完全像是一母所生，而所答一切都是确确实实有根有据。这样，当然不敢公开严办，而一向标榜奉母至孝的蒋介石，也不便无端地叫部下杀害亲骨肉。最后只好听从贡献的两全之策，将这位哥哥交戴笠软禁在军统局望龙门会馆的看守所里。不久又移住在磁器口缫丝厂，不准人和他接近，免得被外国记者知道了宣扬出去。我多次去看过这个老头，他一谈起这件事，便滔滔不绝地叫冤，希望蒋介石不承认就算了，快点让他回家去。以后戴笠便禁止军统特务去和这人谈话，怕不留心传开出来，便把他送往息烽软禁了几年。抗战胜利后，还是把他送回去了。

蒋介石是浙江的谱牒，郑发是河南的血统，他们之间的兄弟关系究竟是捕风捉影还是别有隐情？

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保存了一宗档案，即当年郑发写给蒋介石要求其接见的两封信。第一封寄出的时间是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12月，寄信地点是南京水西门内升州路糯米巷十五号河南会馆，寄信人是郑发，收信人是国民政府蒋主席，该信由国民政府职员高桂南登记，为京府字第一五五一七号。内容如下：

主席钧鉴：

敬禀者窃郑发，年六十二岁，原籍河南许昌灵沟镇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曾在开封郑老师福安馆内求学时，与主席隶属同学。别后数十年始终不克一晤。民国十八年秋，承蒙主席昭见，因发离家未遇，殊觉怅然。发分别来京，晋谒无门。同学敬请崇安。

民人郑发拜启

郑发要求蒋介石召见的第二封信，是1948年5月22日写就，此时蒋介石刚就任总统三天，此信由总统府职员童子敬登记，收文号为总字第三二六号。全文如下：

大总统钧鉴：

敬秉者窃发，年六十四岁。原籍河南许昌灵沟镇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曾于开封郑老师馆内求学时，与总座同学。别后，数十年始终不克一晤。至三十五年，发奔至南京，蒙总座派秘书长吴鼎昌召见，心感莫名。发今再来京，因许昌共匪扰乱，寻获郑发等语，迫不得已，发不顾生死，星夜奔至南京以避危险。专呈一函，恳求总座恩准召见，以解数十年渴望，幸得一见，感戴之至。肃此，敬请崇安

步兵少校　郑发鞠躬

五月二十三日

当时住在升州路糯米巷十五号河南同乡会馆的寄凡先生见过郑发，他回忆道："一位姓张的为他介绍说'这是郑老先生'。老头子显得非常慈祥，两只明亮的眼睛，一撮小胡子，骨架、轮廓都非常像蒋介石。惟一不同的就是他脸上的皱纹，油黑的肤色，臃肿的身态和已经成了弓字形的背脊。"郑发告诉寄凡："我去重庆找他(蒋介石)，没有见他，那个姓戴(戴笠)的派了四个人陪着我，不准我这，不准我那，我受不了，三十五年便回家了。这些年间家乡情形你是知道的，天灾人祸生活困难，来南京也没有见到他唉！"

从郑发给蒋介石的两封信和当事人的回忆分析，郑发、蒋介石之间的确有一种难言的隐情与关系。郑发在信中一再暗示，清光绪二十五年时，两人同在开封郑老师福安馆内读书，而蒋介石对此亦心领神会。看来郑发是有些头脑了，多次碰壁后，他不再到处宣扬自己是"委员长的胞兄"，只说是"同学"。蒋介石也心照不宣，派国民政府秘书长吴鼎昌接见郑发，给了他一笔钱，安抚一番，打发他回河南。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给郑发一个"步兵少

校”的虚衔，只拿干薪不干活。这一切难道没有难以告人的秘密吗？

台湾的李敖先生总结了正反两方面关于蒋介石出身的议论后，采用社会学的方法来进行分析，据前北京政府司法部修订的法律及各省区司法机关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民国时期浙江省奉化县关于亲属继承习惯上有如下规定：

（1）该项习惯之实例及沿革：奉邑习俗，妇人未亡，遗有子女，并无财产，难以度活者，得将其身典与他人为妻妾，年老或家贫乏嗣之人，艰于婚娶，即典此项寡妇为妻妾。典期以十年或八年为限。（并无一定的期限，系当事人于立典时双方合议为定）限内所生子女，认为所典人之子女。限满将典约解除，此等人子女大抵仍居前夫家者居多，所典人给予典妻财物，亦于约内载明每年银若干元，谷若干石，其数极微，仿佛津贴相似，并不负担全份之家用。其沿革已不可考矣。

（2）该项习惯之通行地域及效力：典妻习惯浙省台金衢温处各属皆有，惟他处典妻之原因，率以无力顾养者为多，奉化则十九以夫死而有子女（如无子女即完全再醮）难以自存者，始典与人为妻妾，其效力如典妻。于典期内生子有同一分析财产权，如所典人无子，该子即取得嫡庶子身份权入嗣登谱，并得全份遗产，族中无反对之者……

根据奉化县这一习惯，李敖先生认为：王太夫人（王采玉）之于蒋肃庵，根本就是“典妻”身份；而蒋介石本人，则是“夫死而有子女难以自存”下的“拖油瓶”。

这大概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令人信服的结论了。

魂归故土　　蒋介石墓址之谜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蒋介石和蒋经国在台湾先后去世，蒋介石暂厝在桃园大溪慈湖，蒋经国在大溪头寮外。2004年1月27日，由蒋经国的遗孀蒋方良率全体家属具名，向台湾当局国防部正式提出申请，将两蒋遗体移灵台北县汐止五指山军人公墓。其实，蒋介石、蒋经国生前都想归葬大陆。蒋介石曾为自己选了三个墓址，而蒋经国则一直想死后能埋在其母毛福梅的身边。

蒋介石选定的第一个墓地在故乡奉化蒋母墓旁。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1921年病逝，蒋请风水先生看中了离溪口镇约三华里的西翠屏鱼鳞岙。这个地方风水极好，就像一座弥勒佛像，而安葬蒋母的墓穴正好就在弥勒佛的肚脐眼上。蒋后来在此又修建了规模较大的坟庄，并建筑了新式洋房慈庵，蒋介石还亲撰《慈庵记》。蒋最早是打算把自己埋在亲生母亲身旁，以便身后仍能尽孝。

后来，蒋介石又看上了奉化城北响铃岗，想以此处作为自己的归宿地。此处紧靠岳林寺，岳林寺是布袋和尚的圆寂处，地势高亢，景物幽美且周围有九座山，中间是水塘，正好形成九龙戏珠的大好风水。于是蒋介石改变了葬在其母身边的想法，选定响铃岗上的仁湖作为自己的墓址，并派人在周围专门修了一条公路，以供修墓时用。现在公路仍在，但仁湖周围却已成为水稻田。

20世纪90年代初，一位神秘人物在奉化蒋氏家族两位老人的陪同下，来到响铃岗察看风水。原来他就是宋美龄专门派来的秘密代表，来奉化筹办蒋介石的移灵事宜。此人与奉化市领导接触后，谈了蒋介石归葬的有关具体事宜，为了办事方便，还用五十万美元注册了一个公司，准备暗中操作，后因种种原因而中止。

蒋介石选定的第三个墓地在南京。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蒋介石曾多次拜谒中山陵，因觉得百年之后，若能在孙中山身旁得一处安息地，比安葬在母亲身旁有意义。选址的标准有二：蒋介石自认为要比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高明，因此墓址选得一定要高于明孝陵，但认为自己不如国父孙中山，因此墓址要低于中山陵。

于是他在风水先生陪伴下，亲自在钟山南麓勘察，终于在观音洞地区选定了一块墓地。此处背靠紫金山，面临紫霞湖，东邻中山陵，西毗明孝陵。蒋介石所以选定此地，不仅因为此处风水极佳，有山川之胜、林壑之美，而且高低相宜。1946年11月，蒋介石饬谕国父陵园管理处在此修建半山亭一座，以资纪念。因为当时抗战刚结束，百废待举，经济困难。当时预算为法币七千万元，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后由华侨自愿捐款，再加上法币贬值，物价升腾，国父陵园管理处呈请行政院长孙科，孙科函请海外部部长陈庆云，将捐款转到陵园管理处账上，该工程才得以开工兴建。

该亭由著名的基泰工程公司设计，共绘制了三种样式，报请蒋介石选定。1947年春天动工，秋天建成。亭为方形，重檐飞角，以苏州花岗石为基座，顶

覆蓝色琉璃瓦，亭内外画梁雕栋，富丽庄严。蒋介石命名为“正气亭”，并亲笔题写了匾额和楹联，正面横眉上阴刻着“正气亭”三个镏金大字，两侧楹联蓝底、黄边、金字，上联为“浩气远连忠烈塔”，下联为“紫霞笼罩宝珠峰”。“忠烈塔”指国民革命军将士纪念塔，“紫霞”指亭东之紫霞湖，“宝珠峰”则在亭西的独龙岗上。亭后有石墙，正中刻有孙科撰写的《正气亭记》。

如今正气亭犹在，成为南京中山陵的一处著名景点。

旧情难忘　王赓“丢”地图之谜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作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明确向美、英方面表示：中国将以全部军事力量来抵抗日本的入侵。他的亲军——税警总团编为第八十八师独立旅，配置在龙华和南市一带。由于旅长王赓及随身所带的军事地图被日军缴获，导致全线失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发起进攻，淞沪战役爆发。第十九路军第六团和公安警察两个中队的将士，在未及进入阵地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将士们都抱着一种强烈的爱国责任感，斗志昂扬，奋勇杀敌。在宝山路、虬江路、北火车站、青云路、横浜路一带与敌人展开激战。直至29日凌晨，才将来犯之敌击退。上午10时许，敌机复来俯冲轰炸，闸北一带燃起冲天大火，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总厂和藏有大量珍贵图书资料的东方图书馆都在爆炸和烈火中焚毁。日军趁着浓烟，向上海北站发起进攻，竟一举攻占北站。我军经过几个小时的浴血拼杀，终于在下午夺回北站。第一天的战况：第十九路军击落敌机一架，击伤两架，击毁敌铁甲车三辆，毙敌数百人。是日下午6时，我军进至北四川路租界边日军占领之地，日军退入虹口租界。同日，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发表抗日通电曰：“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卫守土，是其天职，尺土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第十九路军爱国将领的通电，激起了全国民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

2月3日起，日本海军陆战队在空军的掩护下，连续三天向闸北等地发起进攻，均被十九路军击退。2月4日，日舰十三艘大炮轰击吴淞炮台，蔡廷锴

急调兵力进行回击。

截止2月7日，抵达上海的日军已达万余人。敌主力向江湾和吴淞发起进攻，均被十九路军第一五六旅翁照垣部击败。另一路日军进攻八字桥，也被我军击退。8日，日军久留米旅团自拂晓起倾力猛攻吴淞，截止下午3时许，冲锋达十余次，均被十九路军所部击败。闸北方面，日海军陆战队向克明路、宝兴路进攻，遭我伏兵袭击，向横浜路败退。八字桥方面日军进攻未遂，向北四川路溃败。

2月14日下午2时，蔡廷锴接总指挥部命令："第五军张治中部八十七、八十八师归我军指挥，现已到安亭。一部抵南翔，加入战斗序列，实行分区作战。十九军及税警总团归蔡军长廷锴指挥。"

税警总团是上世纪30年代初宋子文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为了镇压抗税和漏税而成立了一支专管镇压盐枭抗税的部队。该团直属财政部，由于经费宽裕，枪械、服装、军饷都是一流的。税警总团的士兵要经过考试，择优录取。总团长由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王赓担任，副总团长是美国南方"西点"——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生孙立人。蒋介石不愿意自己的大舅子宋子文掌握一支私家军，想派黄埔系充任该团的下级军官，但税警总团有自己的一套班底和训练方法，王赓和孙立人按美国陆军操典训练军队，黄埔的那些玩意儿根本用不上，黄埔出身的军人也插不进去，蒋介石是狐狸啃刺猬，无从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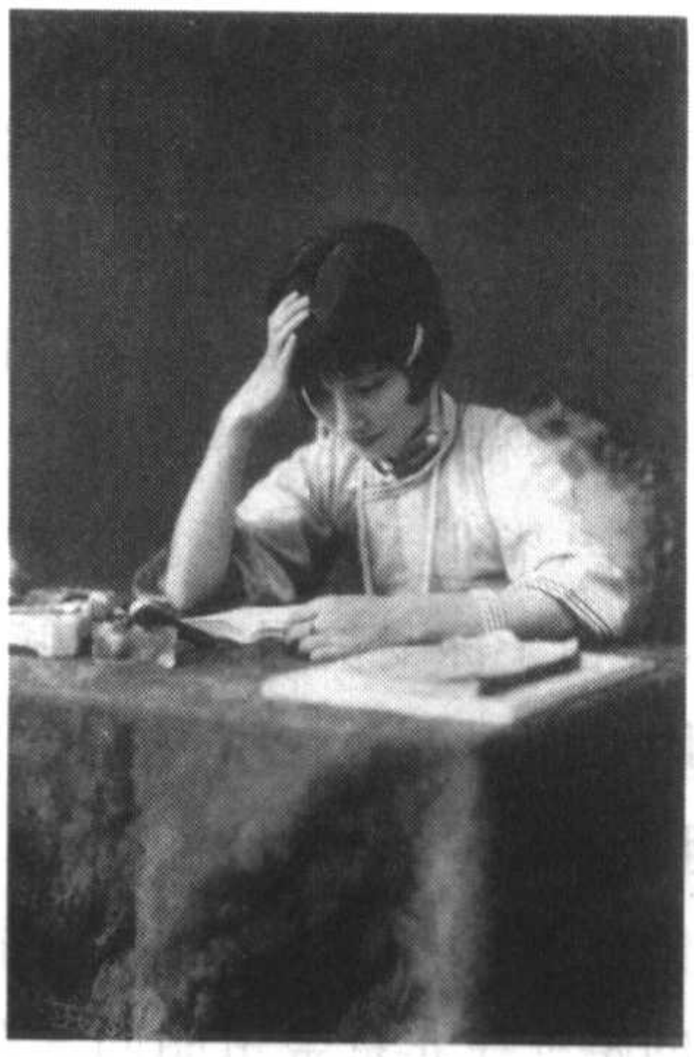
"一二八"淞沪开战后，作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明确向美、英方面表示：中国将以全部军事力量来抵抗日本的入侵。南京附近的国民党精锐部队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驰援上海。守土有责，税警总团自然不能置身事外，编制为第八十八师独立旅，在蔡廷锴统一指挥下，配置在龙华和南市一带，抗击日军。

2月18日，日军总指挥官植田谦吉向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须于2月20日上午7时以前从第一线撤退完毕，否则日军将"自由行动"。在遭到蔡廷锴将军的严正回绝后，从2月20日清晨7时开始，在植田的亲自指挥下，日军从吴淞口沿淞沪铁路至闸北天通庵路一线，向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的总攻击，激战一直持续到25日，植田的"全面总攻计划"被英勇顽强的中国军队粉碎了。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2月27日傍晚，第八十八师独立旅旅长王赓骑着一辆摩托车进入公共租界，在黄浦路上，被日本海军陆战



陆小曼是王赓的前妻，为了看望小曼，王赓在路上被日军发现



陆小曼年轻时的确很美，难怪王赓旧情难忘

队士兵发现并驾车追赶。情急之下，王赓将摩托车停在礼查饭店门前，只身逃了进去。日军士兵在与公共租界巡捕房进行交涉后，由公共租界的巡捕进礼查饭店将王赓抓获，带至巡捕房，又交日本海军陆战队带回审讯。

王赓随身带的军用皮包中，有淞沪兵力部署和战线配置图及重要文件，他逃进礼查饭店后，将皮包交给一位英国领班，但此人不敢拿，复交给了巡捕。巡捕也同时将皮包交给日军士兵。日军得到地图后，如获至宝。

在此之前，日本成立上海派遣军，派白川义则大将为总司令率部增援上海。白川于29日抵达吴淞口外，立即重新部署作战方针。3月1日，日军发动了全面攻势，淞沪各战线均有激烈战况。午后，日军第十师团偷渡浏河。在此防守的我第十九路军只有两个连的兵力，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抵抗，阵地失守。战场形势逆转，我军被敌前后夹击，腹背受敌，情况相当危急。在庙行镇附近的张治中第五军之八十七、八十八师的防御阵地也被强大的日军突破。在吴淞方面，日本舰队进行猛烈炮击。蒋光鼐派一个团前往增援，上去便遭惨败。这时，蔡廷锴已看出日军的企图，是要与十九路军进行决战，以便将该军一举歼灭。

在这种情况下，蒋光鼐与蔡廷锴、张治中三位将军进行紧急商议，决定保存实力，撤退到第二防线。是夜21时，中国军队开始撤退。第十九路军向南翔方向转移，第五军向常熟方向撤退。3月6日，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电令全线停火。在上海英、美、法、意等国的斡旋下，中日双方代表开始举行停

战谈判。

那么，在中日战争如此紧张和激烈之际，王赓为何到公共租界去呢？原来，他是去看徐志摩的遗孀、他的前妻陆小曼。

陆小曼原来和王赓是一对神仙伴侣。王赓是江苏无锡人，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里。稍长，在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读书（清华大学的前身），考取官费留美生，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又被保送到西点军校。王赓从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由于深受美国文化的熏陶，举止全是西洋做派，在北京的社交圈子中很惹眼。而陆小曼在京城社交圈子中也是一个有名的交际花，她人长得漂亮，且能歌善舞，又擅丹青，在她的石榴裙下，曾经拜倒多少好逑君子！年轻英俊的王赓和陆小曼相识后，在陆母的包办下，王赓和小曼很快谈婚论嫁。他们的婚礼在北京金鱼胡同的海军联欢社举行，轰动京华。婚后的王赓，在梁启超、蒋百里等人积极活动下，被推荐为清华学校的校长。但王赓应西点军校老学长温应星的邀请，又去了哈尔滨中东铁路参加护路工作。由于王赓经常外出，寂寞的小曼重返社交圈。

这就使浪漫诗人徐志摩有机可乘，插了一脚，两人很快坠如情网。王赓发现小曼红杏出墙并未雷霆震怒，反倒像绅士一样拱手将所爱让与手无缚鸡之力的徐志摩，只是警告他："若对不起小曼，我不会饶过你的。"

梁启超是徐志摩的老师。当徐志摩和第一位夫人张幼仪离婚时，梁启超写信竭力反对，信中说："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徐志摩却说："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独立，求灵魂之救度耳。"1926 年秋，陆小曼跟徐志摩结婚时，梁启超为他们证婚。当着众人的面，梁启超教训两位新人说："我希望这次对你们都是最后的一次。"弄得徐志摩、陆小曼好不尴尬。婚后，徐志摩偕陆小曼离开北京，南下上海。爱情是浪漫的，婚后的生活却是现实的。徐志摩自从娶了花钱如流水的陆小曼做太太后，父亲徐申如终止了对他经济上的接济，令他苦不堪言。为生活所累，他先后在上海光华大学、苏州东吴大学教书，后来又在南京中央大学兼课。1931 年 2 月起，徐志摩又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书，奔波于上海与北平两地教书，以为稻粱之谋。1931 年 11 月 19 日，徐从南京"蹭"免费的飞机去北平上课，这一天上午 11 时许，徐志摩搭乘的京平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机，在济南附近的党家庄上空遇到大雾，飞机触山，引起大火，徐志摩身化一缕青烟。失去志摩的小曼，身心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与她同处一城的王赓，利用战争的间隙，自然在百忙之中要去看望丧夫之痛的

小曼。这才出现了本文开头的情形。

王赓被抓后，29日晚，上海市政府向美国总领事克宁翰以及各国领事提出严重抗议。3月1日，王赓被日军放了回来。事后，上海市政府向南京政府外交部报告说："王赓于感(27)日，因事路经黄浦路，为日方海军士兵追捕，该旅长避入礼查饭店，后为工部局巡捕帮同扭送捕房，由捕头交与日方带去自由处置……"

当时，上海滩的小报记者就撰文说，王赓是去看坠机身亡的诗人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的。

从此，王赓仕途蹭蹬，而他的副手孙立人却由于作战英勇，名声大噪，在抗战中成为抗日名将。王赓却再也不出名了，抗战期间，他随一个军事代表团出国，中途得病，死于开罗。



诗人徐志摩

"人言可畏"　阮玲玉遗书之谜

阮玲玉是中国早期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正当其事业鼎盛之际，却陷入感情的绯闻之中，饱受黄色小报的围剿，最终自尽而死。阮玲玉死时留下遗书两封，后发表在《联华画报》上，但这两封遗书的真实性一直有人怀疑，因为它将与阮玲玉同居的唐季珊的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而且在遗书中，阮玲玉还对专以玩弄女性为乐事的唐季珊表现得一往情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怀疑始终没有确凿的证据。

第一封遗书矛头主要对着张达民：

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不住他的地方，别的故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100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冤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不住他。唉！哪有法子想呢，想想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吧！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阮玲玉绝笔。二十四年，三月七日晚午夜。



阮玲玉是20世纪中国早期电影时代的杰出影星

写到这里，阮玲玉似乎意犹未尽，又续道：

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现死了，总可以如他心愿。你虽不杀伯仁，伯仁因你而死。张达民我看你怎样逃过这个舆论，你现在总可以不能再诬害唐季珊，因为你已害死我了啊！

张达民是阮玲玉前同居者，当时已经解除了同居关系，但张达民仍继续纠缠不休，一方面制造桃色新闻，一方面向上海特二区地方法院捏造事实，以“妨害家庭罪”及“通奸罪”控告阮玲玉及其同居者唐季珊。

第二封遗书则是写给唐季珊的，此人是一位玩弄女性的好手，用田汉的话说，是个类似于西门庆式的人物。唐与阮玲玉也是同居关系，是一位富有的茶叶商。

季珊：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会和你死别，但是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请你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你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这样百般诬害你我，但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活着呢。

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远保佑你的，请你拿我的余资，来养活我的母亲和囡囡，如有不够的话，请你费力吧，而且刻刻提防，免她老人家步我之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真的爱我，那就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还有公司外欠我的薪水，请向之收回，拿来供养姆妈和囡囡，共2 050元。至要至要。还有一封信，如果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即不宣为要。

阮玲玉绝笔。二十四年，三月七日晚午夜。

阮玲玉遗书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轰动，尤其“人言可畏”之语，成了死者对黑暗环境的控诉，鲁迅先生也不顾病魔缠身，以“赵令仪”的名义发表了《论“人言可畏”》一文，对黑暗社会司法制度及小市民的无聊心态作了讽刺和鞭挞。阮玲玉的遗书也因此名声愈噪，天下皆知。

其实，这两份遗书真伪一直受到人们的怀疑，因为它是在外界的压力下，



阮玲玉和她的义女小玉

由唐季珊提供的，遗书一方面对张达民痛加谴责，一方面却以阮玲玉的口气对唐季珊表示百般留恋和歉意，这很不符合阮玲玉当时与唐季珊的感情状态。而且，如果仅是张达民的纠缠，如果有唐季珊的关怀，阮玲玉也不至于以死来解脱。

然而以上的怀疑却没有有力的佐证。直至1993年3月，暨南大学教授连文光撰写的《中外电影史话》一书，始对这个问题有突破性的研究，他对阮玲玉遗书的真伪进行了考证："其实此间作伪之行径，早已揭露出来，见诸于报端。在阮玲玉去世的同年4月26日《思明商学报》上，登载了一篇题为《真相大白　唐季珊伪造遗书》一文。文中揭露，阮玲玉自杀当晚，确写遗书两封，但不是唐季珊拿出来的两封。发表在《联华画报》上的两封遗书，是唐季珊指使梁赛珍的妹妹梁赛珊写的。梁赛珊后为良心谴责，说出真情，并将原遗书交出。原遗书极短，文字不甚流畅，而且涂改多处。"

新发现的阮玲玉遗书如下：

（其一）达民：我已被你迫死了，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津贴你100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其二）季珊：没有你迷恋"××"（按：指歌舞明星梁赛珍），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



阮玲玉遗容

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

过去的织云（按：张织云，唐季珊玩弄过的女影星），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

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还有联华（阮玲玉就职的电影公司）欠我的人工 2 050 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照看她们，因为她们惟有你可以依靠了！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

玲玉绝笔。



阮玲玉

然而连教授的研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至 2001 年，上海老作家沈寂也宣称发现了阮玲玉的真实遗书，并撰写了《真实遗书揭开阮玲玉死亡真相》。可惜的是，沈寂所出示的资料来源与连文光教授来自同一处，因此有人称这只是“旧闻变新闻”，并没有什么新发现。

客观而论，沈寂的文章对研究阮玲玉遗书之谜还是有用处的。比如说，这两封遗书虽然发表在不为人知的内部刊物上，但还是有人看过的，为什么当时没引起重视？因为圈内人都以为，唐季珊对阮玲玉一向体贴有加，不会施

以暴力，因此这封遗书是与唐季珊有过结的人刻意而为。而沈寂通过阮、唐周围的人，如黎民伟的日记发现，阮玲玉确有被唐施以暴力的事实。

如此看来，阮玲玉自杀虽有“人言可畏”的原因，但直接原因却是同她对男人的绝望有关，尤其是唐季珊，对她的伤害更大。

阮玲玉遗书的真伪似乎已经清楚了，然而人们不禁要问，这两封遗书为什么在当时没被人们确认，他们毕竟比我们对阮玲玉更熟悉，更了解当时情况，有许多微妙之处更不是我们当代人能体会的。所以，要确定新发现的遗书的真实性，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红颜烈女　　方君瑛自杀之谜

方君瑛乃黄花冈著名烈士方声洞之堂姐，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同盟会的骨干分子，曾一度醉心于暗杀行动，以暗杀手段来加速清政府的灭亡，曾组织成立暗杀部并自兼部长。辛亥革命后留学法国，不久，回上海居住。1923 年 6 月 14 日，方君瑛突然在上海自杀身亡。关于她的死，人们有不同的猜测。

方君瑛死时，留下遗书一封，全文如下：

君瑛之死乃出于自愿，非他人所迫也。盖因见社会之腐败不可救药，且自己无能，不克改良之，惟有一死耳！在世甚觉无聊，我对不住所有爱我者。我已去矣，所有之恩惠来世再报罢。六嫂之款七万二千，存在法银行，乃仲鸣弟经手，问之可也。伯母之款也存仲鸣弟处，六嫂尚有一万六千法郎，被黄国治、林秋生借去，请醒姐代追之，谅不至全数无着。瑛诚对不住六嫂，请恕我。瑛。绝命书。字据在第二小皮包内，请六嫂取之。

从遗书上看，死者对身后之事作了详尽的安排，但对死因却是语焉不详，以至引起后人的猜测。李焰生在其所著《汪精卫恋爱史》一书中认为，方君瑛本为汪精卫情人，她的自杀乃为殉情。

李焰生的观点大体如下：1909 年夏，汪精卫、黄复生、方君瑛、陈璧君等七人在日本组织了暗杀团体，准备赴国内暗杀满清权贵，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汪、方二人暗生情愫。没想到汪精卫后来的刺杀行动宣告失败，并被捕进了监狱，而一直仰慕汪精卫的陈璧君对汪展开了狂热的追求，并最终结为夫妻。

辛亥革命后，汪精卫夫妇曾一度旅居法国，与方君瑛再度相逢，于是旧情复燃。1921年，汪与陈璧君在广州筹备执信学校时，方君瑛应邀前来执教，汪利用陈璧君到美国筹款之机，更狂热地向方君瑛展开追求。

对于汪、方私情，陈璧君早有察觉，并派人对其进行监视，终于对他们的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因此闹上门去，百般羞辱。以方君瑛如此身份，如此性情，自然不能忍受，遂当夜写好绝命书自杀身亡。

对于以上说法，蔡德金先生予以了反驳，认为这根本是无稽之谈，“并非是对于后来成为汉奸卖国贼的汪精卫的贬斥，而是对一位纯洁女性且又为同盟会女杰方君瑛的莫大玷污”。为此，蔡德金撰写了《同盟会女杰方君瑛缘何自缢》一文，以正视听。

蔡文认为，方君瑛与汪精卫是生死之交的密友，但其中并没有恋情，只是一心想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共同理想，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方君瑛与陈璧君相识时，陈才十七岁，而方已是老资格的革命者了，就连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这样的人物都很敬重她，陈璧君对她也表示了敬仰之情，方也一直视陈为亲妹妹，十分关怀照顾。

汪精卫、方君瑛、陈璧君三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也一直维持着，辛亥革命后，汪精卫夫妇及方君瑛、曾醒等人结伴去法国留学，一同住在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城。不久，陈璧君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汪文婴，为什么一个男孩取了一个具有女人味的名字？这是取方君瑛“瑛”的谐音，因为其时由于宋教仁被刺身亡，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因此照料和看护婴儿的任务主要是由方君瑛承担的，以“文婴”为名是表达对方君瑛的感激和纪念之意。1914年底，陈璧君又生下长女汪文惺，“惺”与曾醒的“醒”字同音，因为这是个早产儿，幸亏有方君瑛与曾醒的悉心照顾，婴儿才得以存活。由此可见，方君瑛与陈璧君的关系十分亲密，不是姐妹，胜似姐妹。另外，汪精卫与陈璧君的感情一直是恩爱与忠诚的，这从汪为陈所写的大量诗篇中就可以看出。1936年，在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时，远在欧洲的汪精卫也没忘了赋诗给陈璧君以示纪念：“恩爱如新不可名。”

那么，为什么方君瑛选择了轻生之路，蔡德金认为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与汪精卫的恋情无关。

其一，痛感国内政治腐败。方君瑛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去法国留学，数十年与孤嫂及子侄弟妹过着极其俭朴和单调的学生生活。本想在学成之后报效国家与社会，但是回国后的现实却让她大为失望，

当权者纸醉金迷，国家依然积弱不振，过去的同道者许多变了节，与前清的贪官污吏无大分别。想起当年为追求理想的牺牲者，想起这十年的寒窗苦读却是劳而无功，前途黑暗不可想像，于是痛感生活毫无意义。

其二，沉重的负债心理。方君瑛的六嫂郑萌曾于1920年汇寄八万余元给方君瑛，暂存在她那里，准备给她的儿子贤旭来法国留学时作为学费，但被两位福建籍的留法学生林秋生与黄国治因学费无着从方君瑛处借走，且始终没有还钱。此事让方君瑛深为自责，成了她沉重的心理负担。为此，她曾准备回国去厦门集美学校任教，但因为学校所订条件过于苛刻，另外汪精卫与陈璧君也不赞成她接受这项工作，只能快快作罢。从这件事上，也可以反映出方君瑛急欲还债的心理。

其三，摆脱不掉的婚姻纠葛。方君瑛原有未婚夫是由父亲包办的，名叫王简堂，也曾去日本留学，平时倒是埋头读书的，但其思想陈旧，对方君瑛从事的革命活动不以为然，与方君瑛产生了矛盾。因为志趣不投，方君英抱定了独身的决定，终身不婚。然而十余年过去了，王简堂居然也一直未娶，并时常来电来函纠缠，这让方君瑛极为厌烦。

相对封闭的环境也促使方君瑛走上轻生的道路。方君瑛在法国留学期间曾遭遇车祸，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记忆力也大为减退。因为脑部受伤严重，方君瑛失去了自我排解压力的能力。而此时，她的平常最亲近的人包括汪精卫、陈璧君也都不在身边，内心忧愤得不到排解，积累之下，终成忧郁症，就在她绝命前数日，已对一直照顾她的陈璧君之母卫月朗流露过轻生的意向，可惜未能及时引起注意。

因此蔡文认为，方君瑛之死乃多种因素综合而致，但与所谓汪精卫私情无关。

多出个爹　　马占山弃亲案之谜

马占山是著名的抗日将领，“九一八”事变后，率孤军奋战于白山黑水间，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疆场失败后息隐津门，避居在英租界四十六号路三十七号宅内，伺机为抗战效力。此时的天津已经在日本人势力范围内，因此马占山的处境也颇为尴尬。果然，不久后闹出一场“马占山弃亲案”，在津门沸沸扬扬，使马占山名誉受到重大损伤。

这起弃亲案当时不仅在天津的大小报纸上连续报道，就连远在上海的《申报》也予以关注并投入大量的篇幅，一时人言啧啧，扑朔迷离。

事情的经过很蹊跷，1936 年 7 月的一天，一位七旬老者突然闯进马宅，自称马荣，是马占山的亲生父亲，此行是专门认子来的。

据《申报》记载的法庭记录，马占山的父亲已病故多年，而且由他本人亲自床前送终，怎么又冒出一位爹来？但马家为了息事宁人，还是接待了马荣。

据法庭目击者印象，马荣一袭黑色长衫，虽年已古稀，却精神强沛，能言善辩，目光闪烁游离，缺少庄稼人的本分。他在法庭上说：他乃是河北丰润县人氏，马占山是他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失散之大儿子，乳名老虎，失散已近四十年。

根据法庭调查，马占山确为河北丰润县人，但他的家族已经迁居关外达九代，他本人则出生在辽宁省怀清县，与马荣显然无丝毫关系。马占山的秘书杜荀若也向他做过解释："马将军的父亲在东北去世多年，坟墓尚在，他绝非你丢失的孩子，是你弄错了。"



马占山将军

对于此人，马占山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但马荣却认定了此事，虽百般劝解都无济于事，并不断上门到马宅哭闹。他转弯抹角地提出要求，说是为了寻找马占山，已费资近千元，不能就这样草草打发。

马占山很警惕，此人来历不明，给他些钱事小，怕他拿钱后乘机渲染，反倒授人以口实。为避免纠缠，索性置之不理。

然而此事没有了结，不久，天津法院检察院民事庭给马占山发去传票，原来马荣已经以"弃亲不养"状告马占山。同时，检察院也以"弃养尊亲属罪"提起公诉。

此案十分奇怪，天津律师界历来竞争激烈，但却无人愿意过问此案。也有的人乘机大敲竹杠，提出先交两千元讼费。落魄之中的马占山已是囊中羞涩，为筹集这笔钱，颇费了一番周折。

由于马占山未能及时出庭以及他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加上亲日势力的煽动，媒体纷纷作了披露，其中多有臆测影射。马荣也重新来到马宅，高声叫骂，致使路人围观，报界喧腾，舆论沸然，每每从道义上对马占山多有指责。

忍无可忍之下，马占山派秘书专门去北平邀请著名大律师纪清漪相助。纪大律师马上意识到这绝非简单的民事诉讼或一般刑事遗弃案，它很可能有政治背景。于是纪律师毅然前往天津，义务为马占山辩护。

如今的马占山处境困难，不仅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当局对他也很嫌恶。纪大律师一再请求马占山要说清事实。马占山坚决否认与马荣有血缘关系，他认为这是有人故意想损坏他的名誉。他说："在天津，我接二连三遇到麻烦，教唆这老头来哭闹已经是多次了。这老头丢儿子也可能是真的。开始我觉得他很可怜的，打发他回家算了，不必通知警察局。可是这老头子什么也不听，就是一味哭闹着要见我。我感到事情没那么简单，这老头一定是被人利用了，一定有背景。我不敢下楼，万一他掏出个炸弹呢？不料他又把我告了。"他还向纪律师补充了一个细节，马荣初来哭闹时衣衫不整，后来却穿起了长袍马褂，到法庭还请了律师，明摆着暗中有人支持。

根据马占山提供的情况，纪清漪决定以攻代守，以"妨害名誉及侮辱"等罪向法院反诉马荣。

公堂之上，原被两告唇枪舌剑，马荣一口咬定马占山乃是他的亲生骨肉，生于光绪二十年(1894)腊月初八。因当时家贫，交与姨妈抚养，后被姨父贩卖。多年来，几经打听，多方寻找，踏破铁鞋，耗尽家产，始探得下落。

马荣每一次出庭，俱做足文章，痛心疾首，声泪俱下，旁听者无不为之动容。一时间，天津街头巷尾争说故事，马占山这样一位抗日名将竟被指责为弃亲不养的道德沦丧之徒。

原告律师纪清漪则反驳说，马荣系一无业游民，其住址、社会关系俱语焉不详，显非安分之民。所述其子散失一案，前后矛盾，或云走散，或云拐卖。此外，被告所述遗失之子各项特征也与马占山不相吻合。根据民国二十年(1931年)出版之八卷四十七期《国闻周报》"时人杂志"所刊登的原告生平介绍，马占山生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二十四日，当可一目了然。

纪清漪律师还传讯了大批证人，他们或是马占山多年之部下，或是世交故人，证言原告家系清楚，身世明白，现有叔伯兄弟多人在世。原告之父马纯于民国六年(1917年)亡故，葬于怀德县炭窑村，有证人张殿元等亲自参加葬礼，被告所述与原告之关系纯属捏造。

因此纪律师指出：被告冒认、讹诈行为遭到理所当然的拒绝后，仍多次上门取闹，毁人名誉，中外报界俱有登载，已对原告造成伤害，特根据刑法第三〇九条及第三一〇条起诉，请法庭以侮辱罪依法论处。



抗战时期的马占山

但是，马荣及辩护律师仍坚持原告本人必须到庭，以利辨认。这一要求却让纪律师担心，他向法庭询问，由于马占山的特殊身份，公开露面将危及他的生命安全，而马荣却为什么一定要马占山出庭，其目的何在？

马荣思索片刻，称所失之子耳上有一“拴马桩”（即多长的小肉瘤），请求法庭当场验证。他用手抹着脖子比划着：

“马占山耳朵上若没有‘拴马桩’，情愿以死抵罪。”

这是马荣以前从没有提到过的线索。

纪律师冷静地发问：被告所述之“拴马桩”是在原告哪只耳朵？

马荣猜疑半晌，答是左耳。

被告律师立即补充道：“也可能动手术割掉了。原告必须亲自到庭，由被告会同法医当庭检验。”检察官同意被告的请求。

纪律师对此却很为难，他告诉法庭，马占山既不是一般的普通百姓，也不是当今的特权阶层，而是著名的抗日将领，如今又失意于政坛军界，目标既大又处于无保护状态。日本特务时时盯着他，处处欲置他于死地。前年春节除夕，特务曾组织暗杀小组，阴谋炸死他全家，此事尽人皆知。目前日方势力控制天津不可轻视，且华洋杂处之大都市，鱼龙混杂，原告公开露面于大庭广众之下，恐有不便，因此不宜在法庭上公开检验。

一周后，天津市法庭庭长、书记官、检察长、市法院法医、市总医院外科主任等前往马宅检查，一些报社的记者也随同前往。他们对马占山的两耳前后都作了详细检查，并拍照存案，记者也照了相。因为此案轰动全国，人们想要知道，这位抗日将领是否真的遗弃了他的亲生父亲。

法庭再次开庭时，审判长给被告和他的律师看了放大的四张马占山两耳的照片，马荣的脸顿时变色，照片清晰地表明，马占山双耳既无“拴马桩”，也无动过手术的痕迹。

纪清漪在法庭上大获全胜，法院随即作出判决，马荣因“侮辱及毁人名誉罪”拘禁六个月。

但马荣及其律师并不甘心，其律师辩称，此事事出有因，他的当事人为什么拿出明显不利于自己的证据。而且像这类小手术，因为年代久远，加上手术成功，完全可以不留痕迹的。此案过去数年后，也有马占山少年时代的友人回忆，马占山耳朵上依稀长过小肉瘤。还有，马荣被判拘禁后，旋即释放，据说也是马占山的意思，不愿为难这位失子的老人。再加上此案背后的故事，马荣究竟是为了寻子还是有人策划，有意识败坏马占山名誉，都成了不解之谜。

相煎何急　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之谜

鲁迅与周作人，本为同根生，又都是五四时期的斗士，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文豪，后来却一朝失和，终身怀怨，这一疑案，至今让人议论纷纷。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认识了一位日本侍女羽太信子，很快周作人就坠入情网，于1909年夏与之成婚。后来兄弟俩先后回国谋职，几经颠沛，终于在北京八道湾安了家。

周氏兄弟在八道湾的新家是一座四合院，共有前、中、后三个小院，院中林木扶疏，屋明窗亮，周氏全家，包括其母、鲁迅原配夫人朱安、三弟周建人及周作人夫妇都住在这座宅子里。一晃将近三年半，其间相处融洽，平时吃饭都由羽太信子一手操持，大家也互相经常串门，完全是兄弟无间的那种亲密。

然而至1923年7月14日，鲁迅突然改在自己屋中用餐，他在日记中专门记下了此事："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鲁迅的这则日记似乎言犹未尽，有未吐之言，到了同月19日，事情开始发作与表面化。这天上午，住在后院的周作人踱到前院的鲁迅屋中，留下一封信就径直而走，信中写道：



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

必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请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周作人的话十分严重，他等于彻底断绝了和鲁迅的兄弟情分。从字里行间看，他还似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以至打破了他的蔷薇梦，需要订正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似乎他们之间是明白的，因为他“昨天才知道”的，“过去的事不必说了”。

这件事的后果也十分严重，一周后，鲁迅去砖塔胡同看房，显然他已经无法忍受在八道湾住下去了。8月2日，终于携朱安离开了八道湾，兄弟失和遂为文坛皆知。这其间，鲁迅竟大病了一场，这病与兄弟失和、心情忧郁不无关联，甚至是他后来致于死命的肺病的重要诱因。这一点，就连周作人也曾意识到，他在兄弟失和十三年后第一次谈及鲁迅时说：“说起他这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着了。”

然而矛盾继续恶化，鲁迅搬出去十个月后，即1924年6月11日，鲁迅因回八道湾取书物，兄弟俩竟然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据当时的目击者、鲁迅与周作人共同的朋友章川岛说，他当时就住在八道湾宅前院鲁迅曾住过的房子里。那天午后，他正要去上班，看见鲁迅来了，走进小院的厨房，拿起洋铁水勺从水缸里舀凉水喝。他请鲁迅进屋喝茶，鲁迅却说：“勿要惹祸，管自己！”然后径直走进周作人住的后院去了。过了一会儿，从后院传出周作人一声骂，章川岛急忙走进后院，看见了可怕的一幕：周作人从木架上抓起一个尺把高的铜香炉正要砸下去，章川岛抢下香炉，将周作人劝回了屋，而这时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正忙着打电话，也不知是搬救援还是请人调解。



周作人

兄弟火并的当口，他们的母亲鲁瑞也住在八道湾，亲眼目睹了这伤心的一幕。据周建人1983年的回忆，母亲和他说过这件事，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只陶瓦枕向周作人扔了过去，他们才退了下去。



绍兴鲁迅故居

兄弟之间的怒火仿佛没有穷尽时，从此他们再无一丝来往，鲁迅在他的《铸剑》、《兄弟》等一系列文字中，让人感到积郁和压抑，有一种借题发挥，一吐块垒的感觉。而周作人也在《破脚骨》、《谈龙集序》、《老人的胡闹》等文章中，用种种暗示手法论及鲁迅，有时甚至相当恶毒。钱理群先生在写《周作人传》时也认为："这恶毒的咒骂出自温雅的周作人，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足见他心中怨恨之深。"

这怨恨甚至延续到兄弟俩人的后代，据鲁迅儿子周海婴回忆，直到1948年，他随解放大军回北京，羽太信子见到他竟然破口大骂，后来感到用汉语骂不过瘾，又换成了日本话，手又指又划，气势凶猛。周作人在1967年"文革"中去世，其家人给周海婴寄去讣告，然周海婴并没有去赴丧。兄弟之情破裂如此之深，让人唏嘘不已。

然而究竟发生了什么？当事双方却是绝口不提。据鲁迅三弟周建人回忆，有一段时间，他常见到鲁迅，但鲁迅从没对他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认为其"昏"，鲁迅倒是对羽太信子颇有微词，他说："我已经涓滴归公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因此他分析认为，两个哥哥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矛盾"（见周建人《鲁迅与周作人》）。

因此有一种说法非常流行，兄弟失和的原因在于羽太信子。她出身贫苦，并患有歇斯底里症，自从进入八道湾后，因为当时周氏兄弟收入颇丰，也渐渐地学会了奢侈，佣仆成群，花销巨大，"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钱买香烟和点心"。也许他就这些问题和周作人交换过意见，但因为周



鲁迅夫妇与孩子

作人的软弱或者惧内，不仅没有调和矛盾，反而加剧了矛盾，终于导致兄弟反目。

但是有人怀疑他们的冲突是因为经济问题引起的，“请注意兄弟二人是突然失和的，如果仅是经济上的这些说法，那么必然会有一个从小吵慢慢到大吵的过程，而且如是经济上的考虑，二人完全可以放到光天化日之下争吵”。没有必要二人都守口如瓶，忌讳难言。所以，就有人猜测，根源大概来自羽太信子本人。章川岛回忆说：羽太信子曾对他言：“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而且，周作人后来也在《破脚骨》一文中影射鲁迅，“破脚骨”在绍兴话中是流氓之意。

章川岛本人并不相信“听窗”一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还有人猜测是鲁迅调戏了羽太信子，恰好被周作人撞见，从此兄弟断交。这种猜测完全没有依据。周作人的信是18日发出并声明“昨天才知道”，而鲁迅14日就开始独自吃饭，显然周作人的怒火是因羽太信子的挑唆而暴发。羽太信子究竟向周作人说了些什么，这就不得而知了。

口舌之争　鲁迅与“四条汉子”产生矛盾之谜

众所周知，“四条汉子”一词乃鲁迅对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四人的一句调侃之词，后来却成了“文革”时期四人的罪名，历史的真实是什么？鲁迅为什么与以上四人产生矛盾？有不少研究者对这个课题进行了研究。有一篇题为《鲁迅眼中的“四条汉子”》的文章，对这一段经历作了比较形象和详尽的追述。

此事发生在1934年10月，因为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左联方面原来负责与鲁迅联系的冯雪峰调到苏区，左联

的另几位负责人周扬、夏衍、阳翰笙则认为，有必要继续与鲁迅加强联系。

然而在与鲁迅约好见面的时间里，田汉不期而至，因为鲁迅对田汉的某些事不满，给这次谈话蒙上了阴影，气氛也变得有些不愉快。

但是，整个见面过程还是顺利的，分别时，大家还因为鲁迅的一句调侃而哄堂大笑，所以说，这次见面并没有爆发原则性的争论。

然而一年多以后，鲁迅的怒火突然喷发，他在给徐懋庸的公开信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讽刺的文字：

>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即夏衍）约我谈话了，到达那里，却见驰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即周扬），还有另外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来通知我：胡风乃是汉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答问以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显然，鲁迅对以上四人充满了不满。

其实鲁迅的不满主要集中在田汉身上，那次谈话说胡风是汉奸，也是由田汉挑的话头。当时从监狱里放出不久的左翼诗人穆木天怀疑胡风是内奸，因为在审讯时，主审官提及调查了许多人，但始终没有提到胡风的名字，这本来是没有根据的猜测，然而出于警惕，左联的一些领导人也对胡风产生了怀疑，所以通知鲁迅也并没有恶意。

但鲁迅对此却生出强烈的反感，这不仅因为他对胡风的遭遇有着同情之心，而且因为《申报》上发表过穆木天宣布脱离左联的声明（此乃国民党的捏造，但鲁迅并不知情），出于对变节者的鄙视，鲁迅也因此迁怒于这一消息的传播者。

然而鲁迅与田汉的误解还在继续加深，特别是《社会月报》事件，更加导致了鲁迅对田汉的愤怒。因为鲁迅一封给曹聚仁的信被曹拿去交给《社会月报》发表，而同时在《社会月报》上发表文章的，还有一位已脱离中共、被鲁迅称为“革命小贩”的杨村人所撰的极具恶意的《赤区归来记》。为了阻止《社会月报》继续刊登杨文，田汉以一种所谓“责备贤者”的方法发难，认为鲁迅之信与杨文同登一刊是一种“调和”。

这种生拉硬扯的做法让鲁迅感到愤慨，视田汉为同一营垒的人从背后给他的一刀。

田汉没想到弄巧成拙了，按他的设想，他是有意冤枉鲁迅的，以激起鲁迅

向《社会月报》提出抗议，从而达到阻止杨文继续发表的目的。因此，他向鲁迅作出真诚的解释：

> 我与先生不但是多年文化上的战友，而且无论在什么意义上也没有丝毫矛盾的地方，我有什么中伤同志特别是中伤您的必要？既然无此必要，却会把友人当敌人，那除非发了疯。1935 年我们的阵线需要更整齐更坚强，同志间任何意义的误会都与整个工作有害。为着说明那一文章的经过与意义，我写这封信给您，希望您也不要怀疑您的战友。无论什么时候，我是敬爱同志特别是先生的。



1881 年 9 月 25 日鲁迅出生在绍兴这座屋子里，一直生活到十八岁去南京求学

但鲁迅对田汉的解释并没有释然。

除了对田汉的矛盾外，鲁迅对周扬也有不满。客观而论，周扬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他对左联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党内组织系统上，这就与非党的鲁迅很难相交。特别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又造成了鲁迅与周扬之间的沟通甚少，误会也因此难免产生。比如说，当时左联有一份内部刊物《文学生活》，每期都要寄给鲁迅、茅盾等左联领导人的。后来有一期未曾寄，鲁迅听说后托人找来这期刊物，发现这期竟是总结 1934 年工作的。像这样总结左联全年工作报告的大事，鲁迅竟然不知情，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就连茅盾也有不平："左联一年工作的报告，却事先不同左联的'盟主'鲁迅商量，甚至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当然，也没有同我商量），这就太不尊重鲁迅了，即便是党内的工作总结，也应该向党外人士的鲁迅请教，听取他的意见，因为左联究竟还是个群众团体。"

在“四条汉子”中，鲁迅对夏衍、阳翰笙并没有很深的成见，之所以将他们联在了一起，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左联的领导人，意气相投，又恰好同时出现了。鲁迅是个文学家，一旦动起笔来就会追求妙笔生花的感觉，对一些事情的描绘不免注意生动性而忽视准确性，比如夏衍就在《一些早该忘却而未有忘却的往事》一文中订正了一些史实，鲁迅不仅将此事发生的时间从1934年误写为1935年，“四条汉子”乘坐的汽车也是在很远处停了下来，鲁迅是不可能看到他们从汽车上跳下来的。另外，他们也不是一律洋服，至少夏衍穿的就是骆驼绒袍子。从夏衍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四条汉子”之说在他的心中创伤之痛。



这就是鲁迅在他的文章中写到的小时候读书的地方“三味书屋”

从以上的情况看，鲁迅与“四条汉子”虽然存在着矛盾和误解，但并非是敌对性的，只是普通的口舌之争，并不涉及原则性的问题，还都把对方视为同一营垒的战友，他们的矛盾主要起因于当时的环境恶劣，再加上小道消息的传播和恶意谣言的挑拨，以及门户之见和个人性格的原因。“文革”期间之所以有人拿它大做文章，那是别有用心。

误会与隔阂　吴宓与钱钟书师生失和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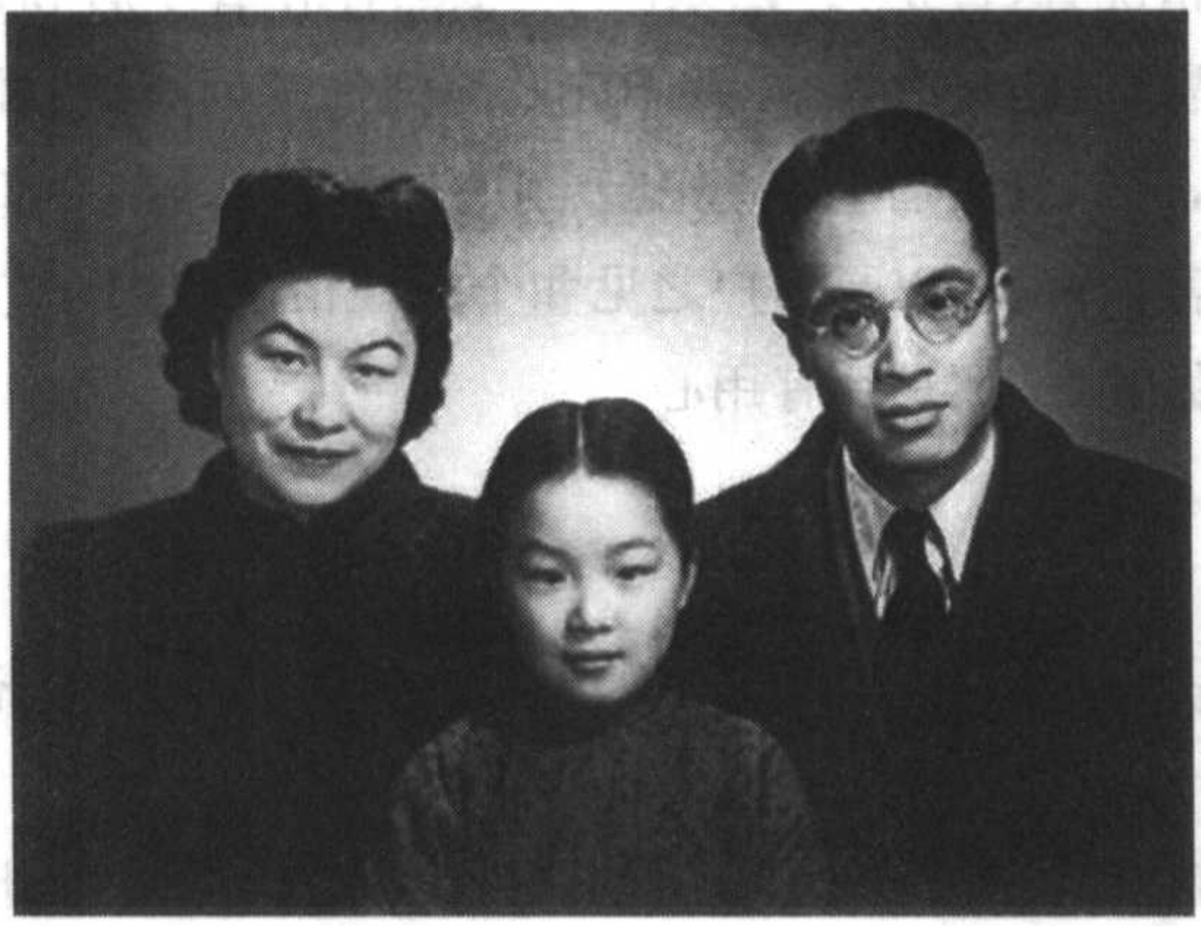
吴宓，字雨僧，陕西泾阳人。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先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学成归国后，被聘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室主任、清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等。他的弟子中出类拔萃的泰斗级人物有：古汉语学家王力、历史学家傅斯年、东方语言学家季羡林，还有就是为世人熟悉的写《围城》而出名的钱钟书。但是师生恩怨似乎从此而起，两人后来几乎没有什么交往。

吴宓和钱钟书的师生关系，要从钱的父亲说起。早年，出身无锡大户人

家的钱钟书到北京求学时，因钱父与吴宓私交甚深，吴宓便让钱钟书在清华园旁听，并亲自辅导他一年多的外语，在此基础上，钱钟书学业大进，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后又留学法国，学业有成，闻名天下。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照理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就是师生有误会和矛盾，也还是可以坐下来谈的。但为什么老死不相往来呢？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宓内迁大后方昆明。当时，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在昆明联合组成西南联大，吴宓在西南联大讲授世界文学史、中西诗比较等课程，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明、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进行比较印证，传授学生。而钱钟书留学期间，尽管通讯不便，仍与老师鱼雁往还互通消息。远在巴黎的钱钟书把决定回国的消息写信告诉吴宓时，吴义不容辞，与西南联大校方谈妥，聘请钱钟书为该校教授。校方委托国文系负责人陈福田写了便函，附在吴宓给钱钟书的信中，只是未下正式的聘书。后来，钱钟书从法国留学归来，来到西南昆明，找到了恩师吴宓。

谁料想，当钱钟书兴冲冲地来到西南联大，校方却变了卦，他们告知吴宓，说钱钟书的学问尚欠火候，暂时只能聘其为副教授。



钱钟书与夫人杨绛、女儿钱媛

校方临时改变主意，使吴宓不好向钱钟书解释，钱钟书也怏怏不乐，师生二人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吴宓失望之余，劝钱钟书去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教，并亲笔写了一封推荐函。钱钟书便辗转湖南，在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教授。不久，通过学友王力的推荐，又受聘于广西桂林大学。抗战中期，中日双方处于相持阶段，加之西南群山阻绝，交通不便，钱钟书颠沛流离于战乱之中，几番迁徙，吃尽了苦头。到达桂林后，钱钟书谈及自己归国后的

谋职遭遇与感受，唏嘘不已，同时亦对老师吴宓有些微词。不想，经过一些口传，添油加醋，再传到吴宓耳朵里时，已经大相径庭。吴宓认为自己一片好心，作为学生，更应该体谅。遂叹自己多管闲事落下不是。

吴宓因校方没有聘用钱钟书不能释怀，等学期结束，写了一封辞呈便拂袖而去。先到四川成都的燕京大学执教，后又到武汉大学，最后辗转到四川大学任教。

钱钟书在桂林稳定下来后，完成了后来著名的长篇小说《围城》。然而，就是这本书，却最终导致了师生间的感情进一步恶化。本来，《围城》面市后，吴宓特地购得一本《围城》，读过后感觉不错，倍加赞赏。但一些有“索引考据癖”的人评论《围城》时认为，书中的“三闾大学”影射的是西南联大，抗战期间，“联大”乃由北平的北大、清华和天津的南开三所大学内迁组成的。更有人言之凿凿，说书中方鸿渐只按照高松年开的路程走，那个“高松年”便是指吴宓与陈福田，而吴宓的影子则更多一点。如书中描述：“鸿渐等了一个多钟点，不耐烦了，想自己是神经过敏，高松年直接打电报来的，一个这样机关的首领好意思说话不作准么？”至于“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学去，所以接了聘书，近来越想越乏味，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原船退回上海”更被“索引”人士指出，这便是钱钟书快快意态的真实流露。

一时间，各类小报纷纷热炒师生间这段不愉快的经历，从而使吴宓觉得似乎进一步证实了钱钟书对自己的抱怨，心中大为不快。师徒俩却再无机会来消融因此而引起的误会。

数年后，有人传话给吴宓，钱钟书评价自己的老师时出言不逊，什么“吴宓太笨”、“傅斯年太迂”、“叶公超太懒”，所以做不出大学问，徒有虚名而已。

吴宓虽未作反驳，可心中对钱钟书隔阂更深，而钱钟书也一直没有机会向老师解释，于是师生间老死不相往来。

这桩文坛公案在半个世纪后仍未了结，吴宓解放后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病逝于 1978 年。钱钟书也是命运坎坷，不再写小说，文革中被当做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和磨难，晚年闭门谢客、潜心治学。钱钟书同其夫



吴宓先生

人——翻译家杨绛多次在不同场合否认:“我从没有说过‘吴宓太笨’的话。”可惜,吴宓再也听不到弟子诚挚的解释了。

踏破铁鞋　“北京人”头盖骨失踪之谜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标本,抗战时期不知流落何处,这是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损失之一。1945年12月4日,当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著名历史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北京人”在哪里》一文。他感慨道:这是一个谜,也许不久即可解答,也许永远不能解答。1998年8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等十四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发出倡议书《让我们继续寻找“北京人”》,希望“在本世纪结束前,大家携起手来,做一次全人类共同的寻找”。遗憾的是,“北京人”的下落依然不明。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发现于1929年12月,根据其特征表明,它代表了“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为“从猿到人”学说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一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重大发现,引起了全世界学术界的注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也在1987年12月11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北京人”头盖骨从发现后一直存放在协和医学院解剖系办公室的两个保险柜内,抗战爆发后,中方委托美方转移,途中就此遗失。据当时最后接触化石的胡承志战后报告,在珍珠港事变前,大约(1941年11月)18至21日间,北平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BOWEN)匆匆来到实验室,要求胡承志速将“北京人”等装好,要在极秘密之下送到他的办公室。“余当时将早经备妥之木箱拿出应用,并将房门锁住后装箱。该两箱均为白木箱”。“至装箱之情形,颇为华贵。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由具有弹性之黄色瓦垅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两箱内骨骼化石数为:“北京人”头骨五个,头骨片五片,牙齿约一百三十枚,下颚骨约十个,上颚骨一个,其余零星碎块之肢体骨等约数十块;上洞史前人头骨三个,未成年头骨一个,肢体骨十余个,牙齿数十枚及零星小骨多件。

装箱完毕,胡承志“旋及派工友用车亲自押送至博文先生办公室,当面交

彼，彼即立刻将两箱送到‘F’楼下四号之保险室，过夜后即送至美大使馆”。珍珠港事变前，知道“北京人”装出的有胡顿校长、博文先生及白小姐（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不久之秘书）。自此，“北京人”化石便下落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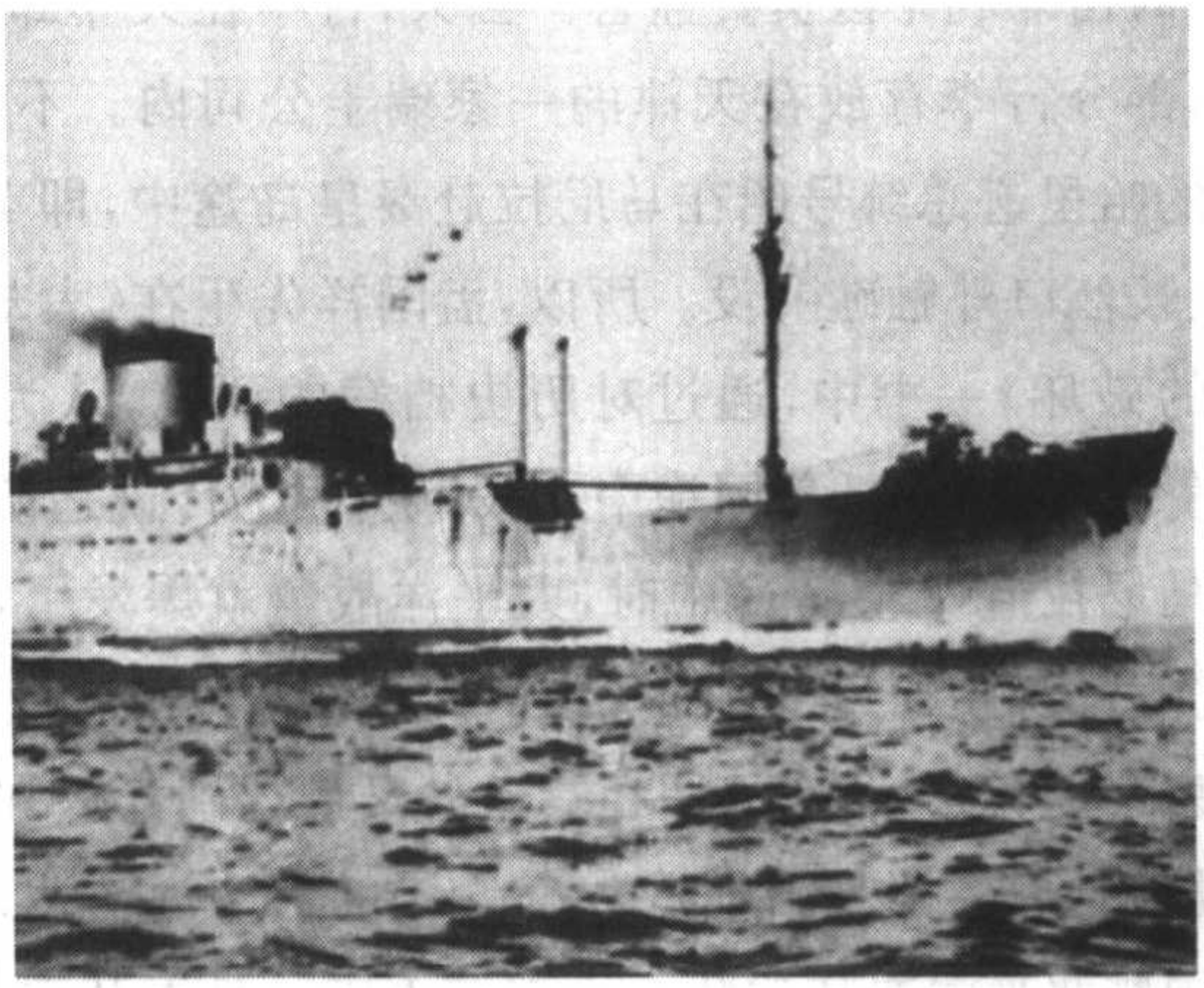
关于“北京人”化石失踪之谜，有多种说法。其一是“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国海军代运出，美国方面原计划由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带到美国。1941年12月4日，两箱化石标本连同美军人员的行李二十七箱，由火车专列运到天津转秦皇岛，当时由菲利军医负责监管。当天，行李在天津卸下，部分行李存巴斯特研究所，部分行李存放在天津的一家瑞士公司内。不幸的是，来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哈里逊总统号船在马尼拉赴秦皇岛途中，即12月8日，为日本战舰追捕，在长江口外触礁沉没。所以，孟国祥先生在《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一书中，通过对历史档案的研究，认为几乎可以排除“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运抵美国途中遗失”说，因为传说运载化石的那艘哈里逊总统号在马尼拉赴秦皇岛途中时，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该船在长江口外触礁沉没，它不可能接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

那么，“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滞留在秦皇岛又遭遇到什么呢？1942年9月10日，原北平协和医学院教授佛腾在给翁文灏的信中说：“北京人”头盖骨原物等原拟随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一道送往美国。日美开战不久，美国陆战队队员在秦皇岛做了俘虏，那些化石就与这些陆战队员在一起。这个情况是佛腾教授从一位陆战队员那里得到的，他在北京被日军关押时因阑尾炎发作而住进了协和医院，他瞅准机会把这一消息透露给大夫。佛腾教授分析说，这些化石或许已被日本人得到，或许就在秦皇岛遗失了。

那么，“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被人藏匿？有人说，它在天津时就被掉了包，后流落在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一位古人类学家夏皮罗在《北京人》（PEKING MAN）一书中就认为在天津的地下室里就掉了包，它极有可能在美国。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打破中美长期敌对的坚冰，尼克松想找到“北京人”作为礼物送给中国，但没有成功。随尼克松访华的嘉纳斯悬赏5 000美元寻找“北京人”，获得了很多线索，其中一位女士说自己藏有“北京人”化石，并约定在帝国大厦102层楼见面。双方如期而至，当该女士取出照片时，嘉纳斯眼睛一亮，以为这正是他苦苦寻觅的“北京人”。就在讨价还价之时，看到有人拍照，该女士拿起皮包飞跑而去，可惜嘉纳斯未能追上，以至失之交臂。

那么“北京人”是否可能在日本呢？如果化石和美国陆战队队员确实落

入日军之手，那么可能就在日本。然而在战时，日方也在大规模搜寻“北京人”化石，为此博文还被日本宪兵队关押了五天，但没有问出什么东西。对于日本人的这种行为，你可以理解为掩人耳目，也可以理解为确实不在日本人手中。还有一种说法是，装“北京人”的两个箱子，当时在秦皇岛的库房里，该库房曾被日军抢劫了两三次，在战乱中难保这两个箱子不被日军摧毁了，而日本方面还不知道。



这艘日本轮船“阿波丸”号，已经沉入海底六十年，
有人说“北京人”头盖骨就在这艘船上

长期研究“北京人”去向的中国学者李树喜先生认为，化石在日本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中日两国无论在官方还是学术界都就头盖骨失踪问题交换过意见，日本方面坚决否认在日本”。从常理来推测，“北京人”头盖骨之所以珍贵，主要在于其研究上的价值，关注的人多才有意义。假如在日本，无论在政府，或是在民间，都应该将它公布出来，没有秘而不宣的道理，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著名人类学家贾兰坡生前曾说，他也不相信“北京人”头盖骨在日本。

对“北京人”的去向另有一说是：当时有一个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与美国驻华大使馆相通的便门口值岗的卫兵，曾看到半夜有两个人抬了一箱东西，埋在大使馆门外十几米的后院里。这个卫兵推测，这一箱东西不能排除为“北京人”。该后院现在建成一个仓库。对此，李树喜认为，起初美国方面并不愿意代为保管，后来中美就保管头盖骨化石事宜达成官方协议才起运的，不存在私埋的可能性。

也有人认为，遗失的头盖骨化石就在国内。曹家骧在其《考古发现漫笔》中说，1996年初，有一位日本朋友在临终前对他的朋友嘉滕刚清说：据他所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被埋在北京日坛公园内，在一棵松树的树干上还做了记号。嘉滕刚清将此事告诉了好友仰木道之。仰木道之向中国方面提供了信息，引起了重视。1996年5月3日，各路专家商讨对日坛公园“埋藏”地点进行地表探测的方案。以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进行两次地表探测。6月3日上午，发掘正式开始，然而近三个小时的发掘依然一无所获。

在种种谜团无法解开的情况下，“北京人”头盖骨随葬“阿波丸”号一说又让人燃起了希望。这一说法是由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方面提供的资料率先披露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向中国方面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希望中美两国共同打捞。“阿波丸”是日本的一艘万吨级巨轮，1945年4月1日返回日本途中，在牛头岛海域被美国海军重创，沉入我国领海，船上两千人只有一人生还。有关资料表明，“阿波丸”号上装有金锭四十吨，白金十二吨，未加工钻石十五万克拉，工艺品四十箱，锡三千吨，铝两千吨，约值五十亿美元。我国于1977年初对其进行了打捞，在已经打捞的沉船部分物品中，成功取回了三千吨锡锭，这说明美国方面提供的材料基本上是可信的。由于当时打捞技术的限制，潜水员只能下潜到水下五十米左右，而“阿波丸”号的船底在水下七十米，结果未能作全面打捞。但在“阿波丸”初步打捞中，竟然发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的家藏小官印(玉印)及郑孝胥安葬时分赠后人的圆砚，砚上有“郑公孝胥安葬纪念”字样。而历史记载“阿波丸”乘员全部都是日本人。这说明日本人搜罗携带了中国北方的文物宝器上了“阿波丸”，这也是“阿波丸”可能装载“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旁证。正因为如此，一些研究者建议，有关部门应该对“阿波丸”号重新打捞。但这一推测也有疑点，如果日本人1941年已得到“北京人”化石，为什么不将化石直接送往日本，反而绕道东南亚，一直等到1945年才装上“阿波丸”号运往日本呢？

至今，人们还在苦苦寻觅。

谁为祸首　　邵飘萍被枪毙之谜

1926年，是黑暗势力与进步势力大搏斗的一年，也是中国报业史上不幸的一年。才华横溢的北方报人、著名的《京报》社长邵飘萍在北京被北洋军阀

张宗昌杀害，国人再也读不到他那脍炙人口、揭露黑暗、针砭时弊的文章。那么邵飘萍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1884年，邵飘萍生于浙江金华，原名振青，飘萍是其笔名。1907年，他进入杭州的浙江省高等学校，与陈布雷、邵元冲等激进分子一同参加了反对清廷将沪杭甬铁路筑路权卖与英国人的活动，参加了浙江各界的“浙路拒款会”，力保主权。他的头脑中充满了反清反暴政思想，再加上邵飘萍笔走龙蛇，针砭时政，“性情高傲，不可抑制”，乃至到了“世人皆欲杀”的程度而不为当时社会所容。

在杭州求学期间，邵飘萍因闹得太凶，被清地方官府视为反清分子，欲加以逮捕，后经人疏通，化险为夷。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窃国为大总统，国家徒有“共和”之虚名，邵飘萍此时仍是放言无忌，与一名叫杭辛斋的报人合作，创办《汉民日报》，并在报端经常“揭露贪官污吏和地方豪绅的丑恶。对袁世凯盗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也时有讥讽”。于是，邵飘萍以三次被拘捕的“前科”，在“二次革命”中支持孙中山，为袁世凯不容，终于逃到日本去学法律。《汉民日报》受到袁世凯的压力而封闭。在日本，他与《甲寅》杂志主编章士钊过从甚密。

1915年，袁世凯为实行帝制，以此与日本作为交换条件，签订出卖中国利益的“二十一条”。此事最先在外国报界予以披露，邵飘萍闻讯，立即撰文寄回国内报界，激起全国人民对卖国条约的激烈反对与声讨。他以“阿平”为笔名，在上海的《申报》、《时报》、《时事新报》上连篇累牍撰文，抒发内心对袁世凯黑暗统治的不满，引起了新闻界与舆论界的重视。很多人喜欢读他辛辣的文章，一时“洛阳纸贵”。

1916年，袁世凯一命呜呼。邵飘萍回国，以其感觉敏锐、文笔有力，成为《申报》驻北京特派通讯员。他具有独特的新闻思想和作风，认为应该采取一切手段和方法，必须得到事实的真相，发出第一手新闻资料以飨读者。当时的军阀、政要常出入北京八大胡同，依红偎翠。邵飘萍便广交朋友，混迹青楼，从将军、总长、部长、秘书长、政客、谋士的口中打听许多内幕新闻和秘密情报，夜深半醉而回，立撰电讯，大大扩充了《申报》的新闻信息，吸引了大量读者。有时，消息重要他甚至用密电码直接发出，成为独家新闻。

1918年10月，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京报》。在创刊词中，他挑明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即是本报之所为作也。”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黑暗年代，他公开与当局相连，自然经常受到迫害，甚至获致牢狱之灾。邵飘萍称：

"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世界，设计害民，我偏要撕破他们的秘密。"这粒"蒸不熟、煮不烂"的"钢豌豆"依然故我，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又为头马。

《京报》的社论直指段祺瑞政府，乃至招祸。军警出动查封了《京报》馆，拘捕了主编潘公弼。邵飘萍闻风疾去，在妓馆内请了个妓女，二人扮成一对夫妇，混进车站，躲过军警耳目，大模大样逃回上海。尽管如此，他犀利的笔锋仍然像投枪一样，直刺北洋军阀的心脏。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段祺瑞战败，政府垮台。邵飘萍回京，复刊《京报》，对直系军阀，尤其曹锟贿选大总统后的政局多有评论。直系欲"统一"，独揽大权，而邵飘萍偏偏主张"缩小中央，整理地方"，引起军阀嫉恨。邵飘萍敢于革故鼎新，在《京报》办了不少有特色的副刊。其中鲁迅主编的《莽原》副刊更为世人争睹。鲁迅共在这个副刊上发表了十篇《旧事重提》，后以《朝花夕拾》为名结集出版。

正是鲁迅的充满革命思想的杂文，给浓云密布的中国天空带来一道道闪电和震耳的惊雷。《京报》与邵飘萍更为反动统治者和军阀所不容，必欲打杀而后快。

冯玉祥是北洋军阀的叛逆。而邵飘萍对冯玉祥和国民军则加正面报道，倾向性十分明显。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激烈之时，冯玉祥率部从山海关前线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导致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大败。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从广东北上，共商国是。后又与入主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不对路，与张作霖的部下郭松龄有反奉秘密协定。郭松龄兵败被杀，张作霖乃将矛头对准冯玉祥及其西北军，与吴佩孚联合，表示要先扑灭北方的赤化，再扑灭广东之赤化。于是奉鲁军与直系残军联手，4月15日，直军进攻到通州，奉鲁军打到北京西苑，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冯玉祥的军队退往南口，奉、直军进占北京。

奉系军团司令张宗昌对同情或支持冯玉祥国民军的人士立即采取非常手段，大肆逮捕与镇压。邵飘萍对骤变的风云不是没有觉察，冯玉祥部一撤离，他便立即躲入东交民巷外交使馆区里的六国饭店，而军界是不能在使馆区捕人的。邵飘萍在六国饭店一住数天。4月24日这天，合该有事，碰上了张汉举。张在北京也搞了一家小报馆，宗旨与《京报》正好相反，专为入主中枢的北洋军阀唱赞歌，像个马勺边上的苍蝇，奔走于权贵之门，以讨些残汤剩饭混日子。此人有个绰号，叫"夜壶张三"，最初是青楼中的姑娘们首先叫起来，渐渐成为公认的名号。"夜壶"在北方即夜中方便的尿罐，因其满嘴脏话，臭气连天，再加上他好吹牛，故弄玄虚，妓女们便送他这个贴切的"雅号"。

“夜壶张三”来到六国饭店见到邵飘萍。

邵飘萍正愁无人闲话，了解信息，于是便与“夜壶张三”闲聊起来。

张说：“危机已经过去，《京报》馆并无查封，说明你没有什么危险。”他故作神秘地说：“我在当局处有熟人，你已无事了。回家不会出问题的。”

清清冷冷的邵飘萍不堪寂寞，便于当夜想潜回家中取些文稿，谁想一离开使馆区，便被王琦的军法处军警布下的埋伏所逮捕，折磨半夜。第二天，北京新闻界推举代表十三人前往张宗昌司令部，请求释放邵社长，而此时《京报》馆才被军警查封。代表们对张宗昌的部下说：“我们是北京报界选出的代表，前来保释邵飘萍。如果邵飘萍所犯罪名为宣传赤化，那么北京的报界全体岂不是都同情赤化吗？”

狗肉将军张宗昌则骂道：“我非看看，是他的笔厉害，还是老子的枪厉害！奶奶个熊，非杀他的头不可。”他还说：“取缔宣传赤化分子，早经奉天军事会议决定，警厅奉命执行，邵飘萍不过其中一人而已。”其实，邵飘萍根本不是什么“宣传赤化”，《京报》的立场只不过多赞扬“西北军”而已。军团司令部连夜审讯，仓促定谳。

4月26日清晨，北京城的春天刮起了少有的狂风，刮得人睁不开眼。天色阴森可怖，铅云四合，不见阳光。

军政执法处处长王琦亲自带领执法队从昏暗的牢房中提出邵飘萍。执法队押着邵飘萍走过他熟悉的北京街道，来到了天桥刑场。王琦以“乱党”和“宣传赤化”的罪名，宣读了执行邵飘萍死刑的命令，签发命令的人便是“狗肉将军”张宗昌，而他的后台便是奉系军阀魁首张作霖。

一声枪声，结束了邵飘萍年轻的生命，也宣告了北方舆论界“中流砥柱”的崩塌。新闻界、文化界和中国的革命派无不为之惋惜与悲痛。

上海《商报》大手笔，“残血犹热”的文胆陈布雷，在邵飘萍被杀的次日，以悲痛的心情在《商报》上刊登《共和国家与生命保障》一文，评论邵飘萍被杀事件，文曰：“《京报》邵飘萍君竟于昨晨为军团司令部判决死刑，执行枪毙。入民国以来，除袁世凯军政执法处时代，未有不顾法律，不重人权，下如此骇人之手段者也。”

特工汉奸

怪西人案　　牛兰事件之谜

1931年6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秘密逮捕了一对持多份欧洲护照并携带一位四岁孩子的夫妇，怀疑他们可能是苏联间谍。但百般调查却无从弄清他们的确实身份，由此引发了许多抗议。8月，这对夫妇突然被移交国民党军事情报当局，又一次引起波澜，中共组织进行了大量的营救工作，并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国际红色救济会也参与其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然而这一事件的内幕始终云山雾罩，不要说牛兰夫妇的真实情况，就连他们的姓名、国籍、来华目的、社会背景，几十年后也没有弄清，而且牛兰夫妇的下落最终也成了谜，诸多研究者穷尽精力，也没能让此事件水落石出，因此也称这一事件为“怪西人案”。

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内部文件已经解密，而且所幸的是，牛兰夫妇的孩子吉米尚活在人间，终于将这秘密公布于世，解开了人们心头的疑云。

牛兰的真实姓名叫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尼克，牛兰是他的中国化名，这也只是他十几个化名中的一个。他的夫人原名达吉亚娜·尼克莱维亚·玛依仙柯。租界方面及国民党当局伤透了脑筋也没弄清楚他们的真名。

牛兰夫妇都是前苏联人，分别出生在乌克兰和圣彼得堡，由于他们手持多国护照，而这些发照国或是否认，或是语焉不详，因此一直没能弄清他们的真实国籍。

虽然租界和国民党特务都认定牛兰夫妇是苏联间谍，但始终拿不出过硬的证据。而真实的情况是，牛兰夫妇的确是职业间谍，牛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后来进入“契卡”（即“克格勃”的前身），曾先后到欧洲数国执行过秘密任务，还在法国被捕并监禁两年。回国后，被调入共产国际联络部充任信使，1927年来中国，以商业公司作掩护建立秘密联络站，但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与苏联在华公开机构联系。

牛兰夫人出身贵族，精通多国语言，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5年与

牛兰认识并结婚，1930年来中国协助牛兰工作。

牛兰夫妇的来华目的是国民党当局最为关心的，但因为对方的丰富经验和坚不吐实，他们也一直无法查实。真实的情况是因为在1927年中国境内先后发生了几件让共产国际猝不及防的大事，比如当年4月，奉系军阀在北京搜查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办事处，逮捕并处死中共领袖李大钊，劫走大批秘密文件。接着，在天津的苏联几家商行被搜查，驻上海的领署也被万国商团包围。尤其是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更是把这股反革命浪潮推向了尖锋。这一连串的突发事件都让苏共和共产国际感到震惊，共产国际联络部、远东局等机构也因此受到批评。在经过检讨后，决定派遣得力人员来中国了解情况，探讨建立秘密联络站，用新的方式加强与亚洲各国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这就是牛兰夫妇来华的原因和目的。

牛兰夫妇在中国的活动很频繁，从他们的述职报告及其他档案材料看，他们利用各种身份，在上海租界区内从事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等机构与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党的联络，接受与中转信件、电报、邮件，提供秘密会议的会址，为赴苏联的共产党人办理手续等等。

牛兰夫妇被捕乃是出于意外，因为共产国际的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察从其所带的文件中发现了牛兰夫妇的邮政信箱，从而追踪到的，但他们却查不到任何指证他们为苏联间谍的证据。正处于为难之际，由于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叛变，使情况顿时复杂起来。因为顾顺章为工作事与牛兰夫妇间接打过交道，但没见过面，所以国民党特务机关怀疑牛兰正是顾顺章交代的共产国际在中国联络站的负责人，遂决定引渡。

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花了大量的精力，动员起爱因斯坦、萧伯纳、杜威等数百名国际知名人士发出公开呼吁，抗议国民党当局拘禁牛兰夫妇。

虽然国民党当局找不到牛兰夫妇的把柄，但他们却认定牛兰夫妇非一般人物，也有心置其于死地，所以牛兰夫妇的生命存在着危险。中共方面也在进行着大量的营救工作，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潘汉年到处奔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这场国际性营救行动中，宋庆龄起到了关键作用，她组织起"牛兰营救会"，亲自去南京和蒋介石、汪精卫交涉，还多次去监狱探监，鼓励牛兰夫妇在监狱里坚持战斗。

1932年8月，牛兰一案进行宣判，虽然缺少证据，但国民党当局依然以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牛兰夫妇死刑，但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

刑。此后，牛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有人说是在狱中死亡，也有人说回到了苏联，因为与托派来往的原因，很可能在大清洗之列。

其实牛兰夫妇早在1939年就返回了苏联，日军在两年前攻占南京时，牛兰夫妇乘乱逃出，回到苏联后生活得很平静。牛兰曾担任过苏联红十字对外联络部长，1963年病故。他的夫人则在大学里任教，1964年病故。因为他们所从事的秘密工作性质，所以一直非常低调，这也是牛兰事件在很长时间里处于迷蒙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

案中有案　河内刺汪案之谜

1939年3月发生在越南河内的刺汪案，是国民党军统特工惩戒汉奸的一次大行动，其结果是误中副车，曾仲鸣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长期以来，对这一事件人们并没有多少歧义，除了当年参与暗杀行动的陈恭澍有些不解外，也只是存疑而已，并未就整个事件提出质疑。

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入，也有人对这一事件作出了全面的探讨，《陷阱——汪精卫叛国案新探》一书对此作出了新的分析，提出不少新见解。

此书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汪精卫叛国案的发生，乃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阴谋，是蒋介石利用汪精卫自身的弱点设置的一个陷阱，诱使其叛国投敌以陷其于不义。至于河内刺汪行动，同样也是一个设计精巧的圈套。



汪精卫

该书分析道：自从汪精卫出走河内，国内一片声讨之声，汪精卫本人也处于孤独徬徨之中。因为日本当局政潮起伏，1939年1月4日刚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的近卫内阁宣布辞职，继任首相平沼对于前任的“和平运动”不感兴趣。汪顿失所倚，被搁置在河内，大有被遗弃的感受，心境极为悲观，以译书写稿打发时间，在叛国行动上并没有进一步动作，甚至打算通过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申请签证，出走欧洲。蒋介石能够想到，假设汪精卫就此幡然悔悟，罢手不干，

事情还未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从过去的历史看，国民党内因党争激烈，派系复杂，开除某某党籍、恢复某某党籍，那是家常便饭。汪精卫被逼走海外不止一次，卷土重来也不止一次，汪系中人留在重庆的不在少数，难保他今后不会再兴风作浪。

所以，蒋介石要彻底战胜汪精卫，必须采取釜底抽薪之策，将其名誉彻底搞臭，不让他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所以说，河内刺汪行动实际上是刺激汪精卫，促其彻底投入日本人的怀抱。该书为论证这一观点，罗列了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发现了诸多可疑之处。

军统特工陈恭澍是刺汪案的负责人，后来他撰写了回忆录《河内刺汪始末》。在该书中，陈以其老牌特工的敏锐，已经产生了某些怀疑：

怀疑之一，虽然陈恭澍名义上为此项行动的负责人，但许多事情并非他所掌握，行动组的一些成员也不归他调配，其行动他也无权过问。

怀疑之二，行动组在河内期间，戴笠曾数度亲临河内，并与刺汪行动组其他成员接触，这一事实数十年后陈恭澍才知道。当时军统在河内最大的行动非刺汪莫属，为什么却撇开行动的具体负责人而另有布置？种种疑点，令人费解。

怀疑之三，当地线人魏春风的神秘身份。此人来历身份一概不清，是由戴笠辗转介绍认识的，却成为行动组得力的帮手，每逢关键时总会出现，特别在刺汪行动的当晚，行动组在动手前突遇安南巡警盘查，形势危急，魏春风却突然从天而降，将危险从容化解。

怀疑之四，在接受此项任务前，戴笠态度很严肃，一再强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否则以军统家法处置。然而，当行动失败后，却是不了了之。

对于以上怀疑，“陷阱”一书进行了梳理，再对照其他材料，从刺杀过程中发现，还有更多的不解之处。

根据陈恭澍的描述，参加这次行动的人员共计十八名，或文或武，都是有一技之长的。按理说，对付汪精卫这样手无寸铁的政客应该毫无问题，而且他们已事先踩好了点，由唐英杰将汪宅内部情况摸得清清楚楚。

参加具体谋杀任务的有七人，陈恭澍负责望风与接应，郑邦国打先锋，轻功突出的唐英杰负责翻墙开门及引路，张逢义与陈布云巡回户外，以为哨戒，杀手王鲁翘在余鉴声协助下实施刺杀行动。

当行动人员进入院内，却是楼门紧锁，情急之下，由郑邦国抽出随身利斧将门劈开，也因此惊动汪宅上下，有人伸头探望，被郑邦国抬手两枪吓了回去。

这一情节，与汪精卫的侍卫许少泉回忆完全吻合。许在《我所了解的汪精卫》一文中说："厨师何兆住在后门的一间小房里，听到异常响声，便打开门张望，特务朝他连开两枪，打伤他的左脚。惊闻枪响，我们准备冲出去，又一声枪响，特务打伤戴云声（汪侍卫）的左膀，并有几枝枪口对准我们威胁说：'不准动，谁动就打死谁。'因出境时不能携带武器，我们都是赤手空拳，加之又不知对方来了多少人，均不敢贸然从事。"

这第一次枪响，陈恭澍听得十分清楚，他当时开着车子在汪宅方向望了望，一无动静。稍许，又传来三声枪响，他开始慢车缓行，准备接应行动组撤退。

这第二次三声枪响，是王鲁翘发出的，根据他事后向陈恭澍的汇报，其冲到二楼三楼之间时，曾与一个人迎面相撞，见不是目标，他将此人吓了回去。然后直奔三楼，冲向带阳台的北房。因为根据唐英杰的侦察，这里就是汪精卫的卧室。



汪精卫与曾仲鸣

因为屋门紧锁，王鲁翘以利斧将门劈开一个一尺见方的洞口，从洞口张望，只见床下趴着一个男人，因上半身隐藏床下，完全看不见，只有腰背双腿暴露在外面。王鲁翘一连三枪，均命中目标，遗憾的是不能验明正身。

其实王鲁翘击中的是曾仲鸣。

陈恭澍对这次行动的失败一直耿耿于怀，事后不久，他就质问唐英杰："每次的侦察报告都说，汪精卫住的是曾仲鸣被打死的那间，为什么与实际情况有误？"

唐英杰的回答让陈恭澍哑口无言：

“人是活的，会走又会动，如果临时调换了房间，我能拦住他们不让换吗？”

直至《蒋总统秘录》出版，他才发现该书全译本第十一册二〇三页上的一段记载与唐英杰说法完全符合。

三月二十一日，汪兆铭的秘书曾仲鸣在河内高朗街的隐秘住宅中被爱国之士所诛杀，因为刚好就在这一天夜晚，汪兆铭偶然和曾仲鸣换了卧室就寝，刺客误认为曾仲鸣为汪本人，对室内射击数枪。

《蒋总统秘录》乃是日本人古屋奎二所著，按出版该书的日本《产经新闻》说明，此项材料系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提供，当然是必有所本。

另外，由台湾国防部情报局于1979年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也有类似的说法，该局的前身就是军统局，一些重大案件的档案记录仍在该局保管，陈恭澍怀疑，这些材料的来源就是唐英杰本人给军统局的秘密报告，经整理改编后就成了来源可靠的原始材料。

唐英杰这个人本来就与陈恭澍有矛盾，在行动期间，行为乖张，几十年后，陈恭澍对他依然摸不清底细，尤其对汪精卫临时换房一事，更感到是牵强附会，但却说不出其所以然。

《陷阱》一书的作者对换房一事作了考证。

曾是汪精卫近侍、亲信的萧耀南称：“离河内时，汪昼夜在曾仲鸣房间看书写字（曾房内光线较佳），在外窥探者以为该房即汪卧室，殊不知昼间在该房，夜间不在也。”

戴笠的重要助手沈醉也撰文曰：河内行动组出动的当夜，不料因曾仲鸣的老婆赶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一间大一点的房间让与曾夫妇住，而他和老婆搬到另一间房内去了。

但是以上的推断都有不合情理之处。

曾经做过汪伪中央委员的金雄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朱子家”为笔名撰写了《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对此案作了十分详细的描写，就连陈恭澍也认为，此人所述必有所本，并非空穴来风。

朱子家对汪宅描述得十分细致：

高朗街道7号，地居河内僻静之一角，屋凡三层，底层：前面左右两大间均为汽车房，相邻的后面两大间为仆役室，楼梯则处于全室的中央

部分。中层：向北两大间，与楼梯两侧各有小室两间，均为汪氏随从人员之卧室。向南的两间，前一间为客厅，后一间为饭厅。顶层：楼梯左为两浴室，右为两厕所。向北两室，右为朱执信次女公子朱微女士的卧室，左为曾仲鸣、方君璧夫妇之卧室。向南两室，右为何文杰、汪文惺夫妇卧室，盖与其左汪氏夫妇一室相毗连，而曾仲鸣之卧室，又刚与汪氏之卧室相对，相距且仅数丈之遥。



投入日本怀抱的汪精卫(前右)

由此可见，该楼坐南朝北，二至三楼的面南房间才是正房，条件与采光也是最佳。否则，二楼的客厅就不会设在南面而让警卫人员住在北面了。

三楼的四个房间，朝南的两间之间有门相通，左首一间既让与汪精卫的女婿及其女汪文惺夫妇居住，那么隔壁者自然汪精卫夫妇最合适。而且此房带有晒台，面对花园，理应为主人居住之房间，如若汪与曾换房，则应该是汪住北屋而曾调至南屋才合乎情理。

即使汪精卫昼间利用曾屋看书写字，然而唐英杰俱是夜间出动侦察，理应不受此困惑，且是亲自登上楼顶，双足勾檐，倒挂卷帘向内窥视，当不致有此失误。

而且，朱子家是对汪宅内部情况有过详细调查的，他也未提到换房一事，汪住南屋，曾住北屋，是一直这样安排的。因此，将误刺曾仲鸣的原因说成是曾汪临时调房所致，已不能用“自圆其说”几个字来解释。

还有更让人惊讶的事，据朱子家透露：“仲鸣腰腹部中弹累累，密如蜂房。其夫人方君璧亦中三弹，一在臂，一在腿，一在右胸。”然根据陈恭澍的回忆，

他当时确实只听到两次枪声，共五六响。而曾仲鸣是否与夫人方君璧住在一起，他们不知情，但有一点可以保证，王鲁翘当时并没有向她开枪，因为王鲁翘没有必要隐瞒不报。

那么，是否朱子家夸大其词。

曾仲鸣后因伤重不治，汪精卫伤心之余为其撰写行状，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晨丑时，天未明，凶徒数人，持械突出寓所，发弹数十，伤五人，君伤最重，是日午时卒，夫人君璧以奋身救君，亦中三弹。余三人伤，轻重不等，凶手被捕者三人。越日，法文各报皆以大字标明蓝衣社所为，且据凶手供称，谋杀目的是在兆铭。

陈璧君在大陆解放后，也在监狱中供称：

我与曾妻子在三日前，刚由香港前来看望他们，是夜全家伤亡共六人，曾中数十枪，方亦中三枪。我与汪房未被进入，其后陈（恭澍——笔者注）匪被李士群诱捕，述往事，说他们每日都从邻街的大楼上，用千里镜窥视汪的住宅了，看得明明白白。不知何故，竟入曾房（此处陈也未提及换房一事——笔者注），曾仲鸣同志遂代为牺牲了。

当晚，住在楼下的汪精卫侍卫许少泉于事发后也曾去过曾仲鸣屋，他回忆说：

只见曾仲鸣的卧室房门洞开，床前血溅满地，曾仲鸣下腹部连中数弹，已撒手西归，方君璧躺在床下不能动弹，大腿中了三枪。

双方各执一词，所述迥异。然而，这一切却不能用一般的非彼即此、非此即彼的概念来判断，原因很简单，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说假话的必要。

那么，曾仲鸣身上所击中的多余子弹从何而来？方君璧那三枪又是由谁击中？自第二阵枪响过后，到陈恭澍接应王鲁翘上车撤退，其间不过几分钟，而汪宅上下却是在刺客走后十分钟左右才出来报警，这中间是否又有新的情况发生？

所以，《陷阱》一书认为，河内刺汪案疑云重重，他刺激了汪精卫卖国投敌的脚步，其目的并非是消灭汪精卫的肉体，而是彻底结束其政治生命。刺汪案乃是国民党特工组织精心设计的一次秘密行动，甚至就连一些当事人也不解其中奥秘。遗憾的是，这一切怀疑仍然停留在推理阶段，尚拿不出过硬的

证据证明作者的观点。

歪打正着　　中国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之谜

中国有没有破译过日本空袭珍珠港的密电？这个问题无疑是民国史上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同为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从事译电工作的池步洲和张令澳两先生，对此提出迥然不同的说法。

对中国破译日本空袭珍珠港密电问题的提出，来自于1979年香港《天天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不过该文认为破译密电的是霍实子先生。内容大致如下：

> 1941年，珍珠港事变发生前五天，中国有人破译了日本密电码，预知日方采取行动，美国不信此消息……本文报道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主人翁霍实子，现仍健在，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名翻译日本军事密码专家，曾为抗日战争立过功。另一件事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五天，他又译出日本外务省给驻美日本大使的密电，饬令驻美使馆马上焚烧各种密码本，只留一本普通本。当时霍氏将电文译出之后，又写上了译者按语说："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曾电令驻华各领事馆，马上烧毁各种密码本，只留一本普通本，由此可以肯定日本决定对美发动战争。"

霍实子在抗战时期是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第一组少将组长，负责密码的破译工作。在"文革"中因为历史问题而蒙受冤屈。1983年3月1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为了落实霍实子的冤案，特派书记员陈培娥女士到霍实子先生住处了解破译日本密电的情况。霍随即给池步洲写了一封亲笔信：

> 步洲兄！您好。今天下午2点不到，有位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陈培娥同志(女)到访，了解在抗战期间我兄的情况。由我笔述或口述，由她用法院审判用笺写的，共有三页，由我签章，先写霍实子，85岁，现在市政协秘书处工作。内容大致是……1940年春，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成立，我任该室第一组少将组长，池任该组第四科科长，破译了许多日本的重要情报，如日本偷袭珍珠港这一重要情报是池破译出来的……

霍实子承认是池步洲破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码。池步洲说:“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我们当年破译日本密电工作的角度出发,将所知的梗概综述如上。但,是谁破译这份密电报,本来是很清楚的,是我而非别人…… 霍先生这封亲笔信,可以雄辩地证明:不是别人,正是我把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报破译出来,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实际上霍先生本人不擅长研究,宜于搞研译和翻译。但他又是一组之长,自有不少行政事务要他去管,故极少做破译工作,一切都是由我们军政部过来的人员及一、二原检译所人员(如王瀛)去做,而且在研究、研译、翻译三者分工中,他不宜于研究,可以做些研译,更无需他去做翻译,事实上他当组长不必做实际工作,总其成而已。”所以,“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报,是我而不是霍先生,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表面上看突如其来,实际上却是酝酿相当时日,其先兆脉络隐约可寻。在事件爆发前大半年里,我们从破译的日密电中即已发现其中异兆;在前五天里,我们又作了准确的判断,惜未为美国所重视……

日本早已根据森村正(吉川猛夫)所提供的珍珠港方面军事情报,决定于 12 月 8 日早晨偷袭珍珠港,但却又狡猾地派遣来栖特使匆匆赴华盛顿搞假谈判,以迷惑美方。其实,这个烟幕早被我于事件发生前五天破译成功,由日本外务省致野村大使的一份密电报中予以揭破。该密电报主要内容如下:

(一) 立即烧毁各种密码电报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二) 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转存于中立国家银行;(三) 帝国政府决定照御前会议采取断然行动。

……

我破译之后,深感该密电报的重要性,立即送交当时组长霍实子先生。我根据以前所译出的有关珍珠港的军事情报对霍说,日美之间也许要“东风,雨”了。霍实子先生点头:“可以判明日本已经决定对美快要发动战争了。”我在旁插话说:“日期可能就是这个星期天。”霍先生点头同意,并说:“我即当面报告毛庆祥代主任。”当时霍即亲拿这份刚译出的日本密码情报,飞跑送到主任办公室交给毛庆祥主任。毛阅后也马上亲自将这份密电情报送到蒋介石手里。事后毛庆祥对霍说,蒋也立刻把密电内容通知驻渝美方。可惜的是美方低估了当时中国研究日本密码电报的技术,不相信中国已攻破日本密码电报技术,不相信中国已破译日本密码电报。

池步洲还说,他曾经携带了两大箱子的有关档案回家,可惜都毁于“文

革”之中。

与池步洲持相反意见的张令澳先生认为:“中国并没有破译过突袭珍珠港的日方密电。”张也是一位当事人,时在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负责审阅军委会技术研究室送来的情报资料。他说:

> 池步洲是我非常熟悉的朋友,对他所服务的单位——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每天送到侍从室来的破译密电,我是直接审阅拟办的第一人……
>
> 据我所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在整个抗战时期,只能译出一些日本外交方面比较简单的密码电报,一般都是日本政府向海外使领馆拍发通报性质的电文,或是外交官员例行的人事调动……至于军事方面能够破译的,也只是中国海域的水文资料以及各地的气象报告,此外便是一些海运物资、给养品、通往东南亚海域许多船只的行程及航向等情况……整个战争时期,有关日本陆军和海军的重要密电码始终未曾被我方及时破译过,这是不争的事实。
>
> 那么,日军偷袭珍珠港这样一件重大的军事计划,日本海军、陆军(注:日本空军附属于海陆军两个系统,不是独立的军种)间的绝密电码,怎么突然会被中方破译的呢?
>
> 我和朱少先,当时一个在情报组,一个在机要组,这些情报要送呈蒋介石,都必先由机要组送达情报组,这是侍从室的工作程序,而我们又是主办这种情报的两个人,怎么会不知道有如此重要的情报,岂非咄咄怪事?
>
> ……
>
> 抗战时期军委会有严格规定:任何作战情报、档案资料,应按分类归档保管,不得私行销毁或藏匿,否则依军法从事。池步洲服务于军委技研室,主任是毛庆祥,他一直是蒋介石身边的机要大员,决不会听任所属随意私存机密性质的情报资料。池步洲既然是“有心人”,难道连这点纪律都不知道吗?退一步说,若真有历史资料可以证明他破译这一重大日本密电码,他应在解放后肃反运动时,主动提供给人民政府审查保存,这是对抗战的重大贡献,可以减免他的“罪责”,不是吗?据笔者所知,当时技术研究室破译的情报资料一律须送交侍从室处理,技研室绝不能自行对外。笔者当时在第六组,就是负责研判技研室的这类破译密电,每日多则数十通,少则五六通。像珍珠港事件如此重大的情报,怎么会不立即呈报蒋介石?蒋又怎会不予批示并加以嘉奖呢?
>
> ……

12月上旬，技术研究室又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一份紧急通知，内容是电告日本驻华盛顿、旧金山、夏威夷、纽约等地的使领馆，限期销毁各类文件，准备撤侨。我们签注的意见是："速送外交部密告美国大使高斯（在重庆），并电告我驻华盛顿武官郭德权转达美国军方。"蒋介石阅后批"可"。旋得美方回答说，美日谈判已陷入僵局，国务院已知道日本撤侨计划，美国也准备同时撤侨。似乎美国尚未意识到日本对其突袭的意图。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到，当时重庆政府仅告知美方：日本将扩大侵略的意图，而并没有告知日本将空袭珍珠港的确切日期。蒋介石（侍从室）除了收到过毛庆祥的技术研究室这份密电资料之外，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约三个星期，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芃生也送呈了一份从日军大本营秘密弄到的《日军准备发动东进和南进攻势的战斗序列》情报资料。该情报判断出日军即将对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和东南亚地区发动进攻。侍从室第六组看到这份情报后，立即用红色封套原件加签注，迅速密呈蒋介石阅。蒋又立即批示"密告美国政府"。可惜美国海军当局并未对这份谍报引起充分重视并及时做出对策，以至后来珍珠港海军基地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从以上两方面所得到的情报资料可以相互印证，日本确实将扩大侵略战争，不惜和美国一战以实现它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但并没有确切的情报告知，究竟在何时、何地，以什么方式发动突袭珍珠港。技术研究室并没有送呈过这样具体的破译密电，更遑论是谁译出来的。当时直接掌握办理这方面情报的，除了我是基本的研判主办人员外，还有第六组组长唐纵和副组长邵毓麟是主要的校阅主官。现在唐纵遗留在大陆的日记已经公开出版，厚厚一大册，题名《在蒋介石身边八年》。这册日记对抗日战争中每一重大事件都有记载，但对密码破译大事却只字未提。此外，邵毓麟著有《胜利前后》一书（台北《传记文学》丛书），只提到王芃生的《南进序列》情报，未言及其他。

根据以上当事人的意见，我们大致可以猜到破译密码的谜底：第一，中国当时的确破译了一些日方有价值的情报，从这些情报内容大致可以判断日本可能对美国珍珠港将采取军事行动，但这些情报未能引起美方的重视。第二，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绝密情报，中国根本无法破译，而且中国当时的技术手段也不可能破译。

“妖艳的白蛇”　郑萍如间谍案之谜

一个美丽妖艳的女人，她的真实身份是军统特务，抗战期间，奉命去暗杀汪伪特工主任丁默邨，由于事机不秘而被俘。在狱中，由于她的美丽和魅力，竟被她的敌人称为“妖艳的白蛇”。郑萍如后来被汪精卫下令枪毙。抗战胜利后，在军统的烈士名册上竟查不到她的名字，这其中究竟有怎样的隐情呢？

1945年深秋，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成为关押周佛海、丁默邨等大汉奸的临时住所。一天，军统少将处长沈醉来此看望周佛海，两人随便聊起过去双方刀光剑影的特工生活。周佛海问：“丁默邨与戴笠先生在抗战时早就有联系，你们为什么还派人暗杀他？并且能找到那样一个漂亮的小妞来搞暗杀工作？你们是怎样训练这种杀手的？”

沈醉诧异地问：“有这样的事？我怎么不知道？至于军统为什么要杀丁默邨，什么原因我不清楚，更不知道训练了什么漂亮小妞去从事暗杀工作。”

“怎么？沈处长不知道有军统女谍暗杀丁默邨之事？那个女人是我下令枪决的，怪可惜的，她可真有办法，要不是李士群盯得紧，她差一点把执行官林之江都策反了，两人都商量好了一起私奔。”

沈醉一听，来了兴趣：“到底是怎样一回事，能详细告诉我吗？我回去也好查一查，给这个无名英雄记功。”

那位被“七十六号”枪毙的郑萍如小姐，1918年出生，死的时候也不过二十多岁。她的父亲名叫郑钺，清末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又入东京法政大学法科，他的同学中有国民党著名领袖宋教仁。郑钺在上学期间也加入了同盟会，跟随孙中山、于右仁等奔走革命。辛亥革命和民国二年的二次革命都参与其间。后来随孙中山流亡日本，娶了个日本太太，中文名字叫郑华君。他们夫妻感情很好，共有两男一女，女孩就是郑萍如。



美女杀手郑萍如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郑钺在司法界服务。当时，国民政府在上海公共租界设有江苏

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和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在法租界设有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和第二特区地方法院。1935年，郑钺被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任命为上海高等法院二分院首席检察官。

丁默邨曾在上海民光中学做过校长，郑萍如是他的学生。她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法政学院学习法律。毕业那年，正赶上七七卢沟桥事变。8月13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开战，中华民族在最危急的关头，无数热血青年投身到抗日救国的爱国运动之中。郑萍如的哥哥郑海澄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党空军，在一次激烈的空战中，郑海澄的飞机不幸被敌机打中，为国捐躯。噩耗传来，全家悲痛万分，郑萍如发誓要替其兄报仇，这时军统特务找上门，劝其参加抗日斗争，郑遂答应为军统工作。

日军占领上海后，汪伪政府多次与租界当局进行交涉，要求把租界内的中国法院接收过来，改归伪政权管辖，但遭到租界当局的拒绝，理由是英、法、美等国只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能把租界里的法院交给未获承认的政府。日方及伪政府恼羞成怒，将争夺租界中国法院管辖权的任务交给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的“七十六号”特务机关来完成。李士群用子弹多次恐吓郑钺，但郑钺始终按法律惩办在租界里犯罪的日本人。

经军统特务嵇希宗介绍，郑萍如成为该组织的情报员。因为她的日语很好，便常常出入日本人聚集的海军俱乐部，以获取日伪情报。一次，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她认识了熊剑东的老婆。熊剑东是浙江新昌人，早年留学于日本士官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剑东在常熟一带组织忠义救国军，在一次作战中，被日军捕获，关押在上海监狱。熊妻正四处托人营救，军统遂指使郑萍如设法将“自己人”营救出来。郑主动帮熊妻找关系，她打听到丁默邨已投降日本人，在极斯菲尔路七十六号担任汪伪特工总部主任，于是主动找上门去，请丁默邨设法找人救出熊剑东。当时，汪伪集团正在筹备阶段，懂军事的干部奇缺，丁默邨去见周佛海，说熊剑东懂军事，本人愿意参加和平运动。于是周佛海亲自出面，将熊剑东保释出来。熊后来担任伪税警总团副团长，成为周佛海、丁默邨的重要干将。

当时，正是戴笠的军统上海站与汪伪“七十六号”在上海滩进行特工战白热化的时候，由于丁默邨担任过军统少将，对戴笠的组织和活动规律非常熟悉，于是，在他的指挥下，军统地下组织屡屡被破获，特工多次被杀害，给军统在上海的活动造成很大的威胁。戴笠严令军统尽快除掉丁默邨，以打击“七十六号”的嚣张气焰。嵇希宗便对郑萍如下达了秘密指令：除掉丁默邨。

郑萍如利用美色接近和迷惑住了丁默邨，使其坠入情网，军统的锄奸网悄悄撒开。

1939年12月21日，丁默邨和郑萍如去一个朋友家赴宴，郑通知军统特务布置好暗杀行动。在丁的汽车回来路过静安寺附近的西伯利亚皮货店时，郑萍如提出要下车买大衣，丁默邨只好陪她下车，暗中叮嘱司机不要熄火。当他二人进店挑选，丁突然发现有两个短打衣着、形迹可疑的人，正隔着落地玻璃窗向他打量。丁默邨不动声色地走到郑萍如旁边，掏出一沓钞票往柜台上一扔，说："你慢慢挑吧。"还没等郑萍如反应过来，丁就猛地推开门，拔脚向马路对面狂逃。

门外守候的军统特务嵇希宗和刘彬，没想到丁默邨突然窜了出来，稍一愣神，才拔枪瞄准。就在丁默邨钻进车里时，两声枪响，却没有打中，小汽车一溜烟开走了。

郑萍如的身份暴露后，曾在虹口隐居下来。虹口是日本军的驻地，她在一个日本宪兵分队里躲着。那里是"七十六号"力所不及的死角。郑萍如后来又巧妙地钻进了日本军内部，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二课参谋和上海第十三军司令部的年轻大尉参谋，都为她的美艳着了魔。她"出卖"的重庆情报和蓝衣社情报以及正活跃于上海内外的游击队动向等，正是当地日军求之不得的。两位单纯的参谋不问情由地轻信了她，做梦也没想到她以这些来历不明的情报为诱饵，换取了日本军宝贵的最高机密情报。不久，郑萍如被丁默邨设计诱捕。当"七十六号"副主任李士群审讯她时，郑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军统特务，但并不否认自己要杀丁默邨，原因是"丁默邨有花心，要去爱别人，我就要杀了他！我要让丁默邨晓得，天底下的女人不都是好欺负的！"她有意将一桩间谍案说成是桃色新闻，把丁默邨气得暴跳如雷。

1940年2月，汪精卫给李士群下达了处死郑萍如的手令。负责看守郑萍如的伪大队长林之江为郑的美貌所倾倒，要与她一起"私奔"。然而，为防止郑萍如逃跑，丁默邨早做了防范，他知道郑萍如的魅力实在太强烈了，谁也经不起她的诱惑，就连"七十六号"的后台老板、日本特务头子晴气庆胤也表示出恻隐之心。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妖艳的重庆白蛇、蓝衣社女间谍——郑萍如最终也未能逃离被送上祭坛的悲惨命运…… 我不知为什么，很想救她，哪怕是免她一死也好。我也知道她罪孽深重，可总想救她一下。我之所以产生这种心情，也许因为她是日华的混血儿……"



丁默邨与李士群(右)

于是丁默邨特意加派了人手,并派伪司法部长夏仲明亲自去监刑。

郑萍如的末日无比凄惨。直到执行枪毙的前夕,她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上刑场,她还给其弟写信说,她在"七十六号"很好,请父母、兄弟等不必挂念。她在银行的领款图章请其弟妥为保存,并将其衣服托人带来。

当执行枪决的那天早上,林之江骗郑萍如说要带她去虹口买衣物。刑场终于到了,原来是徐家汇火车站边的荒野地里。郑萍如明白了,死死地抓住车门不放,在监刑人员一再催促下,林之江才转过脸去,挥了挥手,让人把郑萍如拖了出去。

郑萍如自知不免一死,遂要求最后打扮一下。她掏出化妆盒,在哭得一道道泪痕的脸上细细地扑上粉,重新画了眉。顷刻之间,她那张漂亮的脸蛋变得十分可怕,她痛骂汪精卫,痛骂丁默邨,痛骂日本人!

林之江的手下不忍心开枪,最后由林之江亲自瞄准射击,郑萍如倒在血泊里,玉殒香消。

直到1946年,国民政府在审判汪伪汉奸时,郑萍如的母亲郑华君、弟弟郑南阳(郑钺在郑萍如被枪毙不久,因悲伤过度病死)向首都高等法院控告大汉奸丁默邨残害郑萍如之罪恶,此时竟没有一个军统人员出来证明郑萍如是为军统组织工作的。幸亏有沈醉出面过问,军统人事处才把郑萍如的名字补到军统烈士名单中去。

将星陨落　叶挺飞机失事之谜

1946年4月8日，刚刚获得自由的北伐名将叶挺将军，乘坐美国空军的C-47型运输机赴延安，同行者除叶挺的妻儿子女，还有中共领导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人。不幸的是，飞机在晋西北兴县东南八十公里的黑茶山失事，机毁而亡，给我党我军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中共方面对此次空难一直抱有怀疑，但苦无确实证据，又正值国共和谈时期，因此只能对外宣称是一起意外事故，然而内心却一直耿耿于怀。当新华社在发布飞机失事的消息时，用了“想系”一词，表明中共的怀疑和保留追究破坏者责任的权利。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一事件仍然在重重暗幕之下，叶挺的长子叶大正终于忍不住要一吐为快，他在出席广东惠阳市纪念叶挺诞辰106周年的活动中，披露了压在心里几十年的秘密。

叶大正回忆说：父亲牺牲几年后，周恩来总理告诉他，当年的空难肯定有人做了手脚：“关于你爸爸他们座机为什么会失事，过去只是说浓雾中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诉你，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机组四个人都是美国人，只有国民党的特务才能干出这种事，否则无法解释飞机一直是正常飞行的，当时延安也只是下点小雨，延安附近也没有大山，C-47飞机可以飞越驼峰，性能是好的，飞行员又是美国飞虎队队员，技术也是好的，为什么快到延安的时候突然电讯中断，迷失方向？出事后，从飞机残骸中发现一份迷航报告，证实迷航是确实的。为什么会迷航？就是因为有人在仪表上做了手脚，使仪表突然失灵。”



叶挺将军

叶大正为了证明这一观点，又拿出了一篇文稿，那是1998年4月18日在香港《大公报》上刊登的顾逸之写的一篇《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顾逸之早年在周恩来、李克农领导下工作，“四八空难”时在晋绥公安总局工作，他

奉命到现场进行实地调查和处理后事，并向中央详细报告了现场情况，提出以下疑问：

其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不是在空中坠毁的，因为飞机撞上黑茶山侧峰巨石上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在撞山后才爆炸起火的。

其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结果来看，那天飞机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驾驶人员可能是在这种浓云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点，就不会撞上巨石了。

其三，从我们对飞机出事现场的反复搜查结果来看，一直没有发现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

其四，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到延安的。西安到延安一直是向北飞行的，为什么竟然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来了呢？其中原因我们至今仍不清楚，也无法分析。后来听谭局长讲，在飞机残骸中发现有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老练飞行员。这些问题一直在我心中存疑，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因此叶大正肯定地说：看了以上文稿，更可以证明周恩来的分析是对的，是国民党特务在仪表上做了手脚，导致电讯中断，迷失航向。

叶大正的怀疑最近得到了证实。2003年，《档案时空》发表了《叶挺将军座机失事真相揭秘》一文，文中称，一位叫杜吉堂的台湾老兵在临终前良心发现，忏愧说，当年他作为中美合作所特工队长，在重庆参与了由军统方面组织策划的谋害叶挺将军的阴谋。其具体过程如下：

叶挺将军是在1946年4月6日夜决定飞赴延安的，通过中共方面的联系，决定由国民党空军派出一架美国C－47运输机执行任务，飞行员史密斯是一位有三千小时以上飞行经验的老资格驾驶员，他接到任务后，将忙于空投业务的飞机停在重庆军用机场进行检修。

在飞机起飞前，即4月7日凌晨，军统方面由安插在空军系统时任调度科科长的王平虎那里得到了这一消息，随即有人打电话给中美合作所特工队长杜吉堂，电话中吩咐：中共的叶挺将军准备乘美国运输机回延安，请立即执行刺杀任务。杜吉堂接受任务后即招来特工队其他负责人，密谋破坏中共这次飞行。有人献计在上飞机途中安排狙击手，有人说在飞机上安装炸弹。其中有人提议，破坏飞机上的仪表可使飞机迷航，让其自然坠落，遂被采纳。天亮后，杜吉堂带人找到王平虎，查到C－47飞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同时请



周恩来和叶挺(右)、项英

王平虎为特工混入机场做好安排。次日晨8时,懂得机修作业的特工杨耀武跟着检修员一起进入飞机检修场地,偷偷来到飞机驾驶舱前,将一块磁铁安放在飞机仪表的反面,然后若无其事地离开,装作擦拭飞机零件的样子,眼看着检修员检修完飞机,并填好安检单。

飞机于8时45分起飞,按预定时间在西安机场休息加油,然后继续向延安飞去。离开西安时,天上已经下起了冰雹,史密斯同延安方面电台曾有联系,告知飞行途中情况后就关了电波段。正在这时,飞机为避开冰雹区稍一转向,机身一偏,飞机仪表停止了摆动。失去导航系统后,史密斯只能靠经验飞行,在穿越黑茶山时,因撞山而机毁人亡。

杜吉堂的供词证实了中共的怀疑和叶大正的判断。

恶有恶报　戴笠座机失事之谜

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之死一直让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是因飞机失事致死,也有人认为是军统局特务之间的内部矛盾,甚至还有人认为戴笠之死与蒋介石有关系。至今也还是人言人殊,莫衷一是。

1946年3月16日,军统特工王戴笠由北平乘坐北平航委会拨给的二二二号客机飞抵天津,准备次日飞上海,但夜间接到上海方面气候不好的预报,可是挡不住戴笠归心似箭,他这时对影星胡蝶正十分迷恋,因为18日胡蝶与

丈夫潘有声签订离婚文件，他想亲自在场参加，因此决定按预定时间起飞。为了防止万一，他还命令要多带汽油，上海不能着陆，便直飞南京。

17日上午9时，飞机起飞，抵达上海时，大雨滂沱，飞机不能降落，只能转飞南京。南京气候也恶劣，经交涉，机场勉强同意降落。为确保安全，还派出四架军用飞机导航。但因云层太低，气象条件太差，始终与戴笠座机联系不上。12时30分以后，全部联系中断。经过全力寻找，三天后，军统特工才赶到出事现场——南京江宁板桥镇岱山。经调查和分析，二二二号飞机先是撞在一棵大树上，遗落下一支螺旋桨，又连续擦过三个山坡，撞在山腰，引起大火和爆炸，机上十三人无一幸存。

戴笠之死给世人留下了一个谜，究竟是意外事故还是人为谋杀？因为那天气候确实恶劣，说是飞行事故也说得通。



军统局局长戴笠

但是有人认为，此次事故乃是人为原因，戴笠是被人谋杀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特工王——戴笠》及其他一些研究者就持这样的说法，戴笠是被军统局高级特工马汉三密谋害死的。

马汉三，时任北平市民政局长，北平肃奸委员会主任，负责抓捕汉奸工作。他上任伊始，则雷厉风行，让北平城内大小汉奸人人自危，马也借机敛财敛物，敲诈勒索。对于他的种种行为，戴笠时有所闻，因此这次出差北平时，就顺便调查了此事。在查阅了马汉三呈阅的拟抓捕汉奸名单上，发现竟没有金璧辉的名字，不禁沉下脸来。因为金璧辉就是川岛芳子，满族人氏，是有名的日本间谍，举国公认的大汉奸，马汉三竟然将她放过一边，必有蹊跷。

原来，华北沦陷期间，在北方进行特工工作的马汉三曾经被捕，为了乞得活命，用一把据说是乾隆用过的宝剑买通了日本司令福田隆吉，后来，福田隆吉又将此剑赠给了金璧辉。没想到风水轮流转，这柄剑又成了金璧辉换取生命的筹码。

戴笠对这把乾隆宝剑也不陌生，因为这是当年军阀孙殿英挖东陵时盗来的宝剑，乃无价之宝。东陵案事发后，为了逃避惩罚，孙殿英把这把宝剑交给

了马汉三，请转交戴笠，在蒋介石面前美言几句，没想到马汉三见宝眼红，竟私吞下了这把宝剑。

戴笠立即行动起来，将已经准备遣送回国的金璧辉抓了起来，亲自审问，将马汉三受贿一事弄得清清楚楚。马汉三也是一位老牌特工，急忙主动将受贿物品及那把乾隆宝剑献给了戴笠。

因为行程匆匆，也因为马汉三在北方势力雄厚，戴笠没有急着向马汉三动手就离开了北平。马汉三知道戴笠放不过他，遂暗动了杀机。他利用戴笠好色的弱点，让一位美貌的女特工陪伴戴笠。一直到3月17日飞机临飞时才告别于机场。而就在戴笠登机前，女特工暗中将一颗小型定时炸弹放在了飞机上。


让戴笠魂牵梦萦的影星胡蝶

炸弹定于中午12点30分爆炸，为了赶去见胡蝶，戴笠竟然提前一个小时登机，这让马汉三等人暗中担心，如果戴笠下了飞机炸弹才爆炸，那计划就将暴露。真是恶有恶报，因为天降大雨，戴笠座机在天空中盘旋太久，至12点30分，轰然一声，机毁人亡。

1948年9月，马汉三在北平被枪毙，然死因并非是谋杀戴笠，据说这是为军统遮掩家丑。

除了以上的说法，还有一种传闻让人匪夷所思：戴笠是被蒋介石害死的。

抗战胜利后，军统势力大发展，戴笠已呈尾大不掉之势，蒋介石已经开始有意识进行限制。比如说，戴笠一心想控制首都警察局，由军统特务任局长，他把那颗大印都放在办公室里了，但蒋介石就是不答应。蒋介石还对戴笠抓特务武装表示了不满，曾向侍从室主任林蔚指示过，不要让戴笠带兵，只是专门负责特务工作。原由军统控制的缉私处二十个团的兵力，要交由宣铁吾管理，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也要进行整理，并打算对军统局进行缩编。这次戴笠急匆匆往上海赶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军统局内当家的毛人凤的一封密电，因为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首都警察厅长黄珍吾、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正抱成一团，密谋策划将军统局彻底搞垮。这种情况的出现，表明戴笠已经在蒋介石面前失宠了。

此外，戴笠身为军统局当家人，参与了各种密谋，可以说，蒋介石的各种

隐私和手段，没有他不知道的，而且有的是很上不了台面的，蒋介石也可能因为维护自己的形象而灭口。



戴笠与母亲

所以，戴笠自己也预感到结局的可悲，曾对人说："我将来如果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的。"只是他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早。

另外，如果说戴笠是死于谋杀，以戴笠在军统局的"威望"，怕是很少有人敢生此念，即使马汉三也是如此，那把乾隆宝剑的故事也过于传奇了，没有确实材料可以证实。然而，如果有了最高当局的指示，性质就有了变化，敢向戴笠出手者就会大有人在。因此说蒋介石下令杀害戴也不是没有可能。

以上说法均是猜测之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者可以根据种种材料作出自己的分析。

惟我独尊　保密局谋刺李宗仁之谜

保密局部署了一次谋杀副总统李宗仁的绝密行动，从地面到天上，从住宅到机场，从曲巷到公路，布置了层层罗网，只求一击而中。然而，就是这场连苍蝇也逃不脱的暗杀行动却意外流产了，以蒋介石的下野和李宗仁的上台而告终。这其中的秘密在二十年后终于被揭开。

1948年11月间，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被局长毛人凤一封加急电报召至南京，刚到明故宫机场的沈醉就被等候在那里的毛人凤接上汽车，赶往黄埔路中央军校内的蒋介石官邸。

蒋介石在办公室接见了他们，说："目前局势不稳定，但是共产党并不可怕，而我们内部有些人却在危害国家利益，离心离德，甚至从中破坏、捣乱，阴谋推翻政府。"蒋介石双眼露出凶光，对沈醉说："这次决定叫你主持这项工作，是因为这关系到整个大局的问题，千万不要辜负我对你的希望。此次行

动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你绝对不能泄漏出去，一定要从速布置，做好准备。等我的最后命令！”

回到招待所后，沈醉忍不住问毛人凤：“总统委以我们重要任务，但制裁何人，他却没有说，我也不敢问。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毛人凤小心翼翼地关上门，又四处看了看，狠狠地吐出三个字：“李宗仁。”

“是副总统？”沈醉怀疑耳朵出了毛病，脱口而出，惊愕得半天合不上嘴。

“这次行动只有你、我加上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和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知道，只有我们四个人研究行动方案，连副局长徐志道都不能参加。”

一天，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请李宗仁夫妇吃晚饭。蒋介石像是无意问起：“德邻，你现在的专机怎么样？设备好不好？”李宗仁老实回答：“是一架二战时美军淘汰的过时飞机。”宋美龄当即说：“达令，我的‘美龄号’可不可以送给德邻夫妇？”“达令，你不提起，我还忘记了。我们有‘中美号’够用了。”“那么贵重的东西，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李宗仁慌忙辞谢。“德邻，我们是真心的，千万别客气。”宋美龄又对郭德洁说：“‘美龄号’里的设备是一流的，又舒适，又方便，你可以好好享受享受。”一听说蒋氏夫妇要送飞机，郭德洁当然心花怒放，对李宗仁撒娇说：“德邻，明天你带我乘‘美龄号’到上海还有杭州去玩玩。说过好多次了，你总是不去。”“好，好！”李宗仁漫不经心地答应着，夫妇俩在要不要飞机的问题上看法不一致，别扭了几天，上海、杭州之游被搁置下来。



李宗仁

此时，在沈醉的办公桌上，放着李宗仁傅厚岗官邸周围的地形图和房屋结构图，沈醉、毛人凤与叶翔之在研究行动方案。沈醉已设想了两套办法，一部分人负责暗杀，一部分人监视李宗仁，防止他离开南京。

毛人凤指着李宗仁住宅附近的地形图说：“暗杀最好在户外进行。傅厚岗的巷子较窄，他的汽车进出转弯时速度很慢，你们可埋伏在两面，同时可以射击。如果李不出门，你们再到他的住宅去狙击。我找两个在南京电灯公司

的同志协助进行，先停他家的电，然后借口检修变压器，站在变压器上，用手提机枪从围墙外面向李的寝室、餐厅等处射击，乘警卫人员慌乱之际，你们再潜进室内进行暗杀。”

叶翔之从口袋里拿出两颗锃亮的黄铜子弹，递给沈醉：“这是美国最新研制的，乍一看与普通的子弹没两样，但是子弹头内装有最猛烈的毒药，射中人体任何地方，都可以引起血液中毒，无法救治而死亡。”

“我们在他家周围是否设个旧书摊？书摊的好处是可以狙击。除侦察外，还可以在那里多留几个人，借看书的机会能够多呆一些时候，不易被人发现。”沈醉提议。

“好！想得周全。”毛人凤称赞，他指着地图，又说：“马路拐角处设书摊最好，汽车到这里速度最慢，我们可以看清里面有几个人，以便一举成功。”

沈醉接着又展示他的第二套方案：“为了防止走漏风声，李突然离开南京，我们要在机场、火车站、京杭国道各处设立一些联络点。”

“你大可放心。飞机的问题总统有办法，我们可以在光华门外通往机场的那条街上开设一家小杂货铺为掩护，再安上一部电话。一旦发现李宗仁的卡迪拉克前往机场，立即用规定的暗语报告。我通知两架战斗机随时做好升空准备。”毛人凤阴险地笑着，两手一张作了个爆炸的手势，“飞机失事，这是上策。”



1965 年，李宗仁夫妇回国定居，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

叶翔之分析道:“李宗仁的军队现大部分集中在安徽一带,我们要注意这个动向,如果他从中华门站坐火车,一定去芜湖等地调军队来实行武装‘逼宫’。只要他出南京,我们可以在任何小站进行狙击,不必先请示总统。”

“李宗仁外出的任务由我亲自负责,我估计有时他爱好打猎,可能出中山门沿京杭国道去汤山或到太湖、杭州等地游玩。如果他乘车外出,我特地拨给特别行动组两辆高速汽车,接报后立即追去,在半路上狙击更好。”毛人凤得意洋洋地说,“总统对我说过,在南京城里动手,一定要先等他做最后的决定;如果李不辞而别,便是自寻地狱之门,谁也帮不了他。”

就这样,围绕暗杀李宗仁的目的,保密局准备好了天罗地网,只待蒋介石一声令下,子弹、冲锋枪、汤姆森机枪、火焰喷射器、炸弹、战斗机便可直射目标。

蒋介石与李宗仁貌合神离,这是路人皆知的事情,但为什么要下毒手杀害李宗仁呢?1947 年,国共战区局势逆转,国民党兵力从战争之初的五百万人锐减至三百七十万人,共产党却从战争之初的一百二十万人发展到二百万人。杜鲁门总统及国务卿马歇尔派魏德迈将军来华,调查国民党在国共战争中失败的原因,魏德迈与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谈话时,白毫不掩饰地指出:“一年来的作战经过证明了蒋介石在军事上指挥无能……战局发展至今天这种地步,应由蒋介石独负其责。”魏德迈还与当时北平行辕主任、桂系首领李宗仁就挽救局势交换了意见。

8 月 24 日,魏德迈在蒋介石官邸举行的茶会上发表声明说:“中国虽因连年战争、革命受到削弱和破坏,但仍拥有为其自身之复兴所需要的大部分物质资源。这种复兴,有待于令人振奋的领导。”次日,蒋介石在召见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时小心翼翼地问:“魏德迈将军在《声明》中有中国需要‘令人振奋的领导’一句话,是不是美国真想逼我下野?”

其实美国的确对蒋介石统治的无能感到失望,为了保证大批的美元不打水漂,已经进行换马了。是年 9 月,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去华北巡行,物色接替蒋介石的人选。他在提交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认为:“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日趋式微,在华北知识分子中,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则资望日高。关于他对国民党政府没有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

1948 年 3 月,在竞选副总统的问题上,蒋介石嘴上允许李宗仁参加竞选,但在暗中阻挠,支持孙科竞选副总统。李宗仁联络了程潜等,挫败蒋介石的阴谋,成功地当选为副总统。11 月,白崇禧通电,要求蒋介石下台,与共产党



蒋介石、李宗仁参加总统、副总统就职

进行和谈，向蒋介石实行“逼宫”。毫无疑问，蒋介石认定这一切都是李宗仁指使所为，恨得咬牙切齿，于是制定了暗杀李宗仁的计划。是年底，局势恶化，蒋介石派宋美龄赴美寻求美援，遭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拒绝。他得知美国方面有“换马”的意思，于是放弃了暗杀李宗仁的秘密计划，决定推李宗仁为代总统以渡过危机。这样，李宗仁在不知不觉中躲过了一场杀身大祸。

出卖情报　黄浚间谍案之谜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情报部门所破获的黄浚父子叛国案被人号称为民国史上最大一桩日本间谍案，曾引起社会的轰动。然而破获的过程，在当时却是秘而不宣，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国共抗战大肃奸》一书披露了详细的内幕。

黄浚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机要秘书，其地位仅次于秘书长，深得汪精卫的信任和欣赏。此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长期在北洋政府任职，与北洋各要人及前清遗老遗少多有来往，因此十分熟悉前清的掌故和历史，撰写了一部约数十万字的近代笔记著作《花随人圣庵摭忆》，内容丰富，精彩纷呈，在当时非常得好评。他的诗、词、书法文章俱佳，可谓才名满天下，比如梅兰芳先生的拿手戏《天女散花》，就是由黄浚创作的。

像这样一位大才子，很难想像他竟是一位日本间谍。

他的身份暴露缘于江阴要塞泄密案。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从战略角度出发，在华东开辟新的战场，在筹划淞沪之战时，曾有方案，以海军突然封锁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要塞江面，既防止日军舰队从上海进攻南京，另一方面拦截并猎获当时处于长江中上游的日舰日船，一举取得战略上的先手。

这是当时的最大军事机密，除与会的几位高级将领以及担任记录的机要秘书黄浚外，无人知晓。此次会议的时间是在1937年8月5日，然而从6日起，在长江中上游沿线各港口及江面正在行驶或停泊的日军船只全部升火飞速驶向长江下游，冲过江阴要塞。而在重庆、武汉、南京一带的日本侨民也都突然停止一切工作与活动，随日船撤离。许多人甚至丢下了贵重的物品而不顾，有的连摆上桌的饭菜也没来得及动筷子就匆匆上船而走，这一切都表明他们是突然得到消息的。

因为日方事先得到消息，中方的这次行动没有收到奇效，仅捕获了两艘日本商轮。因此日本海军全身而退，在后来的淞沪之战中，给中国军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蒋介石与戴笠

很明显，中方高层人士中出现了“内鬼”。

战事发生后，因为战场形势危急，身为中方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几次要到前方督战，但因日本飞机对南京到上海的铁路进行了严密的封锁，狂轰滥炸，很不安全。新任副参谋长白崇禧因此建议道，因为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将去上海接见英侨，可以搭乘他的汽车，以避免日军飞机的轰炸。蒋介石对这一意见表示了同意。到了第二天，蒋介石却临时改变了主意，一者另有要事脱不开身，二者他也不愿为了躲避日机而乘坐挂有英国国旗的车。结果，许阁森在半道上即遭到日机扫射，且身受重伤，生命危险。英国当时是中立国，许阁森的座车上又有明显的英国标志，为什么日机不惜冒犯国际公法和开罪英国而开枪开炮，显然他们知道蒋介石将乘坐此车，他们是冲着蒋介石来的。

那么，他们是怎么得知这一消息的呢？

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受命调查此事。他首先将江阴泄密案与这一事件串并起来，发现能知道这两次事件秘密者并不多，在一一进行排除外，将目光锁向了黄浚。于是进行了秘密的监视，从中又发现黄浚及他那位在外交部供职的儿子黄晟与汤山温泉俱乐部的一位女招待有频繁接触，军统特工随即对那位女招待展开调查，吃惊地发现这位女招待竟是一位日本特工，叫南造云子，因此决定收网。

黄浚父子被捕后，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不久即被国民政府明令枪决。而南造云子却出人意料地从国民党监狱脱逸，这又是一个不解之谜。此人后来在上海蒋汪日特工战时被枪击而死。

黄浚间谍案被破获的经过除以上说法外，戴怡康在其所撰《英国大使被狙击的幕后》一文中另有补充，在江阴泄密案和狙击英国大使案发生后不久，又发生了一起中央军校逃车案，日本间谍再次将暗杀的目标指向蒋介石。

这件事让蒋介石尤其恼火，他是以黄埔起家的，所以在南京时，大都住在中央军校内，因为他以为住在他的学生中间是最安全的。现在，最安全的地方也不安全了，这使他感到日本间谍的可怕。

此事发生在9月初的一天，中央军校内举行“扩大总理纪念周”，中央党政军各部大员及蒋介石本人都届时出席，因此警卫也特别严密。就在大家静候蒋介石莅会时，会场上发生了一阵骚动，不一会有人报告，有两名嫌疑人企图混人会场，被识破后乘坐一辆轿车逃跑了。

事后，军警进行了调查，判断那两名嫌疑人很可能是日本特务，目的就是企图刺杀蒋介石和其他军政大员。然而这两个特务如何能混入中央军校，又如何知道蒋介石要参加会议呢。

军警清查了那天校门登记的进出中央军校各单位参加会议的官员车号，最后发现那两名嫌疑人乘坐逃走的轿车竟是黄浚的轿车，从此揭开了黄浚的面纱。

巧设陷阱　　汪精卫叛逃之谜

汪精卫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头号汉奸，他的行为已经是盖棺定论。但是促使他成为卖国罪人的原因，却一直有各种说法。

按主流的观点，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其根源在内因，即他从内心对抗战缺乏信心，反共、媚日并充满了权力欲望，导致他最后的落水。这种观点一直延续至今，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其实，汪精卫叛逃伊始就有许多猜测，冯玉祥就怀疑蒋介石对此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内有隐情，他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说：

> 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许多人乘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甚么任务，戴笠岂有不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

持冯玉祥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就连周佛海也在《回忆与前瞻》一文中说："有人以为这是汪先生和蒋先生演的双簧。"这其中还包括一些日本人，他们以为这是中国人和战两手交替使用，像是在赌台上赌大小，重庆押大，而南京押小，殊途同归，开出来总有一面是会被押中的。

而金雄白的推测更耸人听闻，是他最早提出了"圈套"说："因为'和平运动'之发动，以及以后汪政权之出现，无可否认，高宗武与陶希圣是直接的促成者。因为'和平运动'之发动，是由于近卫三原则之声明，而三原则竟出于高宗武向日方提出的试探，获得日本军部同意之后，汪氏在渝最初还加拒绝，更由于陶希圣之力劝，才使汪氏改变意向。起先汪是一个被动者……像这样一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原来汪氏左右的两大将顾孟余与陈公博却都力持反对，一向为汪系干部的陈树人、彭学沛、谷正纲等也概不参加，这是为了什么？以后由怂恿而组织，所有汪政权之重要台柱，竟无一而非蒋系人物，且最早之促成者高宗武与陶希圣，一等锣鼓喧天，汪氏骑虎难下之际，立即远走高飞，叛离而去，造台人一变而为拆台人，这又是为了什么？……褚民谊所说有人要将一只臭马桶套在汪氏头上，岂褚真有感而发耶……往事虽已成尘，而双簧之传说而外，此实在为又一尚未揭开之谜底。"

金雄白的推测虽然大胆却缺乏系统性，因为要证实汪叛逃一事另有隐情，必须要对整个事件的各个环节作出合理解释，而不是攻其一点。而近年来出版的《陷阱——汪精卫叛国案探密》一书，则对整个事件进行了重新考证，认为汪精卫出逃很有可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

首先，从汪精卫逃离重庆考察，汪精卫是18日离渝，19日离昆，在昆明期

间，至迟在19日下午两时半左右，龙云已连向重庆发去三封电报。而据国民党官方的记载，蒋介石是于21日在陕西武功接到龙云的电报。他因为主持军事会议而在前一天由重庆出发来武功的（按计划应是18日动身，因陕西方面天气原因，飞机延迟起飞）。

很难想像，如此重要的消息，竟无故耽搁了几十个小时。如果能及时采取措施，汪精卫是不可能走出国门的。

另外，促成汪精卫叛国投敌的高宗武其真实身份也存在可疑之处，这一点已在《双重面具　高宗武真实身份之谜》一文中有所分析，如果高宗武确实是蒋系中人，那么极有可能在代表蒋介石与日本求和失败之后（因为近卫三原则已经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推出了汪精卫，再由蒋介石因势利导，将汪精卫推上汉奸之途。



投敌前的汪精卫、陈璧君夫妇

蒋介石为什么处心积虑费尽周折要陷汪精卫于不义，“陷阱”一书也作了如下的分析。其一，蒋、汪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汪精卫与蒋介石的矛盾，与其他派系间的矛盾不同，双方俱是以争江山社稷、争“天下第一人”为目的，而桂系、阎系、粤系等地方军阀则更着重于割据称王，拥兵自重，蒋介石与他们的斗争也主要集中在集权与分权方面。而汪精卫则是与他争夺江山的人，只要汪精卫存在，这场斗争就将延续下去。

其二，非常之事必以非常之手段解决。在蒋、汪十几年斗争的过程中，蒋介石也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汪精卫不是一个轻易打倒、轻易服输的对手。由于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汪精卫从未罢手过反蒋行动。尽管屡次失利，却屡仆屡起。另外，汪精卫的资历、影响毕竟太深太大，潜在力量非常可观，在国

民党内具有相当的号召力，蒋介石不可能也不敢采用粗暴的武力解决的办法。前几年因一时冲动扣押胡汉民，几乎天下大乱，群雄并讨，弄得十分被动。如若运用一般的权术阴谋，蚕食削弱政敌力量，却又收效甚慢。因此，只有通过巧妙手段，置汪精卫于不义，使其人神共愤，彻底失去东山再起的可能。

其三，汪精卫对目前的抗战已形成了破坏性。从抗战一开始，蒋介石就拼命叫嚷：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这不仅针对共产党而言，也是借此约束国民党内各派各系。但是，汪精卫的所作所为却与蒋介石的这一要求有所抵触，即以抗战政策论，蒋介石终究是国民政府的领袖，军事上负以全责。而汪精卫却是个投降主义者，大量散布投降主义论调。作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这样做法势必混淆视听，影响士气。已经有一批求和者正聚集在他的身边，就连自己的心腹周佛海也改弦易辙，追随自己的政敌了，其危害已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

其四，将汪精卫推向日本人不会有太大的恶果，汪精卫的实力在政不在军，国内几支重要的地方实力派与汪关系都不甚融洽。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均是主战派，虽与蒋介石素有矛盾，却是明于大义之人。阎锡山老谋深算，明哲保身可以，卖国投敌断乎不敢。粤系张发奎部虽与汪渊源甚深，但后来却看透了汪精卫反复无常的嘴脸，已与之割袍断交。

基于以上原因，汪精卫的叛逃与蒋介石的设计怂恿有很大关系。

文人掌兵　　汪伪军权掌控之谜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军事体制上完全照搬蒋介石那一套，成立了所谓“军事委员会”，汪精卫自兼委员长，周佛海和陈公博为副委员长。但汪精卫的委员长和蒋介石的委员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汪精卫本人没有兵权。那么，汪伪政府的兵权到底在谁的手里呢？

陈公博在1940年之初，从香港到上海参加汪精卫政府时，便想掌握兵权。他曾对周佛海说：“我别的职务随汪先生支配，但我讨一个政治训练部长来干。”陈公博的目的是想以政治统治军事，伸手抢夺以政统军之权。周佛海何等精明，说：“军队的政治工作是你我的老本行，你愿意出来主持很好；我推荐

罗君强来替你帮忙，他也是很内行的。”



早年陈公博

陈公博说：“罗君强很能干，我们大家替他考虑一个独立的职务让他担任，我看不必以副部长一席让他屈就。我自己不是正式的军人出身，想找两个军官来担任副部长。”由此可见，在汪伪集团内部对军队控制权的争夺是很激烈的。

周佛海是一个文人，却醉心于执掌兵符。他主要通过四条线，即从黄埔系、西北军系、东北军系和日本士官系四方面下手，控制和掌握军队。

周佛海当过黄埔军校的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利用师生关系，笼络失意的黄埔军人，谢文达就是典型的一个。谢文达，原名谢忠锐，黄埔一期生。曾任国民革命军团长，后在上海做生意。汪伪政府成立，周佛海推荐谢文达任和平建国军第十四路军司令，不久，汪伪和平军改编为绥靖军，周佛海举荐谢为暂编第十师师长。周佛海还令谢文达成立黄埔同学会，倚靠黄埔同学会来联络、吸引黄埔军人。周佛海手下还有一个干将叫刘启雄，此人为黄埔二期生。1937 年 11 月参加南京保卫战时为旅长，城陷时躲避于难民区，后辗转到开封。汪伪政权建立后，周佛海专门召见刘启雄，荐其为军官训练队队长。1941 年 9 月 16 日，汪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立，汪精卫任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席，周佛海任校务委员，推荐刘为校务委员兼教育长，掌握该校的实权。1943 年 9 月，周佛海又调其为警卫一师师长。

黄埔系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叫刘夷，黄埔二期生，为蒋介石之大将刘峙的侄子。1940 年 9 月 29 日，汪精卫原警卫旅旅长张诚病死，周佛海将其遗缺给了刘夷。刘夷因与参谋本部常务次长刘培绪有宿怨，警卫旅又发现有两名士兵私藏炸弹，其中一名士兵日记本上记有刘培绪的地址，诬陷刘培绪图谋不轨，欲谋刺汪精卫。汪只听一面之词，派人将刘培绪看管起来。后经李士群将此案澄清。刘夷遂不受重用。

刘培绪曾任蒋介石军事委员会中将高级参谋、第十一军团第四十师师长。1939 年 12 月，汪伪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正式成立，刘培绪为副教育长。不久，升为参谋次长。刘培绪后改任第二军军长。

还有张海帆，此人为黄埔一期生。周佛海委其为汪伪陆军督练处处长。

由于黄埔系投汪伪的不多，周佛海的目光转向原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军官身上。这两支军队虽然归顺蒋介石，但一直受排挤，因此在抗战中叛蒋投汪的人数最多。周佛海控制最得力的要数西北军旧部了，主要通过刘郁芬、郑大章和张岚峰等人。

刘郁芬为冯玉祥西北军重要将领。中原大战时为西北军后方司令，代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在蒋介石的军事参议院中任闲差。汪伪政府成立后，在周佛海的保荐下，刘郁芬任开封绥靖公署主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委会副主任委员。1942 年 8 月任军委会总参谋长。刘郁芬利用过去的老关系，又找来老部下郑大章。

郑大章是西北军一员骁将。中原大战后，任第二十九军骑兵师长。在刘郁芬的诱劝下，郑大章降了汪伪，任军事训练部常务次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周佛海的保荐下，郑大章后为汪精卫的警卫师师长。

张岚峰为原西北军炮兵团长，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经济，回国后任旅长、师参谋长等。1938 年在商丘组织伪“豫东招抚使署”和“豫东剿共军总司令部”，自称“招抚使”和“总司令”。刘郁芬引荐张岚峰结识了周佛海。投汪后，周推荐其为和平救国军第一军军长。张策反了鲁西南的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十九集团军所属游击总指挥孙良诚。

1942 年 4 月 22 日，孙良诚率所部第六十九军、第十三旅及特务旅两万五千人投敌。孙良诚遂成为汪伪军队之主力。汪精卫将该部编为第二方面军，委其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

赵云祥原是西北军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九旅教导队队长。七七事变时，所部在北平北苑被日军包围，赵率部突围。在河北改番号为抗日民军第二路，赵为司令。后被孙良诚收编。番号为暂三十师，赵为师长。孙良诚投降汪伪，拉着暂编第三十师师长赵云祥一起投敌。带过去两个旅一个团的兵力，被委为第四军军长。

张岚峰策动孙良诚等有功，后升伪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很快也成为周佛海的心腹。后来，周佛海与重庆方面取得联络，为与共产党争夺苏北，拱卫东南，特将实力较强的孙良诚部从河南调苏北，增厚苏北的兵力，任孙为苏北绥靖主任。因孙部是驻河南的，属华北防务带，该部调动必须与日军华北军部商量，费尽周折，才将该部于 1944 年底前移防苏北。

周佛海依仗刘郁芬、郑大章、张岚峰和孙良诚的影响，收拢了一批西北军将领和能战之军。例如庞炳勋、孙殿英、刘昌义、程心明、赵云祥、郝鹏举等人。

周佛海控制原东北军旧部，主要通过鲍文樾来进行操作的。鲍文樾，曾任安国军三四方面军军团参谋长、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东北讲武堂教育长、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军事委员会第二厅副厅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40年3月，任汪伪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代理部长、军政部长、陆军部部长等职。周佛海通过鲍文樾的关系，招降了不少鲁苏战区的原东北军旧部和山东战场的抗日部队。



罗君强

鲍文樾最大的“功劳”是将东北军第一一一师三三四旅旅长荣子桓以及新四师师长吴化文拉到汪伪阵营中来。

吴化文，西北军旧部，原是韩复榘手枪旅旅长兼济南警备司令。1938年月1月，蒋介石枪毙韩复榘后，吴化文自立门户，复归东北军系的山东省主席于学忠指挥。在鲍文樾等人的策反下，1943年1月18日率部投降汪伪，所部改为山东方面军，任总司令；后改为第三方面军总司令。荣子桓于同年6月在鲁南附敌，改编为第十军，荣为军长。

周佛海利用旧时同事关系，晓之以利，动之以权，拉人下水。1932年周佛海任江苏省教育厅长，与江苏省政府中将保安处长、镇江警备司令项致庄极熟。抗战之初，周佛海经常在省垣镇江与项致庄等闲谈，大发低调谬论，项致庄亦多附和。项后为第三战区炮兵副总指挥，由于深受周佛海“抗战必败论”的影响，偷偷潜往上海，在周佛海的“开导”下投降汪伪。1943年2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旋任参谋次长兼总务厅厅长，苏北绥靖公署主任，12月兼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项致庄到苏北后，将第二十六师陈同、第二十七师丁聚堂、第二十八师田铁夫三个师合编为第十二军，项致庄任军长，调往浙江。不久，因项部在杭州某戏院看戏，与日军发生冲突，打死了一名日军。日方坚决要求项致庄辞去第十二军军长，周佛海无奈，调亲信张恒接替项致庄之职。项后调任伪江苏省省长。

周佛海还通过缪斌的关系，收买地方势力派，即苏鲁皖边区游击正、副总指挥李明扬和李长江的军事力量。缪斌曾任广州黄埔军校教官、北伐军第一军副党代表、东路军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江苏省民政厅长等职，时为北平伪新民会副会长。在缪斌的诱说下，李长江于1941年2月13日在泰州率所部一万余人投降汪伪政府。随李投汪的高级将领有：第一纵队司令丁聚堂、第二纵队司令颜秀五、第六纵队司令陈才福、第七纵队司令秦庆霖、第十纵队司令范杰。伪军事委员会将该部编为第一集团军，特任李长江为总司令。

此外，周佛海对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军人也另眼相看，并引为心腹。中央警卫军的编制计议已久，但到1943年只成立了一个师，到1944年才成立了二、三师。警卫二师师长秦汉田，所部驻蚌埠；警卫三师师长钟健魂，所部驻句容、江宁、六合。该军名义上由陈公博兼军长，但实际掌握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军参谋长祝晴川手中，此人是周佛海的亲信。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还有张耀宸，字恒，原苏鲁皖边区总部中将军务长。投汪后，任编练总监公署参谋长、参谋本部次长。在周佛海的坚持下，张恒到浙江担任第十二军军长。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周佛海以其乡先辈曾国藩为榜样，文人掌兵，自有一套。汪伪的武装力量表面在汪精卫的手里，其实实权在周佛海手中。要控制军队，第一是要控制它的军事首领，周佛海在汪伪政府中暗权甚大，他用封官许愿的方法，成功地控制了一批掌握兵权又欲攀龙附凤的军头。第二，兵与粮饷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军头掌握其部队，靠的是薪饷，无饷可发，军心必然涣散，甚至发生哗变，在这一点上，周佛海大有优势。他用手里掌握的经费，可以让军队听其调遣。第三，汪伪的军队要发展、扩充，一定要补充弹械，军费预算、购买武器弹药都离不开周佛海的一支笔，这也是他控制军队的有效方法。此外，我们举周佛海的一天日记来看其处理军事活动，也能了解他对军队的掌握程度：

1944年9月10日周佛海日记："八时起。接见前海少特，嘱其赴汉联络……下午，接见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陆振清、宪兵司令部参谋长王炳鳞，询京郊治安情形。召陆军督练处长张海帆，询工作情形。海州税警分团长杨仲华来见，报告防务及整编情形。"

周佛海对主要军事首领的任用、部队的调防、编制与薪饷预算、军事借款和条约的签订，都有生杀予夺的决定权。类似这种情况，周佛海日记中比比皆是。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汪伪的武装力量是操纵在周佛海手中的，汪精

卫、陈公博只是点缀而已。

乞求活命　　褚民谊“献”孙中山肝脏之谜

大汉奸褚民谊在汪伪政府中任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广东省长等伪职。日本投降后，褚民谊配合军统协助“诱捕”陈璧君。他在关押期间，主动写自白书，料想能将功折过。他在答辩书中写道：“总之，不要把有用之食物养一无用之老人，觉得太不经济，所以本人情愿以一死了之。因本人久将生死、毁誉、名利等置之度外……总之，蒋先生是主张抗战救国，汪先生是主张和平救国，彼此主张不同，而救国则一。现在胜利到来，抗战者可称劳苦功高，与国同休。可惜汪先生忍辱负重，中道崩殂，不获躬逢其盛，然而国真得救，吾知汪先生亦必含笑于九泉矣。本人追随两先生有年，一则庆其救国之告成，一则叹其救国之情良苦。倘谓罪所当诛，俾得追随汪先生于地下，决当引领待罪，毫无余憾。”

虽然他口口声声不怕死，但却要求用手中的一件“国宝”和法庭交换活命，这是什么“国宝”呢？

1946年4月15日下午2时，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庭公开审理褚民谊汉奸案，到庭旁听者极多。褚民谊在法警押解下走上被告席，身后是一片唾骂“大汉奸”之声。检察官韩焘站起来说：“本案起诉要旨与起诉书同，褚民谊，你对检察官的起诉有何辩解？你有何要辩论的吗？”

褚民谊答辩道：“我当然有一肚子的话要说。检察官说南京政府是想推翻重庆政府，说有了中央政府，何必再要南京政府？……要知南京政府是在日本铁蹄之下，日本占领之特殊情形下，而来救国救民的。和平救国是用和平的方法来折冲的，像重庆秘密派人来南京，我们决不追究，甚且或要掩护他们……”

他为汉奸涂脂抹粉，辩护说：“检察官说南京政府无利于人民之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苏州如果没有陈则民当时出来维持，恐怕苏州到现在不是这样的，市面人民恐怕也要受到更大的害，这是苏州人所知道的。华中支那的几个公司早已成立，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来交涉取消了四个。这都是在敌武力下以和平方法争回来的，这就是和平抗日。南京政府在日本人铁蹄之下来支持人民……”



褚民谊在法庭上

说到这里，褚民谊略显有些激动，提高了声音："本人认为，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不应孤注一掷，一定要像汪先生所说，忍辱负重来维持地方与人民，而来收回失地才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英美登陆仍在抵抗而不策应是汉奸，或胜利后还在拥兵自卫的也是汉奸。南京政府于敌人投降之后的第二天即自动撤销，就不应算是汉奸了。"

他慷慨激昂大声说："本人在外交部长时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可办，对于日本人占我民间房屋或其他不利于人民的事，我就出来与他争论。日本人因为我的年纪大、声望高，对我交涉的事也让出来或改正，这也可以说是我抗日的一种方法……当时我国武力不及，已退到后方，试问人民是否希望有人出来维持他们呢？所以南京以和平方法抗日来维护人民，总是不错的。至于下面的人有不好的地方或贪污不法的行为，那就非南京的本意了。"

褚民谊稍喘了一口气，继续说："再说到日本投降后至今，中央有许多地方还未接收到，而南京政府昔所能统治的地方都是抵抗别的组织，等待中央来接收，所以现在江南一带能有今日，这都是南京政府的力量，人人所共知的，不待本人赘述。这不能说南京方面无利于国家吧……"

4月22日，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庭开庭，审判长推事孙鸿霖庄严地宣布：

"被告褚民谊因汉奸案件，经本院检察官起诉，本院判决如下：褚民谊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予以没收！"



孙中山灵柩安奉大典

当褚民谊被押出法庭时，满天春雨，飒飒而至。他心里明白，虽平生九死一生，如今却难逃此劫。褚民谊一方面表示不怕死。称“俾得追随汪先生于地下……毫无余憾”。但另一方面，他还是想为自己做最后一次努力。他想到一个或许能活命的方法，于是向法官声称自己有重要的国宝，条件是交出来换自己的生命。他手里的“国宝”，就是孙中山的肝脏标本。

原来，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于北平协和医院逝世后，其遗体解剖，肝脏被泡在福尔马林药水中，装在一个大玻璃瓶里。孙中山的灵榇在 1929 年 6 月 1 日奉安南京中山陵，而其内脏当时保存于协和医院里。1942 年 3 月下旬，褚民谊去北平“公干”之际，得知孙中山内脏的下落，遂分别用玻璃瓶盛好，再用药水浸泡，瓶外覆国民党旗、国旗各一，再以两木匣装好，带至南京。

军统负责人郑介民听说此事后，立即赶往苏州监狱提审褚民谊。据褚民谊交代：“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军接收各地英美财产，至北平协和医院，发现该院研究室内藏有总理遗体腑脏标本。嗣南京伪府获悉，故派我于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赴北平，经与日大使馆北平事务所及敌酋冈村宁次商洽，允携回南京。故于二十七日至协和医院取出，随即至天津，二十八日乘车南下，二十九日抵浦口，当即赴陵园，暂供于总理灵榇后面，至四月一日始正式恭奉置于灵榇之前面，不知现在是否存在。至切片及蜡块与临床纪录等，现由上海汤医生保存。因汤曾留学比国，专攻癌症，经汪逆兆铭之同意，借与汤医生研究。”并谓“总理逝世后，协和医院在表面上已将其腑脏取出焚化，即孙夫人及孙院长与在院照料之吴铁城、郑洪年亦不明底蕴，仅知业已焚化。”



褚民谊将孙中山灵脏用木盒盛装，从北平带到南京

郑介民又派员询问当时孙中山的卫士长、时在陵园管理委员会任警卫处长的马湘。马湘说："本人追随总理有年，未尝远离，总理逝世后，以当时悲恸逾恒，故虽曾亲视含殓，究以泪眼晕花，未及注意，而在遗体解剖时，以奉命侍卫孙夫人，故未亲见，仅闻五脏取出后焚化，装入一红色瓶内，放置于北平碧云寺之衣冠冢，其后或径随灵奉安于南京陵墓内亦未可知。"

于是，郑介民亲自赴上海镭射医院找到治疗癌症的专家汤齐平医生，从他那里取回孙中山的肝脏切片，返回南京。5月22日郑介民向蒋介石邀功，说是自己探听到总理肝脏的下落，并亲自把"宝贝"找回来。蒋介石很高兴，夸奖了郑介民。

5月29日，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庭判决：对于江苏高等法院之判决为"原判决核准"。褚民谊之妻陈舜贞不服，多方奔走，终于在炎炎的夏季有了回音，蒋介石对褚民谊汉奸一案终于有了从轻处分之手谕，但仍然没有逃脱被枪毙的下场。

8月23日，苏州城已有阵阵秋意，暮蝉凄切，回响在苏州狮子口第三监狱的刑场外。中午，执行命令的时间到了，褚民谊原希冀献出"宝物"以获得法庭宽大，然而结果换来的还是子弹，褚民谊欲哭无泪，好不甘心。法警一声枪响结束了褚民谊的生命，却留下种种传说。

有一种说法是：蒋介石曾将从轻处分褚民谊的手令交给褚妻陈舜贞亲携，让其面交江苏高等法院审判长孙鸿霖。在陈坐车从南京去苏州的途中，不知是小偷还是蒋指使的特务将手令偷走，陈舜贞拿不出凭据，褚民谊遂被枪决。第二种说法是：最高法院已复判"维持原判"，将蒋介石的手谕顶了

回去。

到底如何？猫腻太多。

买凶锄奸　　李士群被毒杀之谜

日本投降后，军统局诱捕了汪伪政府第三号大汉奸周佛海，后移交南京高等法院进行公审。周佛海在自白书中吹嘘自己“协助抗战”，其中有一条是“诛除奸伪”。他说：“李士群替敌人做爪牙，戴局长通知我铲除，使中央工作人员减少困难和危险。我便和罗君强、熊剑东磋商，历时四月之久，费款许多万，终于把他毒死。这个人一死，中央在东南秘密的抗日工作才能顺利进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李士群原来是中统特务。他投敌后，心毒手辣。因破坏抗日力量有功，他被提升为汪伪警政部长、伪特工总部主任。他指挥“七十六号”，与戴笠的军统在上海滩大斗法，给军统组织以很致命的破坏，也使许多无辜者成为牺牲品。戴笠充分认识到李士群的存在对军统危害太大，于是通过秘密渠道，让周佛海除掉李士群。

借刀杀人、隔山打炮是周佛海惯用的手法。他向影佐祯昭添油加料，讲述李士群的飞扬跋扈。影佐认为：“不可使某一人权太大。现在，新政府中有两大势力，如同癌症，一是李士群，另一是任援道。任的为害小，李的为祸大，如不及早防止，将来必有大患，应该立即取消警政部。”周佛海要汪精卫同意取消警政部，但汪精卫也不敢得罪李士群及特工。

李士群闻讯暴跳如雷，以辞职相要挟。影佐祯昭主张立即予以制裁，汪精卫却说：“动不得，如果他调动特工对付我们，如何是好？”

周佛海说：“如果李士群以特工为后盾而反抗，尤其应乘其势力未大时，先予抑制。”无奈，李士群有日本顾问晴气中佐撑腰，又有汪精卫罩着，周佛海奈何不了，气得说：“汪先生有软化倾向，盖畏忌特工也。胆小如此，似非领袖所宜有。”周佛海认为之所以这样，是“汪先生畏忌及日方庇护，为养成其骄横之主要原因。今日方似有觉悟，而汪先生则仍畏忌，此不仅不能维持威信，且非爱护士群之道也。”

在周佛海和影佐祯昭的联手下，1941 年 8 月 16 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

通过机构及人事调整案，撤销警政部，增设“调查统计部”，任李士群为部长，以保持特工组织；撤销社会部，改设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由周佛海兼委员长。这个新机构实际上是变相的特务警察机构，以此来分李士群的权。



汪伪特工总部——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

但李士群也不是好对付的。他请汪精卫到清乡区视察，亲自护卫，并在汪精卫所到之处，都张贴“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等花花绿绿的标语，高压手段威逼老百姓来参加欢迎汪精卫的大会。由于李士群“清乡”有功，被汪精卫特任为伪江苏省主席。

李士群手持尚方宝剑，挟天子以令诸侯，不知自忌，居然多次打上门来要钱，这更令周佛海难以容忍。他在日记中写道：“李士群又来借款。此人不来则已，来必要钱。至现在止，凡所求，均必应之，如仍不满，惟有听其自然耳。”

周佛海自从与戴笠暗中往来，身边安插了几个军统特务和秘密电台后，疑神疑鬼，整天提心吊胆，特别害怕有什么把柄落到李士群的手中。

正巧，程克祥的电台传来了戴老板的绝密指示：“李逆士群甘助日寇为虐，迭次残害我地下工作人员，着即周佛海、罗君强诸兄等商制裁办法，迅即回报。”

周佛海找来罗君强和熊剑东商议。熊剑东与李士群有仇，他自从担任税警总团副总团长后，在上海和江苏的“清乡”时，为争地盘，他与李士群的特务武装不断发生冲突，甚至双方开枪火并。李士群动了杀机，与熊的旧部、时任伪调查统计部次长杨杰密谋，派杀手在上海北站打熊剑东的黑枪，刺客被日本宪兵队当场捕获后，供出了幕后指使者是李士群。从此，熊剑东与李士群

不共戴天。听说要杀李士群:“这容易,派几个弟兄埋伏在苏州到上海的公路上,一扣扳机就要他的命……”

罗君强摇头说:“不妥,那家伙精得猴似的,坐的是子弹打不透的保险汽车,腰里掖的是最灵巧的左轮手枪,还有几个百步穿杨的保镖。一旦失手,调查统计部的特务要查,日本特务要查,汪先生也要查,我们如何交代?”

周佛海阴险地说:“我有一个好主意,不劳我们亲自动手,花点钱让日本人去杀他!”

于是,周佛海与日本宪兵司令大木繁少将密谋,得到默许。熊剑东搜集了一些李士群的清乡队如何仇视日本军队的证据,在日本宪兵队冈村中佐面前说了许多李士群的坏话,并拿出一大笔钱请冈村锄掉李士群。

1943 年 9 月 4 日,冈村约李士群到上海外白渡桥百老汇大厦七楼的一间房间谈话。下午 3 时许,李士群带着日语翻译、调查统计部常务次长夏仲明如期到达。李士群见熊剑东在座,当即脸一沉,反身要走。

冈村上前拉住,状若诚恳地说:“李先生与熊先生都是我的朋友,而且都是年轻有为,大家正可以为国家与‘大东亚’做许多的事。不料两位竟为一些小事发生误会,这是很不幸的。据我知道,这根本是受人挑拨,更不是什么深怨夙仇,即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你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冤家宜解不宜结’吗?何况两人都是我的好朋友,又同在一起,我更不能看两位这样下去,变成不是冤家也是冤家,这不论对个人和国家来说都是损失。所以我本着和两位的友谊,邀请两位来把误会解释明白,成为好朋友,朝大的方向进行合作。若能如此,即叫我粉身碎骨为你们帮忙,我也是非常乐意的。”

冈村说完,李士群没有吭气,熊剑东立即表示:“过去的事都是兄弟我的错,我向士群兄道歉,兄弟愿捐弃前嫌,与士群兄和好。今后如有离心离德之事,被乱枪打死!”

这样一来,李士群反倒不好意思,说:“原来的误会皆是手下人所为,多有得罪,我也向你赔礼,愿消除误会,重结新谊!”

冈村将李、熊两人的手叠在一处,高兴地说:“没想到这么快二位便消除了误会,作为你们朋友的我,也觉得脸上有光。大家难得有此机会,我请客,边吃边谈。”

李士群一听要吃饭,顿时警惕起来,推说自己这几日正腹泻,不能吃东西,说着就要告辞。冈村佯怒道:“你的面子的不给我,让我难堪!”

“不敢不敢,我的确身体不好,不能奉陪。”李士群连忙解释。

冈村点点头说:“你的不要走,陪我们坐坐,少吃一点。”

李士群无法,只好坐下来。宾主入席后,下人摆好酒菜。冈村与熊剑东殷勤为李士群敬酒,李滴酒不沾,只是看他们吃哪个菜,自己也用筷子搛一点意思一下。冈村则与熊剑东大吃大喝,十分尽兴。这时,一位日本少妇幽雅地端着一只放着牛肉饼的盘子进来。冈村介绍说:“这位是我的妻子,刚从日本东京飞来。”日本少妇跪到李士群面前说:“这是我亲手为你们专门做的,请尝尝。”

看着李士群在犹豫,熊剑东伸手拿了一块,咬了一口,连称“味道不错”!冈村拿了一块,又递给李士群一块,便大嚼起来,夏仲明也吃了一块。李士群见他们都吃了,不好意思,也吃了半块。冈村催他再吃一点,李说什么也不吃了,紧接着起身去卫生间,想把胃里的食物抠出来。谁知冈村紧随其后,也跟了进去,李士群无法吐掉,只得转回来,又勉强坐了二十多分钟,便起身告辞,坐车回家。在车上李士群问夏仲明:“今天的牛肉饼很难吃,你觉得怎样?”夏仲明说:“没什么呀,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原来,冈村料到李士群不会拿牛肉饼,便安排人将有毒的那只饼做了暗号,亲自递给李士群。

李士群的牛肉饼中的毒药,是一种从患霍乱的老鼠体内培养出来的一种病毒,其症状是上吐下泻,但要等三十六个小时后才能发作,且无药可以救治。

李士群回家后,用手指伸进喉咙,将所吃的东西都抠出来,哇哇吐了半天,觉得好受多了。于是便放心与人打麻将,一直闹到天亮,第二天返回苏州省府,跟正常人一样。到第三天,病情爆发,大吐大泄,连忙请来省立医院的院长储麟荪前来急诊,但药石罔效,束手无策。到第五天,即9月9日,李士群已是皮包骨头,张口瞪目而死。

周佛海闻讯,好像三伏天喝了冰啤酒,心里的痛快难以言状。但在日记中不显山不露水地写了寥寥几个字:“忽闻李士群逝世。”

世人皆欲杀　　汪精卫死亡之谜

也许是天怒人怨,大汉奸汪精卫之死在社会上有许多传闻,有人说他是被日本人作为包袱遗弃而有意害死的;也有人说,是被江湖医生用错了药;还有传闻是被国民党特工毒针杀死。

考证以上种种说法，遭日本人毒手似无可能，因为其时日本政府对汪伪政权还是持扶植态度，何况也没有影响、资历各方面能顶替汪精卫的合适人选。

至于庸医杀人之说，坊间也十分流行，汪精卫自 1935 年被刺客孙凤鸣打了三枪后，虽经德国大夫延治，但背中那颗子弹却始终没取出来，这让汪精卫心里一直有着压力，因此于 1943 年 12 月，在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后勤部队长中将医师铃木小荣主刀，将子弹取出。



正在养伤的汪精卫

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术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大小便失禁，病情加剧。陈璧君心中焦急，便求助于中医秘方。他的侄儿陈春圃经百般打听，终于从无锡找到一位治骨伤疮毒的名医“刘一帖”，意思是再难治的伤，只要他一帖膏药就会痊愈。

刘一帖对汪精卫的病情作了全面的检查，只见汪的创口已经平复，只是脉象细促，虚火内热。因此便开了两剂退火药，也只是普通的方子。接着又拿出一片膏药，贴于汪精卫后背枪伤处。当即，汪精卫感到一股清凉，疼痛大为减轻。

第二天复诊时，陈璧君对刘一帖已是奉若神明，赠以厚礼。而刘一帖也是大话连篇，告诉陈璧君，汪精卫创毒不重，只要再贴上一剂散毒膏药，病就除根了。

谁想这第二张膏药贴上不久，汪精卫就感到不适了，到了夜间更是发作起来，四肢抽筋。陈璧君见状，连忙让人请来日本医师，并连夜寻找刘一帖，要问个究竟。

哪知道那刘一帖已不知去向，只留下一封信：“厚礼不该收，既收也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

看来这刘一帖还是一位义医，是存心要汪精卫命的。

正因为刘一帖的这张膏药，让子弹铅毒扩散入骨，使汪精卫的病情日趋恶化，病入膏肓，成了致死的原因。

而另一种说法则更是离奇，汪精卫是被军统特工一针毙命的。有一篇

《大汉奸汪精卫究竟死于谁手》的文章，对这一说法作了详细的描述：

1941年，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受重庆方面派遣潜入汪伪政府，充当江苏保安司令，特务头子戴笠还给他派了一位高级女特工作为助手，此女姓黄，代号一〇三，其任务是伺机刺杀汪精卫。

再说汪精卫自日本医生为他取出身体残留的子弹后，因为种种原因，病情一直未能好转，尤其是每日午夜时分更是痛疼加剧，辗转呼号，只有通过按摩稍能减轻痛楚。因此急需一位既信得过又手艺高超的按摩师。

周佛海知道这一情况后，向汪精卫推荐，唐生明家中有位按摩师，他以前曾见过。因为唐生明是汪精卫信得过的人，当然黄小姐也就顺利打进了汪精卫的府上并很快取得了信任。

1944年2月13日，黄小姐接到重庆秘密指令："一〇三A，立即制裁。牛郎。"黄小姐知道"A"即代表中枢命令，而"牛郎"就是戴笠的代号。于是她取出密藏的毒剂，在第二天伺机带进了病房。乘着汪精卫昏睡之际，将毒针打入吊水瓶的药液中。根据毒剂用量判断，汪精卫将在四十八小时内毙命。

然而整整过去了两个星期，汪精卫依然活着，其他人也没有发现异常。后来唐生明请专家进行了分析，之所以毒剂无效，很可能是输液中有某种药物分解了毒药，降低了毒性的作用。

然而，这毕竟给汪精卫的病情带来了影响，身体更是每况愈下。经专家多次会诊，决定送他去日本医治，3月3日，汪精卫乘日本专机前往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诊治。

重庆方面针对这一情况，急电黄小姐，要尽力争取与汪精卫同往，并派人送来更为先进的毒针，准备再次暗杀汪精卫。经过活动和努力，黄小姐终于争取到与汪精卫同行。

汪精卫在日本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前后七次X光施治化疗，病情明显好转，已经可以在人的陪同下到花园里散步了。11月7日，一份以唐生明名义拍来的明码电报飞到了日本，暗示黄小姐，制裁行动立即执行。次日下午晚饭时候，正在照料病人的黄小姐见四下无人，遂用毒针直接对汪精卫进行肌肉注射。至次日，汪精卫的病情出现逆转，高烧达四十一度六，脉搏跳动增至每分钟一百二十八次，呼吸困难，瞳孔放大，经全力抢救仍无效，于11月10日下午4时去世。

以上种种说法，也有人认为是无稽之谈，这其中包括侨居美国的汪精卫女儿汪文惺和女婿何文杰。汪精卫的背部枪伤是在1943年以后复发并加剧，

主要原因是体内弹头所含铅毒已损及脊椎，遂决定采取外科手术取出弹头。

弹头取出后，发现该弹头已经在体内腐蚀成两截。此次手术从表面看比较成功，刀口很快平复，没几天即全部拆线。然而术后不及二十天，从1944年1月9日起发现身体不适，高烧一直不退，一般怀疑是“手术时尚留有积血”，2月18日，由日本军医进行进一步诊断，断定汪为脊骨癌，学名为“多发性骨髓肿病”，此病至今仍无有效治疗手段。于是，决定将汪移往日本继续治疗。

名古屋帝国大学为汪精卫的到来作了严密的安排，将医院大楼四层的特别病房作为汪的病室，为了保密，称为“梅号”，三、四两层全部供汪随从人员和日方参与治疗人员住用。

在日本经过了又一次手术后，病情依然时好时坏，日本方面几乎集中了医学界的主要权威，但还是束手无策。到了8月，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就警告过周佛海，汪精卫病势严重，恐撑不了一个月了。虽然经X线治疗，略见效果，但因卧床太久，又引发褥热，身体严重衰弱，已到灯枯油尽之时，至11月10日去世。

失节落水　　周作人当汉奸之谜

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家。抗战期间变节投敌，成为著名的文化汉奸。那么，这样一个文化扛鼎人物，为什么会当汉奸呢？其中有何隐情？

周作人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多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部分南迁大后方。多数教职员随校离平，周作人以“系累太多”留在北平，拟以“卖文为生”。北大校长蒋梦麟委任他留守北大，保管校产及图书，由校方每月寄生活津贴费五十元。

9月26日，周作人在给《宇宙风》主编陶亢德复信中谈到他当时的情形：“现只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请勿视留平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各位关心我们的人。”表达了他自甘清贫，不为五斗米而向日军低头的决心。

1937年12月，北平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周作人的浙江同乡汤尔和出任伪教育部总长。他竭力拉拢周作人出山，但为周所拒绝。为了维持

全家“生活似颇窘”的困局，周作人一面翻译希腊神话，“每月交二万字，给费二百”；又执教于私立燕京大学，月薪一百元。

1938年4月9日，日本方面在北平召开“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周作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发表了亲日的讲话。消息传出，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立即通电全国文化界，指出：“周作人、钱稻荪及其他参加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以外，藉示精神制裁。”茅盾、郁达夫、老舍、胡适、丁玲、夏衍等十八位作家也在《抗战文艺》上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指出：“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俱在，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的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良。”“我们觉得先生此种行为或非出于偶然，先生年来对中华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实为弃此就彼、认敌为友的基本原因”；“希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向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其八道湾家中，被一个戴了口罩，戴了帽子，自称是天津中日学院的青年学生开了一枪，子弹为上衣纽扣所阻，皮肤擦伤，未中要害，但其车夫为救主而亡。周作人大为惊慌，“虽然没有被损害着，警察局却派了三名侦缉队员来住家里，外出也总跟着一个人，所以连出门的自由也没有了”。周作人后来承认，刺杀事件成为他落水的一个重要原因。

刺杀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爱国学生恨周作人落水，对其采取的警告手段；另就是日本人见其时时不肯加入而进行的威胁行动。十多天后，周作人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1939年8月，周出任伪北大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9月3日，参加东亚文化协会文学部会议，成为“东亚文化协会”成员；1941年1月，周作人升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伪教育总署督办，并以督办身份出访日本；1942年4月，出任伪北平图书馆馆长。5月，为庆祝伪“满洲帝国”十周年纪念，随同汪精卫赴满访问，在新京（长春）同汪精卫拜会伪满洲国傀儡政府主席溥仪。同月，前往南京，参加汪精卫六十大寿的庆祝活动。9月，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周作人任评议会主席。总之，他的头上顶了一系列文化汉奸的帽子。

在敌伪期间，周作人写下了不少美化汉奸政权和侵略者，宣传“东亚共荣”的文章。他在1941年5月为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编的《日本的孔子圣

朝》一书写序时说:“中国为孔子故乡,其道当可重光。日本神国而能容孔子道德之教,庙貌俨然,则其影响亦颇深远。窃希望以此因缘,东亚得以保存其思想上之健全性,维持人道与和平,此盖不独为孔子之光而已。”周作人还曾在日华协会成立会上发表谈话,称“此次成立日华协会必能予两国亲善提携有所贡献”;“日华协会自将本诸大东亚宣言之旨趣,促进两国文化交流”。1941年7月17日,周作人在北平伪中央广播电台以《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之关系》为题作了演讲,鼓吹“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华北反共最重要的工作”,为汪伪政权开展“治安强化运动”大唱赞歌。

日本侵略者称赞周作人:“近常来日(本),努力于日华文化之沟通,实可称日华文化上不可缺少之大关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国民政府开展了“肃奸运动”,军统局奉命逮捕汉奸。12月5日,在军统局长戴笠的部署下,在北平东城北兵马司汪时璟家中,用宴客方式将华北特任级汉奸予以逮捕,并即刻解往炮局监狱 ,周作人亦在此列。

1946年5月26日,周作人被押解到南京。6月17日,南京高等法院检察官以汉奸罪对周作人提起公诉。11月16日,高等法院以“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权十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判决书在认定周作人犯罪事实和判决理由后指出:“被告在各大学执教历有年所,我国人受其熏陶者不知凡几;又有相当学识,过去著作不少,我国人对其景慕者亦不知凡几。居领导民众之地位,负最高学府教育之重任,宜如何抱大无畏之精神,坚持到底,保全名节,以扶民族之正气。乃竟意志薄弱,一经遇刺,即变节附逆,觍颜事敌,只图个人偷生苟安,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不能不负刑事上之责任。”

周作人在受审和亲笔所具的自白书中,对历任本兼各伪职皆供承不讳,但对法官的起诉和法院的判决很不服气,除一再上书法院为自己辩解,希望法院“赐明鉴,宣布无罪”外,还搜集有利于他的证据,以达到免刑或减刑的目的。

周作人在法庭上和辩诉状中为自己的辩解说,自己在伪职期间因违抗敌寇政策,险遭敌宪兵队逮捕;虽在伪组织服务,但自始至终洁身自好,迹无贪污,行无恶据,亦无反抗本国之图谋,合于蒋介石对伪职人员“只问行为,不问职守”的“明训”;自己在伪职期间的所作所为,要么有利于抗战,要么是不得已而为之。故不承认有汉奸罪。

此间，有北大校长胡适、蒋梦麟等一批名人替周作人说话，或证明他是奉前北大蒋校长之命共同留平，保管校产的；或说明他在伪职期间保全了北大等校的图书仪器，使北大文化机关各种设备有增无减；说他曾发表论文论中国的中心思想问题，是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言论，以至被日本一个军国主义文人斥为“特殊之文学敌人”、“反动老作家”；或称他曾营救和掩护过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及教育工作人员许多人，等等。

周作人在高等法院判决后，向最高法院递呈申请状，表示“并未负原判决所谓‘抱大无畏之精神，坚持到底，保全名节，以扶民族之正气’之深期厚望。虽任伪职，并无罪行，既非通谋敌国，亦未反抗本国，在法律上自不应负汉奸罪责。即退一万步言，原判对所举有利抗战之事实，即予采信，适用减刑之规定，而对于六十三岁投老残年之被告，减处徒刑十四年，似与无期徒刑无可差异，量刑未免过重，画饼岂能充饥”，故对法院判决实难甘服。

最高法院受理了周作人汉奸案，认定周作人应负汉奸罪责自无疑义。法庭对周作人为自己辩解的种种理由一一进行了反驳，调查证明，周作人在伪职任内聘用日本人为教授，改编我国教科书，推行奴化教育等均有充分表现，有言论、有行动可证。而对于周作人所著之《中国的思想问题》，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自不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解免其通敌叛国的罪责。法庭认为原审以被告在伪职期内保存校产、图书及营救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经多方证明属实，已作了减轻判处，与《处理汉奸条例》有关规定相当，并无不合。只是被告虽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恶行。所以最高法院于 1947 年 12 月 19 日对周作人汉奸一案进行了复判，改判其有期徒刑十年。

周作人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一直到 1949 年 1 月才被保释出来，回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给他改造自新的机会。他一直住在北京八道湾老家，译书著文为生。1967 年 5 月 7 日去世。